



北大讲座

《北大讲座》编委会

第八辑

Lectures at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讲座

(第八辑)

《北大讲座》编委会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讲座(第八辑)/《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6

(北大讲座系列)

ISBN 7-301-09219-9

I. 北… II. 北… III. ①社会科学-中国-文集②自然科学-中国-文集 IV. Z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55888 号

书 名: 北大讲座(第八辑)

著作责任者: 《北大讲座》编委会编

责任编辑: 胡利国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219-9/G·152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21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0.125 印张 269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盗版举报电话: (010)62752017 62752033



目 录

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

——中国节假日制度的现代问题及其改进方略/高丙中/1

《红楼梦》的欣赏/周先慎/16

读书在燕园/初晓波/44

汉字文化的千古之谜

——竹简的发明及它对汉字文化的重大影响/侯开嘉/65

管理哲学/陈 沛/75

台湾经济的奇迹/林毅夫/99

质疑主流:对后发展道路的反思/朱天飏/110

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周志忍/125

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

——这是一个问题/余 斌/137

从刘晓庆案看法治观念的转变/钱列阳/153

在组织化与个体化之间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抉择/谢立中/169

从感应认知到理性的理论/陈嘉映/190

时代、个性与学术/王红生/208

新世纪的中国外交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牛 军/217



美国大选与对华政策/贾庆国/229

美国大选与竞选辩论/张睿壮/249

阿拉法特身后之谜

——阿拉法特逝世及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穆斯塔法·萨法里尼/262

印度宗教与现代化/陈峰君/284



文化自觉与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

——中国节假日制度的现代问题及其改进方略^①

■高丙中

高丙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文化研究、民俗研究、民族志方法、公民身份与公民社会研究等。著有《中国社会发展与文化研究的探索》、《民俗志》、《居住在文化空间里》、《民间风俗志》等书,并与人合著《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发表《民俗文化的建构》、《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等多篇论文。

费孝通先生在最近一些年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思考中国现代的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全局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的时候,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概念^②。他先是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明确提到这个概念,又在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的第三届高级研讨班上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再次论述了这个概念。此后,这个概念不仅为他自己多次使用,而且逐渐被多学科的学者使用

^① 本文是在中国民俗学会的一个关于传统节日文化的课题成果的基础上写成,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如刘魁立、陈连山、萧放、黄涛等的见解给予作者很多启发,特此致谢。

^② 如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自觉》,载《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4期;《文化自觉的思想来源与现实意义》,载《文史哲》2003年第3期。



开来。

文化自觉是在具有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对自己的文化的来源、得失的清醒反思。文化自觉是在跨文化交流的前提下对文化自我的一种自知之明。文化自觉是要克服文化上的盲目性,是要建立从本民族的文化实际思考民族未来的宏观意识。它既是我们反思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化历程的概念工具,也是我们采取正确的文化发展路向的思想方法。在文化自觉的概念中,人文知识分子今天能够多一个视角,明确自己对民族国家的文化使命。本文借助这个概念的思想逻辑,尝试着回顾近现代以来中国的节假日制度的问题,提出一些有利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意见。

直接地看,节日文化通常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文化的精粹的集中展示。间接地看,现代国家的节假日体系是反映一个国家根本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精神状态的风向标,是反映政府与人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重要指标。国家对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应该考虑如何把节假日作为展示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机制。从这种思想出发,我们看到我们国家对于节假日的制度安排存在认识上的偏颇和技术上的一系列问题。

社会上近几年十分关心中国节假日制度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批评和改进意见。中国的节假日制度的直接问题主要在于法定假日没有充分的配套的文化生活,而丰富多彩的民间的、传统的节日文化没有法定假日提供活动的充足时间。其深层次的问题一方面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民众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我们没有处理好时间的工具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当我们在现代极力用西历完全取代夏历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历法是计算时间的工具;当我们多次要消灭传统节日习俗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以传统节日为代表的时间框架对于我们的共同体的政治和文化的意义。简而言之,当时的变革在今天看来是文化自觉意识不够。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我们的节假日体系的问题,国家有必要在承认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或许还有重阳节这些“大节”作为具有普



遍的群众基础的时间主轴的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调整法定假日的分配,让官方系列、现代系列与民间系列、传统系列在同一个节假日体系里具有一种新的、更符合时代需要的结构关系,让它既具有足够的普世性而带来国际交往的便利,也具有充分的民族性而传递社会文化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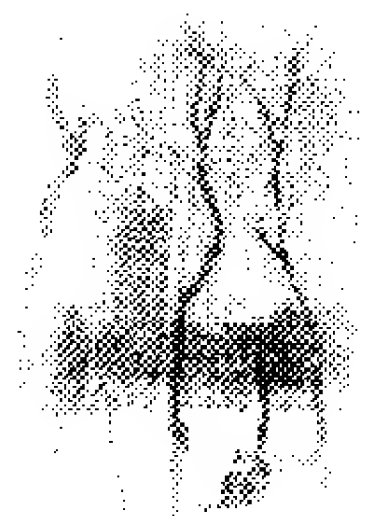
中国节日体系演变的主要脉络与传统节日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成长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定型于隋唐两宋时期。先秦时期不仅形成了以春社、伏日、秋社、腊日为主的节日序列,为后世丰富节日文化奠定了一个框架,而且这一时期积累的包括二十四节气和干支记日的历法以及包括祖先崇拜、天地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也为后世创设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准备了大量的文化素材。

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节日习俗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的社会经济条件、稳定的历法、道教和佛教的浸润,是这一时期节日习俗欣欣向荣的生长点和营养素。这一时期的节日序列可以梁代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为代表,主要包括正月一日元旦、正月七日人日、立春日、正月十五日、正月晦日、二月八日、春分日、社日、寒食、三月三日、四月八日、四月十五日、五月五日、夏至节、六月伏日、七月七日夜、七月十五日、八月十四日、秋分、九月九日、十月朔日、冬至日、十二月八日、除夕等。其中,除正月十五尚未成为灯节之外,还没有把清明和中秋视为节日。

隋唐两宋时期在节日民俗方面又有重大建树,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所述,当时的节日计有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正月晦、中和节、二社日、寒食、清明、上巳、佛诞日、端午、朝节、三伏节、立秋、七夕、中元、中秋、重九、小春、下元、冬至、腊日、交年节、岁除。这一序列基本上囊括了传统社会的重要节日。元明清时期对这一体系没有大的突破,但对传统节日实现了重大调整,突出了新年、清明、端午、中秋等四大节日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以适应民众生活的需要。

重要的传统节日同时也是官方的假日,体现着官与民在节假日体系中的协调与统一。历代在重要节日的放假或有不同,假期有10天、7



天、3天、1天等安排,如唐朝给官员放假,在中秋节是3天,在清明是4天;明朝的假日在冬至是3天,在元宵节是10天。

中国的节日体系是一种成熟的文明的缩影。它既是我们先辈长期不懈地探索自然规律的产物,包含着大量科学的天文、气象和物候知识,也是中华文明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和道德伦理的集中体现。因为有这一比较科学的时间框架,才有中国的古典文明的繁荣;因为有繁荣的中国古典文明,这一节日体系的内容才异常丰富多彩。

中国传统的节日体系既为社会提供时间容器,也是塑造社会的时间模具。它所依据的历法主要是阴历,同时兼用阳历。阴历依据月亮的弦、望、晦、朔确定月的周期,阳历依据从地表观测到的太阳的变化确定年的周期。中国人经过许多代人的知识积累而在汉代完备起来的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科学的阳历年的周期。例如,春节、中秋节等与月的圆缺联系在一起,清明节、夏至(端阳节)、冬至等与太阳在回归线上的来往联系在一起。综合太阳和月亮与人和自然的关系来确定节日的时间,能够更好地体现人与天(自然)的关系。中国人对月亮和月光的细腻感受发展为很独到的文化创造,由此积累的文化对人类文明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中国人重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欣赏柔美、重团圆的美学和伦理观念,都蕴涵在中国独特的节日体系之中。这些思想观念对整个东亚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部分地活跃在韩国和日本社会。

现代中国的节日体系的二元结构

在传统社会,中国也有朝野之分、官民之分、雅俗之分、贫富之分、贵贱之分,但是在节假日所代表的时间框架上却是高度整合、统一的。官方的假日是顺应民间的节日的。可是,这种官与民在时间框架上的和谐关系在现代一分为二,衍生出或冲突(压制与抵抗)或兼容(并存与互补)的复杂关系。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为了标榜自己的现代性,放弃作为王朝遗产的“夏历”的官方地位,改用“公历”(西历)。纪年以中华民国取



代历来的帝号,但不是以夏历,而是以西历的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的开始。按照最初的法令^①,中华民国以西历为主,兼用传统的阴历。在中华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节假日体系之前,曾经乐于借用传统的节日作为国家法定的假日。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在致袁世凯的呈文中提出:“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均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给假一日。”^②袁世凯批准了该呈文。阴历的1月1日要把自己原有的名称“元旦”、“新年”让给阳历的1月1日,自己则被称为“春节”。

现代国家一经诞生,就自信自己在开创历史,就把自己要纪念的重要日子作为全民的假日。这种把现代国家的事件列为纪念日而让它们成为“历史性事件”应该说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前苏联所开创的。于是,假日的来源不仅以宗教、(传统)节日为依据,还以现代的国家事件纪念日为依据,有的国家甚至完全以后者为假日的来源。1912年9月24日北京临时政府所拟“国庆日和纪念日案”被参议院通过:以10月10日为国庆日,1月1日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2月12日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到1929年,这种纪念日已经增加到28个。后来为了便于记忆和放假,纪念日又经合并与删减,数量变少了。大致说来,中华民国的主要节日有元旦、国庆、革命先烈纪念日、国耻纪念日、国父诞辰、国际妇女节、儿童节、国际劳动节、学生运动纪念日、教师节、植树节等。政府部门和国有部门按照公历建立了一个新的节日体系,并在这些日子举行自己的新式仪式。

而民众,尤其是城市私营部门的劳动者和农民,仍然按照夏历过自己的年和节。自然,那些过官方节日的人回到家里也还要参加传统的

^① 在1912年1月孙中山签发的《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中记载:“一、由政府于阴历十二月前制定历书,颁发各省。二、新旧二历并存。三、新历下附星期,旧历下附节气。四、旧时习惯可存者,择要附录,吉凶神宿一律删除。”——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② 参见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第67页。

节庆活动。这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准推动现代化而建立了自己的节日系列的民国政府所不能置之不理的。它下了很大决心要用官方时间框架整合民间节日。1928年5月7日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①的社会工程,原因是“考社会日常状况,十余年来,依然沿用旧历,罔知改正……一般民众之赛会、休沐,益复寻朔计望,蒙昧如故,于一国行政制度之下,百度维新之际,而政令与社会现状,如此悬殊,若不根本改革,早正新元,非惟貽笑列邦,抵牾国体,核与吾人革命之旨,亦属极端背驰。”^②于是,“拟办法八条,冀从根本上谋彻底之改造。”^③其中,第二条办法是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第三条办法是严令京内外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第四条办法是通令各省区市妥定章则,公告民众,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赛会等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例如将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元月内举行。但是,一个幼稚的现代政府要强力改变几千年的文明所积淀的节日民俗自然会事与愿违。有学者引山东《广饶县志》说,“民国改用阳历,提倡过阳历年节,始尚举行,后督促渐懈,仍然趋重阴历,旧习惯照旧存留”^④。不得已,南京国民政府在1934年初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⑤。

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一年要分开过成两个年;官方节日,作为一

①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6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6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类,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6页。

④ 简涛:《立春风俗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页。

⑤ 伍野春、阮荣:《民国时期的移风易俗》,《民俗研究》,2000年第2期。



种严肃的国家制度,得不到民众普遍的关注、支持和参与;全民性的重大节庆活动,却得不到官方在制度上的承认。中国自古以来家国一体、官民一体的节日体系就这样分化成了一种缺陷明显的二元结构。左玉河曾经把这种状况称为“历法上的二元社会”,并对它在民国初期的演变进行了比较详实的研究^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前政权的很多东西进行革命,但是继承了它的节假日体系的二元结构,并部分调整了那一套官方纪念日,订立的节日主要是元旦、植树节、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党的生日、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外加一个传统的春节。其中,全民假日安排在元旦、春节、劳动节、国庆节。这项时间制度由政务院在1949年12月23日颁布。新政府具有大得多的社会动员能力,能够吸引、组织民众参加官方节日活动。但是,传统依然保持着它的惯性。由于私有经济继续存在,城市的私营部门的从业者和农村的家户劳动者可以灵活安排时间,他们在传统节日自己给自己放假,为节日活动的延续提供了时间保证。由于脱离了长期的战乱,社会安定,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们能够更好地开展传统的节日活动。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社会所特有的活动出现在传统节日里。

传统节日民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也有一波三折的遭遇。在起初的十多年,政府不断创设、积累按照自己的价值所设计的纪念日的活动仪式,并尽量影响传统节日习俗的内容朝向有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向变化,但还是容忍民间自发沿袭传统的节俗的。这期间贯串的在生活层次进行文化整合的意图,一俟条件成熟,就会被坚决地贯彻。

我们这里仅以境遇较好的春节为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春节被列为全民节日,有三天的假期,比国庆节(2天)、劳动节(1

^① 左玉河:《评民初历法上的“二元社会”》,载《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第222—247页。该文围绕这个方面的问题,采用了丰富的史料。

天)^①、元旦(1天)的假期都长^②。春节虽然纳入国家制度,全民年年在过,但是,其他假日都是按照政府的设计在举办仪式活动,与政府的理念具有天然的内在一致性,只有春节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法定假日,与时代话语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从历年的《人民日报》来看,春节期间的祭拜活动(迷信)、燃放鞭炮(危害)、大吃大喝(浪费)一直在受批判。“文化大革命”兴起不久,国务院在1967年1月30日发出通知,说是为了适应革命形势,根据群众要求,春节不再放假。第二天,全国的报纸发出一片响应之声。以后十来年的每年此时,报纸都要大张旗鼓地宣传,要求大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也就是春节不休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记得当年我们家的猪圈门上就写着“三十不停战,初一坚持干”的口号。到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以分别题为“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个安定年”的两篇读者来信为信号,表明政府对春节休假制度的回归态度,几天之后,部分省区宣布恢复春节放假,次年全国恢复旧制。

人民共和国更有能力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正常的过节要社会大众有共同的自由时间,要张扬,要有自豪感。经过多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城市的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建设把人民大众的时间纳入到国家的管理范围,国家的宣传教育和文化革命使传统的风俗习惯成为反面的东西,人们没有共同的时间,也不敢大肆、公开地继续过旧时代遗留下来的节日,最多只能私下里以简略的形式举行一下节日仪式。从“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兴起之后,人民除了被组织起来参加国家的节庆活动和生产劳动,就没有机会过传统的节。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一元在这个特殊时期潜藏起来了,只有一部分民众仍然坚持以简略的形式过一过传统的大节。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以来,人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性,可以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可以在私下和非正式的公开场合安排自己的活动。

① 也有例外,如1953年4月29日政务院通告,五一劳动节放假2天。

② 见政务院令270号(1949年12月23日)《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经过这么多年的自发选择,传统节日民俗在全国城乡得到了很大的复兴。节日民俗的二元结构由隐性又变为显性。国家面对民间节日体系恢复的事实,把春节作为法定假日,并对假日的时间有所延长。这种调整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认识的局限性,调整远远没有到位。官民分立的基本格局没有得到改变。

在中国努力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两个共和国里,民间传统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打击和破坏。政府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引进西方文化,使之与传统文化整合,采用一些工程或者运动的手段,这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错。问题一是出在政治人物急于求成,而结果适得其反;二是出在知识分子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出了片面的思想。从西方引进的新文化要通吃或者消灭传统民间文化,从节日习俗的顽强生命力来看,是做不到的。压制遭遇的是抵抗,其结果是潜藏之后再复兴。这与同样是后发现代化的日本能够让传统民俗与现代文化结成正面关系的历史是不同的。日本的知识分子和当政者具有善待传统的明确观念,并找到了传统与现代通过妥协、互补达成融合的方法。而在我们这里,知识分子都没有找到友好地连接国家意识形态与传统民俗的纽带。

对现有节假日制度的反思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家的法定假日大大地增加了。这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标志。但是,我们的研究发现,增加节假日是对的,而主要往现代节日体系里增加的思路值得检讨。五一和十一的休假变长了,可是国家在这个时间只有很简单的仪式活动,大多数民众没有什么非做不可的事情。民众在非常重要的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节日需要休假时间去开展活动,可是国家并不把假日安排在这些时间。国家在春节也放长假,似乎也照顾了民俗的需要。其实不然。国家春节假日的安排并没有充分考虑民俗活动的需要。例如,假期从初一开始,不便于人们开展传统的节俗活动。不为大年三十的节俗提供时间保证,就说明不是在传统的立场考虑过年的问题。显而易见,节假日的增加没有充分顾及传统节日体系的要求。



国家增加法定假日主要是为了适应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的转变。在处于短缺经济的时期,国家需要尽量增加劳动时间来提高总产值,降低物资短缺的程度。当我们迈进生产过剩(或局部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时候,国家的问题由供给不足突变为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学家呼吁利用增加假日拉动消费。

我们认为增加的假日发挥了作用,但是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如果把增加的假日分配在传统的节日里,它们除了发挥现有的对于物质再生产的作用之外,还可以发挥对于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作用。

古典的社会理论把生产和消费看作对立的范畴,相信限制消费有利于增加生产。后来的理论认为增加消费有利于增加生产。新的理论主张,休闲与消费不仅产生需求以推动物质再生产,而且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使特定的观念得以体现,使特定的社会关系得以建立、巩固,进而使特定的社会文化得以延续和加强。简而言之,休闲与消费不仅产生了物质再生产的需要,而且是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机会和机制。把假日全部分配给没有民俗基础的日子,不如把它们分配给民俗节日更有社会意义。五一和十一各有一天的假就足够我们举行应有的仪式与其他活动了,多给的假日相比之下都是意义空泛的日子。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为假日,一方面可能比那些空泛的日子更能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传承并发扬光大。

英国、美国和欧洲大陆的发达国家都是把绝大多数全民性的法定假日分配给具有悠久的宗教、民俗和历史传统的节日和纪念日,如圣诞节、新年、复活节、国庆节(女王诞辰)、各种烈士(老战士、英雄)纪念日(胜利日)。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有两点。一是兼顾现代国家观念和文化历史的连续性,一方面重视国庆节,并设立专门的假日让国人有时间纪念为国牺牲的人,另一方面重视文化根源、文化认同和历史连续性,尽量把认同的历史拉长,于是有宗教性纪念日、皇室纪念日的地位。一是按照传统节日和现代纪念日的实际需要分配假期,基本上没有造成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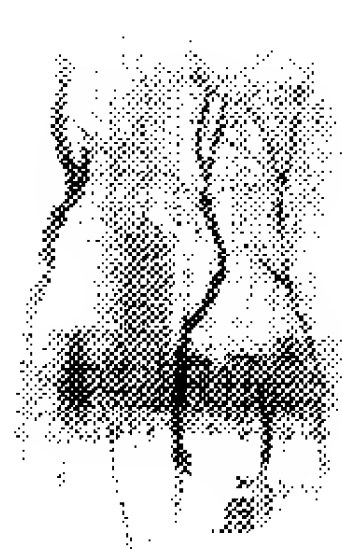


府的现代纪念日有多余的假日而重要的传统节日没有假日供民众开展活动的问题。

中国的一些传统节日在周边国家也很受重视。春节在韩国、越南、新加坡都是最主要的假日,韩国甚至把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日。日本本来一直使用和中国相同的阴历,隆重地过春节,还过端午节,明治政府在1872年宣布改用西历,把春节的习俗和仪式挪到西历的元旦来过,从1873年开始,春节和元旦就合而为一了,避免了中国现代以来节日体系二元分立的情况^①。日本现在还把三月三(女儿节)、五月五(端午节、儿童节)列为节日。我们得到的启发是,别人在尊重来源于我们的传统,我们自己更要给自己有群众基础的传统以适当的地位。

香港和台湾现在都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列为有假的节日。这是我们可以正面对待的事实。大陆和港澳台在现代化道路和现代文化上有意识形态的差别,但是民众在传统节日文化上是相互认同的。中国共产党在一段时间把自己定位于现代的代表,未来的代表,甚至为此不惜与传统决裂。虽然这是激进的,造成了文化上的严重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对于领导人民加速国家的现代化是有助益的。然而,我们要看到,我们当前面临的首要的紧迫问题是国家的统一,其次是政府统治的合法性。现代化已经是上了轨道的过程。从本课题所关心的节日文化来说,我们可以如此回应这两大问题:通过以节日为标志的同质性更大的时间框架来加强对于以领土为标志的空间框架的认同,以服务于国家统一的目标;通过选择性地承认民众的文化并加以积极的引导,使政府成为民族、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从而被民众认可为自己的代表,也就是说,政府通过承认传统节日在制度内的地位而让自己获得代表一个原来被忽视的部分的合法性。曾经,

^① 这里的中日差别除了思想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技术障碍。月形是中国几个重要节日的存在条件,没有圆月就没有中秋节。这在日本不是突出的问题。中国的节日民俗和中国人对月亮的审美与阴历的存废紧密联系在一起。



主张代表传统的是守旧派,主张反对传统的具有正当性;今天,已经是今非昔比,当政之道是善待传统,尤其是民间传承。

传统节日民俗的文化价值

中国传统的节日是中国极其多样的习俗的代表,具有丰富的内涵,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思想精华,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美学观念和伦理思想的体现。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发掘出充分的现实意义,以便我们在今后的节日文化建设中善加利用。

中国传统的节日习俗体现着中国人民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朴素而深刻的思想。这一节日体系的设置兼顾太阳和月亮与地球和人类的关系,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虽然在主旨上各有侧重,但是都包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这种哲学思想在今天弥足珍贵。人们的节日仪式既表现出顺应自然的一面,也表现出有所作为的一面。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是人被动地依赖自然,而是人努力之后达到的境界。“能动地适应”,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高明的世界观。

中国人适应自然,并且能够上升到欣赏自然的高度。人们在节日活动中亲近自然,清明踏青,端午临水,中秋赏月,除夕守岁,感受生长的美、运动的美、圆满的美。这种对自然的审美转化为社会和人伦的观念,成为以和气、团圆为价值的社会观。

人们在平日忙于生计,节日的设计固然是让大家休息、享受的,但是节日毕竟是一种公共文化,主要是用来传递文化价值,为人们建立、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提供机会的。仅从“四大节”来看,社会营造喜庆的气氛让大家相聚,互相用仪式、礼节培植人与人的正面关系,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吃喝玩乐,都强调通过赠送、回报、分享、共享来达到对于固有关系的刷新和发展^①。中国作为一个文明社会,其文明的标志

^① 在这里引入功利的思维,大家看到,节日是中国的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生产时机,节日习俗是社会资本的最有效率的生产机制。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连续性与中国的节日习俗的传承是互为因果的。



直接体现在节日习俗之中。

生生不息的文明既要有历史关怀,也要有对未来的展望。节日的文化设计让大众在特殊的日子能够具体做点什么,同时又让这些活动与人们短期的生活目标、长期的希望、人生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中国人没有单一而普遍的宗教信仰,大家是在节日中通过尊敬老人、纪念先人和礼拜神灵的仪式表达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传统的承诺,通过祈福、祝福晚辈来表达对未来的希望和关爱。中华文明的人性之美、中国作为一个共同体能够存续,都依托于自己的节日习俗所有契机。

这里有一些可能会被称为“迷信”的东西,但是,人们无意于“搞迷信”,很多时候是通过具体一点的“迷信”方式表达比较抽象的思想关怀。另一方面,我们要在观念上区分信仰、俗信和迷信。信仰、俗信是共同体价值共享的心理基础。造成恶劣后果的信仰才可以被归入“迷信”。如果把节日活动中的信仰和俗信都视为“迷信”,我们的社会就没有了互信和认同的共同约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加上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帮助,信仰和俗信作为“迷信”出现的可能性应该是不断在降低。没有信仰、俗信(其中一些被标为“迷信”)的社会,还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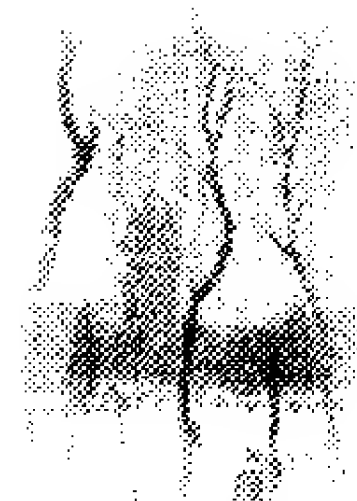
传统节日所包含的文化价值仍然是广大人民今天所认同、所追求的,是我们实现国家目标可以借助的巨大文化资源。更为根本的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热衷的传统,一个现代政府没有道理不给予制度上的地位。

对现有节假日体系的改进意见

本项研究通过对中国节日的历史演变的梳理,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节日体系设置的检讨,在参照世界一些国家的节假日制度的基础上,建议对中国现有的节假日制度进行如下改进:

一、国家公布全国性的节日和纪念日,既表示对革命历史的承续,也表示对中华民族悠久传统的尊重。

纪念日包括现有的妇女节、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儿童节、党的



生日、建军节、教师节、国庆节,还可以纳入辛亥革命纪念日、抗日战争纪念日、科技进步纪念日、孔子诞辰纪念日等,尤其要有先烈纪念日,缅怀所有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而献身的先人。其中,教师节和孔子诞辰纪念日可以考虑合并,就像以前曾经设计过的那样。

节日包括现有的元旦、春节、植树节,政府还宣布承认传统的重大节日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作为国家节日的地位。

二、把春节的假日往前挪一两天,以方便民众旅行,做年前准备;把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纳入国家法定假日体系,考虑把春秋两季五一和十一期间延长的假日移过来放在清明节、中秋节。

让国家假日向更有群众基础、更有文化积淀的传统大节倾斜。通过节日体系,让大陆和港澳台在文化上走得更近,让海外华人与中国和文化上更亲。中国政府具有很多种代表性,其中或许有一些是可以不代表的,但是有一种是绝对不能不代表的,那就是在文化上的代表性。中国政府要在文化上更完整、更全面地代表中国。

如果这几个大节的假期可以让民众安排回家、回乡的旅程,既满足了经济部门希望通过假日经济拉动内需的要求,也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还加强了政府在文化上代表中国历史连续性的正当性,顺便也可能减缓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

传统节日依据阴历计算,而国家的主历法是阳历,阴历的节日在阳历上不固定,有人可能会担心会造成混乱。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国的假日常常有不固定在公历的某一天的现象,例如伊斯兰教国家都有这种情况。即使是在西方国家,若干确定在星期几的假日也是每年变动的。中国的节假日调整将要出现的情况,许多国家的做法已经证明是没有问题的。针对月晦月圆的规律,阴历是十分科学、准确的。在农村地区,人们仍然习惯使用阴历。在城市里,人们普遍使用挂历,阳历和阴历的对照很清楚。人们对每年的节假日分别处于阳历和阴历的哪个时间,大都有机会、有条件知道。

三、把先烈纪念日和植树节列为假期,和清明节连在一起放假。



清明节到烈士陵园扫墓,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惯例。近一些年兴起的一个新的作法是对黄帝、炎帝的公祭。新的纪念日要把二者包容在一起。在这期间专设“先烈纪念日”而不再限于纪念革命烈士,就把我们国家的历史认同从几十年或一百多年(起于鸦片战争)拉长到中华文明意义上的历史长度。

或许有人担心百姓都去祭扫自家先人。我想问,现在还有足够的老百姓怀着对先人的感恩祭拜他们,再过一些年,当社会普遍连对先人的感恩观念都没有的时代真的降临的时候,这样的华人社会会有怎样一种秩序?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很多事情,有人或者有许多人去扫墓,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如果老百姓没有扫墓的习俗,纪念先烈、烈士的活动将很难让人们相信是有意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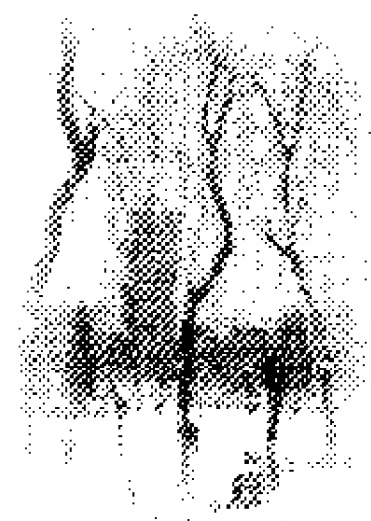
这个时期也适宜栽树,把春游、扫墓和栽树安排在一起,对于各个方面都是很大的方便。由于清明节一般在公历的四月四日至六日的某一天,我们可以按照公历把先烈纪念日、植树节分别定在四月四日、四月五日。在一些年,它们会和清明节重合。无论如何,它们都组成了一个连续的假期,大主题是纪念先人、春游、植树、爱护自然。

四、容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地方性的节日与纪念日,并可以在国家假日之外设立少量的地方性假日。

五、为了让节假日制度的改进具有可靠的民意基础,建议实施一项全国性的抽样问卷调查,看具体的方案是否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

我们希望如此改进的结果首先是缓解现代新兴纪念日与民间传统节日争夺仪式空间和有限假期的紧张关系,然后是让国家对时间的管理从偏于工具性的考虑向多重视一些政治和文化的价值转变。节假日体系是民族国家在时间管理上突出民族性的着力点。这种转变将是我们的文化自觉在时间管理上的一种体现。

(2005年2月27日)



《红楼梦》的欣赏

■周先慎

周先慎,1935年12月生,四川崇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古典小说鉴赏》、《中国四大古典悲剧》、《古诗文的艺术世界》、《明清小说》、《中国文学十五讲》等。

主讲人:

同学们好!很高兴今天有机会来给同学们面对面地讲课。过去可能大家在电视上,或者在电脑上见过我,听过我的课。但是那样总没有直接地面对面地这样亲切,这样真切。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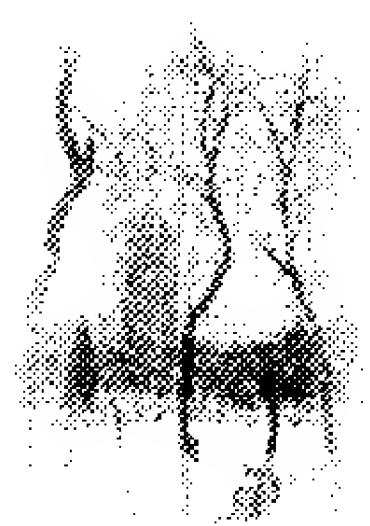
我今天讲课的题目是《〈红楼梦〉的欣赏》,就是谈谈我们怎样欣赏《红楼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但是我想从比较具体的方面来讲。

《红楼梦》这部书毛泽东对它评价非常高。他把《红楼梦》和我们国家的地大物博这么一个特点相提并论,而且他还说过《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红楼梦》确实是非常丰富的,你要不断地读,一遍一遍地读,才会有更深入的体会。有一本书叫做《北京大学教授推荐我最喜爱的书》,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见过这本书没有,就是北大一位叫李常庆的老师编的。书里边有很多老师都推荐了《红楼梦》,我也推荐了。我推荐《红楼梦》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这是一本不读就是人生极大遗憾的



书,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是一本从任何一种角度和眼光去读都可以有所得的书,是一本像是一个富矿永远也开采不尽的书。书中写了一个悲剧,人生的悲剧,家族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悲剧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一个有关《红楼梦》的网站收录了我的这段话。我在这段话里,说到《红楼梦》“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就是说你每读一遍都会有新的体会;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以什么样的眼光去读都可以有所收获。120回的《红楼梦》里写出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看电视剧连续《红楼梦》都会看到这个结局,就是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但是不只是结局,前80回里写的也就是一个悲剧,不过曹雪芹还来不及把这个结局写出来而已。这个悲剧的结局是大体上符合曹雪芹的意愿和构想的。但是我要说《红楼梦》里写的,不仅仅是一个爱情婚姻悲剧,还是一个人生的悲剧,家族的悲剧,社会的悲剧。我讲了这么几个悲剧,就是要强调悲剧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这段话大家记不下来没有关系,这个可以找到那本书来看。我讲这段话,要说明《红楼梦》是非常深刻,内容非常博大的一部书,而且在艺术上也是非常精美的一部书,要好好地读,反复地读,认真地思考,深入地思考,才能够理解它思想和艺术上的妙处,它的优点。

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红楼梦》看得太深奥,觉得除了红学家我们都读不懂。一位著名的老红学家,研究《红楼梦》一辈子的俞平伯先生,在88岁高龄时讲过一段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话,他说:“研究《红楼梦》不是要深一点,而是要浅一点,应该简化,近代化,《红楼梦》本来很流畅,并不难懂,而许多研究它的文章都很难懂,这并不是好现象。”这是俞平伯先生在他过世以前的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他说不是要深一点,而是要浅一点,什么意思呢?我的体会,不是说我们要很肤浅地去理解《红楼梦》,不是说我们不要把《红楼梦》深刻的思想内容发掘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不要去刻意求深,或者在解释的时候故作高深。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某些



红学家(不是所有的)的著作来读一读,一部分红学家的著作会给你这样一种印象,一种感受,好像不读他的著作的时候,我们觉得对《红楼梦》还可以读懂,一读了这样的一些著作以后我们就害怕《红楼梦》了,觉得读不懂,太深奥。所以我想俞平伯先生批评的是这种观点,这种方法,就是故作高深,刻意求深的这种《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虽然博大精深,但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读懂的,只不过是体会得深一点或体会得浅一点,有所不同。我在每一次讲《红楼梦》的时候都要引用苏东坡写西湖的四句诗:“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浅深随自得,谁能识其全?”这首诗的题目叫《怀西湖》,就是杭州的那个西湖,全诗比较长,这是其中的四句。我觉得这四句诗对我们欣赏、认识、分析《红楼梦》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西湖的风景是世间最优美的风景,去西湖游览的人情况各有不同,有文化水平很高的、很聪明的、很有修养的人,也有文化水平低一点的、修养差一点的、看起来不那么聪明的这种人,都有。“游者无愚贤”的意思,就是不管他是愚是贤都可以去欣赏西湖的风景。下面“浅深随自得”这一句很重要,就是说对西湖的风景有的人可能体会得深一点,有的人就可能体会得浅一点,依随不同的人的不同情况而定。但是体会有深有浅,都有体会,没有哪一个人敢说他对西湖美景的欣赏已经到头了,他把西湖风景的全部的美都体会到了。

这段话我们引用来比喻对《红楼梦》的欣赏,我觉得是非常恰当的。《红楼梦》再精深,再丰富,再伟大,我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年纪大的,年纪轻的;文化水平高的,文化水平低的;生活经验丰富的,生活经验差一点的,都可以读,各有所得,有深有浅。但是我们都只能在某种程度上读懂《红楼梦》,或者说读懂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说,哪一个红学家也不敢说,《红楼梦》他全读懂了。所以我们读《红楼梦》要有两种心态,就是一方面,我能读《红楼梦》,程度不同能读懂一部分,我每读一次又要新增加一部分,慢慢就会深入。这个信心要有,不是那么可怕,不是那么深奥,不可亲近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读,人人都可以懂。但是另一



方面,又要认识到,《红楼梦》确实是很丰富很深刻的,所以我们要反复地读,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和眼光去读。每读一次,认识体会就会深化一步。我在年轻的时候读《红楼梦》,你们到了像我这种年纪,生活阅历、生活经验丰富一点的时候再来读,体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红楼梦》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意思,就是对《红楼梦》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不要被刻意求深的,或者故作高深的某些红学家吓唬住。

另外一点意思,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很好地欣赏《红楼梦》,就要认识《红楼梦》在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特点。中国的长篇小说,就是古典的章回小说,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再到《红楼梦》,这么几部大的名著,大家的印象会很鲜明,就是有一个发展的倾向,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从重大的题材,或者说是从历史题材演变到现实的日常生活的题材。《三国演义》是写历史的,《水浒传》写宋江起义,是从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发展起来的,《西游记》也是一个唐代的僧人玄奘到印度取经,这么一个真实事件,然后演化成一个丰富的神话题材,都是从历史故事来的。然后转向现实题材,到《金瓶梅》就是写现实社会中的家庭生活,说的是宋代的事,实实在在反映的是明代的社会生活,不是那种历史的题材。还有就是重大的军事政治斗争和超凡的壮举,《三国》、《水浒》就是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西游记》虽然不是政治军事斗争,但是它是一种壮举,非凡的壮举,然后向日常生活转变,《金瓶梅》也好,《红楼梦》也好,都是写的日常生活。在艺术风格上理想化的传奇色彩逐渐地淡化,逐渐地减弱。惊心动魄的那种情节逐渐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而转向贴近生活的那种细腻描写。所以它的写实的方法是越来越细腻,到《红楼梦》就非常细了。这种写实手法和细腻的艺术风格的成熟,就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我们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和总结。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红楼梦》这样一个特点,从题材内容到艺术风格,到它的细腻的笔法,《红楼梦》是通过日常



生活事件的描写,普普通通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来反映和揭示重大的社会主题。如果我们只看见它那种琐琐碎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现象,而看不出它里面包含的丰富的意义,那我们就可能感觉枯燥无味,对它没有兴趣。我不知道大家的体会怎么样,我接触过的中文系的学生,曾经有一部分学生反映说他读《红楼梦》读不下去,说婆婆妈妈的,写的都是些饮酒、吟诗、喝茶、吵架、生气,这些事情有什么意思?搞不清楚,所以就觉得看不懂,没有太大意思。欣赏《红楼梦》,关键就在我们要从琐碎当中,平凡当中,看出它的深刻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来。明代公安派的一个作家叫袁中道,他曾经对《金瓶梅》的艺术,有一句评语,说是:“琐碎中有无限烟波。”我觉得这个评语很精要,很精到。意思就是说,你别看它琐琐碎碎,但是你仔细阅读,通过这种琐碎的家庭生活的描写,里面有无限烟波,有很丰富很开阔的这种风景,有让我们欣赏不尽的美景在里面。我觉得这句话移用来评价《红楼梦》的艺术,是更为准确的。

我们读《红楼梦》一定要把握住它在艺术上的总的特点。我认为《红楼梦》总的特点就是两个字:自然。我读《红楼梦》的感觉,好像作家对生活并没有进行什么加工,就是让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原原本本地自然地流泻到纸上来一样。但是你仔细去体会就会发现,实际上是作家经过精心的选择和艺术提炼才写出来的,其中包含进了、概括进了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义。所以我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浑然天成的,对生活的原生态保存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同时又是经过高度提炼,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的这样一部小说。写小说都会遇到一个作品和生活的关系问题。太像生活,跟生活一模一样,而没有概括进丰富的内容,读者是不喜欢看的。就像毛泽东批评的,有的人写的剧本,写开会,他说我天天都开会,还看你的剧本干什么?太像生活了不好,但是太不像生活,脱离生活也不好,就是要又像又不像。从这方面讲,对这个艺术分寸,《红楼梦》是掌握得最好的。根据《红楼梦》这样一个总体上的特点,我们欣赏《红楼梦》,最主要



的就是要在琐碎当中去发现无限烟波。你看见了琐碎的,你得到的也只是琐碎的,这样你就不能够很好地欣赏;你看见了琐碎的,看见的是平淡,可是你从琐碎当中发现了无限烟波,从平凡当中发现了不平凡,这时候你就能够获得一种审美的愉悦。我常常跟同学们讲,我说艺术鉴赏就是审美,什么是审美?审美就是要有发现。如果你一眼就看懂了,那太容易了,艺术就没有意蕴了。艺术欣赏要动脑子,要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要调动自己的艺术想像。一旦你有了发现,就是你通过小说中对琐碎生活的普普通通的描写,发现了原来其中还包含了这么丰富的内容,这时候你就会非常高兴,就会得到一种审美的愉悦。还有,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有什么目的呢?开始不知道,慢慢地经过分析思考,原来有作家的艺术匠心在里面,有用意在里面,你发现了这里有作家的艺术匠心,你也会感到很高兴,也会享受到艺术欣赏的审美的愉悦。

下面我想结合《红楼梦》思想艺术的特色,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映射”。

什么叫“映射”呢?我认为它是一种独特的小说艺术,而不能只是简单地理解为一种艺术技巧,或者是表现手法。它决定于作家对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的整体认识。《红楼梦》是中国古典作家当中,甚至在世界古典作家里面也是少见的一部作品,就是在反映生活的时候,它注意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整体性,也就是说作家不是孤立地描写生活的某一方面,不是孤立地描写一个人、一个事件,而是从生活的内在联系当中来把握生活、表现生活,所以他写得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刻。从小说的整体来看,不知道大家看过一些红学研究的论著没有,就是关于《红楼梦》的主题有很多说法,比如说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以贾家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衰亡史。而讲得最多的是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认为这是《红楼梦》的主题;还有就是说是写儿女之情,或是写女孩子的悲苦命运的;也有说是写新的思想,新的人,贾宝玉、林黛玉就是具有新的思想的新人。那么这些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它们都有自己的依据,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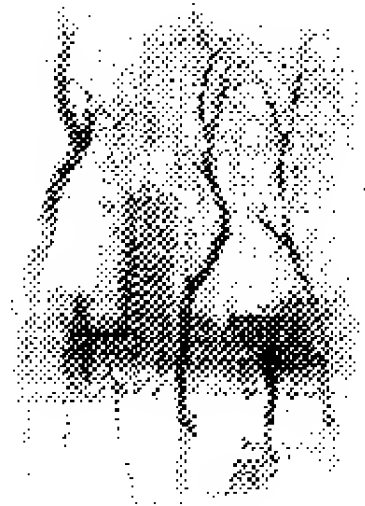
《红楼梦》当中都有表现,但是不能只看某一方面。我个人认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这是《红楼梦》的中心内容,中心线索,但是要注意他们的爱情以至最后的悲剧结局,都是和贾府由盛转衰的这个过程及其各种原因、各种矛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而在贾府的各种矛盾和它的衰败过程当中就产生了贾宝玉、林黛玉的叛逆思想。有人不承认是叛逆思想,我个人认为完全可以说是叛逆思想。我举一个例子,《红楼梦》里面写的大观园内外两种生活完全不一样,大观园内是一个理想的世界,是自由的,平等的,充满了爱的世界。大观园外就是腐朽的、黑暗的、罪恶的各种封建社会末期的生活场景。在大观园当中,贾宝玉跟那些女孩子很亲近,特别是跟那些受压迫的丫头在一起的时候,你看他的表现非常了不起,他是平等地对待她们,很关心和体贴她们。他的思想中没有那种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观念。这在那个时代,那个贵族家庭里边是很难做到的。贾宝玉并没有认为自己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就感到很高兴,很骄傲,到处去炫耀。这个在封建时代很普遍,我的家里面很有钱,我的家里面地位很高,就会产生一种很强的等级观念,优越感。等级观念是什么思想?就是封建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是非常厉害的。现在有的人还要宣扬自己的爸爸是当什么官的,是厅级的,还是局级的,还是副部级的,还是什么,这种思想实质上就是一种封建等级观念的残余。你看第7回里,写贾宝玉第一次看见出身于寒儒薄宦之家的秦钟的时候,强烈地感到我要是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早就跟他相识了,我为什么出生在一个贵族之家呢?不光是以出身贵族之家为荣,反而以为是极大的遗憾,他对自己出生的这个家庭是否定的。还有,比如说丫头是伺候少爷的,贾宝玉是个宝贝疙瘩,贵族公子,可是你们看晴雯生病的时候,他对晴雯非常关心,偷偷地叫人去请医生来给她看病,还亲自审看医生开的方子,认为药太猛,吃了对晴雯不好,又另外请一个大夫来看,还吩咐只在屋内的火盆上替晴雯熬药。为什么?因为如果晴雯生病被家长知道的话,她马上就要被赶出去,怕要传染给少爷、小姐。不是丫头伺候少爷,而是少爷随时



随地都在关心命运不幸的丫头。这些表现和思想都是很了不起的。有的人不承认贾宝玉有叛逆思想,我觉得像这些表现是够叛逆的。

从全书的整体来看,爱情悲剧产生的原因,是跟他和林黛玉的叛逆思想有关系的,他们是在叛逆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爱情,而这个爱情的产生和发展,又和这个家庭的衰败有紧密的联系。如果家长们容许他们的爱情发展,同意他们结合的话,那他们寄托在贾宝玉身上的家族中兴的希望就要落空。可见,叛逆思想,爱情婚姻,家族的兴衰,这些方面都是有内在联系的。曹雪芹在表现的时候,是着眼于生活的整体,着眼于生活各方面的这些内在联系的。并且这几个方面在艺术表现的时候,是起到互相映射的作用的,就是写这一方面的时候,同时也就映射到另外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所以你如果只看见一方面的话,就没有顾及到《红楼梦》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整性。北京大学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是旧红学家的代表,他曾经感叹过《红楼梦》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话是感叹,其实是道出了《红楼梦》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我们由此可以体会到《红楼梦》从整体上去把握和表现生活的这么一个特点。“映射”这种小说艺术,就是顾及到生活的完整性,就是着眼于生活的各种现象之间,各种人物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就要注意曹雪芹的小说艺术是很注意内在联系的,我们的欣赏就是要看出、揭示出来这种内在联系。

映射更多的是表现在具体的情节和细节描写方面。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第33回写宝玉挨打,很值得一读,他写宝玉为什么挨打就写得很有讲究。曹雪芹把贾府内外的各种矛盾,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都纠集到宝玉挨打这个日常生活的事件上来了。父亲打儿子恐怕是生活中最平常的事情了,我们自己作为子女恐怕一般来说都挨过父母的打,至少也看见过父母打孩子这样的事,可是曹雪芹写的宝玉挨打,这里面不简单,有各种原因,概括了贾府内外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才构成了贾宝玉挨打的原因。我这里不细说,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看看。我要说的是在贾宝玉快要挨打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有人进去报



信，一报信的话，就让老祖宗知道了，大家都知道贾母是非常疼爱贾宝玉的，要是贾母知道了，贾宝玉就肯定会得救了，就打不成了。可是这一次贾政是下决心要狠命地打，要结果他的狗命，他命令不准有人进去通报。贾宝玉一定会被打的大势已经形成了，就在这将打未打之际，贾宝玉吓得要命，这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老婆子，家里面的一个老仆人。贾宝玉看见她以后，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快跟她说：“快进去告诉，老爷要打我呢！快去，快去！要紧，要紧！”可因为这老婆子耳聋，把“要紧”听成了“跳井”，便以为是说金钏儿跳井的事，立即回答说：“跳井让他跳去，二爷怕什么？”又说：“有什么不了的事？老早的完了，太太赏了衣服，又赏了银子，怎么不了事的！”金钏儿的死，在贾府里只算得一件小事，可是在曹雪芹写来却是颇具匠心的一笔。写金钏儿受辱在第30回，写她悲愤跳井自杀是在第32回末，此后又在好几处描写相关人物时多次提及这件事。作者通过金钏儿之死这件小事，很有深度地表现了好几个人物。一个人、一件事，放在哪一回来写，如何写，先后详略之间都有精巧的安排，很能见出曹雪芹艺术上的匠心。这里，在宝玉挨打前的将打未打之际，特意写这么一个聋老婆子的出现和她说的这番话，作者就是着眼于生活的内在的相互关联，映射出了多方面的意义。当然，在这里安排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上场，首先是出于情节发展上的需要，即为下文写王夫人和贾母的出场，写这场轩然大波的收束作铺垫；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聋老婆子的这段话有映射的作用，在人物描写上有多层映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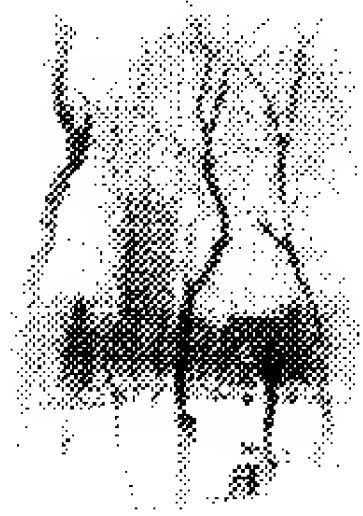
映射什么呢？第一层就是映射到贾政的身上。我们来看贾政是怎么说的。贾政听到贾环（就是贾宝玉的异母兄弟，赵姨娘生的，小老婆生的兄弟）说金钏儿跳井自杀了，贾政想都没想马上就说：“好端端的，谁去跳井？我家从无这样事情，自祖宗以来，皆是宽柔以待下人。”可是，聋老婆子上述的那番话和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就暗示给我们，在贾府里这类事件必然是经常发生，司空见惯的，这才会使得像聋老婆子这样的仆人，她的命运应该说和金钏儿是相近的，是最应该同情金钏儿



的,但是她没有这种感情,而是认为赏了银子,赏了衣服这个事情就了结了。类似的事情一定发生得很多,才会使得这个老婆子变得这样冷漠,这样麻木不仁。所以聋老婆子这段话映射到贾政的身上,就见出他未经调查了解,脱口而出的那些话,只是为了维护家庭声誉,是虚伪而不足凭信的。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就是映射到薛宝钗和王夫人的身上。薛宝钗是同袭人一起听到金钏儿跳井惨死的消息的,当时袭人还表现出一丝同情,这个和以后晴雯之死(也是王夫人逼迫的)形成对比,对晴雯之死她就没有什么同情心了。但这个时候对金钏儿还有一点。小说里面写她念及“素日同气之情,不觉流下泪来”。而薛宝钗却只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这也奇了。”赶忙就到王夫人那里“道安慰”去了。王夫人对薛宝钗说:“你可知道一桩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宝钗马上应和道:“怎么好好的投井?这也奇了。”这里对金钏儿的惨死,两人三次用到一个“奇”字,所谓“奇”,其含义就是金钏儿不该投井而去投井,死得不可理解,莫名其妙。

接下来小说写两人有一长段对话。关于金钏儿之死,我补充两句,是这样,王夫人一边打瞌睡,金钏儿一边给她捶腿,贾宝玉跟她开玩笑,就说“我明日和太太讨你,咱们在一处吧”。这本来是玩笑话,而且金钏儿很严肃的,并没有跟他说什么不三不四的话,就这样王夫人睁开眼睛以后,就给了金钏儿一个耳光,说好好的爷们就让你给教坏了,然后要把她赶走。在贵族之家里面做奴婢,如果被赶出去的话生活就没有着落,很悲惨的,所以金钏儿跪下来给她求情,请她不要赶走她,而王夫人还是不依,硬把她赶走了。在这种情况下,金钏儿一气之下就跳井了。这明明是王夫人逼迫死的。可王夫人是怎么说的呢?她跟薛宝钗说:“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几下,撵了他下去。我只说气他两天,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话里提到自己有罪过,实际则是推脱自己的罪过。而薛宝钗却是这样劝慰王夫人的:“姨娘是慈善人,固然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



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去玩玩逛逛,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这就是薛宝钗劝王夫人的话。所谓糊涂人,也就是对她所说的“奇事”的“奇”字的一种解释。她还对王夫人说:“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这些话表明了薛宝钗对金钏儿之死,所抱的是一种非常冷漠的态度。听了这样一些冷冰冰的话,对我们读《红楼梦》的人来说,我觉得会感到有一种透骨的心凉。我对薛宝钗的印象很不好,这段描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她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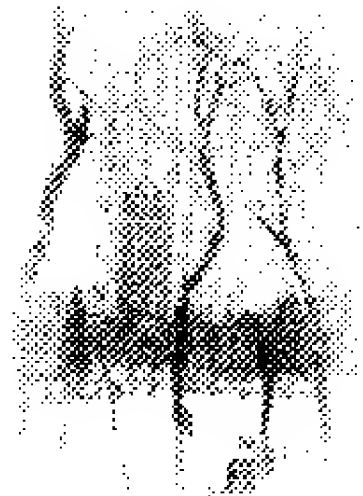
那么聋老婆子的话就映射到王夫人和薛宝钗的身上,她们是这样对待被压迫的奴隶的,这样对待她们的生命,所以才使得聋老婆子也以这种态度,以一种冷酷无情的态度和处世的方法来对待这件事情,显然是她们的态度影响和麻痹了聋老婆子的心,才使得她也表现得这样冷漠。这是第二层。

聋老婆子的话,经过几层折射,最后就映射到贾宝玉的身上了。你看,先是映射到贾政的身上,再映射到王夫人的身上,再映射到薛宝钗的身上,使我们看见贾政的虚伪,王夫人的文过饰非,薛宝钗的冷漠无情以及整个贾府视人命如草芥的这种罪恶,而所有这些,又都一齐映射到了主人公贾宝玉的身上。我们看贾宝玉对金钏儿之死是一种什么态度,我刚才讲他之所以挨打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听见金钏儿跳井自杀的消息以后就非常悲痛,小说里面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五内摧伤”,就是五脏六腑都因为金钏儿之死引起的这种悲痛伤心而受到损害,到了这种程度,因此才精神恍惚地跟他父亲撞了个满怀。这是他挨打的很重要的原因。而且小说还写到,此时,就是在他挨打之前,还一心总为金钏儿感伤,巴不得“身亡命殒”,也就是自己也死了跟金钏儿一起去。他对金钏儿之死,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情。

小说写宝玉挨打之后有几个人去探伤,袭人不用说,薛宝钗、林黛玉、王熙凤都先后去了。这个探伤过程的描写非常精彩,我这里也不细



说。但是有一句话值得注意,就是林黛玉含着眼泪抽抽咽咽对贾宝玉说的:“你从此可都改了罢!”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为什么林黛玉要劝贾宝玉都改了呢?我们听听贾宝玉的回答,就知道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了。贾宝玉说:“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他所说的“这些人”,里面最主要的就包括金钏儿,当然不止她,还有琪官,他挨打还因为跟琪官交朋友。在一顿毒打,差一点丧命之后,他这个话对袭人没有说,对薛宝钗没有说,对王熙凤没有说,惟一对林黛玉说了,而且是在林黛玉劝他要改的情况下说的。这个听起来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回答,却是非常奇妙地传达了两个人心心相印的思想感情。宝玉听出来黛玉不是真心要他改,而是出于对他的深情的疼惜,他深知黛玉是真正理解他和支持他的。心有灵犀,他们的思想是有共鸣的,但是不用点破,心照不宣,两个人都能意会对方的意思。在遭到一顿毒打之后,还对自己知心的人表示死不悔改,说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一直到第43回,凤姐过生日,这是个很重要的日子,再加上他们成立的诗社第一次活动,贾宝玉却不去参加,也没有告假,没有跟谁讲一声就不去。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叫着他的小厮茗烟,一起到郊外去祭奠金钏儿去了。凤姐的生日,诗社的头一天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不放在心上,他的心里只惦着惨死的金钏儿。对比起来看,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经过这么几层映射,最后映射到贾宝玉的身上,而这个映射的结果便体现出贾宝玉的心地是多么的善良,在他那个时代,在他那个具体的生活环境贾府里面,这种感情又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难能可贵!你看曹雪芹写人物就是这么写的,他并没有孤立地写贾宝玉对金钏儿的态度如何如何,而是在人物关系中来表现,他并没有花很多笔墨,但是表现得非常鲜明突出。这就是整体地认识和把握生活的一个特点,因为这些人是互相关联的,因此在艺术表现上就可以让他们互相映射。几层映射的结果,贾宝玉的形象就突显出来了,非常动人。所以有人不同意贾宝玉的思想是叛逆思想,我觉得看看这些描写,应该承认他的表现是很了不起的。关于映射



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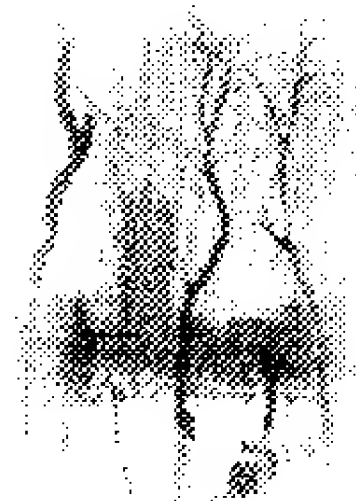
第二个问题讲讲细节描写。

我前面讲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是细节越来越多,越来越细腻,也越来越深刻,包含的意义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可以说细节是生活的血肉,生活里面不可能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更多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细节是生活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没有细节描写就谈不上逼真地反映生活,尤其是对像《红楼梦》这样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而缺少惊心动魄的传奇情节的作品,更是如此。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没有细节描写就没有小说艺术。《红楼梦》这部书,不是以情节的紧张、曲折取胜,而是以细节描写的生动、丰富、细腻和深刻见长的。它不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有很多很紧张的吸引人的故事情节。细节的丰富这个特点,同我前面讲的《红楼梦》总体的艺术特征是“自然”这一点是分不开的。《红楼梦》对生活的描写精雕细刻,却非常真实自然,不露一丝人工雕琢的痕迹,但是实际上是经过作者精心提炼的,在里面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思想意义。所以《红楼梦》的细节描写含义丰富,但是又能够出以平常,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平平常常,里边却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只要仔细去品味、欣赏,我们就能够小中见大,细中见深。所以《红楼梦》的细节描写最能够体现“琐碎中有无限烟波”的这样一种艺术特色。

我举一个例子。第28回写元春(就是贾宝玉被选到宫里做贵妃的姐姐——贾元春)在端午节之前,从宫里面给贾府的亲人,她的那些兄弟姊妹送礼物来。她送来的礼物很有讲究。宝玉的礼物跟宝钗的一样,林黛玉的礼物是跟迎春、探春、惜春几个姊妹一样的。贾宝玉知道以后不相信,他说我的礼物应该跟林妹妹的一样,怎么会跟宝姐姐的一样呢?所以他马上就命丫鬟把他的礼物送到林黛玉那里去,而且吩咐说,让林妹妹爱什么就留下什么。可是林黛玉她不要,她什么也没有挑,反而触动了她的心事,怏了一肚子气。后来她见到了宝玉,宝玉问她为什么不拣,她就对贾宝玉说:“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



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宝玉听了就急了,本来心里面一心想我跟林妹妹的礼物应该是一样的,现在不一样,让你挑,你挑了不就一样了嘛,她就不买账,还这样说。所以宝玉就非常着急,马上就赌咒发誓,说金玉什么的都是别人说的,我自己心里要有这个念头的話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说了很重的话。接下去就有一段,写宝玉正好遇到了宝钗,看见宝钗以后就要看看她的礼物,正好薛宝钗的左臂上,左手腕上就笼着一串元春送给她的礼物,就是红麝串子,戴在胳膊上还有香味。这样的描写很有意思,这些细节完全是性格化的。我们首先说贾宝玉,已经知道了他的礼物跟薛宝钗的一样,那他还看什么呢?不是一样的吗?他就是要看,他就是不相信薛宝钗的会跟他的一样。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这里边就表现出一种感情,一种对薛宝钗和林黛玉不一样的感情,就是出于这种心理和感情,他就要看这个礼物。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的行为,实际上写得很深,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薛宝钗呢,她刚刚接到的礼物马上就戴在自己的胳膊上,大家想想如果换成是林黛玉,我想她是绝不会这样做的。可见薛宝钗表面上表现得不好意思,但实际上是很看重元春送给她的这份跟宝玉一样的礼物的。这样的细节是很有表现力的,非常准确、非常深刻地表现了人物不同的思想性格。薛宝钗是很看重跟元春的关系,很看重元春对她的态度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在小说里另外的地方也有描写。比如说第17回至第18回,写元春回来省亲的时候,请自家兄弟姊妹就大观园的建筑和景物分别作诗。宝玉就怡红院做的一首,其中就有一句道:“绿玉春犹卷”,她见了就急忙告诉宝玉,说元妃很不喜欢“红香绿玉”,才改名叫“怡红快绿”,用“绿玉”二字会让元妃不高兴的。她还具体点示宝玉,把“绿玉”改为“绿蜡”,宝玉表示感谢,说以后不再叫你姐姐,只叫你师父了。宝钗的回答很有意思:“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黄袍”代表权势,她眼里就只看见黄袍,这随口说出的话都能见出她的心思。这里还有一个对比,原本很聪明的贾宝玉居然一下子写不出来诗了,黛玉见他写诗艰涩,也要



替他写一首。但她与宝钗不同,一点没有在元妃面前炫耀,讨元妃喜欢的意思。而是一则因为前面只写了一首,“未得展其抱负”,也就是因为自己有才,就要找机会表现自己的才华,这与薛宝钗一贯地教导她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背道而驰的;二则见宝玉“大费神思”,不免心疼,要“省他些精神不到之处”。你看两个人都要帮助宝玉写诗,感情却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出于显露才华和体贴宝玉,一个则为了讨贵妃的欢心。这里写她刚刚拿到的礼物就赶忙笼在自己的胳膊上,表现的是同样的一种心思、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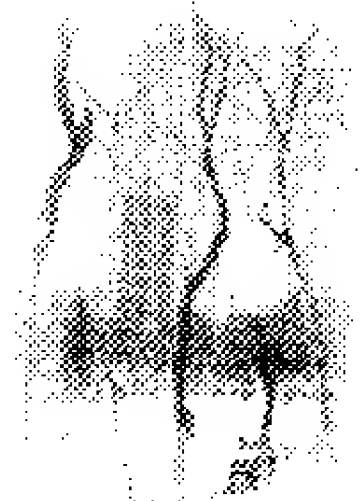
而更为深刻的还在下面的一段描写。小说写到因宝钗生的肌肤丰泽,那红麝串子一时褪不下来。宝玉在一旁看着那雪白一段酥臂,不觉动了羡慕之心,暗暗想道:“这个膀子要长在林妹妹身上,或者还得摸一摸,偏生长在她身上。”这样一种思想活动,在爱慕当中夹杂着一一种遗憾,竟至于失神,小说写他“不觉就呆了”,走神了。这也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是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的。从这样的细节描写里面,我觉得至少可以看出两方面的意义来:第一方面,从送礼这样的小事,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小事,就已经反映出来元春作为统治家长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员,她对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关系与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关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而这个看法同贾宝玉本身的想法是有冲突的,是尖锐对立的。小说写的不过是送礼这样的家庭琐事,但是通过这样的小事,反映出来的却不是小矛盾、小冲突,而是关联到全书的悲剧结局的大矛盾、大冲突。我前面讲过《红楼梦》写的是爱情婚姻悲剧,也是人生悲剧,家族悲剧,社会悲剧,而这里所写的,就是关系到全书这样悲剧结局的细节。最起码,也是和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婚姻悲剧的结局和贵族之家最后败亡的家族悲剧这样的结局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次送礼物,元妃对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关系的不同的态度,以及几个人对这件事的不同反应,就已经是这种大矛盾、大冲突的一次闪现,写来不经意,一闪而过,但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欣赏《红楼梦》就要抓住这些地方,琐碎,但是琐碎当中有无限烟波,不



是小矛盾、小冲突,而是大矛盾、大冲突的一次闪现。

第二方面,这个细节又表现了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情绝不同于过去很多才子佳人小说所描写的一见钟情的模式,而是有一个比较和选择的过程,是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他选择的标准,也不是过去才子佳人小说里面写的郎才女貌,而是思想意趣和精神气质的投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共同的生活理想。我们看小说里边写得非常好,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是有一段发展过程的,有一段时间里老吵架,两个人一见面就生气,林黛玉是老不放心,后来诉肺腑之后才逐渐走向平稳。在这之前,贾宝玉实际上经历了一段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这么一个过程。按照书里面的描写来讲,薛宝钗确实实在某些方面对贾宝玉是具有吸引力的,这个写得很真实,也很深刻。但是更重要的是,薛宝钗对贾宝玉来说,就像书里面描写的那样,“另具一种妩媚风流”,外貌漂亮,长的也很丰满,对他有吸引力,但是贾宝玉经过长期的比较选择,虽然最后是不无遗憾,却还是非常坚决地舍弃了薛宝钗而选择了林黛玉。薛宝钗吸引他的只是外貌的妩媚风流,而他最终选择的却是林黛玉那种跟他发生共鸣的内在的风神灵秀。所以这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平凡,乃至非常琐碎的生活细节,是如此自然,又如此真实地揭示了贾宝玉在爱情选择的过程当中那种包含着深刻的社会内容的心理活动,同时又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一场影响到贾宝玉、林黛玉的命运,乃至影响到整个贾府的命运的大冲突,正在潜伏的形式当中酝酿着,发展着。就是这样一段看起来很平常的描写,却包含着这么丰富的意义。

这一切归结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红楼梦》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知己之爱的描写已经大大地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当中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和夫贵妻荣的传统模式。我再插一句,林黛玉的思想精神境界确实在当时的贵族妇女里面是很高的,一般的贵族妇女都是希望夫荣妻贵,都是希望自己的丈夫好好地念书,中了状元以后自己也就地位很高了,可以过上富贵荣华的生活了。你们都知道贾宝玉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林妹妹从来不说“混账话”。什么是“混账话”?就是劝



他听贾政的话,去好好读书,去考科举,走仕途经济的道路,从来不说这个话。在当时那个时代,那个贵族家庭的环境里,这个思想格调就很高了,就跟传统的贵族妇女不一样了。她是一心一意爱着贾宝玉的,而且希望将来能够嫁给贾宝玉,但是并不希望他,也不劝他去读书做官,将来自己当一个贵族夫人,享受荣华富贵。她不是这样,她追求一种纯真的有着共同的人生志趣的爱情,这是带有近代色彩的一种爱情观念。通过书中的许多描写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宝玉挨打里面有几处细节描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宝玉挨打在《红楼梦》里面算是大冲突,大波澜,大场面了,但实际上也是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一个生气的父亲打儿子,这个太普通了,算不得什么大事情,但是在作者的笔下已经是大矛盾、大冲突了。一个暴怒的父亲一时生气打自己的儿子,打得很重,过后或者打的当时就突然觉得打得太重了,自己的儿子嘛,自己的骨血嘛,转而心疼了,然后流泪的事情在生活里面是很多的。《红楼梦》里面贾政打贾宝玉的过程当中三次写到他流眼泪,而且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伤心。

第一次是写他气得面如金纸,脸色都变了,下决心要打宝玉,但是还在将打未打之际,写他“满面泪痕”。这是贾政第一次流泪,他气得很厉害,但是要打还没有打。这时候当然不是因为打重了转而心疼才流眼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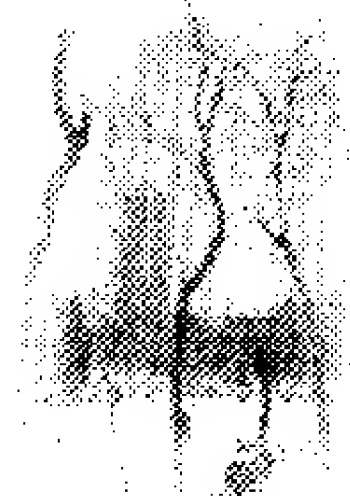
第二次是王夫人在里面听说了以后赶出来,大吵大闹,说你这样打宝玉就是有意地要绝我。王夫人哭宝玉,她对贾政说的话,仔细想想是写得非常深刻的。我们读《红楼梦》,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封建时代的妇女,包括贵族妇女在内,其实命运都是很悲惨的。在座的有很多的女同志,封建时代不会像我们今天这么幸福,一个贵族妇女如果没有生一个儿子的话是没有地位的,在家庭里是站不住脚的。王夫人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贾宝玉,她原来生了一个贾珠,贾珠早死了,现在就一个贾宝玉。贾宝玉就是她的安身立命所在,贾宝玉如果被打死了,她也就



没有依靠了,在这个贵族家庭里她就没有地位了。这反映了在封建贵族之家里,妇女的地位和命运。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说《红楼梦》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写得确实很深刻。王夫人对贾政说,你把我儿子打死了,我还有什么依靠,在这个家里面没法活了,所以说是“绝”了她。这时候,是这个“绝”字触动了贾政,使他听了以后“泪如雨下”。这是第二次流眼泪。

第三次是写王夫人哭贾珠。贾珠跟贾宝玉不一样,贾宝玉是不听话的,叫他好好念书,他就是不好好念,而贾珠是很听话,好好念书的,但是不幸早死了。小说里写王夫人哭贾珠,哭得很有讲究,哭得很深刻。她说宝玉死一百个也不足惜,只要珠儿活着就好,这话简直是写到这个贵族夫人的灵魂里去了。在曹雪芹的笔下,王夫人哭儿,哭得有身份、有性格、有思想:她哭宝玉,又哭贾珠,归根结底是哭自己,她哭出了封建社会一个贵族之家正统夫人的理想和希望,也哭出了她那可怜又可悲的地位和命运。贾政听见王夫人哭贾珠以后,“那泪珠更是滚瓜一般滚了下来”。这是第三次。

你看第一次是“满面泪痕”,第二次是“泪如雨下”,第三次是“滚瓜一般滚了下来”,三次流眼泪一次比一次厉害,一次比一次伤心。但是并没有一丝一毫因为对宝玉一时手重转而后悔心疼的表现。因为流泪的时候,不是还没有打,就是打的过程当中王夫人劝阻,越劝阻越哭闹,他越凶狠,毒打还嫌不够,还要拿绳子来勒死,根本就没有心疼的意思。我们仔细阅读,仔细思考,就能够体会到描写贾政三次流泪这个细节里面所包含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原来贾政打贾宝玉有多方面的原因,大家去看,我就不细说了,牵扯到各方面的矛盾。但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贾宝玉不听他的话,不愿意走他为他规定的人生道路。贾政眼见贾府渐渐走向衰败,就要想选择一个接班人来继承家业,振兴家业,光宗耀祖,这样一个人他选中了贾宝玉。他把整个家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贾宝玉的身上,因此要求贾宝玉读他规定的一些书,走读书中举的道路。但是贾宝玉不肯就范,不愿意读这些书,不肯走他指示的仕



途经济这样一条道路。贾宝玉的表现,就使得他感觉到这个家族后继无人的这种悲哀和绝望。所以三次流泪,特别是王夫人提到贾政有意绝她,这个“绝”字就深深地触动了她内心的隐悲。这就是为什么王夫人越劝阻他反而越厉害,而下决心毒打以后,一边毒打却又一边流泪的深刻原因。这样一些看似非常平常的细节描写,就透过贾政表面上的凶狠和威严,无情地揭示了这个封建正统派人物,要拼命地维护这个家族的人物,他的灵魂深处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就是悲哀和绝望的一面。所以他三次流泪,不是心疼宝玉的表现,而是他感到悲哀和绝望的表现,就是贾宝玉不听他的话,走叛逆的道路,使他对家族的复兴感到绝望,感到悲哀。表现在贾政身上的愤怒和悲哀,威严和虚弱,这两个方面既矛盾而又合乎逻辑地统一在他身上,这样就把贾政这样一个正统派,一个行将败落的贵族之家的家长,想要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家族的家业,而又不可能的这种矛盾的心理和思想性格,非常完整地、非常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曹雪芹在对生活的细节描写上,能够写出这样的思想深度,能够概括进这样丰富的社会内容,确实是非常少见的,令人惊叹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林黛玉进贾府,这个在中学课本上我想大家都读过的,这里有两段细节描写,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但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很有讲究的,就是前面我讲过作者是有用意的,是有艺术匠心的。林黛玉进贾府有两个地方写她坐轿子,写得很精细,粗看确实有点啰里啰嗦、婆婆妈妈的味道。但是你要好好体会,读出里面的“无限烟波”来,就不觉得它烦琐和平淡了。

第一次,是写林黛玉刚刚进贾府的大门,是这样描写的:

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那轿夫抬进去,走了一射之地,将转弯时,便歇下退出去了。后面的婆子们已都下了轿,赶上前来。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复抬起轿子。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众小厮退出,众婆子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



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进贾府以后，“另换了三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上来抬起轿子”，特别讲了“衣帽周全的”。注意这里就有讲究了，诗礼簪缨之族，抬轿子的小厮穿着也不能随随便便的。二是，“众婆子步下围随至一垂花门前落下”，下面又要注意了，“众小厮退出”以后，众婆子才上来打起轿帘，扶黛玉下轿。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这些十七八岁的小厮，是不能够跟林黛玉见面的。这一点很重要。这里面是有讲究的。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写林黛玉在贾母那个地方用了茶，吃了小点心以后，邢夫人带她去见贾赦，是这样写的：

出了垂花门，早有众小厮们拉过一辆翠幄青绸车，邢夫人携了黛玉，坐在上面，众婆子们放下车帘，方命小厮们抬起，拉至宽处，方驾上驯骡，亦出了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便入一黑油大门中，至仪门前方下来。众小厮退出，方打起车帘，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

这段描写也有几个地方值得注意。一个地方是开头，“早有众小厮拉过一辆翠幄青绸车”这句里的这个“早”字，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邢夫人带林黛玉出来之前，早就命人把黛玉将要用的车子准备好了。第二个地方，就是邢夫人和黛玉坐上去以后，让众婆子先放下车帘，然后才命小厮抬起，也是不能让他们见到这位小姐的。第三个地方，是到仪门前停下来，众小厮退出以后才打起轿帘，让邢夫人搀着黛玉走出来。这一系列的描写表明，小厮们是不能够跟小姐随便见面的。

另有一处相关的描写，与这里的描写形成了一种映照，也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回的后面，写黛玉由王夫人陪着从贾政住的地方到贾母那里去用晚餐，这中间经过凤姐住的地方，王夫人就向黛玉介绍，说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这时小说里写，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命，就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那个地方迎候他们。这里写他们并不回避小姐，什么原因呢？因为是“才总角的”，就是头上两边挽了



两个发髻,说明他们是没有成年的十来岁的小孩子。不是小厮,小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小青年。小厮和儿童是有严格区别的,礼仪就不一样。你看曹雪芹写得多么细。这么一对比,更显现出前面那种描写是很有用意的,有匠心的,不是随便那样写的。

前面我们讲过映射,这里的描写也是有映射作用的。我们联系到第33回,王夫人听到贾宝玉挨打,写她不敢先回贾母,来不及,怕打死了,“只得忙穿衣出来,也不顾有人没人,忙忙赶往书房中来,慌的众门客小厮等避之不及”。你看,就是一个成年的女主人,也是不能随便跟男性的仆人见面的。这里是写的紧急情况,可见在平日,在通常情况下,小厮和男仆对成年的女主人也是要回避的。这些是写的什么?就是写的贾府这样一个诗礼之家,就是有地位的,有钱的,有文化的,它有一套严格的礼教规范。这些描写还映射到更广的方面。我刚才讲了贾宝玉私下里请医生去给晴雯看病,医生来了以后是不能直接给她号脉的,晴雯的手从帘子里面伸出来给大夫看,那晴雯的手伸出来以后指甲是涂了红的,就赶快用手绢把它盖上,这样大夫才能号脉。晴雯还只是一个上等的丫头,还不够身份,可以想见小姐就更严格了。这就是《红楼梦》里面写的封建社会,诗礼之家里面严格的礼教规范。联系到《红楼梦》的丰富内容,这就有两方面映射的意义。一方面,就是这么严格的礼教规范,男女大防,怎么贾宝玉和林黛玉,还有和一群女孩子就能够成天到晚厮混在一起,而且以至于小说里面写的,和林黛玉是“耳鬓厮磨”,是非常亲近的关系,然后慢慢产生了深挚的爱情。这么严格的礼教规范,为什么能允许他们这样呢?从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首先是贾母对贾宝玉、林黛玉的疼爱、偏爱,特许他们这样的。袭人不招人喜欢,她发现贾宝玉和林黛玉的这个关系以后,就曾经向王夫人建议要想办法把贾宝玉迁出大观园,可见是因为很有权威的贾母的疼爱,才给了他们这种特殊的环境,能够培育爱情的环境的。而同时,贾宝玉的追求自由平等这种朦胧的观念,这种初步民主的思想,也就是在这种跟很多纯洁的女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在跟大观园外面污浊、丑恶的对比中,



在贾府内外各种矛盾的发展过程当中,慢慢地产生出来的。这些描写,对我们理解他们的爱情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环境,贾宝玉的叛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特殊环境,是有帮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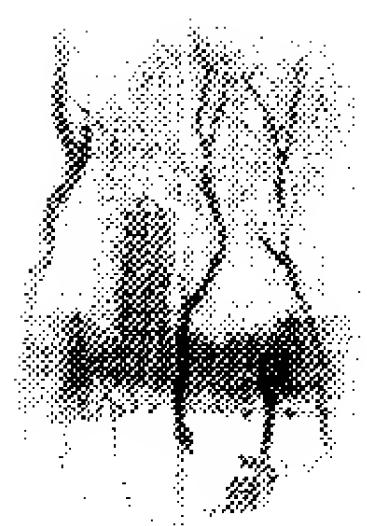
我们进而还可以理解到,大观园这样一个理想的世界,确确实实是作家曹雪芹呕心沥血,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有意地创造出来的。否则像贾府里面这样的严格的礼教规范是不会为他们提供一个发展自由爱情的空间,这么一个天地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样一些严格的礼教规范的描写,又映射到贾府里面有一帮子从老到少的衣冠禽兽,像贾赦、贾琏、贾珍、贾蓉,这些人在男女关系上是非常糟糕,非常丑恶的,根本不顾礼教那一套。这又从另一方面看出来,这个贵族之家,它用以维系它统治的这种封建的精神方面的礼教规范,实际上已经不能够维持了,不起作用了。这个家族走向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子孙们的堕落,道德的败坏,礼教统治的实际崩溃,这也是一个方面。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就是细节描写。

第三个问题讲讲《红楼梦》的语言。

《红楼梦》的语言特色,和它的总体的艺术特色是相一致的,就是我前面讲的“自然”两个字。《红楼梦》的语言具有高度的艺术表现力,是经过作家严格的淘洗和高度提炼创造出来的艺术语言,文学语言。但是它又同时保持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保持着生活的原生态。就和它的总体艺术特征一样,是经过精心的提炼,精心的选择,但是又普普通通,非常自然的一种语言。

这里我想讲一下什么是好的文学语言,有什么样的标准。当然我们可以说准确、生动、精练,这些都是文学语言的特征,但是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标准。我认为好的文学语言,应该是饱含着生活的血肉的语言,又同时是饱含着人物思想感情的血肉的语言。所以好的文学语言的标准有两条,一条是饱含着生活的血肉,再一条是饱含着人物的思想感情的血肉。从文学表现的角度讲,这样的语言就是好的语言。

我讲一个我的体会。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北大招了很多



工农兵学员,那时候不分专业,我就教工农兵学员的写作,不是中文系的,其他系的。工农兵学员有的文化水平比较低,写作很困难。有一个学生,在作文里就写他写作很困难这件事情,他在文章里有一句话说:“我写着写着就写不动了”,我后来在评讲他们的文章的时候,对这个“写不动”的表达大加赞扬,我说这就写得非常精彩呀,这就是文学语言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地方写出了作者独特的体验,别人没有的独特体验。如果改成“我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那可能有很多原因,可能现在文思不畅,或者外边汽车或者打球的吵得很厉害,或者肚子饿了,各种原因都会影响到写不下去了。可是他说的是“写不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感到笔头很重,有千斤之重,提不起来。这就表现了他文化水平不高,写作上的那种特殊困难,心里的那种特殊的感受。这就不一般化了,就表达出了他的独特的生活体验来了。他用朴素的语言,把那种独特的体验表现出来了,这就有了生活的血肉,有了属于他个人的思想感情的血肉。这就是好的语言。所以我觉得人人都可以写出好的语言来,好的文章来,关键就是你要把你真实的生活体验吸收到里面去,你的语言包含着你独特的生活体验。有了鲜活的生活的血肉,有了鲜活的你的思想感情的血肉,那么这个语言就很好了。《红楼梦》里面的大量语言都是这样的,很少用那种夸张的语言,很少用华丽的词藻,很普通,但是表现力非常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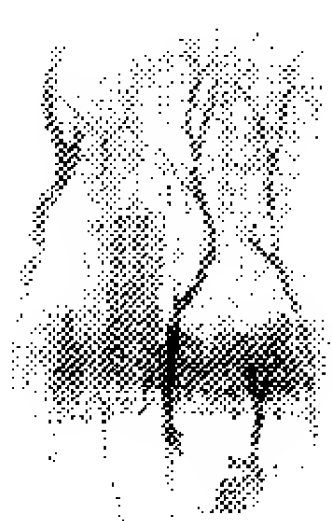
我下面着重说一说人物的语言。《红楼梦》的人物语言特别好。鲁迅曾经讲过一段话,大意是说《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够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就是你看这个纸上写的人的对话,你就能够想像这个人是一个什么表情,什么样的思想性格,什么样的思想感情。《红楼梦》的语言确实实是能够让我们从书本上听出人物的声音,本来字是写在纸上的,但是我们能够听出声音来,由这个声音进而又能够从纸面上看到活动着的人物,并且能够体会出他们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王熙凤是《红楼梦》里面写得非常出色的一个人物,尤其是她的语言。第6回里面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时候,有一个周瑞家的向刘姥



姥介绍凤姐,她说王熙凤这个人,少说些也有一万个心眼子,再就是会讲话,十个会说话的男人也说不过她。王熙凤的性格当然是比较复杂的,丰富的,但是既聪明又善于言词,这确实是她性格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层面,一个特点。她的丰富的鲜明的思想性格,很多时候都是由她的对话表现出来的。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从林黛玉的眼中心中,从她的感受来写凤姐出场。凤姐出场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在黛玉的感受当中感到很惊奇,在众人皆“敛声屏气”的庄肃气氛中,独她一个人竟敢如此“放诞无礼”。可见她在贾府中的地位,也可见她大异于别人的性格。她是一个非常机灵聪明的人,这个机灵和聪明常常都表现在她的嘴上,非常伶俐的口齿。特别是从她讨好贾母、奉承贾母的那些话当中,更能够体会出凤姐过人一等的聪明。看看林黛玉刚刚到贾府的时候,她在贾母的面前讲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很有讲究的: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

她是先赞美黛玉的标致,紧接着就赞美她的通身气派,这是很有讲究的,由表及里,先讲外表的漂亮、标致,然后讲通身气派,这就讲到了内在的气质。而这些,又都落到了老祖宗的身上:因这“标致”和“通身气派”,就不应该是老祖宗的外孙女,而应该是老祖宗的“嫡亲孙女”。这样一来,表面上是赞美黛玉的话,就全都变成讨好老祖宗的话了。“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这“心头”二字是绝对不可少的。只有聪明而富有心计的风姐说话,才考虑得这么精细周到,表达得这么准确。她说这话时还配合着动作,“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处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凤姐听了,忙转



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这段话也是说得绝顶聪明的。她十分懂得，讨好老祖宗，有时候要直接奉承，有时候又要采取曲折迂回的方法，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她都能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掌握得恰到好处。在这里，此情此景之下，说她心里只有黛玉，比直接说她心里只有老祖宗还要更能讨得老祖宗的欢心。只有领悟到这一点的人才能说得这样的话，而作为读者，也只有领会到这层意思，才能从中听出人物的思想性格，从而体会出曹雪芹写人物的语言所达到的高度艺术水平。

凤姐喜欢在贾母的面前讲奉承话，就是拍马屁。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景之下，任何内容都适合拍马屁的。有一次，就是38回里面，写贾母带着一大家子人，贾母很喜欢逗乐，喜欢享受，大家一起讲笑话，她就过得很快活。她喜欢这样的生活。她和大家一起在水池上面的藕香榭欣赏风景，因为心里一时高兴，就说起小时候在枕霞阁那个地方玩儿，不小心失脚就掉到了水里面去，没有淹死，救起来以后头上碰破了一块，现在的鬓角上还有指头儿大的那么一个窝。就这么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要拍马屁，要拍得自然而不生硬，要拍在点子上，拍得很乖巧，拍得让人喜欢而不反感，是非常非常难的。不信大家试试看，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拍马屁。听听凤姐是怎么说的？凤姐不等人说，刚刚老祖宗的话音一落，反应非常快，就笑道：

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

就这么几句话，一个凤姐就活脱脱地站在我们的面前了。看她是那么世故、乖巧、聪明，她专从“福”“寿”两个字上来发挥，这是最切合老祖宗的身份地位的，也是老祖宗最喜欢听的。她掌握老祖宗的心理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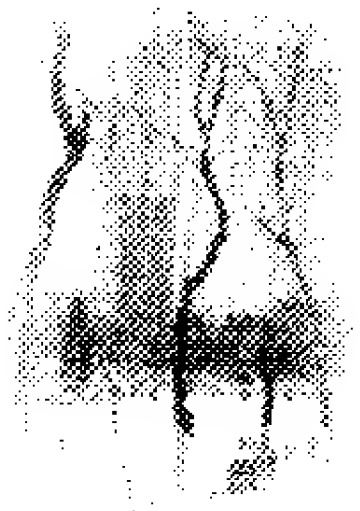


握得非常准确。不过要从头上的那个坑儿转到“福”“寿”两个字上来，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她真是聪明绝顶，一下子就想到了寿星老儿，说的是寿星老儿，实际上讲的是贾母，她在这里是用了一个隐喻，又曲为解释，就是讲歪道理，本来不是这样的，很自然地就跟老祖宗挂上钩了，并且落到老祖宗最喜欢听的万福万寿上面来。这段话把凤姐的那种聪明、乖巧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只有凤姐那样一份奉承讨好贾母的心思，而没有她那样的聪明、乖巧，是说不出这样的话来的，充其量只能说出“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一类干巴巴的套话，像这样有血有肉、有滋有味，让贾母听了心里一定美滋滋的话，别人是说不出来的。

从《红楼梦》里所描写的人物的对话，从人物的语言，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物的性格，再进而联想到人物之间的关系，联想到更丰富的内容。凤姐和贾母什么关系？贾母在贾府里面是什么地位？她为什么要拍贾母的马屁呢？因为贾母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是说了算的，可是大家知道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是怎么说的，就是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在老祖宗这里不灵了，你看贾政打贾宝玉一听到老祖宗说了马上就下跪，哪里是从子，不灵了。这是什么意思？反映的是封建末世了，这些东西都维持不了统治了。贾府里面男的哪个行？惟一看重的就是贾宝玉，而贾宝玉也不是他们所想的那种人，其他的男人都不行，所以妇女当家，这种情况，三从四德这样一种封建礼教到了封建末世不能维系了，这些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我们从人物的话来理解人物的性格，再联想到人物之间的关系，再联想到这些人物关系所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社会内容，我们这样读的话，对《红楼梦》的理解就深入一层了。

这是讲的人物说的一段话，有时候就是一句话也能表现出人物的思想性格来。如第32回，写贾雨村到贾府里来，贾政命宝玉出来跟他会面，宝玉不愿意，而又不肯违抗父命，无可奈何磨蹭一阵之后只得出去。因为满心不高兴，又走得匆忙，忘了带上扇子。袭人怕他热，急忙拿了扇子追出来给他。要是一般人会这么说：“扇子忘了，给你。”或者



甚至更简便些说：“给你扇子。”可袭人却是这么说的：“你也不带了扇子去。亏了我看见，赶着送来。”从温存体贴中透出一种有意讨好的意味。一件极琐碎平凡的小事，一句极普通的话，却极生动、准确地表现了袭人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微妙的心理。她是一个受主子宠信的奴才，一心做着将来做半个主子(姨太太)的美梦，便时时处处都要显出这种特殊的亲近，以讨得宝玉的欢心。

有时候不是一句话，单是一个词的运用，就能收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如第40回，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由许多人陪同，先在潇湘馆黛玉的卧房里坐了一会儿，后来贾母说：“这屋里窄，再往别处逛去。”刘姥姥接着贾母“这屋里窄”的话茬儿，说：“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果然威武。”“威武”这个词，是极普通，人人都熟悉，人人都会用的，可从来没有人用来形容房子和家具，但刘姥姥用在这里却是用得再好不过，不但准确，而且传神，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内容。刘姥姥的这番话，特别是用上“威武”这个词，是从贾母的一个“窄”字引出来的。刘姥姥作为一个从偏远农村来的贫苦人家的老妇人，她对贾府里房屋家具的感受当然是同贾母完全不一样的，可以说是两种身份，两副眼光，两种感受。这是只有刘姥姥处于那样特殊的环境条件下才说得出来的。“威武”一词用在这里，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深刻含义：其一是，刘姥姥是一个从农村来的没有见过世面的小户人家的妇女，从来没有见过像贾府这样气派的房子和家具，因此在这些大家伙面前，十分自然地产生一种威压感。“威武”这个词用在这里，就最真实、最生动地表达了刘姥姥在此情此景之下的独特感受。其二是，刘姥姥又是一个虽然纯朴却又老于世故的老妇人，到贾府里来是为了得到一点好处，她一进贾府就看出来贾母这位老祖宗的身份地位，是一位她能不能得到好处的关键人物。所以一有机会就抓住说点讨好奉承的话。“威武”这个词用在这里，就多少透露出一点讨好奉承的意味。简单一个词，却极传神地表现出刘姥姥独特的身份地位，独特的思想性格和独特的生活感受，同时又生动地揭示出人物之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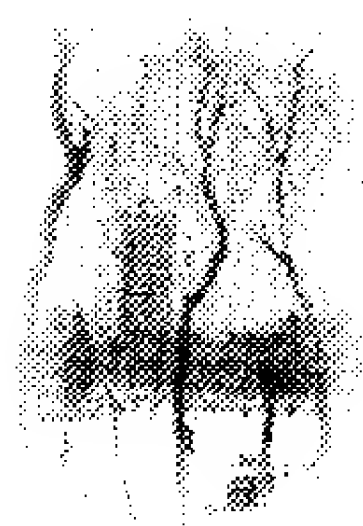
微妙关系。再比较一下凤姐讨好贾母和刘姥姥讨好贾母的情况，同中又有异。要讨好人都需要一点聪明，但凤姐的聪明中显出机心，而刘姥姥的聪明中却透着纯朴。

以上我们从映射、细节、语言三个方面，举例谈了《红楼梦》的欣赏，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把握《红楼梦》的总体艺术特色——“琐碎中有无限烟波”，能从小中见大，细中见深，平凡中见不平凡。当我们从《红楼梦》那些看似琐碎平凡的日常生活描写中，发现了其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意蕴时，就会真正领略到《红楼梦》独特的艺术美，得到同读别的中国古典小说不同的审美愉悦。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咱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周教授。

（2004年11月6日）



读书在燕园

■ 初晓波

初晓波,山东文登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东北亚政治外交的研究和授课工作。

各位同学,晚上好!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姓初,名字叫初晓波,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书。我看今天来的有刚入校的新生朋友,也有许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同学和老师。在我进来之前,有的同学可能会想,今天要讲咱们北大读书传统的话,应该是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我本来也这么想,所以来之前有点儿紧张。但当学生会的同学们找到我的时候,我还是答应下来了。这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可能比各位大了几岁,早来北大几年,多听了几年老先生们的讲座,多看了几年书,略有一点粗浅的体会。今天我就把从老先生们那里得到的经验和一些启示复述给大家,自然难免很多是鹦鹉学舌了。当然,如果真的是鹦鹉学舌,说了错话是鹦鹉主人的责任;今天则不然,说得不对的地方全部由我自己负责。第二个原因,是读书不分年龄大小。我和大家一样,非常非常喜欢读书,喜欢买书。可能,我比老先生们对现在书的类型、购书途径,更清楚一点。所以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希望能用实用的内容弥补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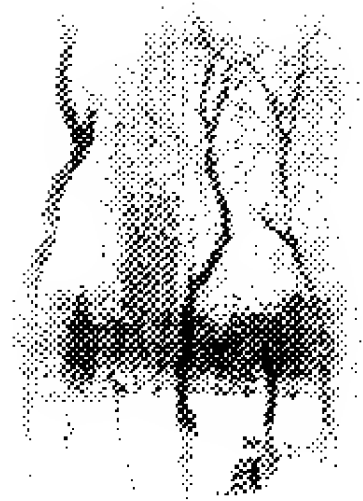
今晚谈的题目是“读书在燕园”,内容大致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是谈书,第二是谈读书,第三谈读好书,第四谈读书之余。北大有优良的读



书传统,以下要给大家举的例子,大多是前辈先生的教诲和事迹,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当然我也希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间会穿插一些古人或国外学者的读书经验。

第一方面,谈书:包括对书的感情、书的种类和买书的渠道。书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可能是因人而异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说清楚。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前人是怎么看待书的。一位是顾颉刚教授,老先生写一个序言就是一百多页,水平很高。十几年前我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曾经立下鸿鹄大志,希望能够读完顾颉刚先生写的《古史辨》这部巨著,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如今大学生毕业找工作一般人关心的是升迁机会、奖金多少、有没有出国培训机会等等。当年顾先生在南方接到复旦大学邀请他任教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给我安排的房子有多大。复旦告诉他一般教授就能分一套房子。顾先生说您能多分给我几套房么?人家笑了,说您是著名学者给您两套够了吧。顾先生说,我家的书有6万多册,如果给我一间房子,我的书装不下。这样好不好,您能不能先给我三间房子我暂时放一下,等我死了以后所有藏书都归你们。这是顾先生的弟子在回忆录里提到的。大家想一想,一个老先生在找工作之前并不考虑薪水,未来的升迁,考虑的是有没有地方来放书,这是真正喜欢书的人,以事业为重的人。后来,复旦大学还在犹豫,而当时中科院就请了顾先生说:“您到北京来,我们一定给您放书的地方。”顾先生就到了北京,没有去复旦大学。

另外一个例子是日本的学者,名字叫内藤湖南。外语学院学日语或中文系研究比较文学的同学一听就知道。内藤先生是日本京都大学的著名教授,他才华横溢,年轻时是一个普通的记者,经常到中国来旅行,对中国很有感情。当时京都大学的校长就把这样一个小记者请进大学,引起许多流言蜚语。事实证明,内藤先生是京都大学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是世界级的汉学家。当然,他成功的背后有几个中国人的鼎力帮助。一位是罗振玉先生,一位是王国维先生。内藤先生买书的



方式和现在我们北大的同学买书不太一样,没有时间天天去跑书店、扒拉旧书摊,他就向旧书店订购。旧书店经理人很狡猾,如果把书只给你一个人,那就卖不出个好价钱,他给搞相关专业的、可能需要这本书的很多学者都发去了书目。内藤先生最紧张的时候是接到书目的早晨,惟恐来送书单的人迟到了。因为如果书单送晚了,先送给张三、李四等其他学者,等你拿到书单往书店里跑时,人家已经到了,而老书店的习惯是先到了先挑。于是内藤先生说,我一辈子最爱的、最恨的人都是旧书店老板。每当买到一本别人没有抢到的好书时,他总是拿在手里得意地展示。旁边迟到的人就纷纷抱怨说,又让内藤抢了先。当然,还有很多时候他也会站在旁边,看着别人得意洋洋而大发牢骚。这种类似小孩的心态,也体现了一种对书发自内心的热爱。

我刚说过读书不分先后,对书的感情更不分先后。我们和老先生相比,可能没有那么多知识,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学问,但是我们都有对书的感情。记得我小时候也有很多关于书的故事。当时我爸爸在城里教学,我在每个周末的下午6点到7点他回家的时候,绝对不出去玩,一个礼拜只能看到爸爸一次,特别高兴。结果呢,只要看见爸爸,我不是先请安,而是一下子就将自行车把上的提包抢过来。其实很简单,我清楚地知道,爸爸为我订的《小朋友》、《儿童时代》、《儿童文学》等杂志或者新买的图书就在这提包里。我爸于是乎就很生气,儿子到底是欢迎我呢,还是欢迎提包?我想大家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吧。进入大学后,一段时间内我比较节约。当时兜里的钱不多,在保证吃饱饭的前提下主要的花销就是买书。那时买书喜欢找打折的,有8折就不买8折半的。还有就是去旧书摊淘旧书,那时候最喜欢去中关村操场,非常大的露天旧书市场,足够看上一整天。不过去买书之前心里总是惴惴的,因为担心兜里的钱不多,万一遇到喜欢的书却只能眼睁睁失之交臂。我最惨的一次是钱已经基本花光了,却看见一本从拉丁文直接翻译为英文的企鹅出版社老版本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时这本书还没有中文译本,我的欣喜之情立刻溢于言表。卖书的老板一看就明白



了,张口就要5块钱,而且不能还价。当时我还真拿不出来,磨了半天。老板说,这样吧,你等到我收摊时如果没有人来买,你来帮我收摊装车,就3块钱卖给你。我一直等到下午5点半,帮他把书装在车上推出大门才拿到书,当时那个高兴劲儿呀没法说!用劳动换来的这本书,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架上。这是十年前的事,至今印象还非常深刻。

谈书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什么样的书。大家以后有机会可以去看看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就是珍藏着所谓镇馆之宝的善本图书阅览室——一进南门右首的那间屋子。我很喜欢那里的氛围,以前总能看到几个老先生戴着白手套、拿着铅笔,特别专注,就像老僧入定一样,等着图书管理员把书从库里取出来,然后带着一丝虔诚的神情开始看。这种感觉我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看见过,很神圣,像醍醐灌顶一样,灵魂上会受到洗礼的。有新来的同学说,北大图书馆也就这样呀,没有多少书嘛!实际上今年正赶上图书馆整修,保存本库和大库都被迫封存了,暂时你还看不到。不过不要着急,等明年整修好的新图书馆全部开放了,一切都会大为改观的。

除了我们能手翻的书以外,现在网络图书发展很快。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七八个人住在一起,后来四人一块住,每个人都有一堆书。实在没有办法,就只能把暂时不用的书放在壁柜里或者楼道边上,整天提心吊胆。很多书都想买,但你搁哪儿呀?所以大家应该了解一个道理,有的书你是不需要买的。比如说,网络图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学中文、历史、哲学的同学,也许有很多人会说,我就喜欢拿着书本看。我也是非常喜欢拿着书本的感觉,不喜欢趴在电脑前面看“书”。但是有大量的书是可以“偷工减料”的,就是说很多书可以不放在书架上,而是放在电脑里。现在国学网就有大量的电子书下载,图书馆有二十五史检索,有《十三经注疏》的索引,有唐代文学的数据库等等,这些我们都应该充分利用一下。这一切在几年以前都是不可思议的。前一段时间,我帮我爸爸查一份资料,中国古代一名学者的一句话,典故出自哪里。如果按照以前的方法,只能去扒拉类书或者去查阅四库全书。别



说一天、两天,我估计一个月、两个月都扒拉不完。现在呢,你坐到图书馆电子阅览室里检索,通过键盘输入主题词,大约二三十秒钟就全出来了。“君子善假于物也”,网络图书给我们带来了崭新的图书观。大家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利用越快,掌握得越熟练,就越能获得先机。

举个例子来说,我给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们上课,谈到关于东北亚安全问题时要使用一些国内外的相关图书,平时把这本书每一章放在一个文件夹里,PDF格式,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需要的时候只要点一下相关的章节就可以了。网络图书不仅方便,而且保存也很容易,一张700兆的光盘可以刻上一个书架的书。我劝大家充分利用课余时间,把上网聊天改为上网找书。搜索到自己需要的图书,而且经过整理越来越多,形成系列,同样也是一种乐趣。我们有些高年级同学制作的FTP上的书也可以自由下载,尤其政治、法律、文学、历史类的书特别多。据我所知,其范围包括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图书,甚至许多外文电子书也可以找到。自己搜集整理的图书放在自己电脑里,想看的时候就点一下,可以一章一章看下去,还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做一些记录或者摘抄。这时候真的会感觉读书是件非常惬意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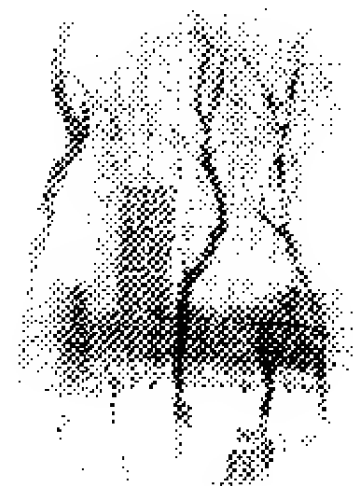
关于书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去哪里买书比较好,这是大家很关心的事情。先说正规的新书书店,学校附近最有名的是万圣书园,本来在靠近西北三环人民大学那边,后来迁到北大南门,不久又搬到东门博雅塔下现已拆迁的成府路上,现在的店面在北大清华教师蓝旗营小区内。万圣书园有非常专业的人从全国图书书目中进行挑选,成体系、有针对性地进书。特别是我们社会科学类图书相对来说是比较全的。我们这一代人对万圣书园很有感情,它搬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已经数不清到底在里面买了多少书。类似的书店还有北大南门附近的“风入松”,海淀图书城里的“国林风”,也都是可以搜罗图书的好去处。不过这些地方买书折扣比较少,一般顶多9折。但是,当你急需用书或寻找不太好找的书,我估计去这些地方应该没什么问题。西单图书大厦图书数量比较多、购物环境也好,但对我们而言,图书的精选远不如万圣书园,



而且还要考虑你跑一趟所要搭进去的车票和时间。另外,我们附近还有中关村图书大厦也可以去看看。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些书店现在基本上都有自己专门的网页,可以搜索书目,去之前做好相关查询的准备是很有帮助的。

近年来网上购书也开始流行起来,我很少买,大家可以上网看一看。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孔夫子旧书网,文、史、哲方面的书非常全,价钱稍微贵一点,但是有一些很老、很难找的书。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互相探讨,其中有一些从事不同行当研究的人推荐不同领域的参考书目,有一些是很全面、很权威的,可以开阔眼界、节省时间、少走弯路。另外一个买书的选择就是中国书店,尤其对喜欢旧书的同学来说是个好去处。我们学校附近海淀图书城里就有一个,在西单附近有一个主要卖旧杂志的中国书店,在琉璃厂也有一个很大的中国书店,隆福寺、新街口、灯市口也都有中国书店的分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国书店每年都有定期的书市,有些中国书店也把自己的书目上了网,可以查一下,这也是一个捷径,了解到哪里有需要自己的书就可以直接奔过去。有时候去中国书店东看看、西瞧瞧,会遇到很多有趣的事情,看到很多让你非常吃惊的书。比如,我在1996年去海淀中国书店买书的时候,发现一本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品相极好。我本能地打开一看,上面竟然有钱钟书先生的大印,原来是他自己签名送给朋友的。我当时想,这可是件宝贝,得赶紧买下来,而且价格也不贵啊,30块钱,这次我可算是捡漏了。高高兴兴去结账的时候,售货员一看我拿着这本书,说:“小伙子,可以呀,是学生呀,还是老师?有钱呐!300元!”哎呀!我少看了一个0。回头一想,他们对书的判断和行情肯定是非常清楚,盼着他们走眼是不太可能的。尽管在那里不能讨价还价,但还是值得去看一看。

我还想再给大家介绍一些淘旧书的地方。北京市里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春季、秋季书市,想买成套书的同学可以到书市上看看,有的时候最低只有3折。比如要买《辞海》的话,平常也就9折,书市最低可能就



有6折。另外,在马尾沟附近有新华书店总店的仓库,里边的书比较全,有一个专门打折的大厅,特别是中文系、历史系的同学可以去找找,历代的词话、书评以及笔记小说很全。有些同学最喜欢旧书摊,以北大为中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书市,也就有了无数个有趣的故事。我看到最早的旧书市是在中关村操场上,那时有上百个摊位,壮观极了;后来大部分挪到地坛体育馆后面的旧操场上,而那些在北大附近卖书的人则跑到清华北门小河旁;再后来因为城管部门“查剿”,被迫挪到清河镇的马路边上;而有一部分人一直坚持在北大东门“打游击”,买书的同学也是络绎不绝。如果有时间,你可以坐300路车到潘家园旧货市场,那里有很多卖古董的,当然需要你专业的眼光,旧书市的规模也比较大。还有报国寺那里主要卖收藏书,价格稍贵一点,也能找到和我们专业相关的书。此外,以前五道口、玉泉营等地也有较大规模的书市,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其实也不用舍近求远,我们校内旧书市的规模就很大,在学校西南角、研究生宿舍旁边,每个周末都开。类似这样的书市在人大、清华也都可以看到。北大校内以前的旧书市场更加辉煌,辉煌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北大的三角地,也就是现在百年纪念讲堂一带全是柿子树,柿子树底下很多卖旧书的。我估计最多时能有几十家,周末的时候人声鼎沸,热闹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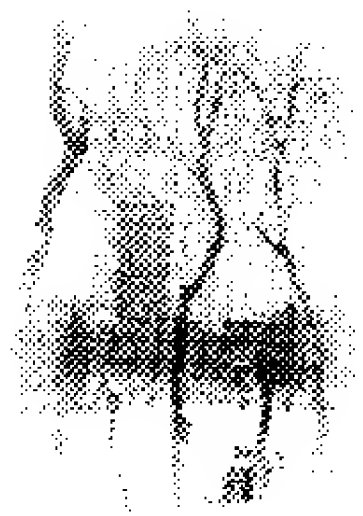
说了这么多,最好的地方还是我们的图书馆。毕竟那里都是免费书,而且种类也比较全。著名史学家蔡尚思先生说,我们的老师有两种,一种是能给我们上课、教诲的“活老师”,一种是“死老师”、不说话的老师,也就是图书。说到底,“活老师”也是“死老师”教出来的,因而应该称图书为“太上老师”。因此,图书馆也可以被尊称为“太上研究院”。北大老校友、曾经写过很多书的张中行先生文笔非常幽默,他讲了自己的一个经历。以前张先生是北大的,看古籍善本书很方便,也不需要办特殊手续。后来他老人家离开了北大,因为他女儿在北大工作,所以也经常进图书馆来看书。结果不一样了,必须有批准手续才可以看。他说自己每次等着看那些“老朋友”(就是那些曾经看过的书)的时候都很



郁闷。说到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珍惜在北大的美好时光,充分利用一下图书馆,对我们学业长进一定有很大的作用。

接着我要谈的第二个方面是读书。我们从小到大听到过很多关于读书的故事,比如说“刮目相看”、“孙康映雪”、“车胤囊萤”、“欧母画荻”。说起古人的读书,让我们总觉得读书是个苦差事,“映雪”、“囊萤”和“画荻”都说明学习条件很差。范仲淹学习的时候,通常就煮上一锅粥,凉透之后分成几块,一顿来一块以节省时间。现在读书的条件可彻底改变了,读书环境的优化就不必说了,就连读书的时候听听音乐、喝一点咖啡都成了时尚。你是不是读书人,就看你欣赏不欣赏读书的意境。读书本身是一件很高尚、很惬意的事情。有人说中国古代文人读书的最高境界是“雨夜孤灯杯酒读《楚辞》”,这可真是字字珠玑、传神之至。说这些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读书并不是枯燥无味、劳心伤神的事情,要从读书过程中体会到不可替代的乐趣。

所谓“开卷有益”,我们应该把读书变成自己的一种习惯,感受其中的幸福。我们伟大的前辈鲁迅先生在《读书杂谈》中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这句话精辟之极。大家现在功课很紧张,特别是修双学位的同学,有很多功课要做。要是有空的话,要尽量涉猎不同领域,博览群书对提高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是有好处的,我觉得这是鲁迅先生一生经验的积累。我想举两个小例子来说说我的体会。第一个例子,读书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启示,加深你对日常生活、人生等很多方面的理解。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酒至半酣,突然聊到人为什么要喝酒的话题。大家的答案各不相同,当时也没有当回事。过了两三天我出去办事,在车上随手翻了翻《唐诗三百首》,看到韦应物的一首五言古诗,当时拍案叫绝——应该说是拍车叫绝——慨叹“与我心有戚戚焉”。韦应物在做苏州太守的时候和朋友喝了酒之后写了这首诗,其中几句是这样的,“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俯饮一



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体会。几个好朋友坐在一块,当我们的问题有更深领悟的时候,兴致所至也就忘了收敛,多喝了几杯,来点水果,要盘涮羊肉,再加一点酒,继续慷慨陈词或者洗耳恭听,这时感觉到飘飘然、悠悠然,不就是“意欲凌风翔”吗?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已经把这种体会完美地表达出来了。古今中外类似这类诗文的确能够让我们体会到不同时代和文化背景的魅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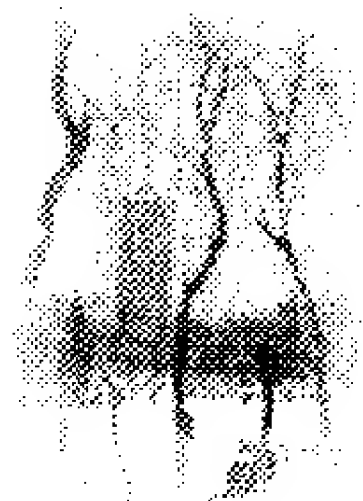
第二个例子是读人物传记的收获。我平时很喜欢看古今中外的人物传记,看别人的一生不仅可以让我们悟出很多人生哲理,而且有很多人物传记本身就是我们专业学习的参考书,是对课本知识非常好的补充。比如说你要看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实际上这本传记本身就是宋史研究领域内非常严谨的学术著作;看《周恩来传》,读到的就是中国革命史、中国外交史;而《基辛格传》则让我们了解一个思想家成长过程的同时,还可以了解美国政治、外交。记得有一次我读到辜鸿铭的传记,印象很深刻。辜鸿铭先生是我们北京大学历史上有名的“怪人”,都到民国时代了,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很多人一提到他总喜欢说他是榆木疙瘩、顽固不化,议论他喜欢小脚、赞扬纳妾等花边新闻。我看了他的传记后有很多感触,每个人都有很多侧面,不能一叶障目。辜鸿铭先生号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任在北洋”。据说会九门外语,拿过十三个博士。尽管他对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五体投地,但在北大却是讲授拉丁文。我看到周作人先生在《苦茶》一书里面讲了很多老北大的掌故,其中描述的辜鸿铭先生非常可爱。因为他平时教学生拉丁文,也就没有机会显示他对国学的态度,于是一有机会他就要冒出来。有一次蔡元培校长准备讲话,下面有人还在交头接耳,这时辜鸿铭先生突然站起来说道:“校长训话了,各位请安静!”弄得大家面面相觑。1919年6月,北大教授会发动大家表决,希望挽留蔡元培校长。会场上主要是革新派在座,大家发现辜先生竟然也身列其中,他是坚决支持蔡校长的。每个人都会站出来找一些理由表明自己的态度,辜先生也



举手要说两句。他的理由和别人的都不一样，“校长就是一校的皇帝，皇帝怎么能走呢？”弄得当时革新派哭笑不得。此外辜先生的一句话，影响了我很长时间。那是他新学期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给同学们上课。大家知道，我们北大的传统是比较强调自由、民主的，同学们一看拖着马尾辫的怪人来了，都哈哈大笑。辜先生没笑，慢条斯理说了一句话，让所有的学生们都哑口无言。说的什么啊？他说：“我的辫子在脑袋上，你们的辫子在心里。”时至今日，大家仍然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条小辫子，是不是就完全没有痕迹了呢？

关于读书要谈的第二个内容，就是把读书变成一个习惯，涉猎要广泛，这也是我们北大的一个优良传统。学习就像造金字塔一样，如果下面的基础不宽不厚的话，想建起一座巍峨的金字塔，那肯定是海市蜃楼。我们的老校长胡适先生治学的名言就是“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当然了，“高”是“专”，“广大”是“博”，基础广博在很多时候有助于你去发现问题，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和认识。

《礼记·学记》里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同学可以发现很多自己的不足之处，老师在讲授的过程中也会发现自己的教学和研究中的漏洞。我本人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主要做东北亚地区的政治与外交，尤其是日本的政治外交研究。下课和同学们聊天的时候，有的同学忧心忡忡：您说这美国怎么办呀？到底想干什么？打完阿富汗，又打伊拉克，而且布什还瞄准了下一步目标，一个是朝鲜，一个是伊朗。冷战结束了，大家都以为天下太平了，它这么打来打去的，将来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强大的美国究竟会走向何处？“美国世纪”会有多长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复杂，不可能用一句两句话说清楚。怎样才能给同学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呢？我想起前不久看过的一份材料，作者是我们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法律、历史的同学都应该注意的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在文章中说，“权力的每一点减退都意味着向暴力发出一次公开的邀请——因为掌握权力并感觉到它正从自己手中溜



走的人总是发现难以抗拒用暴力代替权力这一诱惑”。这句话有点晦涩,大家想一想,倾向使用暴力的人、组织或者国家,一般来说都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存在着权力的减退或者减退的威胁。这是很辩证的一种说法。美国为什么打人,说到底它现在不是或者感觉自己可能不是天下无敌的寂寞高手了,不属于“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层次了。

对于强者的态度,我们东方人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泰戈尔在 1899 年的最后一天写了一首名字叫《世纪的黄昏》的诗,现在读起来仍会给我们巨大的震撼。大家不要忘了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那正是大英帝国统治印度的鼎盛时期。泰戈尔在诗里写道:“不要羞惭,我的兄弟,站在骄者和强者面前,穿着您那朴素的白袍。让您的荣誉成为谦恭的荣誉,您的自由成为灵魂的自由。就在您毫无掩饰的贫穷的基础上,天天修造上帝的宝座。要知道庞然大物并不伟大,骄傲并不久长。”我琢磨了很长时间,东方人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确不太一样。与泰戈尔这首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日本人的一首诗。在日本著名小说《平家物语》的开篇写道,“祇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的声响;沙罗双树的花色,显盛者必衰的道理;骄奢者不久长,只如春夜一梦;强梁者终败亡,恰似风前尘土。”看得出来,这其中流露出佛教无常观对日本人的重要影响。有同学慨叹说,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如果好好读读这首诗,也许就不会侵略了,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从以上的例子中可以看到,培养读书习惯,广泛涉猎,多了解人类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经验和财富,会帮助你对现在许多事物和现象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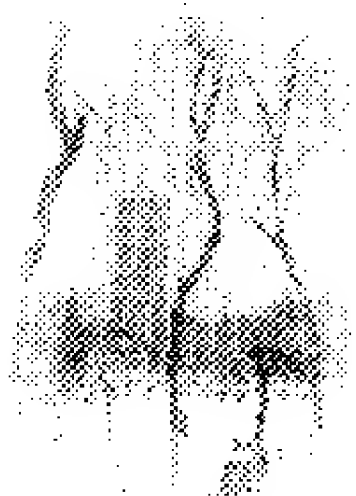
关于读书的第三点,我想谈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的培养——融会贯通。葛兆光教授是我们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现在清华大学做教授。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就是《中国思想史》,共三卷,最近还对第一卷作了一些补充,单独成书。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内有很多种著作,我个人认为葛老师的最大特点就是尝试着把文、史、哲融会贯通,于细微之处见许多高深的道理。比如说他认为思想史的研究范围要包括私塾教材、



考卷以及地图等材料,其中对于中国古代的地图,尤其是世界地图传播到中国以后对思想史和人们观念产生的影响非常关注。当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评价并不是完全一致。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尝试,是发扬了老北大的学术风范。

南宋的吕祖谦先生曾经说过,“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这样努力的结果,“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其实这种想法在不同学科里都有阐述。我们北大一些老师的观点就很有代表性。比如外国语学院的金才教授根据自己研究日本思想史的经验,提倡在研究和学习中“换位思考”的重要性;而国际关系学院的尚会鹏教授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反复强调许烺光先生提出“边缘人”的重要性,避免以自己为中心和以己度人的错误。而中文系的严绍璁教授在介绍自己的治学经历时说,搞科研、看书,不能只简单地看翻译过来的书,尤其是搞文史哲的同学,应该努力用研究对象国家的语言、意识、思维特征去思考,这时你才能发现我们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微妙区别,而精华往往就在这微妙之处。

我再举个例子。刚才我谈到美国究竟往何处去的问题,现在我想说说世界将往何处去的争论。对于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各国学者提出许多不同的观点。有些同学最喜欢世界文明中心转移论的观点,也就是说世界的文明中心或者权力中心是从葡萄牙到西班牙,到荷兰,然后是德国、法国、英国,二战以后的美国,接下来再转移不就到中国来了,21世纪将是所谓的“中国世纪”。而很多人不太喜欢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大家怀疑文明的冲突为什么不可避免呢?我想总结出一条规律,不能仅仅看表面现象,你要拿出充分的理由才可以。不同的学科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结论不同,我想不应该仅仅由一个学科给出一个固定的答案。比如说,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里说:“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



见异,又能集异见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说白了,就是你不要觉得你比别人高出一头,不要奢求改变别人,让别人和你完全一致。在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不要忘了别人也可能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玫瑰多么漂亮,如果世界上的花朵只剩一种玫瑰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世界失去了多样性也就失去了动力,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同样的道理,另外一个老先生从不同学术体系出发得出了类似的答案。他就是华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研究非殖民化和世界体系论的大师,他曾经和一些学者合作写过一本书,题目叫《开放社会科学》,华勒斯坦作出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世界,应当允许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同时并存,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真理不一定总是存在于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手中。而且,“只有通过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有可能把握我们现在和过去一直生活于其间的丰富的社会现实”。有同学说,这句话太晦涩了,有更简洁明了的阐述吗?有的!我们北京大学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谈到未来世界发展的时候,仅仅用了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不热爱自己的文化,就比较麻烦了;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文化,并不是说自己的文化是唯一正确的或美好的。相反要学会去尊重别人的文化,理解别人的文化;而且文化与文化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都必然有共同性,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找出这些共同性,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

关于读书要注意的第四点就是要提倡怀疑精神。“怀疑精神”并不是说我们要怀疑现实所有一切,而是应该把所有的问题,放在理性的天平上衡量一下、审判一下,对的我接受,不对的我就要拒绝。这一点在我们读书的过程中非常重要。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是很有道理的,丧失了怀疑和判断能力,只能盲从别人的意见。最可笑例子就是对菠菜能不能补血的争论。以前关于营养学的参考书上说吃菠菜能补血,但后来看到其他的书出来辟谣,吃菠菜不补血,这是一个误区,最近



好像又有人站出来重新提出“补血论”。要是万事局限于书本,你相信哪一个?这是一个生活上简单的例子,但是在学术上也会同样遇到。当年有同学问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长陈垣先生,看书应该注意什么。老先生说:“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这句话有些夸张,但是其中道理是很深刻的,对我们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是一个很好的警示。所以说,我们在读书之前一定要有个信念,这书里面说的不一定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其他结论,这一点一定要有思想准备。当年郑板桥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法比较有趣。他说:“善读书者曰攻、曰扫。攻则直透重围,扫则了无一物。”虽然听起来这段话有些“粗鲁”,但对我们很有启示。当然你要掌握“直透重围”,学会“了无一物”,还是有很多方法的。我们古人强调读书是有窍门的,比如韩愈在《进学解》中就提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前人还提醒我们说:“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袞九章,但挈一领。”不管山怎么险峻,学问怎么高深,肯定有中心和脉络;龙袍很漂亮,体系很庞杂,理解和掌握就要提住领子,抓住根本。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去实践却需要我们一天天、一年年,甚至用一生慢慢去体会其中的精妙。大儒朱熹在《读书法》中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也就是说,你看书的时候就要善于发现问题,善于思考,看书的目的就是要慢慢解决这些疑问,这时候你才有真正的长进。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用“莫须有”的罪名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打成反革命。很多人说“莫须有”就是“不须有”即“不需要有”的意思。其实对这个词解释的争论由来已久。此词出自《宋史·岳飞传》,当时秦桧要把岳飞的儿子岳云以及部将张宪斩草除根。韩世忠去质问秦桧,你有证据吗?秦桧说:“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如果说“莫须有”是“不须有”的话,放在原文中体会一下,也太强词夺理了。毕沅在《续资治通鉴》里提出,“莫须有”不是“不须有”,而是“必须有”。俞正燮在《癸巳存稿》里面说,你们说的都不对,实际上是我们读古文时句读出了问题,“莫须有”实际上是“其事体莫,须有”,“莫”变成



了助词。到底相信谁的结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经过多年的思考，得出了崭新的结论。“莫须”为宋代的一个常用语，大体相当于现在“恐怕”、“别是”的意思。他拿出大量实例总结出这样的规律，从南北朝到唐一般用“莫”单字表示测度疑问，唐开始至宋有很多使用“莫须”的例子。而从唐开始出现“莫”后加否定词，“莫不是”、“莫非”、“莫非是”等，“莫须”后来就逐渐消失了。吕叔湘老先生不拘泥前人的说法，给我们很多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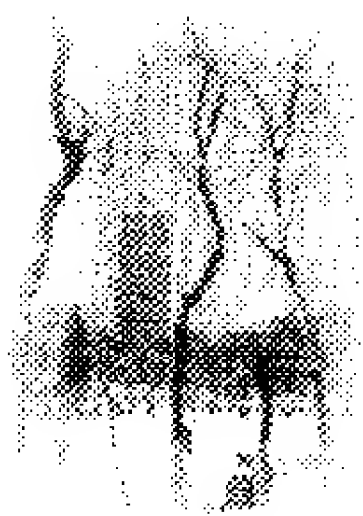
再以我们研究日本政治外交的体会来举个例子。说到中日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的时候，有一个词肯定会出现，大家也许也听说过，中国与日本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呢？理解不足！希望在哪里呢？相互理解！无论是外交部门还是学术研究，大家对这个说法已经习以为常了。真的是这样吗？后来我在看国际政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的时候深受启发，作者在书里说，人们已经把相互不理解作为国家关系发生冲突的原因，可是翻开历史看看，哪两个国家发生战争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相互不理解呀！仔细想一想，实际上“理解”本身虽是一种前提，却是有限度的。拿中日关系来说，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日本立刻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抗议，说中国不应该拥有原子弹。周总理当时回答说，因为日本是第一个遭受原子弹爆炸苦难的国家，提出抗议反对发展原子弹，这一点中国绝对表示理解。但是，中国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需要具有核能力以自卫，也请你们理解。所以造成国家矛盾的是不是不理解呢？恐怕根本原因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理解与否只是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条件之一，而不是根本条件，更不是全部条件。所以读书时我们应该多开动脑筋，这样会带来新的思考。

关于读书要注意的第五点是治学严谨，这也是我们北大优良的传统。我上学的时候听季羨林先生讲治学。听完讲座我拿着笔和本跑到季老先生跟前，请他留句话，季先生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了两句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句话的原话不是季先生说的，但却是他老人家一生的理想和实践。读书、学习需要长时间的努力，要甘于



寂寞。同时,研究必须严谨,文章要言必有据,不能随心所欲、人云亦云。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勤奋。程郁缀老师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也是我们学校社科部的部长,负责全校文科的发展规划和管理指导。程部长非常忙,经常在校内校外开会,天天都有人找。我很奇怪,程部长写了很多专著和论文,还要带那么多研究生,要上许多课,哪里来的时间啊?程部长告诉我说他给自己书房起了个斋名,叫“三余斋”。哪三余呢?夜晚为一日之余,周六、周日乃一周之余,寒暑假乃学期之余。他的主要研究基本上都是在“三余”中写出来的。而且说等退休以后就改成“四余斋”,退休乃人生之余嘛!我不能不对程老师的精神表示由衷钦佩。同时呢,治学严谨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要有耐心,要虚怀若谷。《颜氏家训》里告诫我们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很多老先生都是以这句话作为治学指南的。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长期在清华大学、后来在中山大学做教授,曾在北大代过课。陈先生通十几国语言,而且国学功底鲜出其右,不是一般的学者,是大学者。他在自己的文章里说:“史料简缺,诚难确知……寅恪姑取一时未定之妄见,附识于此,以供他日修正时覆视之便利云尔,殊不敢自谓有所论断也。”这么大的学者,这么高深的学问,对自己的文章如此谦虚,从来不说自己得到的是最终的结论、是真理,尤其在风气浮躁的今天,值得我们学习。另外我们北大以前的名教授黄侃先生直截了当的话语,也同样发人深省。他曾经立志50岁前不写书,可惜不到50岁就去世了,他老人家留下的大多是手稿和读书笔记。但他的学生桃李满天下。他告诫后人,治学有四大忌讳,“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不能服善”。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警钟长鸣的座右铭。

今天要讲的第三个方面是读好书。读书方法很重要,但选择读什么样的书也很重要。我们哲学系的泰斗冯友兰先生,至今在北大图书馆二楼还有他的雕像,非常有神韵。他把自己的读书经验归纳为4条,“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我们有



限的人生和精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读书的首要能力就是精选。这种观点和古代著名学者陆世仪的观点如出一辙,他提出:“读书如欲一一记颂,便是玩物丧志。凡读书须识货,方不错用功夫。”

究竟读什么书好呢?我想在这里很难用一句话来回答。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兴趣可能都会有不同的选择,而且我想自己还没有资格敢在这里给大家开列书单。因此,我不怕有鹦鹉学舌之嫌,给大家大力推荐一下 2001 年 11 月 14 日北大未名站的一个帖子。当时同学们请教了北大文、史、哲、政、经、法各院系最著名的三四十位教授,请他们分别开列书单,最后综合各家的意见确定了 30 本必读书目。主要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一些经典著作。当然,这个书目不仅仅是提供给文科的同学,对理科、工科的同学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其书目大体包括以下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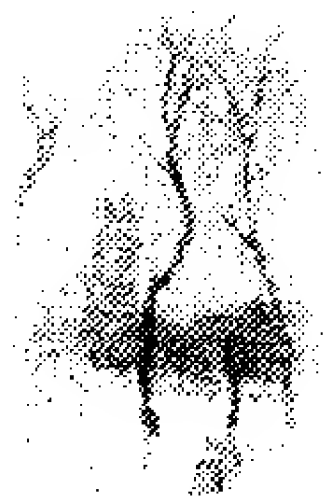
1. 《周易》,参读《周易大传今注》,高亨编注、参读《周易译注》,周振甫译注;
2. 《诗经》,参读《诗经译注》,江阴香译注;
3. 《老子》,参读《老子注译及评介》,陈鼓应著;
4. 《论语》,参读《论语译注》,杨伯峻译注;
5. 《孙子兵法》,参读《孙子译注》,郭化若译注;
6. 《孟子》,参读《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
7. 《庄子》,参读《庄子今注今译》,陈鼓应译注;
8. 《史记》,参读《史记选》,王伯祥选注;
9. 《坛经》,参读《坛经校释》,郭朋校释;
10. 《古文观止》,[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
11. 《唐诗三百首》,蘅塘退士编、陈婉俊补注;
12. 《宋词三百首笺注》,朱古微重编、唐圭璋笺注;
13. 《红楼梦》,曹雪芹、高鹗著;
14.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著;
15. 《鲁迅选集》;



16.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
17.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著；
18. 《毛泽东选集》；
19. 《邓小平文选》；
20. 《理想国》，[古希腊]柏拉图著、吴献书译；
21. 《神曲》，[意]但丁著、王维克译；
22. 《哈姆雷特》，[英]莎士比亚著、曹未风译；
23. 《思想录》，[法]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
24. 《社会契约论》，[法]卢梭著、何兆武译；
25. 《纯粹理性批判》，[德]康德著、何兆武译；
26.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罗兰著、傅雷译；
27. 《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英]丹皮尔著、李珩译；
28. 《共产党宣言》，[德]马克思、恩格斯著；
29. 《资本论》(第一卷)，[德]马克思著；
30.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恩格斯著。

另外还有选读书目 30 本，内容大体如下：

1. 《礼记》；
2. 《左传》；
3. 《荀子》；
4. 《韩非子》；
5. 《论衡》，[东汉]王充；
6. 《三国志》，[晋]陈寿；
7.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8. 《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
9. 《李太白集》，[唐]李白；
10. 《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
11. 《明夷待访录》，[清]黄宗羲；



12.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
13. 《人间词话》,王国维著;
14. 《闻一多年谱长编》,闻黎明著;
15.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著;
16. 《国史大纲》,钱穆著;
17. 《圣经》;
18.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
19. 《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
20. 《复活》,[俄]托尔斯泰;
21. 《物种起源》,[英]达尔文;
22. 《城堡》,[奥]卡夫卡;
23. 《飞鸟集》,[印]泰戈尔;
24.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德]韦伯;
25. 《精神分析引论》,[德]弗洛伊德;
26.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
27. 《历史研究》,[英]汤因比;
28. 《德意志意识形态》,[德]马克思;
29.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德]恩格斯;
30. 《哲学笔记》,[俄]列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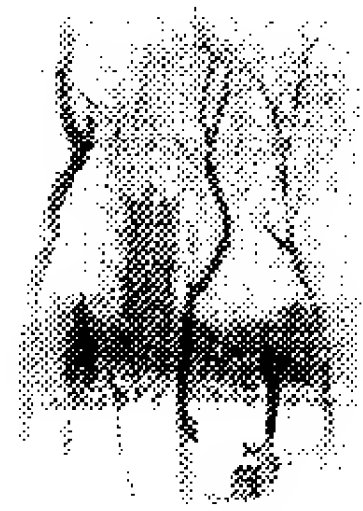
这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很有代表性,希望大家不要带着成见去读书。很多同学说,《唐诗三百首》也算名著啊?也许有人说马克思的书很厚、思辨性太强,而且现在也不流行了。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些想法都是需要静下心来读完书后认真反思的。唐诗、宋词、《红楼梦》,无论学哪个专业的同学都要读一读,这些都是凝结着我们整个民族智慧的载体,深入我们的灵魂。当然,国外类似名著也应该读一读,比如说柏拉图《理想国》、但丁《神曲》等都不仅仅属于哪一个国家,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以前对马恩著作也有过敬而远之的心理,但是你有时间可以翻看一下《马恩选集》,看看马克思年轻时的文章,里面的论证刀光剑影、行文荡气



回肠,很多语言就像诗一样,不但思想上有冲击力,而且文字本身就非常优美。当然,刚入校的同学肯定都想了解自己学习研究领域的经典著作和必读书目。这里我可以给大家透露两个绝招,那就是可以采取“偷学”的捷径。办法一是多和你的前辈师兄、师姐们聊天,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办法二是去自己老师的办公室或家里,认真去看他书架里的藏书,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今天要谈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读书之余。我们强调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但是读书的目的不是读书本身。读书之余第一要身体力行。《中庸》中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说法,在我们求知的体系中,学、问、思、辨都是为了行。《墨子·鲁问篇》中说“君子以身载行”,而在《墨子·修身篇》同样强调“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这些都告诉我们要努力求知,还要亲身实践;要读知识的有字之书,还要去读社会这个无字之书,二者缺一不可。

读书之余,第二是交友。《孔子家语·六本篇》中说:“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与处者焉。”我们在上大学期间,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幸运的。到了社会上以后,环境会变得复杂,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像在学校里面那样可以无话不谈、切磋诗书的朋友相对就比较难得了。所谓的朋友,也有不同类型,明代苏辙在《鸡鸣偶记》中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这是非常生动的概括,相信大家从不同途径也会有类似的体会。我们从读书的角度来说,可以找到共同语言的畏友、密友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大家一起去买书、一起畅谈读书的体会,互相帮助,共同提高。陶渊明在《移居》一诗中早就描述过这种美好的体验,“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至今还记得读研究生的时候,考古系的好朋友、现在上海博



物馆工作的许全胜兄,因为买了一套好书兴奋不已,深更半夜来敲门相告的情景,还记得为了一本好书我厚着脸皮多次相求,而他最终拗不过忍痛割爱的场面。这都是我自己珍视的宝贵人生财富。

读书之余,第三是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直都是古人的理想境界,其中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人的才华和知识不仅来源于书本知识的积累,而且源于丰富的阅历和亲身的体会。大家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是“千古绝唱、无韵离骚”,既是翔实的历史,又是优美的文学。这仅是司马迁本人的天才,是他的“读书破万卷”吗?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现在我们学校每年都鼓励、号召同学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走出象牙塔,去全国各地、不同行业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锻炼自己、丰富自己,为更好地学习提供动力,为将来顺利走入社会、适应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

今晚能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谈谈读书的事,说实在的,我觉得很荣幸。现在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一个历史性的社会转型期,在这段时期里,很多人不太关心读不读书,而有些所谓的读书人也纷纷耐不住寂寞。由此我想起中文系的泰斗王力先生 1942 年发表在《星期评论》上的一段话,过了 60 多年了,至今还是振聋发聩,“这年头儿的书呆子加倍难做。‘时穷节乃见’,咱们等着瞧那一班自命为书呆子的人们,谁能通过这大时代的试金石。”我盼望着各位,来自全国各地、聚首燕园的莘莘学子,能够继承我们北大的优良读书传统,并不断发扬光大。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在这方圣土上兀兀穷年,潜心求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4 年 9 月 19 日)



汉字文化的千古之谜

——竹简的发明及它对汉字文化的重大影响

■侯开嘉

侯开嘉,1946年5月生于四川省宜宾市。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书学学会副会长。自1981年即参加国内外重要书法活动。书法作品收入《中南海珍藏书法集第一卷》、《日中代表书家展作品集》等二百余种国内外书法专集。曾获第五届全国书法展览“全国奖”。所著书学论文多有创见,数次引起学术论战。曾出席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有《侯开嘉书法文集》、《中国书法史新论》、《侯开嘉书法集》、《蜀派书法名家精选·侯开嘉》等专著出版。

竹简的发明是一个千古之谜。

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有很多失落的文明,而考古的发现往往使得这些失落的文明得以重现天下。比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东方雕塑是抽象的,西方雕塑是具象的。结果西安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后,发现兵马俑的人和真人一样很具象,令全世界都大吃一惊,整个东方的艺术史就这样改写了。还有四川和山西的考古遗迹发掘出来后,一下又知道,有个和中原文明不同的巴蜀文明一直存在着,人们于是知道整个中国是作为一个多元文明出现的,而不仅仅是过去公认的一个黄河文明。另



外,在近百年的考古当中,河南小郑村的甲骨文的出土,还有大量的汉简、竹简的出土,又使中国的书法史和文字史改写了。在这些发现中,有部分是人们普遍认为已经消失了的文明通过考古被重新发现。但是除了用考古发掘之外,是不是还可以根据一些线索来寻找一些个别失落的文明呢?我觉得是可以的。今天我讲的竹简的发明就是一个失落的文明。

我指的这个竹简不是我们现在看见的已出土的竹简,这个竹简的年代要久远多了。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近年来不断有文字出土的报道,比如说 1986 年在西安就出土了龙山文化的具有四千多年的甲骨文,河南付阳县出土的新时期的甲骨文符号甚至还有八千多年的,就是说中国的文字在四千多年、八千多年前就有了。我们中国有个传说,据说有个叫仓颉的人,中国的文字就是他创造出来的。这个传说的人并不可信,但造字这个说法是完全可能的。正式说来,仓颉不应该是文字的创造者,应该说他是符号文字的整理者。

有了文字,就必须有书写文字的材料。世界上除了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之外,还有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它们怎么记录文字的呢?古埃及是用纸草,就是把尼罗河里的水草捞出来晒干,在上面记录文字;古巴比伦在泥板上面刻字,由此叫做楔形文字;古印度在树叶上画画、写字;古欧洲的人则在桦树皮和去了毛的羊皮上写字。这就是他们找的材料。那么我们中国有了文字以后用什么材料来书写啊?这就是个问题。

现代很多书里都说中国最早的文字是青铜文和甲骨文,大约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出现。这个事情引起了我的思考。我觉得不大可能。为什么先有甲骨文,先有青铜器?甲骨是占卜用的,甲骨文是宗教文字。青铜器是有了重大事件比如国家要公布法律、记录战争才会铸造一个青铜器然后在上面再刻文字,这些都是庄严的大事,但有了文字后他要写信、写便条怎么办?不可能铸造一个青铜器然后刻在上面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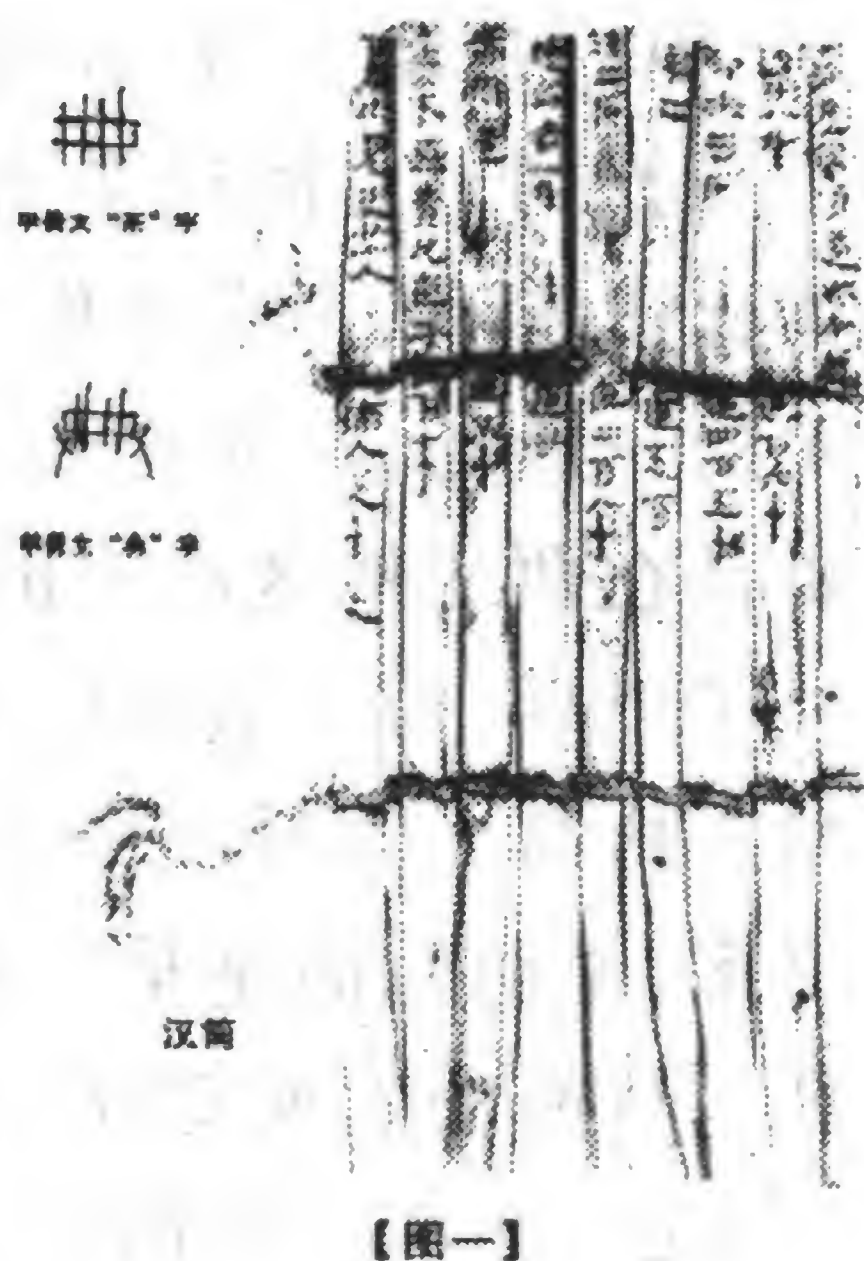
人家送去吧？肯定有一种书写文字的载体。书写在什么上面呢，我觉得是竹简上面。

我的理由：甲骨文上，有两个字——“册”字和“典”。周代《尚书》里提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个“册”和“典”的字形是什么呢？是这样的：（图一）这就是汉简，“册”的形状像用绳子把很多木片编起来，确切地说就是个竹简的象形文。而“典”字就像两只手捧着册祭奠祖先。“册”和“典”就是竹简的象形文，而既然是象形文就说明在甲骨文和金文之前就有了竹简这种形式了，比商周时期还早。所以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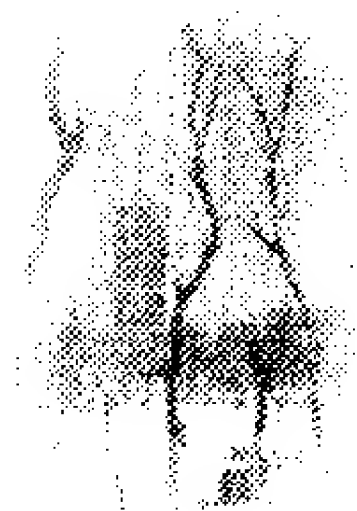
竹简是甲骨文之前书写汉字的主要材料。有个典故叫做韦编三绝，就是说历史上孔子读书很用功，反复翻竹简作的书时，编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三次。目前已知最早的竹简是在战国时期，而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可见竹简的时代比现今考古发现得出的结论要早。

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我进行了一定的推测。我认为，要选出书写文字的材料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这个材料必须是普遍的，容易找的，并且数量很多。（2）制作起来方便、简易而不繁杂。（3）容易书写，容易汇聚，容易交流且容易保存。（4）要有制作材料的工具。作为书写文字的大量载体，必须具备这四个条件。那么我们来看竹简什么时候具备这四个条件：现代历史地理学已证明，在我们的中原地区，古代生长着不少竹子，而竹子是竹简的原材料。另外，据古文字学家罗宾基的《金文新考》，证明公元四千多年前，中原并不是处在我们书上说的新石器时代，而已经是青铜技术很普及的一个时代了。考古当中还出现了青铜器的刀。既然有了竹子又有了工具，就具备制造竹简的条件了。所以竹简发明的时代应该是在四千年左右吧，相当于夏以前的五帝、唐虞时期。这是个推测，因为我觉得那时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我觉得祖先在寻找记录文字的材料上经过了很多尝试。有了文



【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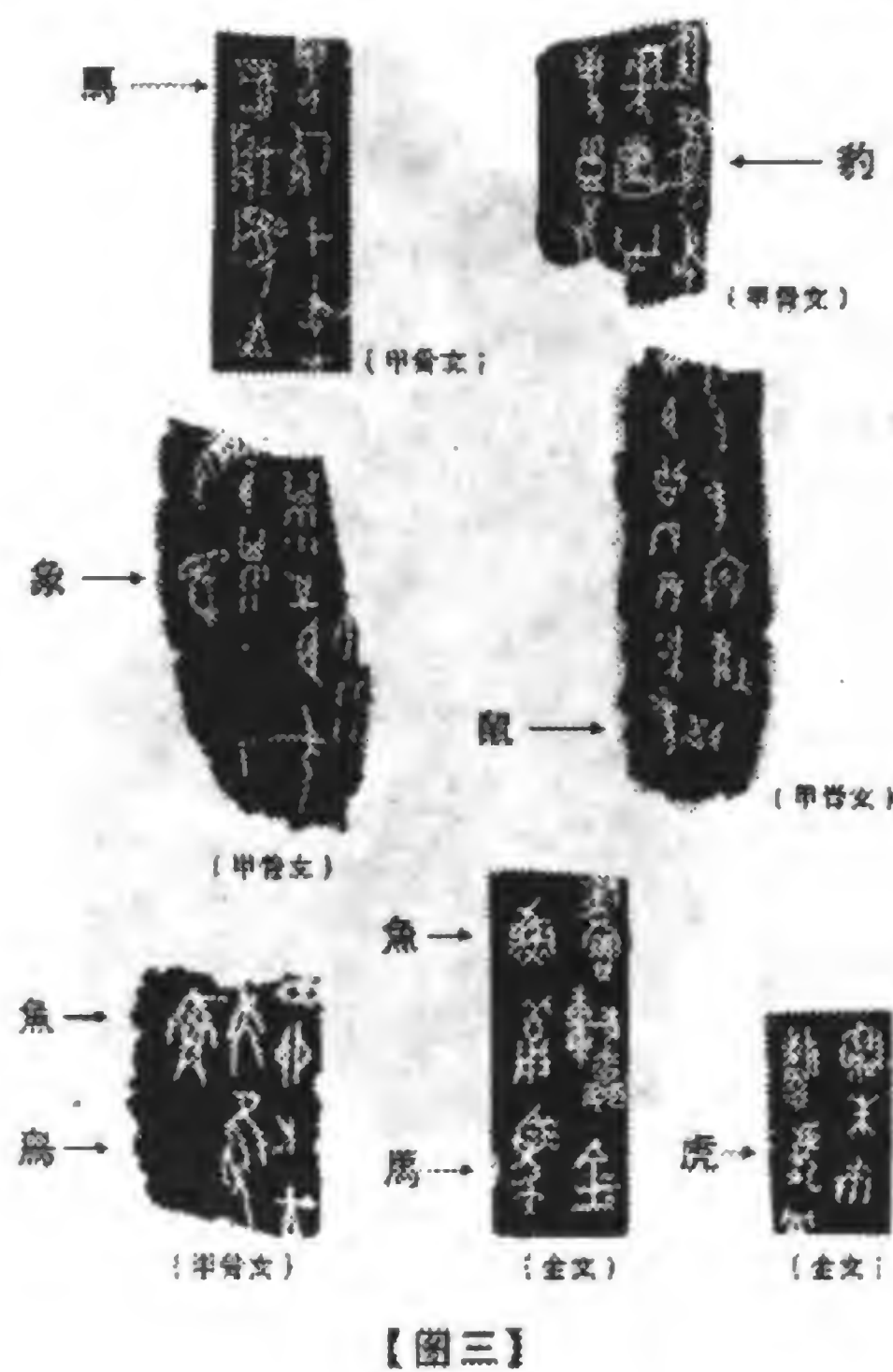
字,他们在地上写,在墙上写,还有树木上写,尝试了很多材料,但是终于寻找到了竹简这个书写文字的工具了。现在来看竹简这个文字的载体比古埃及、古巴比伦及印度的都还先进,是一项伟大的发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竹简之外还有木简及帛布造的简。竹简早于木简,木简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出土的。西北不产竹子而生产木头。中原的文化传过去了以后,为了适应中原文化这种书写在竹简上的方法,就要用帛布来制造帛简。你看那个简字,简字上面是个竹字头。这个文字就是个形声字,说明竹简是早于木简的。

竹简的发明对汉字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因为文字是一种社会化的东西,并不是说创造一个文字就是文字了。文字创造出来后还必须要大家承认,要很多人来赞成它的意义、它的发音,然后才起到它的社会功效。文字发明以后还要起到记录语言、传播并保留思想的作用。五千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汉字没有中断,对传播中华文明有极大的作用。在其他文明古国里面,他们的文字都中断了,比如埃及的文字中断了,文明也中断了。但是我们中国的文字一直没有中断。所以我们知道几千年的文明中的社会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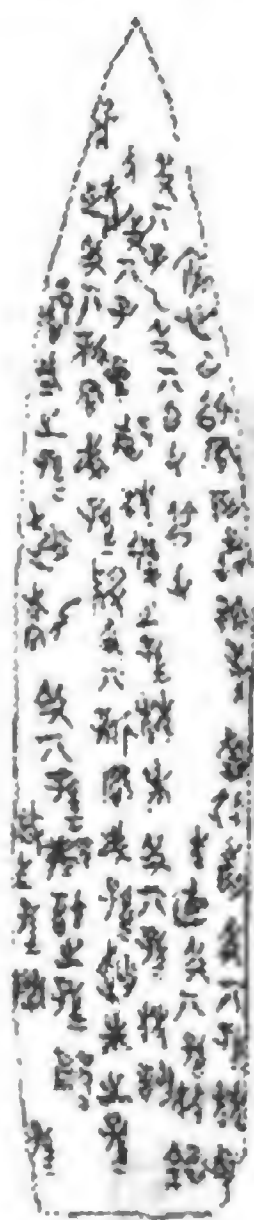
关于文字的改革,特别是对现在汉字的简化字是否今后要走精简化的道路,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过我基本上赞成很多人的看法。主张文字改革,走拉丁化的道路,主要觉得中国的文字太繁难了,写起来尤其困难,所以要把它简化得好认一点,写起来快一点。但是这种好心,实际上起到一个并不好的作用。文字改革不能急于求成,应该顺应它的自然规律的发展。我是赞成文字简化的,但是它必须符合规律。在竹简上书写,它就对中国的汉字的简化起了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

比如,现在我们看,为什么中国人写字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就是从竹简上来的。有人会问:在竹简上为什么不横着写?在竹简上写字,写完后无论是拿起来看还是摆在地上,横着不如竖着方便。而如果是竖着摆,就理所当然要从上面写到下面。至于从左到右,写好了以后

肯定顺手把竹简放在近旁的右手边。写好了一片竹简就又跟着第一片竹简放在它左边,就从右到左地摆放了。形成了中国汉字几千年来自上而下,从右到左的形式。这就和西方人不同了,西方人不是在竹简上写,书写方式就变成横着写。我们汉字文字的形狀也和竹简上写字有关。因为竹简非常重,在上面写字如果字形很宽的话,这本书就很重了(过去说学富五车实际上没有几本书的,没有几本竹简就装满了五车了。很多人小学、初中的水平在那时就可算作学富五车了)。为了轻便,他们就把竹简削得很窄,一片竹简只有0.5公分至1公分,同时字也很小,比如山东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上面写的字就很小。为什么这样小?为什么不写大一点,好看一点,也好学一点呢?因为字写得小,书就轻了。但是这样窄,在上面书写文字就不好写了。就要把很多繁复的笔画简化下来,于是一些带有图形的绘画型的文字变成了抽象的线条的文字了。还有一些象形字,比如说(图三)马、鸟、豹、舟、目、洲(水中的陆地)、鼠、鱼、象、水、车,这些形状构成横形的字,古人创字时是把它们横着写的。但是在书写的时候,在甲骨文和金文上就变成竖



的了。为什么竖起来？就是因为竹简上窄，人们必须要竖起来。在竹简上竖着写习惯后，在龟甲、兽骨和青铜器上写时，他们也把它竖起来了。让我们再仔细地推敲一下这个问题吧，古人完全可以横着写的，但是却把它竖起来写，为什么呢？如果原始的书写材料是甲骨和青铜器的话，有什么必要把字形变成竖的呢？金文当中我也找了几个字（图四）。比如老虎的虎、马也是竖起来的。这就证明了竹简是早于甲骨文和金文的。另外，书写的时候要简化，要去掉一些文字的重复字。比如说，这里去掉的字，这是什么字？这是包围的围（图五），周围这是人的脚，中间的方块是个城，脚把城包围起来，但是后来书写的时候就变成了（图六），两边的就去掉了。只剩下上下的部分。后来再在外面给它加一个“城”（图七）。为什么要去掉两边，不去掉上下？是因为在竹简上书写的缘故。再举一个字。这是郭字。（图八）中间是个城，四周是四个亭，书写的时候，竹简上就变成这样了（图九），左右两边给它去掉了。证明竹简上书写的确对中国的文字起到了很大的简化作用。去掉左右也形成了对称的形式。经过了一些整理，最后中国就形成了方块



(石刻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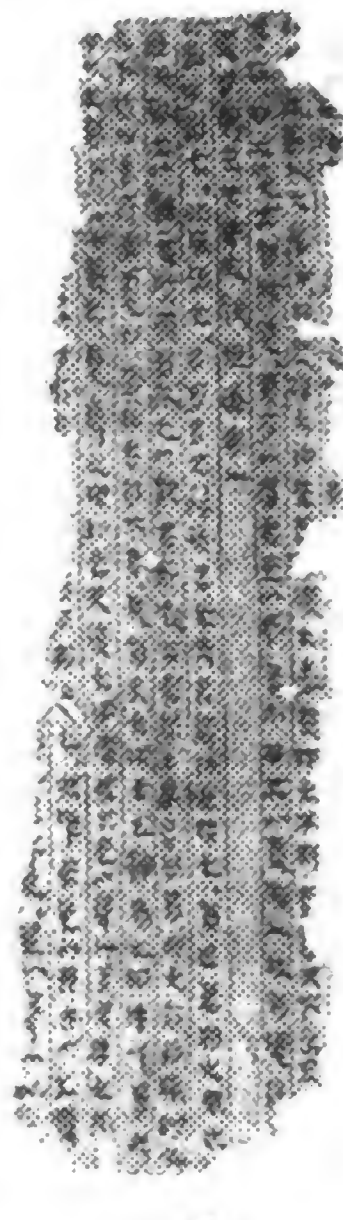


(甲骨文)

【图四】A



(金文)



(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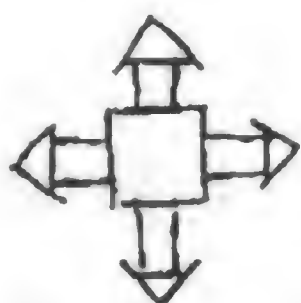
【图四】B



【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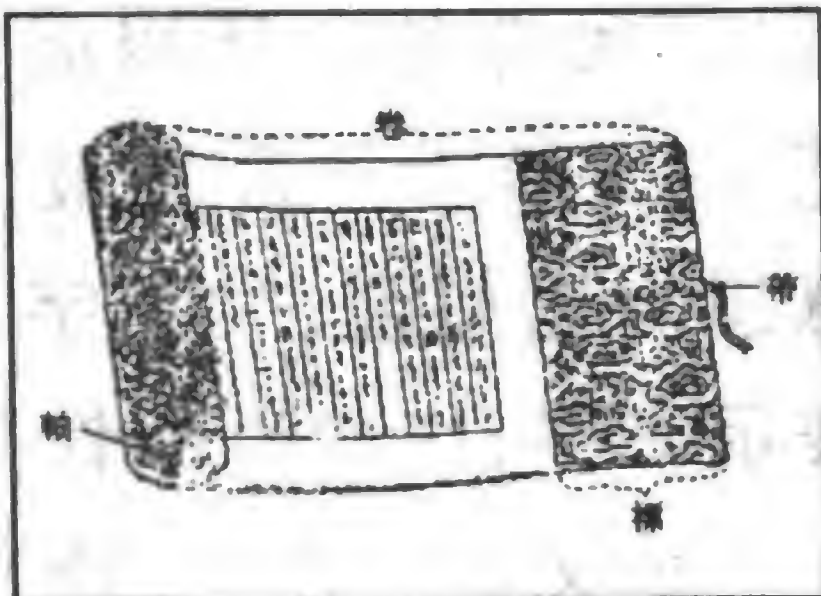
【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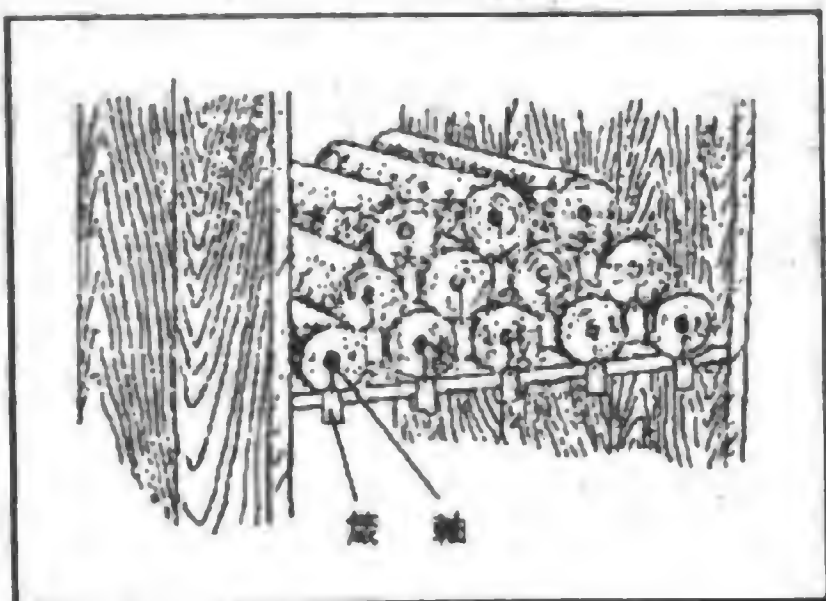
【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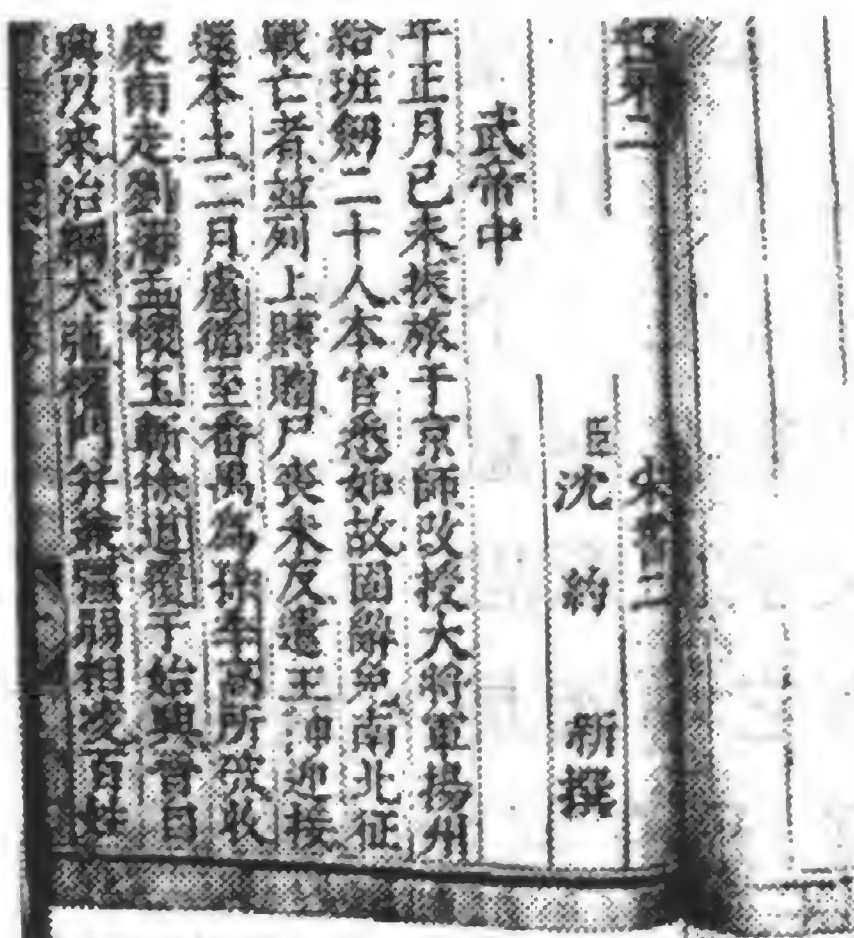
【图八】



卷軸標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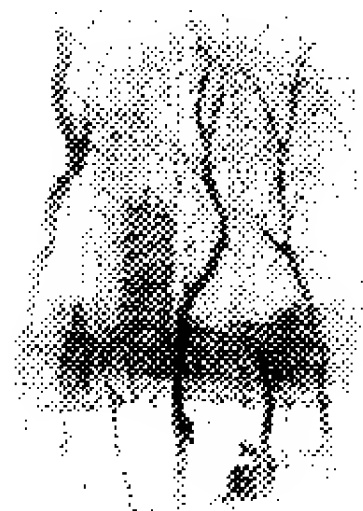
插架



【图九】

字。所以说方块字的形成与竹简上书写文字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我们的祖先当时不是在竹简上写字而是采用了另外的材料,那么不知道我们的汉字现在是什么模样。

另外,竹简的书写还促使了中国文言文的产生。虽然竹简在古代属于一种很先进的书写载体,但是它还存在着很笨重这个缺陷。文献上记载,秦始皇读送来的公文每天要读 120 斤。西汉的东方朔上书给汉武帝用两千斤竹简才写完,要两个壮士抬到宫里给汉武帝看。所以说竹简虽然很先进,但是笨重。要克服这个缺陷,有两方面。一方面如前所述,要把它变得很薄很窄。另外一方面就是,书写的文字必须很简单,很精练,要浓缩起来。不像我们口头,一句话说出来几十个字。为了克服它的笨重,就要把这个文字浓缩起来。这跟现代通讯中拍电报是一样的。电报是按照字数算钱的。拍电报时不可能一句话说很多。为了节省钱,就需要很简短的文字把意思表达出来。在竹简上书写文字,为了使竹简变得很轻,也需要把文字浓缩起来。所以中国的文言文就是在竹简上写字形成的。它和我们的口语相对应,一种是书写上的文字,一种是说话时的文字。现在我们写书,如果用现代白话来写,那



一本书就是几百万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用书面语来写。就跟古人在竹简上写字传达意思一样。文言文最大的特点就是用字很精练。它一个字就有多种意思。比如说,“文”字,翻一翻辞海,它可以表达很多种意思。它可以表示文字,比如说甲骨文、金文、钟鼎文,它就是文字的意思。第二它可以表示文章。作文、诗文,就是文章的意思。还有它可能是文雅,温文尔雅,它还可以与“武”两相对应,比如文人、文官;还有它可以表示钱,比如“一文不值”;它还可以是姓,比如文天祥的文;甚至它还可以表示修饰,比如“文过饰非”;还可以表示花纹或在身上刺画花纹,比如说文身;甚至可以表示古代的礼乐制度如“法令条文”。辞海里对“文”字的注释有十二种。文言文中,一个字用在不同的地方就有多种意思。就是我们在汉字上产生的文言文。传统教科书对文言文的阐释跟我的讲法完全不同。我的讲法是,文言文的产生就是因为书写汉字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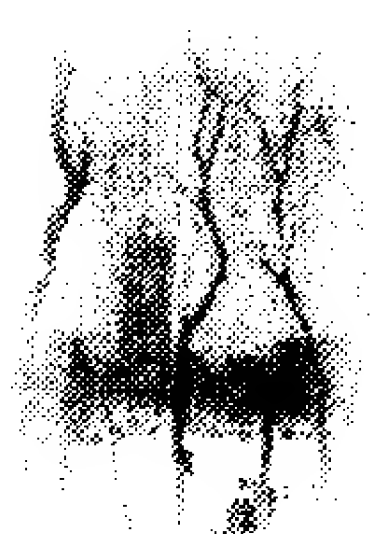
竹简存在时,除了简化汉字和对文言文的产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消亡后,对中国汉文化还存在着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是书法,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书籍和印刷。

竹简对书法的影响很大,我是在搞书法的时候才找到这个体会的。首先,书法仍然沿袭着汉简、竹简这种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的形式,此外,很多笔法在竹简上也已经基本形成。严格说来,竹简存在时候字还是实用易行的,真正让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在竹简消亡、纸张发明以后。竹简上写字写得窄小逼仄,在纸张上就写得大方悦目;竹简上写得比较粗糙,纸张上写的就比较细腻了,笔法的微妙就表现出来了,技法上也深化了,简竹上的生硬笔法就转化为了抒情达性的书法,就成为艺术了。所以书法成为艺术的时间和竹简消亡的时间是一致的。应该说,书法从竹简那儿继承了书写的形式和很多笔法,把它深化下去,当作表现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表现自己的个性的一种艺术后,就成为了我们的国粹。林语堂说要了解中国的艺术就必须了解中国的书法;甚至熊秉真也说书法是中国文化中核心的核心。就是到



现在,竹简已完全消亡后,很多书法家仍在模仿竹简、汉简,从里面汲取新的养料来寻求一些新的突破。

另外,最大的影响就是对文献里的点校。以前在竹简上写字,要反复地删改,删定以后,再抄在帛书上面。因此帛书就继承了竹简的形制。比如马王堆出的帛书,抄书时完全是照着竹简的形式来的。竹简上画好了就卷成一卷,帛书上也卷成一卷,传到后来在纸上抄书也卷成一卷。而且为什么在纸上和帛上要画出一杠一杠的?因为本来在竹片是一片一片的,竹简上并没有空隙,现在在纸上模仿,人们还是把它画成一杠一杠的,实际上就是对竹简的一种模仿形式,这就是空隙的意思。书籍称为卷,称为编,也和它从竹简上来是一样的道理。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近代以后的纸张都很小,因为当时竹简的长度就是这样的,就只有二十几公分的高度(长度),最长的有五十多公分。所以古代一般抄书的纸的长度就是二十多公分,将近现在的一尺,所以后来纸张也差不多这样长了。又比如现在修改文章说“删定”一下,为什么用这个“删”字呢?因为过去的竹简修改要有把刀,写错了用刀来把它刮掉了再写;我们的文章写完了,就是“杀青”,“杀青”是竹简制造的过程当中要把它烤一下,把青皮去掉,这就反映了竹简还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个事情说明了传统的惯性是很强的。另外是竹简对印刷的影响。现在看到的印刷出来的作品大概是在隋唐时期,我的分析是还要早一点。唐代的印刷是很精美的,印刷术到那时可以说是很完备了,所以我觉得印刷术的发明还应该早一点。那时印刷出来的经卷仍然是简竹形的,跟帛书一样被卷成一扎,但是后来逐渐就成了叶(页)。所谓页就是单页的东西,现在的书一页页地叠放在一起,但是其形式仍然是按照汉简的形式最后书写变成的——蝴蝶装,宋版书和光绪时候的书也是这样,现在我们海外版的书也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人民日报还是这样竖成一版,台湾的报纸书籍仍然是竖起的,香港的也是。我曾经把我对竹简的这个看法告诉几个对中国的文字很感兴趣的英国人,他们恍然大悟,说:哦,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你们中国人的书要从背面看起!



由上可知,虽然竹简已消失了两千多年,但对今天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竹简的发明比起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对世界的影响显得小多了,甚至在我们中国,对竹简的发明这个事情都还没有明确的鉴定。但是从今天讲的,我认为我们华夏远古的祖先发明的竹简理所当然同我们后世发明的印刷术一样,应该在中华史诗上占据光辉灿烂的一页。

(2004年9月26日)



管理哲学

■ 陈 沛

陈沛:中国搜索总裁,首席执行官;国内著名搜索引擎技术专家;第三代智能中文搜索引擎的主设计师;中国搜索联盟发起人,个人门户时代的倡导者。主要经历:16岁进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后在总参三部计算中心从事大容量信息处理工作,其间获全军科技成果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三次;研究领域涉及信息处理、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机器翻译等;1994年,开始中文全文检索技术的研究;1995年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引进中文全文检索领域,推出智能中文全文检索系统 I-Search;1997年,发明中文全文检索与大型数据库无缝对接技术;1998年,与 IBM 合作完成国内第一套中文全文检索与大型数据库无缝对接产品 I-Search for DB2,后被新华社采用;1999年,提出“后门户时代”信息技术和服务理念,并开始致力于基于 Internet 的信息获取、筛选、传播等技术的研究。其主持开发的 I 系列产品(I-Search, I-service, I-news, Myinfo 等)已被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北京日报社、联想集团、计算机世界等广泛使用;2002年推出搜索引擎,现已被新浪、搜狐、网易、TOM、中华网、263 及中国搜索联盟等 1400 家网站所采用;2003年8月29日推出第三代中文智能搜索引擎;为新浪、搜狐、网易、TOM 四大门户网站提供搜索引擎技术,成为



全球第一大中文搜索引擎;被称为中国搜索引擎第一人。业余五段,曾获得北京市业余围棋冠军。

我前不久刚在清华做过一次演讲,我一直希望我自己跟同学的交流能对大家有所帮助。今天很多同学热情到达现场,我希望能够把真正对大家有帮助的知识,包括我个人成长经历中,我认为对大家非常有用的知识贡献给大家,让大家在人生道路上能够分享一些别人的成果,能够少走一些弯路,能够更快达到我们理想的境界。

今天听讲座的人群也许不是都适合听的,因为我会讲一些人文和哲学方面的内容,因此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有两种能力。第一是很强的学习能力。我说的学习能力不是指学习书本知识的能力,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学习书本的能力都很强。我认为,学习能力也是发展变化的,一般来说小时候学习好的人以后学习能力会下降。为什么呢?因为一直学习比较好,总是回答正确的问题,那你就知道你很聪明,别人也认为你很聪明,同时由于你大部分事做的都是非常正确的,所以你就太容易听取别人的意见,不太容易发现别人说得正确的东西。我说的学习能力不是说别人讲一个东西你就全盘接受,而是在别人的内容中找到真理的部分、适合自己的部分,哪怕一个人讲的十句话错了九句。所以,我说的学习能力是有能力发现那一句真理的人。其次,逻辑思维能力不要特别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逻辑思维恐怕都很强,但是我们可能不需要,因为我讲了一些科学以外的东西,可能更多是在哲学人生方面,它需要的是一种感悟,不一定用逻辑推理来产生,而我没准也会讲错很多东西,大家会说你这个逻辑不太清,但是我讲的不是逻辑。

我今天讲的内容我相信可能有一半是错误的,有些内容可能不适合某些人,可关键是我不知道哪一半是错误的。不是说上半截是错误的,下半截是正确的。我相信对某一个同学来说,可能某一半是正确的,另外一半可能是不适合他的,那对另外一个同学就完全不同。所以



我希望每一个同学能够在今天我的讲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首先,我想在这之前先做一个品牌调查。请在此之前听说过我陈沛的举个手。这么少啊?(笑)不过看到这个情况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说明我的品牌还不够,很多人不知道我;但另一方面,我也很高兴,因为今天现场的效果非常好。起码以前不知道我的人可能会认识我。

我把人的能力分成几种。有些人可能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有些人可能是学营销的或者学管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我自己做企业,做到一定程度,我在看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什么能力是越来越重要的能力呢?那我总结一下,大概有三种能力:第一种能力,我称为学习能力。因为大家可能学过很多专业知识,学习都很好。但我刚才讲了,这并不是学习书本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另外一种能力。因为当你们走上工作岗位,实践你们自己的理想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课堂上学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包括我们IT业竞争为什么这么激烈,我有时候就开玩笑,因为我看到有各种人进入这个行业,有的人是学英语的,有的人是学农业的,也到这里做IT,那能不竞争激烈吗?所以你们以前学过什么专业知识,有时可能到最后不会变得特别重要,那么学习能力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因为总有许多知识是你们在课堂中学不到的,那需要在人生理论中自己去感悟和学习。这就要有一个很好的学习能力,所以我要提醒大家,特别是从北大、清华来的学生要特别注意。

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心态,其实你们的学识不取决于你自己的看法,你们有多大学问并不取决于你自己,你们的学问是别人对于你们学识的一种评价,所以自己的态度并不重要。所以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有一个学习的心态,认识到自己在很多方面知识是不够的。如果你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心态,你们就能很好地学习了。当你们不具有很好的心态时,你们的学习能力就会减弱,所以尽管在座的各位今天表现都非常出色,但不能保证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一直保持优秀,那就需要你们在长期的工作过程中在有效的学习成长过



程中特别重视知识。

我曾经跟清华的 MBA 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们学了很多的专业管理知识,学了十八般武艺,现在要毕业了,准备大显身手,但这时候常常也是企业最危险的时候,也许你们中的很多人将成为企业的杀手。事实就是这样,MBA 的知识是不是能有效地应用于企业,那是一种能力,一种对知识驾驭的能力。那我怎么看待知识呢?不是说你们学过的知识就叫知识、看过的书就叫知识。我认为,知识是你真正消化、吸收并且能够驾驭的知识,那才是真正的知识。有些知识你似乎也懂了,但你不能驾驭它,那也不是你的知识、真正属于你的知识。对管理也更明显,有些人学了很多管理知识,但他不能够驾驭这个方法,那企业就变得非常危险。所以,理论联系实际可能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所有基本知识都要和实践相结合。也有一个说法叫“纸上得来终觉浅,实践出真知”,你们今天可能是进入了各种专业的书本上的学习,那么以后呢,将在社会上更多体验从经验上掌握的知识。你们看到很多顶级的运动员,有人说打球的时候手感很好,也叫球感很好,那球感是怎么来的呢?它不是通过书本知识培养出来的,是经验和长期积累出来的那种感觉,有时候很难用书本知识去描绘。所以对你们来说,可能更多面对的是经验性的指示,对你们又是新的挑战,特别是 IT 这个行业。IT 这个行业实际上是工程性很强的,它需要很强的动手能力或者实践能力,把你心中的理论知识变成一个实践的应用。所以如何把你们的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活学活用,有一个很好的心态。这是我最想说的。

第二种能力,是合作能力、与人合作的能力。为什么这个能力很重要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出色,所以,希望别人都听我们的,如果从正常情况来看,这似乎也是应该的,出色的人就应该成为领导者。但关键是如果你真正成为一个出色的人,如果你越来越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你会见到越来越多同样出色的人,除非你一直在很小的环境中,其他人都比你差。所以你们在成长过程中,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时,要有合作能力,因为你们会看到越来越多出色的人跟你们共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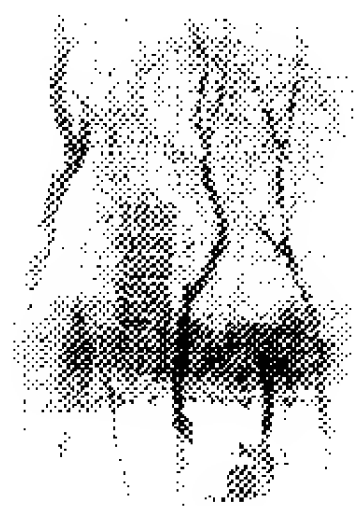


跟你们竞争。所以合作能力成为第二种重要的能力。那怎么能够做到更好的合作呢？

我自己的总结是第一学会尊重别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经常也会学一些如何沟通、如何合作的小技巧，但我觉得那不是最本质的。很简单，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你看不起他，你无论怎么掩盖、怎么客气、怎么有礼貌，都不能达到很好的沟通、合作。真的要想做到非常好的合作，要从心底里尊重对方。但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尊重，特别对于我们年轻时很出色的人，尊重别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大部分时候我们被别人尊重。

那如何做到从内心尊重别人呢？我的经验是要学会发现别人的优点。其实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我上面谈到的哲学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和在座的各位，都有时候不敢把自己最阴暗的一面给别人看，因为都有做得不好的地方。那我们常常受人尊重，只是因为我们某些做得比较好的一面而已。其实我们也有不足的地方。我以前是数学系的，我们数学系曾经在运动会上得了零分，在运动才能上就比较差，其实我的运动才能还可以。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出色的一面和不足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你就自然会从心底尊重别人，这是一个合作的前提。

第二是要尊重真理。我们工作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在我们公司经常有争论和讨论，特别是技术人员在一起，大家知道文人相轻，技术人员也互相看不起，都觉得自己挺厉害的。那我们鼓励非常民主地去讨论和争论问题，但不要把它变成是争吵，弄得非常的不愉快，最后没有发现真理，关系搞得很烂。有时候我经常需要去控制这个场面，这是真的，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很出色。那么我们给争论定了一些原则，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讨论，为什么要争论。其实不是所有人都懂得这些事情，包括我年轻的时候，跟同学争论得非常多，大家争得面红耳赤，然后不欢而散。我相信很多人有同样的经历。那过后你去想，去回忆，其实挺有意思的，人总要有这样一个成长的过程。



那我们怎么总结呢？要告诉你争论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争论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真理，而不是捍卫自己的观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也许不相同，但为什么要讨论呢，是为了在不同的观点中找到共同的真理，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真正有收获的实际上是改变观点的人。一个人如果从争论开始到最后，什么都没有改变，是整个争论中收获最少的人。所以我们说争论的目的是发现真理，而不是捍卫自己的观点。我们说捍卫自己的观点并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我就是不同意你们的，我从头到尾就是反对你们的，我一直坚持我刚才说的话，哪怕其实我自己都不太相信了。”这个并不能提高你的威信，因为你的威望是别人对你的评价，不在于你自己。你可以固执地坚持，但你的威信会逐渐下降的。只有一个人捍卫的是真理的时候，才能真正赢得威信。

我在公司里要经常讲这些，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特别是争论一激烈的时候，面子上就放不下来了。其实面子是次要的，人的脸面面对真理时真的是次要的，而且特别是越出色的人，越承认自己的错误、尊重对方的观点时，其实越赢得威信。这就是关于合作的能力，合作将成为你们未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第一种是学习能力，就是你在工作学习中发现许多内容都没学习过，你需要通过很好的学习能力把它补充起来。当然，你真要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人，你会发现你做的肯定也是很伟大的事情，那时候你一生都在学习也无法把这些全都弥补过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通过合作把另一些自己没能掌握的知识变成我们自己的或者变成我们事业需要的知识，所以你必须跟别人合作！一个从来不与别人合作的人就一定是能力非常低的，因为他一生的学习能力是很少的。所以第二种能力我们称为是与人合作的能力，它可能跟智商没有太大关系，可能跟情商关系更大一些，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它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第三种能力，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种能力，我称为赢得信任的能力。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能力，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来北大学习，包括我们后来为什么要学习其他的知识，为什么要和他人合作，其实归根结底



是一个赢得别人信任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轻易可以获取的。我们去读我们的专业知识是为了赢得别人对我们专业知识的一种信任;我们去同别人合作是为了让别人信任和支持我们;其实我们做企业、把产品卖给客户的时候是为了赢得客户对产品的信任;如果你在企业中能够持续高升,受到领导的赏识提拔你,是领导对你的信任;如果你的团队跟你非常好,都支持你的所有工作而不是跟你闹情绪要工资,那是你赢得了下属的信任。美国总统大选就是直接投信任票,那就是相信谁能够把美国领导得更好。所以,所有的能力归结为本质的能力,就是赢得信任的能力,包括企业也要赢得客户的信任。

这种能力可能是最难获得的能力,你所有的能力最后都归结为一种能力,它甚至超过了各种学习本身,它甚至和人的品格相关。所以在我公司我经常跟他们说,我们不说假话,要说真话,这话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一定说过假话,我自己也是,只是有人假话说得多一点,有人假话说得少一点,有人习惯于说假话,有人坚守不说假话的原则,但是又偶尔被迫说一下。为什么我在公司非常强调这一点,员工培训也好,很多中层管理开会也好,我经常跟他们提这个,特别是跟市场部门。那有人说我们做市场怎么可能不说假话呢,因为所有的产品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那我说真话岂不是把我产品的缺点都说出来了,那谁还能买我的产品呢?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说假话不表示我们所有真话都要说。据说我小时候有句话说得挺好的,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你有一句话我记了好长时间。”我说是什么话?他说我说的话是:“真话可以说,但说出来一定是真话!”这是我一个说话的原则。我们没有愚蠢到要求你把公司的所有缺点都告诉人家,然后产品、公司也死掉了,你再也没有机会给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说假话代价是非常大的。你说了一句假话,那跟这句假话相关联的可能还有许多话,你要时时刻刻地控制好不要漏出来,然后把其他的假话也掩盖住,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的很多精力放在不要说错话上面,其实你的精力应该放在



更有创造性的地方,而不是控制如何讲话上面;第二,一旦假话被发现,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哎,你上次不是这样说的吗?!”他发现你在骗他,然后你个人和品牌的信誉开始打折扣,你个人也影响到企业,更危险的是其实你也就是偶尔说了一句假话,另外九句真话他也不太相信你了。所以成本非常非常的大。

同样,这一点不光是我们做人的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国家存在的问题,中国的企业诚信程度实际上是非常低的。我们做过太多的没有信誉的事情!发达国家的许多企业,我觉得诚信程度确实超过我们。2002年圣诞节前一周,美国电子商务的成交额是22亿美金,那中国的这个数字就差得很远。为什么?不是说互联网技术不能支持这个电子商务,而是中国企业的诚信不足以支撑我们的电子商务。有的中国企业做外贸觉得做得挺容易的,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企业,他说和老外挺好做的,我让他把钱打过来他就打过来了,确实是这样的。对!说你先把钱打到账户上来,他就打过来了。但是他对一个中国的企业就不同了,说你把钱打过来,那个人说我把钱打过来,你不把货发过来怎么办,他说还是你先发货吧,那个人说我发了货,他不给我钱怎么办,我哪有精力跟他打官司啊,最后两个人商量找个地方咱们去见面,然后还可能带着两个保镖。所以说互联网是什么?互联网本身带来一个很大的效应就是降低交易成本。那你看到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有多高,所以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乃至整个民族正在为我们的诚信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但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正在建立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信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是第一条,一个企业也罢,一个个人也罢,诚信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你人格的一部分,而且它是直接影响你获取信誉的能力——是最重要的一种能力。

一个人一旦学会说假话,他的能力会下降。其实,你为什么要说假话,无非是想要对方相信你,从短期来看,是赢得对方信任的一个捷径。人家问:“你有没有钱?”你没有钱,你说:“我有一千万!”说了假话之后,“哦,你有钱。”直接赢得对方的信任,是很简单,但问题是一个人习惯于



说假话之后,他有两种能力就丧失了。一个,他不需要再去选择其他的一个复杂的方式了,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直接相信我了,“哎,他知道我有钱”,所以他不寻求其他方式了。实际上,这本质上是一个说服对方的过程,让对方相信我有钱,或者我可能有钱。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的体会是你说真话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你有效地组织论据,就有可能论证你的论点,让对方接受你,这是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实际上是一种说服能力。所以在我看来,你坚守不说假话,时间长了,经过严格的训练,那对方无论说一个什么话,你迅速开始搜集对你有利的证据,然后非常有条理的向对方表述,最后完成了这个说服,虽然当时你也许没有钱,但是你都能让对方相信你,你以后会有很多钱,哪怕现在没有钱也没有关系。这是一种说服的能力。所以说假话会严重地降低这种能力,时间长了,说真话的人能力是很强的,它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包括我刚才讲的搜集论据,包括组织和表达等各方面。说假话完全不行,时间长了你就丧失了这种能力。所以,我想要说真话,是为了赢得信任,某种意义上,是做事的要求,是做人的要求。我在我们公司里,经常强调这个,至于做成什么样,要看每个人的领悟了。

以上就是讲的最重要的三种能力。那么关于学习,我还想强调一下,也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同北大有一定缘分的,我1987年在北大学了人工智能,这对我人生影响非常重大。因为后来我提出中国未来的搜索引擎发展方向是智能化发展方向,就是将人工智能融入到搜索引擎技术中去。因为我有五年做人工智能的经历,有十年做搜索技术的经历,我把它们很好地糅合在一起,我相信未来的搜索引擎技术确实是这样的。

此外,我读过北大的EMBA,光华管理学院的EMBA。有一次,一个企业家同学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他说“你们学MBA没有什么用处,你们以为学完MBA就可以和国际巨头竞争了吗?不可能!只能输得更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MBA这些现代管理知识都是从西方流传过来的,是他们总结出来的科学的管理知识。如果把他比喻



成一个武功的话,人家都练了好几十年了,然后你才去学,所有招式人家都会,功力比你深得多,你上去人家一拳就把你打趴下了。”那天我们讨论的时候,有一个学员同学就说:“我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我们怎么跟他们争呢?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我们学的都是半生不熟的三脚猫功夫。”

但我不那么认为,我讲了一个观点,就是关于学习的问题。我相信MBA的很多课程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对管理知识的一个科学总结,是一种科学的管理办法。但是我不认为没有MBA,中国人就没有管理知识了。其实中国的管理知识很早就有了中国特色。中国古代的皇帝实际上就是真正好的管理者,他们要治理一个国家,包括盛唐、乾隆盛世等等,他们治理这么庞大的国土时,其实还没有学过任何的MBA的知识!所以我说,我们如果学习了西方的知识,就变得更有信心了。因为西方文化的成就是把这些管理知识科学化了,很多人通过学习迅速领会到这些管理知识,并确实掌握了。但是东方知识有东方的特色,东方比较含蓄,比较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先人没有总结出科学的方法,东方的管理知识的传递就比较困难。其实东方有很多管理的大师,比如说鬼谷子,他有四个学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叫孙臆,一个叫庞涓,后来成为两个大军事家。后来的两个学生是苏秦和张仪,一个做了六国宰相,一个统一了中原。他教的学生怎么这么伟大?他一定有很好的管理方法和思想,可惜我没有时间查他写过什么东西。

我们在讲西方的管理制度或者机制,说开公司前要先要搞好利益关系,不然的话这些人肯定不会好好地干。其实中国的很多公司发的工资比较低,按西方的管理者来看,这些人都该闹事了,但是在中国的企业中这些员工却特别忠诚。为什么?其实其他时间公司也做得不好,但是有一天这个员工感冒了,这个老总下着大雨到他那里帮他盖盖被子,问寒问暖,就这样,这个员工非常地感动。我只是举个例子,说明东方有东方式的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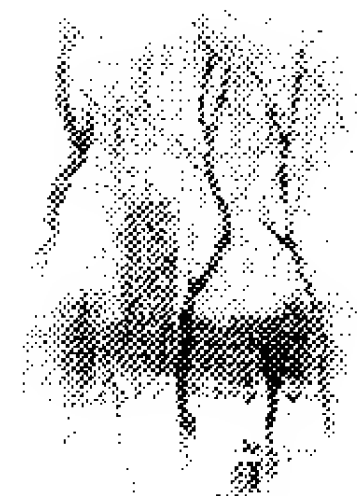
现在其实在很多西方的院校里,也在学习东方式的管理,比如像



《孙子兵法》。据说在国外《孙子兵法》被有些学校当作管理的课程在学习。我们看孙子兵法里有几句话,叫“兵无常志,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老外很难看懂这些,但是我觉得非常理解,这么几个字概括了很多很难描述的东西,几本书不一定能讲清楚这个事情。我觉得东方有东方形式的管理,西方有西方形式的管理,比较而言,西方的知识更容易学一些,东方的知识真的不容易传播和传递,所以我们学习西方知识总是很快地理解和掌握,因为我们已经提前学习了数学、物理,这些科学知识很快就可以搞清楚。什么考勤机制,画几张表,中国人比外国人画的还好。我认为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管理知识更容易学习,西方的那些管理学者会说:学习完西方的,我们来学点东方的吧,然后就发现东方的管理知识没有三五十年的熏陶根本没办法理解,搞不清楚他在讲什么。所以到我们学完西方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既懂得东方的管理,西方的管理知识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的那些方式,他们完全摸不着头脑,那就是说我们更有机会战胜这些国际竞争者。这是我对学习的一些总结。

接下来呢,我想说一些人生的感悟,可能有些高深,是哲学方面的问题。我自己很喜欢哲学,我父亲是个哲学家,所以我从小时就觉得自己可能懂点哲学。我认为哲学是什么呢?我说哲学就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一种能力,也叫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它是一种指导其他任何一种学科的科学。有很多伟大的哲学家,他们没有读过几本哲学书,却成为了哲学家,比如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也有很多人读了很多哲学书,甚至他们能记住每个哲学家的出生日期,但却一点哲学脑筋都没有。我想这里面的能力不需要学习就能够感悟,你在不同时间的感悟和对哲学的领悟,我想把这种体会能够比较好地告诉大家。我自己也觉得可能偏少了一点,但我相信北大学子的悟性也是很高的,很快就能把我那些稍微有用的东西变成自己的。

首先,我想证明自己有哲学的思维,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



是一种由表及里的能力。就是说能看到事物本质的一面,这就是一种哲学。那我想举个例子叫“白痴的智慧”,有一次我回家,跟弟弟说:“你知道世界上什么人最幸福吗?”他说:“不知道。”我说:“白痴最幸福,见到什么都乐呵呵的,看到什么就傻笑。”傻笑就是傻子的笑。就是在别人不该笑的时候笑了,就是正常人不该笑的地方笑了,就叫傻笑。包括我们正常人互相攻击的时候,会说你傻笑什么?!没什么可笑的。这傻子就是笑了,笑是什么?就是快乐的感觉,真的是快乐!有些事情你认为没有什么好笑的,他认为是快乐的。这只是表明一个正常人把快乐的门槛提得很高,而一个傻子比正常人获取快乐的能力更高。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你说他知不知道痛苦呢?我说他当然知道,你打他一巴掌试试看,哇,就哭了,痛苦的表现,那么和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同,就是几分钟以后他就忘了,他该笑的时候他又笑了,我想问,在座的各位被打了一巴掌三天你能缓过劲来吗?你们会沉浸在痛苦和愤怒之中,那我想有一个人,他获取快乐的能力和忘却痛苦的能力都超过了你,他不比你幸福吗?你还觉得他是白痴?可能他觉得我们是白痴。我自己觉得是有一些道理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失去了一些对生活本质的认识,不知道为什么去活着,为什么不快乐地活着。这就是我讲的白痴的智慧。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去领会。但我觉得,最起码我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東西,因为没有人告诉我白痴,我觉得他挺幸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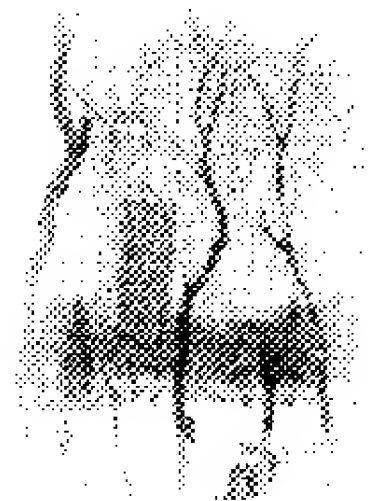
其次,所有的事情都有表面,也都有两面。也就是常说的辩证法。我小时候就在想,所有事情都有两方面吗?绝对好的,绝对坏的吗?后来我尝试做了一个算是实验吧,来看看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反的。我当时在写了一本叫《成语新解》的书,就是把原来固定的成语,用另一种方式解释它的内容,我做了两个,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可能兴趣不在这里就没有写下去了,但我自己觉得写的挺好的,都很大了我还记得这件事情,第一个叫螳臂当车,螳螂是什么?它是不自量力,它早晚要被车子碾得粉碎,对吧,它是一个贬义词,我当时怎么写的呢?我说,当不幸降临的时候,挺起胸膛,张开臂膀,竭尽全力与命运抗争。(掌声)



当然,它也可能还是被车轮碾得粉碎,但是我相信我在这里看到了更积极的一面,我看到了一种新的精神和品质;另一个呢,我更喜欢,叫飞蛾扑火。这个叫自取灭亡,其实蛾的生命非常短暂,它是蛹变来的,它产完子以后几天就会死去了,那我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我说:“蛾,破茧而出,繁衍了生命就毅然地投向了光明。”我不知道这两个成语能否表达我能够从一面看到另一面,我想这可能是一种哲学能力。我想先自我宣传一下,效果更好,大家会有新的领悟,包括对一种能力有一个更高的追求,我们不再是仅有简单的学习课本知识的能力,而是有一个能看到事物本质的能力,由事物的一面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能够更全面、更客观地看待事物的一种能力。我觉得这个能力对人的一生来说,太重要了。

在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同样一个问题,两个都很聪明的人观点截然相反,甚至你都会怀疑他们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同样一件事情怎么会差别这么大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因为他们角度不同,站在不同立场,所以得出截然相反的观点,跟智商没有关系,只不过跟他们坐的位置有关系。比如说伊拉克战争,全世界所有看法,同等智商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就是角度不同,你要了解这件事情就要了解不同的看法。我看到很多部门经理吵架、争论,每一个都义愤填膺、振振有词,绝对捍卫真理,为什么呢?两个真理为什么有如此的悖逆呢?你要知道他站在两个部门的角度上,如果你能把两件事情都看清楚,你就能找到更客观的想法,所以才能更好地处理这种综合性问题、解决综合性矛盾。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有这种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不会因为表面的问题,你就轻信了它,因为很可能你有另外一面没有看到。当你看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常常能对这个事情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所以有时候你的视角会取代你的脑袋,当一个人用屁股想问题时,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我把管理看成什么?管理是一种工具,但我更喜欢把管理看成是一种武器。它是武器的话,就因人而异。我觉得一个好的管理者会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因为他自身的素质和条件决定和形成了他自己的



管理风格,这个风格其实是不可模仿的,因为是他的特质形成了他的管理风格,你学人家只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就像李逵使大斧使的很好,你也去学,但其实你本来使剑或使枪更好些,你不能因为别人斧头舞得好你就也去学斧头,选错了武器。武器呢,适不适合你是最重要的,而不是武器本身。所以要把管理本身看淡了,要在更高层面上驾驭管理。比如说,我们对“要不要搞末位淘汰制”进行讨论。这种管理手段很好,但管理并不是一个定式,如果管理是一个定式的话,那真的会太简单了,所有人都可以做企业家了。有一个标准的成功的版本,大家都照着做就行了。我认为“末位淘汰制”在我们公司就比较难实现,因为我在公司是比较平和的,不是那种动不动就对员工发脾气的,所以我们公司没有员工怕我。那我这种风格可能就不一定能采取这种特别严格或者残酷的管理,这跟我的这种价值观不相符。但那不表示我管不好这些人,我们公司管理非常松,我的原则是要激发每个人的潜能,让他们自觉地去工作,认同这份事业,那是最重要的,哪能去管人家呢!你管他,他还有创造力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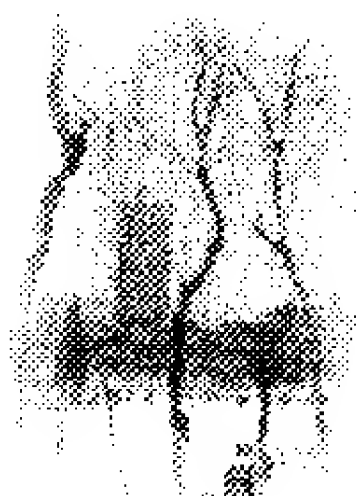
下面会讲到一些管理,好多东西是我以前读的书上完全没有的,而且可能还真是挺重要的。第一,制度健全、有错必纠。我们从 MBA 学了建立各种制度来管理各种事情,但我觉得大部分竟然是错的,这是我的心得。我是怎么总结出来的?我从小企业做大,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刚开始只有五个人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做得这么辛苦啊,要管这么多事情,要是五十个人该多好,那时候我肯定特轻松,那时候我能做好多事情。后来到两百人的时候还是捉襟见肘,到处都有漏洞,还是缓不过来。这个事情并没有被改善,好多你特别想做好的事情你发现还是做不好。那我得出的经验就是在任何时候、无论大小,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这是第一条。WINDOWS 3.0 的 BUG 有多少,大家想想,加在一起是五六百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当然有点小 BUG 就算了,用也不影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微软是个最大的软件公司了,但是它的每一个产品其实都有好多 BUG。为什么呢?不是



它不想做好这件事,而是在一定时间内任何人都没法做好。人的资源是有限的。一天只有 24 个小时,其实我们不是说哪件事情该做不该做,我们说一个正确的决策者,他不是说决策到底哪件事情该做不该做,而是先做哪个后做哪个,因为你的前提不是你能做所有的事情,而是你只能做这么多事情,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企业也是有限的,是说我对企业的管理方式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我认为这是一种真正正确的管理方式。什么制度欠缺、所有错误都纠错,理论上你不可能纠出所有错误,你做一个你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你把精力放在错误的地方了。

我以前总觉得怕我好多事情管不了,后来发现管不了其实是对的,所以我可以把精力放在公司的战略思考上、重要的产品发布上、重要的技术研发上,我只能管这几件最大的事情,其他事情确实管不过来,做得也很差。差就差吧,如果说一个 CEO 看到前台花放得不好的时候,其实他是有能力纠正它的,但是如果他去纠正这件事情,肯定就是错的。因为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机会做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你做的事情越小,错误越大,因为你的资源是有限的,你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上,所以你必须学会不管很多事情,但这样做实际上挺难的,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发现,他会管很多事情。我要学会什么呢,一个是学会抓大放小,知道最重要的是哪几件事,这几件事情做好了,公司可能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其他好多小事都做完了,公司该怎么辉煌!要学会抓大放小。

第二个,要难得糊涂。不是说聪明人什么都要搞清楚,该糊涂就要糊涂。因为你的精力、你的才能是有限的,你只能把你的才能放在最重要的几件事情上,那个地方你清楚就可以了,然后有时候要做到视而不见,明明看到他做的不行时,不去理它,让它留着,因为还会有更多的不行的地方需要做。最后要复杂问题简单化,才能处理公司许多更重大的事情。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上我讲有两句话我体会比较深,一个叫“拿得起放得下”,做人要拿得起放得下。怎么叫拿得起呢?就是只要做一件事情能做好它,就叫拿得起,我们一生的努力都在



做“拿得起”的工作,我们承担越来越重的工作,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拿得起放得下的,有很多人真的是放不下。我看到都替他们着急,他们在做一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时,一看到这个地方不行就赶紧过去。所以对职务越高的人,对管理才能的这种要求越高。像邓小平,南巡时讲“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这就行了,其他的事情可以忽略。人家说,你看清楚了吗,我们这样走行吗?邓小平说那要摸着石头过河吧,我也没有精力都把那些研究透。对,这是对的,我在后面还会涉及。

我以前是学数学的,我的围棋下的很好,是业余五段,曾经拿过北京市冠军。我是从小下围棋,因为从小下棋,培养了一种逻辑思维能力。我认为我的逻辑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做了企业之后,我忽然发现这个逻辑根本不管用。因为我以前学的东西都是 $A + B + C + D$ 得出 E , $E + B$ 然后再推出个 F 。后来做了企业发现了什么呢?绝大部分事情前提都不具备的,本来是 A 有, B 根本就没有, C 要求证, D 代价太大,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前提不具备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那我自己在这一过程中总结了快速决策的两个原则,我认为我一生中最大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其实有时候没什么对错;有时候,有对有错;有时候,不知道对错;有时候求证的成本太高,这四种情况使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求证、去推理,付出代价很大,也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所以很多正确的决策,甚至伟大的决策都是非常快速完成的。不是说这个决策越重要,花的时间就越长,在我这里完全不是的,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常常越重大的事情决策越快,越往下去求证,越有求证的可能的时候,就有人去求证了,那速度才放慢。重大的事情常常无法求证,那么大一件事情要多少条件才能求证,成本太高,所以大部分不是这样做的。

我这两个快速决策原则可以说是从下围棋上感悟出来的,从下围棋中学出来的。我下围棋,赢过很多次棋,也输过很多次棋,这里头哲学的东西就体现出来了,有人说陈总你这个围棋下的好,跟你这个做管理有没有什么关系,能不能讲讲围棋跟管理的关系?那我说你要是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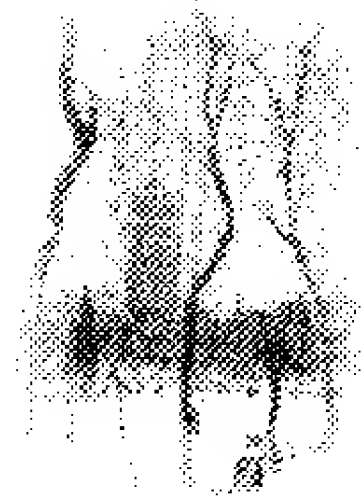


围棋跟管理放在一起,那你就降低围棋了。我从围棋看到了一种哲学高度,它博大精深,它是由黑白两个子组成的,只有两个最简单的元素,两个最简单的元素它有可能组成最复杂的东西。围棋中充满了对立统一这种概念,我们知道“大与小”、“快与慢”、“先与后”、“强和弱”,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把围棋看成是哲学。

那我在围棋里悟到了两条,一种是必要条件的决策,一种是充分条件的决策。就是如果有人吃掉你一个特别重要的棋子,这一局就输了,我们把它称作棋筋,这盘棋最重要的棋子,如果别人要来吃你的时候,以前我和所有的九段一样,迅速找到机会跑出去,想都不想。但是,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这样想了,为什么他也不想,马上就作出了这种决策了呢?有两件事情我们没有想过,第一,能不能跑掉,你没有想过;第二,你跑掉会不会带来更大的损失,你也没有想过。居然这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你都没有想过,你就能做出决策呢?你认为如果这个棋子被吃掉了,这盘棋就输了,如果我这个棋子跑不掉也无非是输嘛!多吃了一个子而已。如果这个棋子跑掉,其他损失很大不也无非是个输嘛!既然我能判断这个棋子被吃掉就一定会输,那我就赶紧跑掉,不要想其他的,这就是我讲的必要性决策。

第二个是充分性条件决策,就是反过来说,如果我有能力把对方这个子吃掉,我就赶紧吃这个子,你也别再想了,你也不要再去求一个最优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满意的解!这个棋子被吃掉了,已经输了,我们不需要再去想,吃掉这个棋以后,是不是还有其他机会,我不吃这个吃另外一个是不是机会更多一点。完全不需要,因为你已经赢了。你已经满意了!所以我们寻找的不是最优解,而是满意的解。那这常常成为支撑我最重要决策的两个依据!也是我把我的思维方式改变了。

那么人生有很多重要的决策,包括公司有很多重大的决策,完全是由这两个原则作出的。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当过兵,是1995年转业的。转业的时候我在想,我要不要转业,转业的代价是什么?后来我也确实转业了,代价非常惨重,部队不愿意让我走,后来给我提出特



别苛刻的条件,说,如果你要走的话,你的房子就没有了,你的户口也没有了,就这样一个条件,和我一起想出来的都留下了,最后就我一个人走了,很多人都觉得我非常鲁莽,很多爱护我的人说:陈沛,你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举目无亲,你怎么知道以后能够做得很好呢?你这样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但是,我当时的决定非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必要条件决策,如果不打仗,像我们这样的技术兵种,只能当一个大校,连将军都当不上,我们会走一条非常平稳的道路,但生活比较平淡,我自己肯定不满意,我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转业,以后我是不是做得更好我不去想它,我也真的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证明我一定能够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我主要看到我不满意当时的生活,就足够了。还要什么?不需要其他什么条件,至于以后好不好不重要,所以我迅速作出了决策。1995年转业的时候,所有的转业费用只有18000块钱,多了两个负担,一个老婆,一个孩子,然后开始了艰苦的创业历程。这样重大的决策,我根本没有多想,在后来做企业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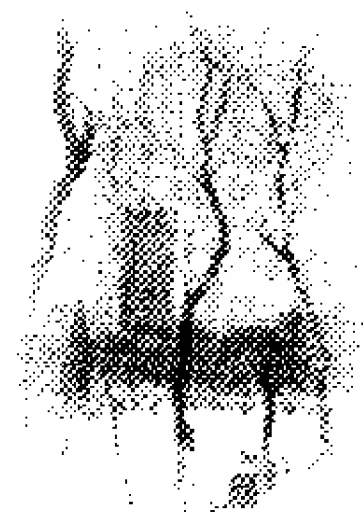
在做中搜时,我特别想强调的就是创新,这个创新能力,对于一个人也罢,对于一个企业也罢,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力,所以我在公司内,包括在很多场合来谈这个创新。我弟弟在读PHD,他的导师是一个犹太人,就是清华**学院的院长,他就讲中国人的缺点,中国人是非常聪明的,但是有两个弱点,他提到创新的能力,中国人学习的能力很强,但是拿诺贝尔奖的人就很少。中国人的学习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但是就创新能力来说差一些。我们数一数我们五千年的文明,最后,能记起来的也就是四大发明,但是四大发明是什么?那个时候你不发明什么都没有啊,你不发明,连火都没有,对不对?现在我们的发明越来越少。另外一个弱点,就是冒险精神,中国人缺乏这种冒险的勇气,这一点我非常认同,中国人缺乏承担风险的勇气。

我读MBA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师问一个问题: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靠智商还是情商。那么现在证明了,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情商起主要作用。而智商很高的人更多成为一个科学家。情商要有三个主要的要



素：第一条，叫勇气与决断力。中国人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我想这和我们长期的文化有关，包括我们中庸的这种思想和文化，很少走到两极，大家都走到中间，都选择一条更安全的道路，但是利益和风险是成正比的，当你在降低风险的时候，你也在失去很多的机遇，特别是有志做企业家的，你们必须有承担风险，做好失败的准备，在没有想清楚的时候，可以赶紧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这恰恰是我们智商很高的人很难做到的，我们总是期望用我们的智慧打通一条很平稳的道路，我相信我们可以走一条平稳的道路，但是我们不太可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包括互联网，互联网短短十几年的历史，诞生了多少企业家，你看那些成功的企业，他们当年也写商业计划书，给投资商看的那种，但是现在来看他们的经营模式相距甚远。但是你只要看看新浪也好，腾讯也好，盛大也好，他们都是第一个在做事情，就算不是第一个，别人不相信了，他们还是一直在往下做，你说他们都看得很清楚吗？没有。包括改革开放，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如果你老在岸边盘算着怎么过河，然后做各种科学的计算，说不定别人已经游过去了。所以有志于做企业家的人，要有勇气与决断力，赶紧去做你没有想清楚的事情，这是一种能力，你不能低估了它。当然如果在科学决策基础上做出哲学决策，那更是一种能力。

最后，我特别想谈的就是创新，特别是在高科技企业中，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将进入高科技企业。我在公司里就很强调创新。当然，创新不是说随时就有的。苹果砸到牛顿脑袋上，结果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苹果更多是砸在果农脑袋上的，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果树底下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什么也不能发现？其实，创新是要有条件的，一个企业的创新也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创新的意识，强烈的创新意识，就是我一定要比别人做得好，一定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更出色的东西；第二，就要有创新的能力，这个能力呢，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创新知识的积累，牛顿是物理学家，所以苹果砸在他脑袋上的时候，他能够发现。只有有一定的知识积累的时候，才有创新



的能力和可能。二要有创新的思维方式,有些人学习能力很强,但是创新能力不一定很强,我也看到过很多。如果你能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東西,你就会有一些创新,所以我说哲学的能力对创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能通常看到的東西,很多人通常都看到了,已经沒有机会创新了。

另外对企业来说,要有创新的环境。从管理看,我真的舍不得管我的员工,要按时上下班,迟到 5 分钟就扣 50 块钱,上班必須穿西装,打领带,如果要加班,要向部门经理申请。我们公司的员工相对来说管理比较松,我们考虑到大家都是 9 点钟上班,写字楼里会有很多人都挤电梯,效率也很低,因此,我们的员工可以 9 点 15 来也行,我们为员工营造一种非常宽松的环境。这只是一个例子,我的管理思想是,尽量不管理,特别是我们要管理的都是那种有创造性的、高智商的人,他们不是管出来的呢,他们的潜能是激发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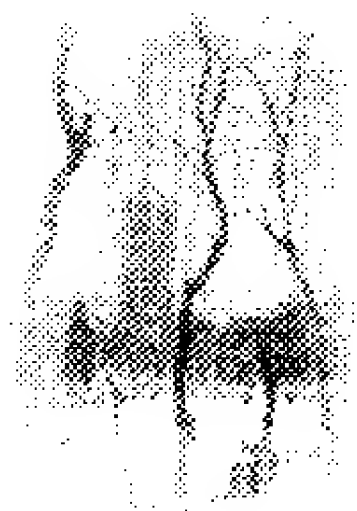
我经常给员工做培训,说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进入公司,我把人的合作分成了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乌合之众,就是看起来一堆人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沒有凝聚力,说反就反,沒有战斗力;第二个层次是我们称作利益捆绑,包括我们 MBA 很多都在做分赃的工作,就是上来就要考虑很多利益机制,这种利益机制很像小偷,分钱;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称作志同道合,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超越想象的利益关系,不能为钱工作,要做到志同道合;第四个层次就是理想和主义,我自己现在就是这样,我想世界上沒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沒有无缘无故的爱,所以我要员工们喜欢和尊敬产品和技术,并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是前提,我想只有有了理想和主义我们才会出现董存瑞炸碉堡,黄继光堵枪眼的事迹。只有这样,企业才会有战斗力。我想,比尔·盖茨也好,丁磊也好,他们当初投身互联网和软件产业的时候绝对不是为了钱,他们心中一定有了一个目标,当他们成功的时候,社会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包括比尔·盖茨现在还天天在工作,这有必要吗?据说年终分红分了三四亿美金。还全部捐掉了,他说留着还要纳税,还是全部捐掉吧。所以我相



信,很多人不是为了钱工作,而且我们是能够做到不为了钱工作,我们相信,所有为了事业献身的人,为社会做了巨大贡献的人,终将得到事业的回报。那么,我希望我的员工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公司的员工都是非常努力敬业,他们都以公司为荣,有一种成就感。

我们是做搜索引擎的,我们认为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搜索引擎,中国人能够做到最好的搜索引擎,我是这么想的。我告诉我的员工,我们是有机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公司,站在国际竞争者的面前,包括微软和google。其实,中国人已经失去很多机会了,因为我们在芯片技术,操作系统,大型数据库等领域,已经没有资格站在别人的对面,但是在中国搜索领域,我们看到有百度和中国搜索正在成长起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和国际巨头站在一起竞争,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所以我们所有员工都以我们的工作为荣,很有成就感,他们会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再有一个就是管理层很重要,我们要花时间告诉员工我们的理想,讲我们的竞争格局,讲我们为什么要创新。

我给员工们讲我们为什么要创新呢,很简单,我说中国搜索是一个最年轻的搜索引擎品牌,在我们前面有百度,如果我们和他们做同样的东西,你怎么能够说服我说我们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呢?所以中搜必须是一个有创造性的公司,它一定要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它要做得更出色,才有可能和别人竞争到底。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一定要创新,中搜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公司,我在《中搜 2004 年的战略规划》上前两句话是“要不脱颖而出成为互联网的领导者,要不昙花一现成为互联网又一个过客”。就是这两句。所以坦率地说中搜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两年多来我们做了很多创新的事情,这也令我和我的员工们骄傲。第一个,在 2002 年,第一个开发出新闻搜索引擎,当时 google、百度都没有做新闻搜索,那时候的搜索引擎只能查找两个星期以前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好,但我们知道用户需要我们把它做好,之后新浪就选择了我们,从此我们也开始进入高端的搜索引擎市场。现在,所有的搜索引擎上都提供新闻搜索,现在在中国 95% 的新闻搜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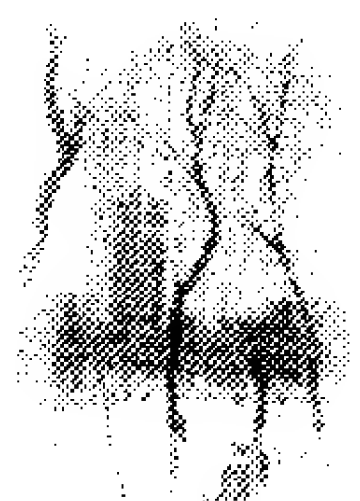


都是我们提供的,无论你在新浪,在 tom,还是在网易上搜索新闻。一年以后,google 开始提供英文新闻搜索,而 google 的中文新闻搜索仅仅在一个月前才实现,整整落后我们两年的时间。去年 8 月份,我们发布了第三代智能搜索引擎,我们认为未来搜索引擎是智能化的,只有人的智力才能改变引擎的质量,提到智能化我必须作点解释,因为我看到下面很多人和 IT 有关,什么是智能化,如何去衡量呢? 我们把一个绿茶当作搜索的例子,搜索器上会自动取得“绿茶”,当你把绿茶输入后,搜索引擎会提供很多和绿茶相关的信息,有的是茶叶,有的是绿茶电影,如果把所有的结果都列出,肯定结果比较长,我们必须在这里找到我们要的东西,那么智能导航干什么呢? 就能告诉你,我这个茶叶有娱乐的,有皮肤保健的,那你点娱乐进去全是绿茶电影,没有任何无关的,这就等于把你的需要进行排列了,那你再看看皮肤美容的,一点击全是皮肤美容的,因为绿茶对皮肤好,怎么保健这些东西,我们认定它是未来搜索的方向,这也是中搜第一个做的,也是今年,google 才开始完全认同我的理念;而今年我们推出了全球第一个桌面搜索——网络猪,我们认为桌面搜索将代表未来,未来的搜索将从地址栏和浏览器,转移到桌面上去,这是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在这个领域我们领先 google 一大段,当时给好多人讲桌面是搜索的未来,他们不信,但是现在好多人都相信,因为微软做了,那就是说,未来的搜索引擎将完全脱离浏览器,就在桌面上进行,而且 google 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桌面搜索工具,全球的桌面搜索大范围普及,那是谁推动桌面搜索的呢? 是中国搜索。你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网络猪,我们很快就将发布网络猪的非常震撼的最新版本,因为所有人都开始进入桌面了,我们在引领着桌面大战争,在桌面搜索引擎大战中成为王者,我们将在桌面的竞争中,实现我们战略的转移,从一个追随者变成一个领导者,这真是我们公司的战略规划规划,这些成就都来自于对创新的强烈的渴望。当然我们是被环境逼的,如果不创新,那我们肯定是一个追随者,我不愿意做一个追随者,就一定要创新,这是我讲的必要条件决策,所以我们要做出非常重要的决策,就是



做 google 没有做过的东西,所以几年来我回答的最困难的问题是有的记者问,你说你代表未来,那为什么 google 不是,这是我最难回答的。但是我们看到现在 google 成为我们的追随者,为什么不行呢?因为互联网只有短短 10 年的历史,那么一个中国公司和一个外国公司差距并不遥远,他们能看到的東西,我们也可能看到。而且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许多重要的商务模式技术要在中国诞生。包括无线,其实无线技术远远领先于北美,很多无线的商务模式他们要考虑中国人怎么做,有什么奇怪吗?我想,互联网也给中搜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最后,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创新也要允许失败。一个企业能做多大,实际某种意义上胸怀是很重要的。这是勇气和决断。在这里我稍微讲一下我的商务创新——中国搜索联盟。中国搜索在市场方面的表现应该称之为奇迹。很多搜索引擎公司都是先给门户网站提供服务,通过这个途径做自己的品牌,增加自己的流量,然后经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开始进入搜索引擎排名的经营,来获取利润。如果没有品牌和流量,就没有机会涉足经营。中国搜索因为起步较晚,技术也没有完全成熟,品牌可以说基本没有,当时的流量也还不足以进行经营,这时候按常规根本无法进入市场。但是,在市场高速发展的情形下,我们又不能等到一年半以后再进入。当时,这确实让我们非常苦恼。那么,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进入市场,在经营的同时做品牌、流量这些事情呢?应该说,“中国搜索联盟”的成立非常完美地解决了我们面临的难题。联盟成员中包括新华网、人民网、263、商业网站、行业网站等,他们利用多年时间打造出了自己的品牌和流量,但是他们缺少核心技术,对技术的需求很强烈。中国搜索的核心优势是技术,联盟成员的优势是传统品牌和流量。成立中国搜索联盟,把搜索引擎技术提供给所有的联盟成员,利用我们的核心技术优势,与他们的品牌与流量优势结合,共同打造出更强更大的品牌。中国搜索联盟的成立与超常规的快速发展,充分体现了优势互补的重要,找到了中国搜索的正确发展之路。就是在这一瞬间,我们完成了别人需要用一年半时间完成的事情,迅速地完



了品牌的构筑与流量的跳跃式增长。

希望我今天的讲座,真的对大家的人生有所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中国搜索这个品牌,谢谢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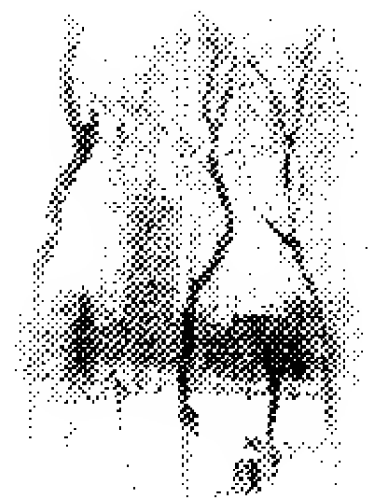
(2004 年 11 月 16 日)



台湾经济的奇迹

■ 林毅夫

林毅夫教授,1986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1987年学成归来后曾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至今,同时也是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教授。林毅夫教授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家,在国内外有众多兼职,并担任众多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是国务院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五”计划咨询审议委员会常务理事成员、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亚洲开发银行长期战略框架高级顾问组成员、世界银行顾问,国家人事部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特殊贡献专家津贴,并且是第7、8、9、10届全国政协委员。著作《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教育部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四章“价格双轨制与供给反应:理论与来自中国农业的经验证据”荣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获1992年度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内经济学界最高奖);《技术变迁和家庭收入分配》一文为被评为1999年度《澳大利亚农业和资源经济学》最佳论文。1992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农村改革和中国的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负责编辑《自然科学引用索引》(SCI)和《社会科学引用索引》(SSCI)]评为1980年至1998年间的经济学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论文之一,国内经济学界仅林教授一人获得此奖。还有多本著作分别获得北京市第4、5、6届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著作一等奖。

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好!

因为当老师当惯了,上课的时候总是站着讲,所以我就先站着讲,等一下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再坐着。

今天晚上有两个事情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第一件就是我们研究生会以台海局势作为第三届国是论坛的讨论主题,同时看到有这么多的同学们来关心这个问题,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论坛。作为在台湾出生和长大、到北大来工作的台湾人,我内心感到特别温暖。让我非常高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晚上有幸和汪毅夫省长同台演讲。汪省长是我多年的长辈了——应该是兄长,我记得大约在七八年前的时候他托人给我送了一本书,上面写的是请毅夫兄指正,然后写毅夫赠送。那会儿我才知道在福建省还有一位叫汪毅夫的学者,当时他是福建省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从那以后他就平步青云,一下当上了福建省副省长,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福建省得到各界的尊敬和重视。这七八年来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是大约5年前,我回福建老家找我祖先离开去台湾时的故居。我们在台湾保留了一个族谱,里面的记载不是很详细,后来通过汪省长的帮助,我们总算找到了当时我们祖先离开去台湾时候的小村落,还有祠堂等等。慎终追远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德,在汪省长的帮助和关心下,我们把老家的祠堂修复了,同时我哥哥也在老家设立了一项奖学金。汪省长这几年不仅帮我找到了在福建的老家,在我工作、学习的很多问题上,他也是我最谈得来的朋友,是我最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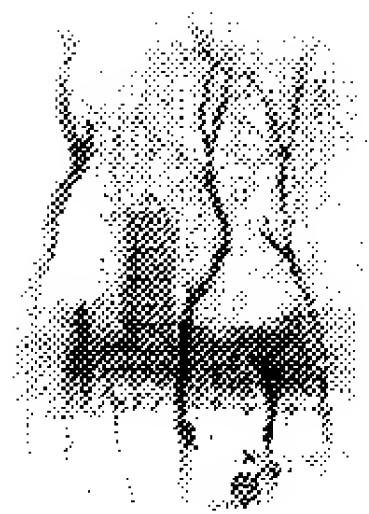


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所以今天有机会能和汪省长在这里同台演讲,我内心里面确实感到非常的温暖和高兴。

主办者希望我今天谈谈台湾的经济问题,我想谈两个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被认为是亚洲四条小龙当中的一条小龙,它从 50 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我首先想谈谈台湾为什么可以创造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的经济有一点停滞,我想分析一下台湾的经济为什么会停滞,然后我想和各位探讨一下怎么再创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

台湾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奇迹,是说在 50 年代的时候,台湾的经济还非常的落后。为了做今天的报告我特地查了一下数字,1950 年的时候台湾人均收入一年只有 37 块美元。当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没有办法回忆当时的情况,不过我有一个大哥在台湾,他比我大 12 岁,1950 年的时候他正好读小学。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在读小学的时候,早上到学校去,中午回家吃饭,他从来不敢问我妈妈今天家里到底做饭没有。他回到家里以后,就把背往灶上靠一靠,如果灶是热的,代表今天家里做饭了,就问我妈妈有没有饭吃;如果灶是冷的,他在家里看一看,饿着肚子,低着头又回到学校去——那是 1950 年的情况。我想我 1979 年到大陆来,当时大陆还很穷,可是如果和 1950 的台湾比起来,台湾确实是更穷。我自己是 1952 年出生的,1960 年我读小学,在 60 年代的情形,我倒有一些印象。比如说小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一般是哥哥穿过的,或者是我表兄穿过了,然后留给我穿。当时如果说看到街上在卖馒头,那我就会瞪大眼睛看着卖馒头的车子一遍一遍地从我家门口走过去,很难得能吃上一个热乎乎的蒸馒头,能吃到那样的馒头就好像是过年了。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买皮鞋,那是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 1962 年了。我第一次买皮鞋是在我哥哥的帮助下,当时是过年,我们到了一个皮鞋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买皮鞋的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要买大两号,因为那个时候十几岁长的很快。买了皮鞋以后是准备穿两年的。这种心情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很难



相信是真的,可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就是在那个水平上。我相信在 50 年代的时候从很多方面来看,可能大陆的情形比台湾还要好,绝对不会比台湾更糟,因为当时的台湾基本上一般人是在温饱线的边缘。但是从 50 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到 1970 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台湾的人均收入就达到 2727 美元,从 50 年代的 37 美元变成 2727 美元,20 年的时间,到 1990 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 9263 美元。1996 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均收入达到了 14000 美元。台湾这三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非常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它们的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为什么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那么低的收入水平、人民生活那么差的状况之下,能够在持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作为学者,我们总想解释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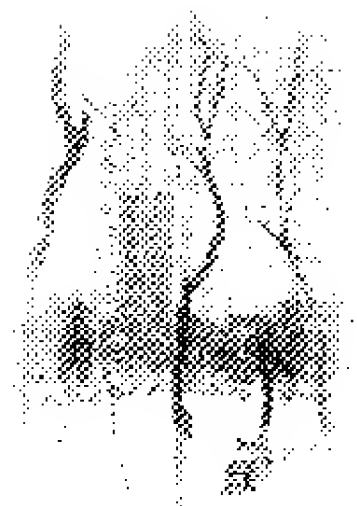
我看过一些文化学者,尤其是北京崇拜儒家文化的学者,认为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经济能够维持三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到了 80 年代变成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因为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约,作为一个现代经济,勤劳节约可以增加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这个看法我个人是怀疑的,怀疑的原因是因为文化是不变的。台湾文化确实是继承了从大陆带过去的儒家文化,特别尊敬长者、特别重视秩序等等,这对经济增长应该会有帮助。可是文化是不变的。台湾之所以会从大陆割让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因为在 19 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非常衰弱,被日本打败了。那么,如果用文化的观点来解释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怎么能解释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样是中华儒家文化,为什么中国那么衰弱,以至于让台湾从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被割让出去?

对那样的事情我们大概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变量来解释。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在 50 年代、60 年代、70 年代发展那么快,研究政治的学者经常讲是由于冷战的关系。因为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陆是共产党领



导的,大陆、东欧和前苏联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在美国领导之下有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等是在国际的冷战的状况之下,围堵社会主义国家扩张的前沿。我们知道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非常有吸引力,尤其对年轻人。那么按照“防止社会主义的扩张”这个说法,美国对台湾、对韩国等提供了很多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技术上的援助,美国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我们知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金、技术、市场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按照这个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者说5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可以发展得这样好,是得益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不过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我想如果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的应该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原来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或者是市场开放,都比对东亚的韩国、台湾等更为优惠,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没有发展起来。同样的情形,如果冷战是关键的因素,那么拉丁美洲的国家应该比东亚的国家发展得更好。我们知道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叫古巴,它对拉丁美洲的年青人非常有吸引力,即使到今天古巴的经济也不太好,但是你到中南美洲去看看,很多年轻人还是把古巴的卡斯特罗看作是英雄。我们知道古巴就在美国的后门,后门着火了美国当然更紧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市场开放、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的条件应该比在东亚的韩国、台湾更为优惠。但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到了八九十年代老是发生金融危机。

既然不是文化的因素,也不是冷战的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台湾经济以及东亚经济在50年代以后能够取得奇迹般的增长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台湾经济之所以从50年代开始一直都比较好的,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凡是上我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我提出了一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其实这个战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我自己在台湾的观察以及回到大陆后研究大陆在改革开



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通过比较总结出来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像美国和欧洲这些 OECD 的国家,它们有很多资本密集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优势;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作为发展中国家,当然希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但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果,不是因,是它们国家强盛的果而不是因。真正造成它们发展这么多资本和技术很密集产业的原因,在于从资源和要素来看,它们的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样的状况下,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劳动力的价格相对高。那么作为发达国家,如果它们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话,在它们的产业、产品的生产中就要多用它们有优势的廉价的资本,少用它们没有优势的价格很高的劳动力,这样形成的产业当然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当然最终要靠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改善,但是如果改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话,就必须着眼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从发展的早期,劳动力相对多、资金相对稀缺的这样一个要素禀赋结构变成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短缺的这样一个要素禀赋结构。但是怎样才可以提升每一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禀赋?我们知道资本来自于剩余,来自于生产剩余的积累,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希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话,就要形成一个产业经济结构,在每一期生产的时候都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在剩余当中有最多的积累。怎样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最重要的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如果按照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那么不言而喻,你的产品不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据最大的市场,创造最多的剩余,而且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是相对高的,由于利率高,那么在剩余当中愿意积累作为下期生产投入的部分就相对多。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能够快速积累资本,让它的要素禀赋从劳动力相对非常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慢慢地变成劳动力



相对短缺而资本相对非常丰富。

总的来讲,台湾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比如说在 50 年代,台湾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它主要出口农产品,而农业恰恰是在利用土地和廉价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到 60 年代以后它就开始发展轻工业,包括纺织业、小五金、家用电器等等,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规模都非常小,不过这些产品符合当时台湾劳动力多,劳动力素质高的情况,有一点像我们大陆现在的状况,它的产品质量不差,价格又非常低,在国际市场上自然有很大的竞争力。于是在 70 年代出现了一个现象:当时的台湾桃园机场可能是全世界最忙的机场,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台湾小商人,拿了一个 007 手提箱全世界到处飞,找订单找市场。其实,他的产品都是些很简单的东西,而且这些小商人之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过度竞争的,不断地杀价,但是他不断杀价也能赚钱,因为岛内的生产成本更低,而且这种竞争的结果使他就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印象:如果你要轻工业品的话,最便宜的地方就是台湾,所以美国、欧洲的那些大百货公司、大连锁店有什么东西要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台湾,这样就让台湾的产品占领了国际市场,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大陆的产品。正是由这种产品的竞争力积累资金,台湾才慢慢地进行产业升级,到了八九十年代,向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过渡。其实,台湾在刚开始发展信息产业和计算机产业的时候也是组装,然后生产零部件,到最后才慢慢地升级到整机与核心部件生产,像台湾积体电路公司的核心芯片生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

由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台湾都充分地利用了比较优势,所以它的经济就特别有竞争力,而且相对来讲,它的经济也特别稳定,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即便是在 1998 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台湾经济同样没有危机,还是以 4% 到 5% 的速度增长。

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从 50 年代开始,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按照比较优势而不是像很多国家和地区用赶超的方式发展? 难道国民党就那么聪明吗? 难道被我们打败的蒋介石到台湾以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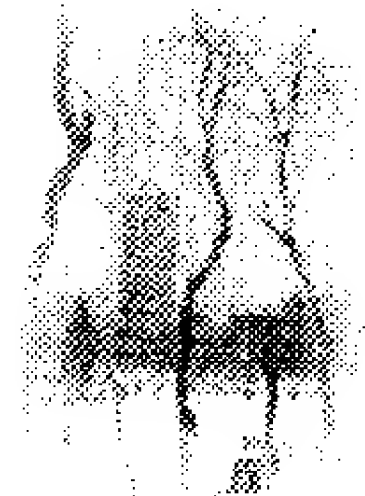
就学乖了吗？我想绝不是他聪明。我看过不少的资料，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台湾在 50 年代的时候也推行经济计划——它叫经济计划，我们叫计划经济。在经济计划里面它也曾经讲到说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就必须有国防产业，要有国防产业就必须有重工业，所以它在 50 年代的时候也曾经试图想要去优先发展并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但是台湾人口少，50 年代的时候只有八九百万人口，而且资源非常短缺，因此当它想推行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时候，就马上碰到了资源短缺的问题。于是政府用财政赤字的方式来运作，结果第二年马上产生了很高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对通货膨胀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国民党为什么失掉大陆？因为在 40 年代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控制大陆的通货膨胀，引起老百姓很大的不满，失掉了民心于是就失掉了政权。在那种状况下，国民党发现它如果像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其他比较大一点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去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话，马上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后，虽然政府后来的经济计划当中也强调发展重工业，但是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都是嘴巴讲讲的，没有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任何由政府靠行政动员的资源来扶持那些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不符合它们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政府没有这些政策，所以企业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能从政府得到补贴、拿到保护，当他面对国内国外竞争的市场，当然只能按台湾自己的优势来发展。那就是台湾经济为什么从 50 年代以后，一直到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初都能发展这么好的原因。这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设计的，而是形势比人强。当然，作为学者，我们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因此我希望从台湾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和大陆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中提出一个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能够比较快速发展的理论。

台湾可以说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经济都发展都非常好，到 1996 年台湾的人均收入达到 14000 美元，但是 1996 年以后，八年的时间过去了，台湾的人均收入总是在 13000 和 14000 美元之间徘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四年前，台湾的前行政院长萧万长曾经到北大来访问，在



北大访问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命题,我说你看台湾经济发展的道路,其实跟日本和新加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是很接近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它们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也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比较好地利用了它们的比较优势。我发现,新加坡在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40%的时候用17年的时间才使他们的人均收入赶上美国,也就是从1979年到1996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基本动力与新加坡是非常相似的,台湾1990年的人均收入9268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40%。照理说新加坡用17年的时间赶上美国,那么台湾也应该有这个条件。也许有人说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200多万人口,而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口,所以新加坡的例子不足为证。可是反过来看,日本在197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到1988年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赶上了美国,用了18年的时间。我们知道,日本的人口规模上亿,将近台湾5倍。既然日本和新加坡都可以用十七八年的时间使人均收入赶上美国,那么台湾没有理由不赶上。可是台湾在199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到1995、1996年接近它的50%,可是1996年以后台湾就在原地踏步了,之后收入就没有继续增长,相对来说台湾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30%多。

那么为什么从1996年以后,台湾的经济原地踏步,而没有办法像日本、新加坡那样地继续往前走,最终赶上美国呢?背后的道理是这样的:一个像台湾这样的中等发达经济、一个新兴工业化的经济,它可以讲说是不上不下。不上就是说它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的距离,可是当它与去年人均收入才1000美元的大陆比,那就高多了。如果它想让这种不上不下的经济继续发展的话,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随着工资的不断提高,这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必须转移到海外去,把资源释放出来,将释放出来的资源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它能够很顺利地不断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它的人均收入才会不断提高。可是我们发觉,从1996年以后,这样一



个良性的循环,基本上被李登辉和后来的陈水扁打断了。我们知道李登辉去访问美国以后,回到台湾感觉非常好,想当台湾的国父,所以他就和大陆对着干。如果就经济的合理性而言,台湾那些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最好往外转移的地方是哪里?当然是大陆,同文同种,交通距离又近,而且大陆整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基础非常好、劳动力素质非常高、有许多产业集群的效应——我们知道想要有竞争优势就要有群聚效应,大陆就有很多的群聚效应。可是李登辉推行了南进政策,反对西进,于是在政府的政策的压力和诱导下,不少产业转移到像印度尼西亚、越南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像打水漂的石头一样有去无回。如果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大陆来,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这只是一个账面的投资,比如说到大陆投资一千万美元,实际上他是用一千万美元来买台湾的机器设备,然后把这些机器设备进口来,他就可以把台湾的这些已经物化的资本变成金融资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转移到大陆来的产业,利用大陆的优势还可以创造第二春,而且比原来发展得更好。比如说70年代台湾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制鞋业,就是制造像耐克那种运动鞋。在台湾,一个厂雇佣一万名工人的话就已经是超级大厂了,转移到大陆来,有不少厂雇佣10万名工人,它会发展得更好,获得更多的资金,资金回流到台湾去,就给台湾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可是李登辉不愿意这样,所以很多的产业就转移到东南亚去。到东南亚赚不到钱,没有办法把这些已经物化的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以创造更多的资本。同时由于他不愿意让在台湾那些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大陆来,这样也给台湾企业的产业升级制造了很多障碍。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台湾积体电路公司,现在是台湾最有影响的企业之一,它现在的生产技术主要是8英寸晶圆片,就是8英寸电脑芯片的生产。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个老技术了,如果要维持竞争力的话,应该投资到12英寸的晶圆片的生产。积想把8英寸的生产线转移到我们上海来,这个是最合理的转移,但是台湾就是不让它转移过来,给它制造障碍,就影响了积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因为即使它把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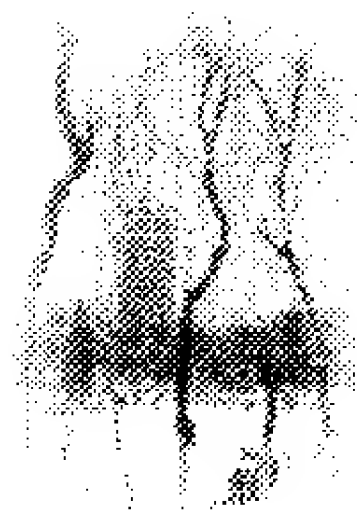


的晶圆片生产能力从 8 英寸升级到 12 英寸,也只能在 5 年 10 年内维持它的竞争力,5 年 10 年以后这个厂还是要往海外移。往海外移最好的地方就是大陆,可是现在 8 英寸的生产线要转移到大陆来就已经这么困难了,以后的 12 英寸生产线不是更困难吗?于是他一想到将来 12 英寸生产线转移到大陆来很困难,现在就不敢投资 12 英寸的生产线,这样就导致产业没有升级,有竞争力的产业,逐渐失掉竞争力,收入水平当然也就不能提高。这正是台湾从 1996 年以后,人均收入在 14000 美元原地踏步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希望台湾的经济能够发展得更好,希望台湾真的能像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当中的新加坡一样,能够在未来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变成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个希望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那就是不能让政治妨碍经济发展。大陆把 2020 年人均收入三千美元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如果大陆经济和台湾经济能够抛开那些政治上的不必要的来自台湾当局的纷争,那么我确信,很可能到那个时候,台湾会是人均收入 40000 美元。如果台湾能够这样做,我想对大陆的经济也是双赢两利。因为我们大陆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产业的不断转移和升级,同样需要技术的不断升级。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需要升级的产业和升级的技术很多,台湾的技术转移到这里来正好供我们升级,将来对大陆经济的发展也会有好处。所以我们需要智慧、需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解决目前在台湾的那些乱象。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话,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所不断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只要大陆经济发展得好,台湾的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好,台湾经济发展得好,大陆的经济也会发展得更好!

谢谢!

(2004 年 3 月 10 日)



质疑主流：对后发展道路的反思

■ 朱天飏

朱天飏，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在英国剑桥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是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主任，主要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主持人：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为弘扬北大兼容并包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研究生会组织了“新视野”系列讲座。今天是系列讲座之二，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朱天飏老师，为大家讲授“质疑主流：对后发展道路的反思”。大家掌声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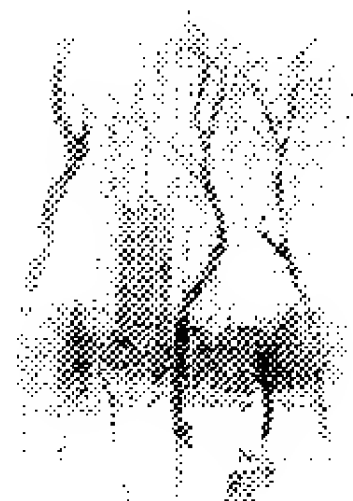
朱天飏：

今天是星期五，各种讲座应该是很的多的，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学者、学生、朋友来听，希望不要让你们失望太大。这里首先感谢北大研究生会为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包括我们院的几位同学也一直忙前忙后，包括这块布都是上午买的，突显了北大精神，在这种环境中既有很现代的东西，又有不那么现代的东西。最后我还要感谢李强老师能够参加这个讲座。李老师一直都很忙，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能不能先给他提供一点东西看看，我其实还真写了一个东西，我的一本书里的一章与这个话题有直接关系，我当时没有给李强老师，不能把自己的马脚先暴露出来呀，



让他听完了以后再做点评,这样会有一个突然的效果。为了避免大家的等待,在讲演之前我先说明一下,今天我只是在讲座的最后一点点时间讲一下中国的问题,绝大部分的内容都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关系。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后发展是一个大的框架、大的思维,它肯定会对中国的发展有一些启示的。这个启示是什么样的呢,希望大家能够听清楚我讲的后发展的问题,而后自己思考,我这里就不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具体的讨论了。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总是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说首先要了解中国然后再了解世界,我这儿却恰好相反。在许多院系里他们会有这样一种思考的模式,有些同学写论文时会写国外的东西,比如写韩国和日本的比较,比如写美国和阿根廷的比较,那么就有老师这样说:中国的事情都没有弄清楚,还研究外国的事情。听了我这个讲座,你至少会发现,这里没有中国的东西和外国的东西(相区别),这里只有理论的问题,只有论点、论证和启示,所以我从来不分中国的事情和外国的事情,原因在于我从来都不相信,中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例子。我现在开始讲,讲完以后你来告诉我,中国是不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例子?

题目是“质疑主流”,所以我就只有先简单谈一谈主流的观点了。关于发展的问题,主流观点之一是新古典经济学。发展问题是各方面的发展,但首先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我们有发展经济学,但发展经济学很早以前就被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鄙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市场的运作规律之上的,对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来说,发达国家的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没有本质的区别,关键的一点都是要消除阻碍市场自由运作的障碍。所以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一样的,不应该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所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发展经济学并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甚至不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在他们看来,他们只研究市场的规律,没有必要分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样细分的必要。如果说我今天到这里讲这个主流的话,可能就没法再讲了,在这个主流里原本就没有后发展的问题。第二个主流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



济学很明显要讨论发展的问题。发展在政治经济学中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对于政治经济学家来说,一定要进入到发展背后的各种政治经济、国际国内因素的互动中去理解发展。我今天的讲座就是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这个发展的问题和后发展的问题。

提到政治经济学关于后发展的论述,一般来说,我们首先都要提一个著名的人物,那就格尔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1904—1978)。如果我今天不介绍他的话,我就没法质疑主流了,因为我相信在国内很多人连这个主流都很少了解,所以我只能从这个主流开始。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背景。我怎么知道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他呢,在 google 上有一个查寻的办法,你把 Alexander Gerschenkron 这个英文输入,然后旁边再加一个中文,比如“的”等常用词,点击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名字有多种多样的译法,我这里只说一个,叫做格先克隆,可见这个人在国内事实上并不知名。可是在国外的政治经济学界和比较历史研究里,提到他没有不知道的。他 1904 年生于俄国。1920 年,俄罗斯处于内战中,他的家庭看来是比较惧怕苏维埃红军的,因而在这年离开苏维埃俄国去了奥地利。在奥地利,他受到了经济学背景的教育。1938 年他 34 岁时又一次大逃亡,因为奥地利与纳粹德国同流合污。他辗转到了美国,并成为哈佛大学著名的教授。他虽然是一个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但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俄国人,不但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而且被聘请教授意大利文学和斯拉夫文学,可见他的学术功底是很深厚的。那好,我们回到后发展的问题。

格尔申克隆的名字没有听说过,但“后发优势”都应该听说过吧,它就是直接从格尔申克隆的理论里发展出来的。先说“后发展”。按照发展时间先后的标准,英国是唯一的先发展国家,在英国之后可以依次排一下。第一代后发展国家比如美国、比利时,是在 19 世纪中期开始工业化的发展的;第二代如法国、德国,是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工业化并达到一定程度,可以说比较发达了;第三代如俄国和日本,20 世纪初期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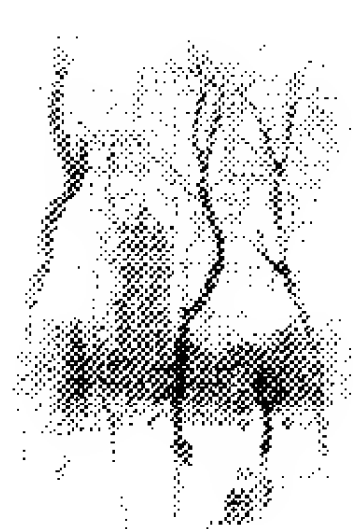


初具规模。

格尔申克隆观察到,发展的时间越向后,发展就越需要具有强大组织力的组织(此后简称“强力组织”)来推动。他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重点比较了德、俄两国的发展历程,他发现,起步越晚的国家越需要强力组织去调控资源。他说,英国是以市场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而后发展的德国和俄国就需要银行和国家作为强力组织来推动发展。先是从德国开始,以银行作为发展的中心机构调控资源,以谋求某些工业的发展;俄国则是比德国更后的第三代发展国家,俄国不是靠银行而是靠国家去调控资源。从企业组织形式上看,这些国家的企业组织有一个从小型企业到企业集团的过程。英国作为先发展国家主要是以家庭工场起步的,而德国在20世纪初期出现了大型的企业集团。

格尔申克隆这些观察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呢?首先,后发展的国家能够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通过走捷径的办法来追赶别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发优势。后发展国家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劣势的,后发展国家往往在资金上很困乏,没有足够资本推动工业化的发展。格尔申克隆却没有强调后发展国家的劣势,而是指出后发展的优势所在,后发展国家已经看到了别人是怎么发展的了,也就可以通过走捷径来赶超别人。其次,要想赶超别人,就需要集中有限的资本,在借鉴别人发展的经验后,把这些资本投到最应该发展的地方,这就是后发展的逻辑。这个逻辑有一个条件——需要中央调控机构,市场的办法是很难实现的。第一,市场不会从整体上去学习别国的经验,这是因为市场是由不同的消费者、不同的生产者所组成的,他们都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所以很难从整体上去学习别国经验。第二,市场很难非常快速有效地把资本集中起来投到某一个产业中去,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你要发展的工业不一定就是一个一开始就能赚钱的工业,这就是后发展背后的逻辑。

为什么越后发展就越需要强力组织呢?因为这个强力组织要用来学习别国的经验,指导对某些产业的投资,争取一步或几步赶超他国。



同时,强力组织还要来把有限的资本组织起来,集中投到一个地方。在工业组织上,这个强力组织当然希望它支持的产业能够集中,不希望它的工业组织是以手工作坊、家庭产业为主的,因为这样不便于强力组织进行集中资本的运作。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国家的强组织力不一定只局限于经济层面,也可能会表现在政治层面上,一般来说,它塑造的是一种集权的状态而不是民主的状态。如果说英国有一个比较自由的政治环境,从法国、德国到俄国,政治环境就越来越专制,政府的强压能力越来越展示出来。以上是对后发展理论的基本介绍。

在很大程度上,我下面的观点并不是要否定格尔申克隆的观点,其实他在政治经济学里为研究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基础。他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一样,他把国家引入了后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强调市场的调节,主要是要消除市场运作的障碍。格尔申克隆对这个主流提出了非常大的质疑,他说,后发展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组织力。这个质疑也为我们研究后发展问题打下了一个基础,但他的观点又有不全面的地方。下面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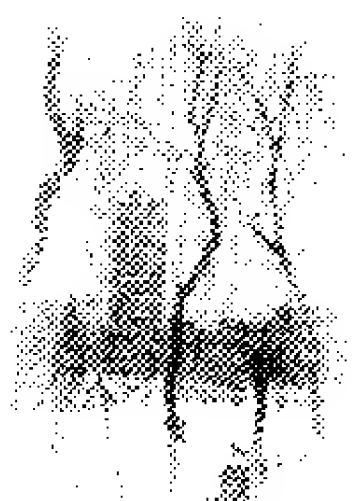
在阐述我的观点之前,我先要提出几个问题,一个是关于发展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国家的问题,一个是关于社会的问题,我逐一讲讲。先讲发展的问题。格尔申克隆在发展问题上稍有一点问题,我们说过,他有经济学的背景,他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认为发展的问题就在于市场的障碍,只要把这些障碍拿开就可以发展了,而是用他的强组织力的观点去讨论问题。其实他的框架并没有离开经济学的框架,他认为发展并不是一个难的问题,只要你用银行、国家等强组织力把资本集中在一些应该发展的产业上,并按照这个程序,你就完全可以发展,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格尔申克隆讨论德国、俄国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但在这期间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这个世界上,不但后发展国家没有赶上发达国家,两者的差距却越拉越大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但总收入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换句话说,世界上另一部分发达的国家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却



占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从这里虽然看不出具体国家的情形,但仍然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路要走,差距还很大呀。有人统计了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世界上最穷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的变化,60年代这些人占有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二点三,到了90年代这些人只占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点四,这个比重是下降了。另外说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二十的富人,60年代他们占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到90年代占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从人口的角度看,很明显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从国家角度来看,现在发达国家总收入是发展中国家总收入的37倍,40年前还只有18到19倍。无论从人口还是从国家的角度看,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了一百年却越落越远了。为什么没有像格尔申克隆说的那样,只要有强的组织力就可以像德国、俄国、日本那样发展起来呢?为什么没有能实现赶超?为什么21世纪初与20世纪相比两者间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了呢?

进一步分析,格尔申克隆的问题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格尔申克隆的理论完全没有社会这一层面,没有社会这一层面,你就不能去问到底谁坚持发展、谁反对发展。经济学里面没有这个问题,经济学里只有市场、消费者、生产者,在这个角度上,发展对大家都有利,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会支持发展,但在政治经济学里就不能这样简单处理了。即使我们不谈其他的理论,只用我们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也能看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为什么有阶级斗争呢?是有人不愿意发展,有人要保障他们以前的利益,这就很危险。我不是说完全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它只是分析的理论中的一种。你可以想象到,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他们可能是支持发展,也可能是反对发展,你不分出反对发展的这些部分,你就不好去分析发展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国家。对于格尔申克隆来说,国家起到了一种功能的作用,当后发展后到一定程度了,国家就得出面对市场进行干预



了,国家就要计划把有限的资源投到应该投的工业领域里去。但格尔申克隆却没有分析国家能不能这样做,以及国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国家是由官僚政客掌控的,这些人首先要考虑自己的利益,这样一群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追求整个国家的发展,而且要快速地发展? 格尔申克隆的后发展理论特别着意于时间的问题,他说,越后发的国家为了赶上别国就越需要强的组织力,把有限的资本组织起来投到别人经验证明是成功的领域里去。当你把国家分解为政客、官僚后,你就要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快地发展,这与他们自己的利益相关度有多高? 所以,如果说格尔申克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发展问题打下了一个基础的话,他显然没有进一步思考关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关于发展阻力的问题。之后要考虑的是国家到底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国家致力于发展,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什么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只拿到世界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 相反,国家是由官僚掌控的,你不能假设国家就一定致力于发展,致力于去满足社会的需求,政治家们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这可能更能解释现实的情况。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在社会层面上去看发展的阻力,其次要通过分解国家来考虑国家到底在什么状态下才能致力于发展。

下面就来集中谈谈我自己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在这里我首先要提到刚才我谈的那几部分。社会要分解来看,国家要分解来看,讨论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以及它们互动的原因,要通过它们的互动来看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第一步我提出了发展的问题,这是建立在刚才对发展的质疑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追赶了一百年距离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的问题根本不应该是怎么发展,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不发展? 为什么停滞? 为什么跟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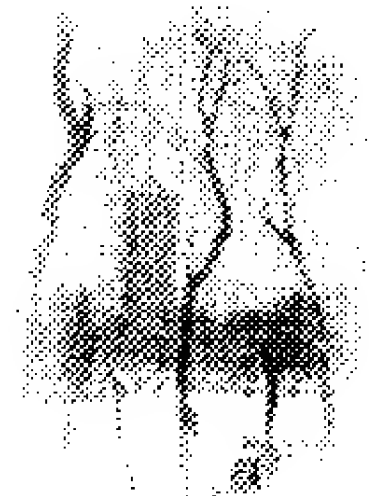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从社会开始,从发展的阻力来讨论这个问题。发展的阻力涉及到一个传统的问题,是关于地主集团、地主阶级,他们代表了一种



生产方式,他们和工业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地主集团是后发展中最主要的阻力呢?因为地主集团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这种生产方式可以叫做封建生产方式或者其他,但它一般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地主集团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工业化必需的劳动力不能获得。二是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工业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农业发展基础之上,如果农业部门生产积极性越高,所产粮食越多,它就对工业发展越具有促进作用,但地主生产方式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却起到了阻碍作用。我们看到,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要讲“耕者有其田”,就是要提高劳动的积极性。三是地主集团为了保障经济利益和与之相连的生产方式,会利用自己在原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权力来尽力阻碍工业化,所以,相对说来,地主阶级越弱的地方,工业化就越容易实现。我们可以分出这样几种国家类型来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城市国家、移民国家和原住民国家。

首先要说城市国家和地区。城市国家一般只有很少的土地,并以城市为中心,很明显它的地主集团力量不会很大。在考虑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韩国、我国台湾包括新加坡都是以政府的强制力去干预经济促进发展的,香港是以自由贸易推动发展。无论是强调国家干预的新加坡还是强调自由贸易的香港,它们都没有那么强的工业化的阻力,它们缺少一个强有力的地主集团。

另外要讲的是移民国家,特别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崛起以后建立的移民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相对来讲,它的地主集团也很弱,这些国家也较好发展,过一会儿我举美国例子时会说,它也有别的阻碍因素,不一定没有地主集团就没有别的阻碍,拉美就没有克服这些阻碍,过一会我也要讲。总的来说,移民国家较少有地主集团为了维护其生产方式而对发展设置的障碍。第三种也就是大部分的国家,我把它们叫做原住民国家。它们有封建传统,有很长的历史。原住民国家的地主集团力量一般比较强,所以如何克服地主集团的阻力是第三世界国家要面对的重大问题,地主集团在一百年前是阻碍后发展国家的



重要力量,现在也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主要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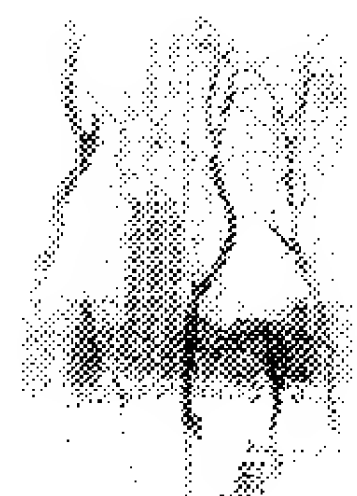
一百年来,地主集团都是阻碍工业化的强有力集团,如何打破这种集团,这涉及我们对国家的讨论:国家并非像格尔申克隆说的那样,当落后到一定状态时会借鉴先发展国家的经验并把有限资金投在最需要的部门。在这之前,这个国家首先要克服发展的阻碍力量,克服地主集团对发展的挑战。在这里,国家可能是工具性国家也可能是自主性国家,相对说来,工具性国家较难克服地主集团的挑战,因为传统社会中国家本来就是这些阻碍力量的工具。只有自主的国家才可能推动后发展国家的发展并赶超发达国家。这里的国家仍然是关键,一会我还要谈国家怎么能够做到自主性。一般说来,成功的后发展国家基本有两条路。一条是改良的道路,地主集团与国家达成一种妥协,在保证他们部分利益的同时支持国家的发展,这在后来的德国、日本是很明显的。第二条是革命的办法,当很难与地主集团达成妥协时,只能去推翻它,这很明显是前苏联的做法,也是后来中国的道路。无论是哪一种都需要一个很强的国家,这就涉及到刚才的问题,国家怎么能够强大?

如果国家的组成人员都是理性人,也就是说,国家主要是由自利的政客掌控,它怎么能够使国家全面推动工业化?这就需要从国家-社会的层次上升到国际体系的层次,这也是格尔申克隆的理论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说国家由自利的人掌控,那在什么情况下国家才能有发展的动力呢?在经济学里我们要解决一个集体行动的问题,一班自利的政客他们怎么能集中在一起有一个发展的意愿,并且能够保证执行,这也是解决国家怎么能够凝聚在一起推动发展的问题。学术界里经常在国际层面上思考这个问题。个人在什么条件下会暂时放下自己的利益去追求国家的发展呢?经验发现,当整个国家面临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时最容易做到这一点。当国际层面上的竞争甚至战争不仅威胁国家的安全还威胁这些政客自身的安全时,一部分政客能先把自己利益放置一边,团结起来面对威胁。所以说,国家能够有自主性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种国际环境并不是那么多,而且战争威胁也可能不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同时,从自主性转向发展也是一个过程。国家面临外部威胁时,可以去增强军事实力也可以去寻找同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选择工业化呢?如果威胁只是短期的,可能根本不会去考虑工业化,只有在一个持续威胁和竞争的环境中,甚至搜刮民众增强军事实力或者寻找外部同盟都不足以应付时,才会考虑工业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在一个适当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可以把国家的政客团结在一起,运用国家的组织力量推动发展。当国家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有自主性的实体时,国内的任何利益集团都难以撼动它。所以,只有国家在解决了它能有持续发展的意愿、作为实体有强大凝聚力的问题后,才能面对地主集团的挑战,无论通过改革还是革命的办法完成对地主集团的控制,然后才能涉及发展的问题。我下面将通过以下几个案例来具体阐释这一过程。

首先我来谈美国。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移民国家没有强大的地主集团,可以很容易地开拓市场的发展,这是移民国家非常有利的方面。但移民国家的问题是,它在一开始可能很容易进入市场化,但这不一定就能保证工业化的持续发展,从市场化向工业化还要经历一个台阶,美国的例子很明显。从19世纪初期开始,随着大西洋两岸交通的不断加强,欧洲对粮食、棉花等初级产品的需求很高,美国逐渐成了为欧洲提供粮食、棉花等初级产品的地方,所以在美国南部形成了大庄园经济。大庄园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到世界市场上去卖,所以美国一开始就走上了以国际市场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但这个发展道路能不能直接引发工业化呢?很难讲。开始时,市场化可能会带动工业化的发展,这个带动既是需求层面上的也是供给层面上的。在需求层面上,粮食生产的规模越大,对农具的需求越多,而农具的生产又能带动其他行业的发展。到19世纪70年代,大约四分之一的农具已在美国本土生产了,农具的发展又带动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供给层面上,粮食产量的增加不仅引起国际市场上供应增多,也带动了国内工业的发展。从1850—1880年的30年间美国最大的工业是磨粉业,对粮食



产品的加工促进了工业的发展。但再进一步,重工业的发展就遇到了瓶颈。在先发展的英国的冲击下,美国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就需要关税的保护。如果国内完全是市场起作用,那国内消费者肯定会买质优价廉的英国产品,所以美国必须先把自己的那些劣质的产品保护起来,通过国内市场培植自己弱小的重工业的发展。等到发展壮大后,就可以打开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去竞争。这就是为什么从1820年开始美国工业品的平均关税就到了百分之四十,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而且1820年以后就再没有降低过,直到一战以后,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非常强大了,美国对工业品的保护水平才低于另一个国家前苏联。所以说,美国一直是按照保护工业品的方式来发展的。但问题在于,从种植业到工业的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于美国的庄园主而言,只有便宜的农具和工业品才能保证农产品价格低,才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如果提高关税保护工业品,那么粮食成本就高了。所以美国的关税政策受到了种植园主的直接挑战,这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爆发南北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19世纪60年代的这场内战的胜利者是北方工业主,他们胜利后美国的工业才能持续发展下去。一个反面的例子是拉美国家,它们同是移民国家,但从来都没有这样一场重工业的決定性的胜利,因为种植园主的实力太大了。所以即使是移民国家也面临着发展的问题,它可能不是面临着地主集团的挑战,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封建势力的束缚,它们能在一开始就有出口导向性的市场发展,但当市场化水平到了一个程度后,就面临产品升级的问题。当收入水平高了,初级产品的成本就增加了,那些比你穷的国家就会比你有优势,因为他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从农产品到工业品,从初级产品到重工业产品,这在经济学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但在政治经济学里却是一个血淋淋的过程。原因在于每一部分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种植园主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抛开他们习以为常的生产方式,那么它的选择只能是动员自己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是很合理的。为什么拉美国家的大庄园主一般会选择生两个儿子呢?一个儿子继承自己的大



庄园,另一个儿子送到政府里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拉美是很受欢迎的,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与马克思的观点有很一致的地方,种植园主作为一个集团、一股政治力量能够控制政府,使其对自己的生产方式采取保护措施。而美国通过一场内战解决了产品升级的问题,从而成为了世界的经济强国。

然后我们回到原住民国家,在格尔申克隆的观点里,德国是一个以银行发展为主的典型,通过银行调控资源,使工业迅速发展了起来。格尔申克隆没有深入分析的是,在银行背后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容克地主集团的一个妥协。1871—1890年俾斯麦当政时把德国建设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调和重工业和容克地主集团之间的矛盾,在保证容克地主一部分利益的同时,让他们为现代化出力。德国工业化的基础最早是依靠容克地主集团卖粮食赚取外汇来支撑的。为什么会在德国出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妥协呢,这也涉及我刚才所说的国际层面上的因素。德国之前的普鲁士一直处于军事竞争的环境之中,一直处于欧洲四面八方敌人的围攻中。1740年,在一个非战争的和平时期的柏林,其居民中有五分之一是军人,可见欧洲腹地的地缘政治因素对德国的影响。19世纪初期,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普鲁士军队被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拿破仑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在此失败后,普鲁士进行了三次大的社会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原因就在于在这样一个长期的竞争环境中,不进则退。无论是德国的国家、德国的工业集团还是德国的容克地主集团,都愿意达成一个妥协,谁也不能离开谁,如果有一方不合作,德国在这样一个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就很难立足。实际上,德国的发展动力来源于国际环境的压力。

另外一个就是俄国—前苏联。俄国在19世纪是一个强国,但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它有多么高的发展水平,而是由于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俄国之所以列入列强就在于它的规模。俄国在一战中被极大削弱,并引发了国内的革命,建立了苏维埃俄国。1918年到1920年的内战消耗掉了沙俄原有的工业基础,苏俄又在世界上完全处于孤立的状态,它的



发展基本没有外援、外资、外贸、外债来帮助,只能靠自己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列宁去世、斯大林和布哈林联手打败托洛茨基之后,爆发了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俄国前途上的重大争论的原因。布哈林主张一种缓进的办法发展,不能完全把农业挤压死。斯大林主张挤压农业,把农业剩余投到工业中去,同时工业要形成一种垄断,通过这样的方法来支持工业的发展。这里的原因还要归结于苏俄最初的内忧外患和外部威胁。列宁曾说,帝国主义战争告诉我们,和平只是战争之间的一个喘息机会,可见当时的苏俄领导人是怎样看待外部世界的。斯大林在 1931 年曾说:我们苏联的发展比西方大概晚 50 到 100 年,如果我们不用 10 年时间追上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灭亡。果然在 10 年以后德国进攻苏联,几乎要灭掉苏联,之所以挺了过来,就在于斯大林在这 10 年中采取了建立在挤压农业基础上的快速工业化措施。1928 年时苏联国民生产总量排世界第五,到了 1938 年时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二了。如果没有这 10 年的工业基础,那可能苏联就会全被德国灭亡了。这突出了一点,即苏联的快速工业化动因在于国际军事竞争环境。所谓的“中央计划型经济”也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不得不采取的举措,只不过后来被制度化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蜂拥地去学习。因为有这个国际层面的压力,它便把国家的各个集团凝聚起来,使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和关注自己利益的人先暂时放弃自己的政见,暂时放弃自己的利益,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个必须要发展、必须要工业化的过程。把这个拿出来和格尔申克隆的理论相比,格尔申克隆的理论仍然是基础,国家仍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的分析,国家首先要凝聚在一起才能进一步提出发展的问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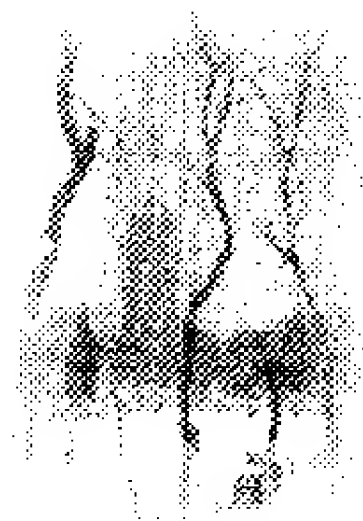
下面我就不去进一步分析东亚奇迹了,我可能在其他讲座中去谈。无论日本明治维新还是韩国 60 年代朴正熙执政,都是一个外部的持续威胁的环境使国家变得很强大,使国家必须工业化才能抵御这样的威胁,然后才去工业化。当然,以上这些我举的例子中没有反例,没有那种即使没有外部威胁也能工业化的例子,这和我讲座的时间有关系,更



有关系的是格尔申克隆的分析主要也是建立在正面的例子上的,所以我也只是建立在正面的例子上。

最后是总结。从国际环境、从国家与世界关系的角度来看发展的问题,首先要解决政客官僚的集体行动的问题,之后才能谈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持续发展的意愿。发展意愿是一个根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国家都不能首先被假设是要促进发展的,这与事实不符,也与逻辑不符。国家是由理性的人组成的,理性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利益,不解决理性人凝聚在一起产生发展意愿的问题就没法谈发展,后发展的障碍首先是社会力量,格尔申克隆没有对社会力量给以关注。其次是国家怎么塑造发展取向的问题,我讲了国际环境,这一点我比较关注。那么是不是还有别的因素呢?肯定有。可能不同的文化对国家的凝聚力也不一样,一个政府官员比较注重为国效力的文化可能就以商业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更容易产生有凝聚力的国家。但关键还在于怎样把理性人聚集在一起形成国家发展的意愿。从这个角度讲,我回到我之前提出的问题,我提出的问题不是怎么发展的问题,而是为什么不发展的问题。第一,难在社会阻力的问题,仍然有一部分人在阻碍后发展国家的发展。第二,难在国家往往没有持续的发展意愿,这就是关键。所以我和格尔申克隆不同,我不认为发展是一个正常的事情,我认为发展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事情。发展需要的条件太多了,发展要克服社会阻力,发展要保证国家的自主性,这两点都很难达到。

最后我要谈一下中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前苏联是很相似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也是内忧外患,所以塑造出一批精英思考中国的前途,最终在1949年通过革命的办法把地主集团清除掉了。但有一个问题是,中国顺手把市场也给清除掉了,这其实是矫枉过正了。前苏联之所以在短短的10年中从世界第五变成世界第二,是因为它对资源的强大动员力,使工业在短时间里爆炸性增长。但是过于强调动员而放弃市场就产生了问题,前苏联在长期发展上不行。从70年代看,前苏联与美国的经济上的竞争就结束了,原因在于由于没有市场的竞争,前苏联不



能推陈出新了。可见,后发展是一个资源集中和市场效率的平衡,完全的资源集中从长期看是不利的,完全的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没法起步。中国清除了地主集团的阻力,但由于同时清除了市场的竞争,所以从长期讲中国的发展是停滞的。直到 1979 年中国打开市场,才有现在的中国奇迹。我是到处都说中国好话的人,原因并不是我爱国而说好话,而是我做了比较,也通过去其他地方,如埃及、肯尼亚等,更清楚什么叫做奇迹,中国就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原因在哪里呢?很多人说原因在于我们 1979 年打开了市场。不完全是。打开市场是矫枉过正后再回来,那一步是对的,但更关键的原因在于 1949 年清除了地主集团。何以见得这是最关键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没法发展,还是在于地主集团及其他对工业化阻碍的集团的长期存在,他们往往还同时控制着国家机器。人们都说中国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中国肯定有许多问题,但你到肯尼亚去看看,肯尼亚的问题肯定要比中国严重十几倍。中国之所以能够发展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国经历了强国家利益击败对工业化阻碍力量的过程,这是大部分国家很难达到的。中国是个奇迹,我们生活其中要细细地体会,这样的奇迹在历史上是太少了。欧洲的崛起是一个奇迹,之后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再以后可能就是东亚的奇迹了。

(2004 年 11 月 26 日)



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

■周志忍

周志忍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管研究生教学。

周志忍教授的学科专长是行政管理学、公共管理学、中国政府与政治,他早年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绩效管理,近年来着力研究公共部门的改革和民营化,担任多门本硕博主干课程的讲授,多次到国外多所知名大学交流访问,编撰了多本学术著作,并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

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的主题是公共部门绩效管理,是发达国家目前正在实施的一种政府管理的机制和措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讲座主要是演示,客观介绍发达国家绩效管理的具体做法。我知道大家更喜欢听政府管理新理念、新模式和宏观战略层面的东西,但操作层面的东西同等重要。首先,了解操作层面有助于对新理念和新模式的把握和理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新愿景、新模式等国内外学者有系统的论述,但面对五光十色的“新理念”万花筒,人们难免产生一种困惑:许多行政学早期文献中频繁出现的提法和概念如民主、参与、市场机制等,怎么就成了当代政府管理的全新理念?在我看来,许多政府管理的新理念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然而,正是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新背景下的特殊体现方式,赋予这些似曾相识的“老”概念和提法以新的内涵,使之



成为“新”的理念。因此,理解和领悟当代政府管理的新理念,必须把这些概念和提法置于独特的历史背景中,必须深入了解新理念在政府改革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方式。其次,操作层面的技术有助于理念的落实。任何管理理念必须有相应技术的支持才能付诸实践。举例来说,没有合同外包、市场检验、凭单制、BOT 等具体形式,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就无法落实;没有科学的绩效评估,结果导向就会流于空谈;没有公民需求的科学分析和顾客满意度调查,“以公民为中心”或“顾客为本”只能是空洞的口号。

今天讲几个基础的问题:政府绩效与绩效管理,就是一些基本概念、概况和背景;战略规划;年度绩效计划;绩效评估、报告和信息利用。

政府绩效与绩效管理

依次讲四个问题:政府绩效的含义与层次;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框架;绩效管理在政府改革中的地位;发达国家绩效管理在实践中的特点。

政府绩效就是政府管理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或产生的社会效果。政府绩效是分层次的:宏观、中观、微观。今天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微观层次的政府绩效。从微观层次来讲,政府绩效表现为三大方面:经济、效率、效益,其中效益包括质量、社会效果、公民满意等内容。

在美国总审计署(现更名为“政府责任办公室”)看来,绩效管理是由相互联系的三大环节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一是确定使命和所期望的结果;二是设计绩效测度和制订年度绩效计划;三是绩效评估、报告和利用相关信息来改善政府绩效。可以说,绩效管理是由不同的环节和要素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目的在于提高政府绩效。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组织,绩效管理的环节和要素是不同的。从展示的两个框架图中可以看出,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政府绩效管理的过程与环节和联邦政府就不一样。



当代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广泛而激进。就改革的内容而言,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调整或卸载(off-loading),就是把政府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放手给市场和社会处理,主要涉及政府角色和职能的重新定位;其次是对政府“份内职责”的管理和改革。这涉及到三个方面:组织结构变革、政策变革和管理变革。发达国家的政府机构基本上是稳定的,改革侧重于管理层面的流程和技术,与我国的行政改革侧重于机构调整不同。政策改革当然重要,但主要涉及高层决策者,多数机构的改革还是集中在管理变革的层面。此外,强化管理有一系列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包括《首席财务官法》、《政府绩效与结果法》,联邦政府设立“以绩效为基础的组织”(performance-based organization),以及设立“总统管理委员会”等。可以说,管理层面的改革是当代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侧重点,绩效管理是管理改革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发达国家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特征可以归结为四点:法制化、规范化、有效的交流合作机制、广泛的社会参与机制。这里无法展开讨论,仅谈法制化。我想强调的是,仅有法规的存在并不能保证法制化的实现,法律要相当的具具体,还要有一系列制度安排来保证法律的落实。以美国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为例,它的特色在于相当具体:明确提出了立法针对的三大问题,追求的六个目标,规定了部门战略规划、年度计划、绩效报告的主要内容。此外,该法律还对监督主体、试点选择的原则、试点评估的时间等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至于实施法规的组织制度保障,包括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负责技术指导,总审计署(GAO)代表国会对各部门的绩效管理进行审查,国会根据各部门的绩效报告和年度计划批准预算,如此等等。

绩效战略规划

规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有句格言叫“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美国人更进一步,“疏于规划无异于在规划着失败”。



绩效规划有两类,战略规划和年度计划。按照《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战略规划须有四个要素:系统的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目标体系的确定、手段与策略表述、外部因素和内部风险分析。

在绩效管理中,“使命”指组织肩负的历史责任或追求实现的终极目标,它是组织存在的根本理由。使命当然以组织职责为基础,但又有所不同:职责主要回答管什么,使命则关注履行职责要达到的目的,即部门管理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使命陈述一般比较简单和笼统,比如说美国空军《20年战略规划》中的使命陈述是“通过对天空和外空的控制和探索来保卫美国”;又如美国商务部的使命陈述。使命虽然笼统,但非常重要:第一,反映了一种理念的变化。传统的部门职责定位模式往往是“依据XX法律,行使XX权力,管理XX职能领域”。使命陈述显然进了一步:授权机关或公民会从中“得到什么”。换言之,传统做法满足于明确部门的“权力”和“地盘”(职责领域),新理念则突出义务、责任和追求的最终目标,其核心是摆正政府部门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位置。第二,使命是绩效管理其他环节的依据和基础。

使命明确后,下一步是目标体系的确定。首先是目标的层级体系,实践中一般分为三个层次:战略目标(strategic goals)、总目标(general goals)、绩效目标(performance objective)。我们来看美国交通部的目标体系,它有5个战略目标:“更安全的交通、更便捷的交通、全球链接、环境指导、创造卓越(交通部要在内部管理方面成为典范)”。“更安全的交通”再划分为五个总目标:

- 高速公路安全目标——2008年以前,高速公路事故死亡率降低到亿分之一(车辆平均行驶每1亿英里发生事故死亡1人次),大型货运卡车重大事故死亡率降低到亿分之一点六五。
- 航空运输安全目标——2008年以前,商业航空运输重大事故率降低到百万分之零点一(每百万次起落发生重大事故零点一次),重大事故降低到每年325次以下。



- 铁路运输安全目标——2008 年以前,铁路运输事故和意外中断率降低到每百万英里 16.14。
- 市内交通安全目标——2008 年以前,市内交通安全事故死亡率降低到亿分之零点四八八(乘客平均乘坐 1 亿英里发生事故死亡 0.488 人次)。
- 管道运输安全目标——2008 年以前,天然气和有害液体运输管道的总事故数降低到每年 307 次。

其次是目标的表述方式。战略目标可以笼统,但总目标和绩效目标应该具体。按照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要求,这些目标可以有三种表述方式:定量目标(如“到 2010 年,70% 的美国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可直接测定的目标即项目目标(如“2005 年底以前完成马的基因测序工程”);以评估为基础(assessment-based)的目标。(如“到 9 年级时,参加过政府举办的学前教育项目的儿童,其教育水平应至少达到其他同龄儿童的水平”)。

第三,目标设定应遵循的原则,包括公民为本、结果导向、广泛参与等。以“结果导向”为例,评价部门绩效的重点不是投入,也不是过程,而是给社会带来的客观效果。比方对警察治安管理的评价,作为老百姓,我不关心你花费了多少财政资源,投入了多少警力,举办了多少次活动,我关注的是我家窗外要不要安装防盗栏。换言之,特定小区窗外的防盗栏安装到几层,就是一个结果导向的绩效指标,就是一种对警察治安管理绩效的客观评价。

战略规划的第三个要素是“手段和策略描述”。按照预算和管理办公室的说法,“策略”指“项目、政策、管理等方面的重大革新创意”。“手段”可以简单理解为“所掌握的资源,包括财政、人力、信息等资源”。手段和策略描述的核心是“调协”(alignment),即根据目标实现的需要进行策略创新并合理利用资源,从而确保目标的实现。调协包括策略和目标的调协以及手段和目标的调协。关于策略与目标的调协,这里举



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例子。从 1979 年成立到 90 年代初,该局的工作备受责难。1993 年,该局确定了自己的使命,即“减少与灾难相关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随之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审查,提出了“整体灾害观”的概念,明确了工作的四个环节,即灾害缓解、防灾准备、紧急反应、灾后重建。在此基础上,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前两个环节并为此进行了组织结构和 workflows 的调整,同时与地方建筑业和保险业建立了“伙伴关系”。策略与目标的调协促进了组织使命的实现。“手段”和目标的调协涉及财、人、信息等多种资源的合理配置,这里仅举商务部的例子,即“分目标预算编制”。

第四个要素是“外部因素和风险分析”。在规划覆盖的期限之内,有一些条件 and 环境因素会对总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条件 and 环境因素就是“外部因素”,其变化往往超出了部门的控制。影响目标实现的还有组织内部因素,如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变化等,这些因素被称为“内部风险”。外部因素描述的内容有三项:确认并界定各个关键因素;说明因素和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描述特定目标怎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下面给一个案例,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战略规划中的外部因素分类:国外经济市场绩效、国外政治环境、国内政治经济环境、资源保证。在年度绩效计划中,这些都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对于内部风险分析,除了上述三方面的要求外,还要说明化解内部风险的具体措施。原因也简单,内部风险是组织可以控制的因素。

最后简单勾画战略规划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明确使命(天职)是前提,使命的具体化形成目标体系,其他两个要素(手段和策略描述、外部因素和风险分析)则是目标实现的保证。作为法定要求,有助于部门思考并创新。

年度绩效计划

年度绩效计划的一些要素跟战略规划阶段相同,都要有目标体系,



都要有外部因素和风险分析;都要有策略和手段描述,但要求的具体性不一样。为避免细节和重复,这里主要讲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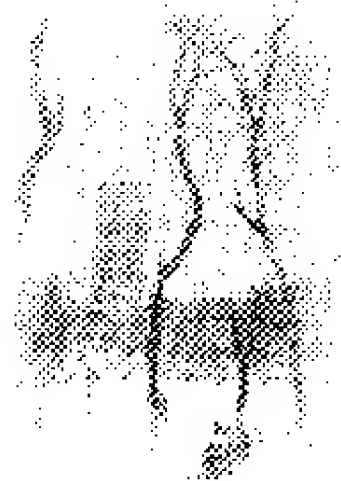
第一是目标体系的确立和目标分解。战略规划一般覆盖三到五年,目标有的还比较笼统,而且都属于跨年度目标。年度绩效计划中目标的具体化相应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年度目标具体化为年度目标,二是年度目标要设立相应的测度体系(衡量目标实现程度的尺度)。下面以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局 2001 年绩效计划为例,展示绩效目标、绩效测度和绩效指标:

绩效目标	绩效测度	绩效指标
为美国公司创造更多的贸易机会	A. ITA 帮助下得以实现的出口交易数	36,949
	B. ITA 帮助下企业获得的首次顾客数	76,241
	C. 第一次从事出口的美国企业数	66,187
	D. 贸易促进活动实现的出口总值	74 亿
	E. 打开的出口市场的潜在值	24 亿
	F. 美国主要产品出口百分比的变化	

目标体系确定以后,还有一个目标分解的问题。分解的核心是多样化的目标跟多样化的主体匹配,不同层次目标跟不同层次的主体、不同类型的目标跟不同类型的主体相匹配,从而保证每一个目标都有相应的主体负责,每一个主体都为目标的实现有所贡献。

第二是跨部门合作机制的确立。这一点对我们国家而言非常必要。我国跨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还比较差。现在总说地方政府有三本账,如果想从国家扶贫基金要一笔钱来,可以提供一本账,说这里怎么穷怎么差;如果要向组织部汇报政绩,又有另外一本账,说今年增长率和经济实力又提高了多少等等。其实解决这一问题并不难,相关部门信息一交流就可以了。但这一简单的要求多年来没有实现。

按照美国总审计署的规定,跨部门合作机制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1)跨部门关系的确认。也就是特定目标的实现需要哪些部门的合作?哪些目标是共同性的目标?相关机构各自对目标的贡献是什么?



(2)明确领导协调机制,即涉及几个单位时明确“牵头机构”,避免平等伙伴之间合作失灵。(3)信息共享机制,包括部门之间在基本概念界定、数据统计方法、信息解释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利交流、比较和标杆管理,也包括跨部门信息交流和共享的技术安排。(4)跨部门合作的激励机制,即用什么措施鼓励部门之间展开合作。

第三个要素是“信息核实和效度确认”。说白了,计划阶段就要明确制度和措施,避免数字失实甚至弄虚作假。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就此提出了三方面的具体要求:(1)数据来源方面的信息;(2)提高绩效信息完整性和可靠性的措施;(3)信息和数据局限性说明。从展示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每个绩效目都有相应的几个测度,每个测度都要明确“信息核实和效度确认”的方式。

第四是绩效协议。了解目标管理的都熟悉绩效协议的基本内容,所以我重点讲绩效协议确定时的原则。我们国家目前在实行目标管理,目标责任制、岗位责任制等,但我们在理念上还有相当的差距。需要强调的第一个理念是“以共识为基础”(consensus-based),强调绩效协议是平等协商的结果,而不是上级单方面强加给下级的,也不是下级对上级的单向承诺,也就是讨价还价是可以的。新西兰的协议称为“购买协议”(purchase agreement),就是突出这一点。第二个理念是契约精神。绩效协议是一种契约,契约当然应具有双向约束力,不仅仅是对下级的约束(如果没有实现目标,下级就要挨板子),对上级也有约束——如果因为不当的干预,或没有提供足够的资源,那没有完成目标首先是上级的问题。我看过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与下属各局长签的协议,局长的目标很细,最后州长也承诺了5条。这协议出来了,到最后没有实现,很容易明确到底是谁的责任。

绩效报告与信息利用

讲三个问题:绩效状况的监测和反馈;年度绩效报告的内容和要



求;绩效信息的利用。

绩效状况监测和反馈的方法和技术很多,这里仅介绍一下小布什的“记分卡”。小布什上台不久推出了“总统管理议程”,提出了五项改革战略: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竞争性外源采购、绩效与预算的整合、改善财务绩效、发展电子政务等。相随的是引进“记分卡”技术,监测各部在各领域的进展状况,每一季度公布一次。图中展示的是2002年第四季度的记分卡,14个部各自的进展一目了然。其中绿色表示合格,红色表示不达标,黄色介于两者之间。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记分卡的划分标准。我们以“竞争性外源采购”为例。竞争性外源采购就是合同外包,通过公私之间的竞争提高绩效。根据有关法规,政府各部门都要提供所有活动的清单,在此基础上,主管部门根据一定标准把这些活动分为“核心业务”和“商务活动”两大类。比如说中央情报局,收集情报等属于它的“核心业务”,机关内部的餐饮服务就属于“商务性活动”,可以由市场主体来提供。商务性活动总量用“全日制雇员折合数”计算,合格的标准是50%以上的商务活动实现了合同外包。从图中可以看出,当时没有一个部达标。

下面简单讲一下年度绩效报告。根据有关法规,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绩效水平展示和未尽目标的原因解释。由于绩效目标比较多,每个目标又有多个衡量尺度(测度),所以绩效报告都比较冗长,商务部的报告达500多页。简单说,绩效水平展示主要通过比较的方式,包括实际绩效水平与年度目标的比较;部门绩效水平的纵向比较(一般是连续四年的绩效数据);对地方政府来说,由于许多部门履行相同的职责,还有一个绩效水平的横向比较。

展示了以后还会有问题:如果一些目标没有实现,还需要向老百姓交代,向国会交代,这就涉及解释。问责的本意是政府对公民负责,未尽目标的原因解释就成为部门义务。根据管理预算办公室的要求,解释分为两类:一个叫“一般性解释”,一个叫“具体解释”。一般性解释比较简单,可以覆盖几个未尽目标,适用于实际绩效与目标相差不大,不



会对战略目标带来大的影响的情况。具体解释比较详细,而且只能针对单个未尽目标。至于什么情况下可以提供一般性解释,什么情况下需要具体解释,有关部门规定了明确、详细的标准。

至于绩效信息的利用,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是绩效奖惩。学界对此有争论,认为是“粗俗的泰勒主义”。不论学界怎么看,实践中物质奖励依然是绩效信息利用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发展趋势是,加大奖惩力度,完善奖惩机制。加大奖惩力度首先是拉开基本工资档次,比如英国高级文官同级的工资额相差一倍;其次是提高奖金额度,由工资总额的 15% 提高到 20%。完善奖惩机制则包括明确奖励幅度确定的标准,拉开组织之间的奖励水平,个人绩效奖惩与组织整体绩效的挂钩等等。第二是“责任与灵活性交易”(flexibility in return for accountability),或者说以责任来换取灵活性。如果组织绩效好,它在管理过程中享受的自主权就大,受到的监测、控制就少。这是目前绩效信息利用中比较多的做法。英国的说法是“赢得的自主权”(earned autonomy)。第三是“诊断与指导”。最初主要是排行榜,以此来形成社会压力迫使部门改进。这种策略西方归结为“fame or shame”策略:要么荣光,要么现丑。后来发现存在很多问题。现在主要是建设性策略,即帮助诊断问题、提供建议、解决问题。也有人把它叫做绩效评估的“三 D 模式”:诊断(diagnosis);发展(development);设计(design),即帮助你设计改进方案。最后一条是“绩效预算”。它的基本理念其实很简单,就是根据绩效来拨预算,或者说预算与绩效结果挂钩。但绩效预算设计技术复杂,美国从克林顿时期开始尝试,至今还没有成形。

需要强调一点,以上几条讲的只是外部机构怎样利用绩效信息,绩效信息利用最多的还是部门自身,利用方式主要是做下一年的绩效计划,包括预算申请的论证、内部资源配置、政策或项目调整、绩效目标的调整、手段与策略的改进、人力资源发展计划等等。从这可以看出,绩效评估和信息利用意味着新的绩效管理周期的开始。所以说绩效管理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绩效管理与我们政府管理的现代化

这实际上是结合我国的情况谈几点感想。

首先,充分认识管理的重要性。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重点在管理层面,我们国家多次改革基本上集中在机构精简上,对撤并完了后怎么管理比较忽视。我一直讲,机构结构和管理不是一回事:一个是舞台,一个类似演出。机构改革做得好最多也只是改善舞台条件,戏唱得好坏取决于平时的管理。我们的改革目标很明确,“精干高效、行为规范、运转协调”,这些显然都是管理目标,主要通过管理来实现。

其次,管理要关注制度细节。俗话说,“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当然“天使也存在于细节之中”。小的疏忽会导致大的损失。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我看来,外国人在管理细节上比我们还认真。从上面谈到的竞争性外源采购可以看出,政策出台后伴随的是部门活动清单、活动类型划分和总量计算、商务活动合同外包的比例要求、记分卡的持续监测和督促等。其实,关注细节,就会想到一些解决的办法。中国人喜欢号召,但在细节上动脑筋少一些。比如应对野蛮装卸,我们经常见的是冰箱外包装上“严禁倒置”几个大字,运输过程是否倒置过谁知道?美国人的设计就很简单,一个沙漏装到外包装上,如果货物的倾斜超过了许可标准,沙子就会往上走,而且怎么弄都回不来。每一装卸环节交接之前检查沙子是否有漏,问题和责任就一目了然。

最后对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说几句。我们国家也搞了一些目标责任管理、绩效评估等,我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第一,理念比较落后,怎样充分体现公民为本、结果导向等需要思考。第二,我们许多岗位责任书简直就是“军令状”,缺乏平等协商和契约精神。最值得注意的是评估结果的利用,长期不搞绩效评估,一评就搞末位淘汰、一票否决等,貌似激进,其实根本不科学。急于求成压力过大,往往导致

假报告、假数据的出现。甘肃省几个缉毒警察为摆脱末位排名,竟然设套陷害百姓,致使三人被判死刑的案例,更向我们敲了警钟。政府管理要创新,创新需要脚踏实地,不能着眼于轰动效应。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2004年12月15日)



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

——这是一个问题

■ 余 斌

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

余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94年至2000年,在厦门大学学习,先后获理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返回北京大学,在光华管理学院做博士后,出站后进入政府管理学院任教,2001年曾作为访问学者赴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经济系调研。现已出版《微观经济学批判》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等两部专著,发表《股份合作制及其制度设计》、《生产函数的统计学问题——与西方生产函数论商榷》等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各位同学和来宾:

大家晚上好!

回北大已经四年了,今天是我在这里的第一场讲座——当然,这个第一场指的是对北大同学的讲座。我曾给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的学生做过讲座,去年与北京大学博士生考察服务团去河南省考察时,给当地的政府官员也做过讲座。以前我在厦门大学读研究生时,有了新的想法就会做个讲座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师兄说,我是厦门大学做讲座最多的学生。



那么,为什么回北大四年了,今天才做第一场讲座呢?主要因为北大是我的母校,是我心中世界一流的大学。因此我在北大做讲座,就力求讲得最好。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并非所有的讲座都是好的,但我觉得,如果没有里程碑式的成果,还是不讲为好。这也是我回北大四年来,讲了不少课,但在讲座方面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记得当年考上北大概率统计系的时候,一位中学同学告诉我,我们中学的化学老师听说我考上北大后,说北大赚了。这话当时令我非常惊讶。北大是百年名校——当然是指现在了,1986年我上北大的时候,校史还不到90周年——而且对中国贡献极大,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毕业生,高考总分也不是全省的前10名,我的化学老师怎么能够如此评价我呢?“今天你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你为荣”,这句话如今已经说得比较滥了,但当时没有流行,现在想来,我的化学老师是提前说出了“明天北大会以我为荣”的话。当时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压力很大,直到今天,我都没敢回去见我的化学老师。

但是如果以后有机会再回武汉的话,我就可以带着我的两本书——一本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改写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一本是我今天带来的《微观经济学批判》——去见我的这位老师了,这也是我今天终于可以在这里做讲座的原因。虽然,我今天的成绩还没有被社会和学界充分肯定,但我自己很清楚,在中国经济科学的历史上是不会少了我的;就好像诺贝尔奖的得主,他对自己的肯定,不是在得奖的时候,而是在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拿出后来得奖的成果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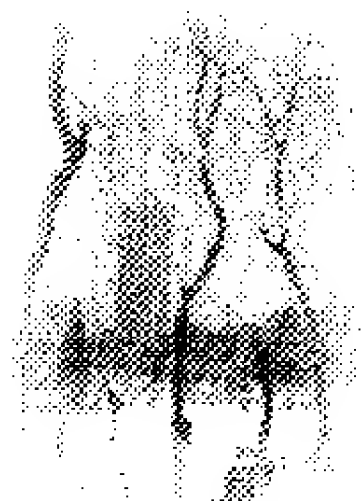
我能够写出这本《微观经济学批判》,取得今天的成绩,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大学本科是学概率统计的。毕业的时候,我就相信会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做出一些成绩,但没有想到自己会搞经济学的研究。我一直认为,财富是生产出来的,而经济学不过是解决财富的分配问题的。没有生产,哪来分配?因此我一直对生产过程



更感兴趣,而对后来逐步热门的经济学兴趣不大。所以考研的时候,我仍然选择了概率统计这个专业,但不是在北京大学,而是在厦门大学,因为我现在的爱人当时在厦门。

没想到的是,我的数学系硕士导师对信息论和信息经济学的问题一直都比较感兴趣。有一天,他拿了一篇英文文献找我和我师弟,让我们看一看。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思·阿罗的一篇 1971 年的文章,其中提到信息的需求价格的求解问题。我的导师说,这个问题在文章中未能得到解决,而他从 1988 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检索了大量文献,直到他把文献拿给我们看的 1996 年,跟踪了 8 年时间,也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我们当时的学习方式是,每周我和我师弟轮流汇报交流一篇英文的专业文献的学习和研究体会。这篇文章是我师弟先看的,等到两周后由我来汇报时,我把这个拖了 25 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解决,让我感到,原来西方的经济学大师的数学水平不过如此。在数学领域我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但如果转入经济学界,我至少可以与这些大师们平起平坐,无需仰视他们。恰好这时有个机会,我就转行成为了金融学专业的博士生。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上取得成果的偶然性。

但为什么说又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我当年上北大的时候,北大的校训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而北大人为人所诟病的地方之一是只喜欢批判。其实,只要你照着北大的校训去做,能够做到或接近做到“严谨”和“求实”,自然就会发现别人的不严谨和不求实之处,自然就会具有批判精神,而有了批判精神,要创新也就不难了,因为批判者已经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了。这样说来,一个严谨求实的北大人想要不取得成绩也是很困难的。有个统计学家曾经跟我说,你写那两本书会得罪人的,在经济学界会干不下去的。我说,那我就跟你搞统计好了,而且我还可以搞医学,在其他领域,我也不是不能取得突出成绩的,这是必然的。



我今天讲座的主题是,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这是一个问题。这是套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主题,还是从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讲起。

由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专业都不是经济学,我感到自己的底子比较薄,所以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一方面补一些硕士阶段的核心课程,强化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另一方面,我决定看一看马克思的《资本论》。我的导师知道我看《资本论》时,对我说它早就过时了,要我跟踪阅读最新的西方经济学文献。但我从25年前那个问题的解决上看到,西方经济学一些早期的东西并未得到解决,如果基础不牢,楼盖得再高,也会轰然倒塌。于是,我还是坚持把《资本论》三卷看了一遍,结果发现,西方经济学里非常推崇的东西,早就被马克思批得体无完肤了。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西方经济学就已经过时了,而现在它不过借助了一下数学的包装,就又显得像新的一样。这样的包装,让学数学出身的我感到十分亲切,而且也正是因为经济学中用了大量的数学,才使得我的博士生导师考虑招我这样数学基础比较好的学生来捧金融学的饭碗,但是,在数学基本功比较扎实的我面前,这些包装就像皇帝的新衣一般。

但是,既然导师不是很喜欢《资本论》的主张,我也不想发生正面冲突。我就考虑选一个避开意识形态的选题来做博士论文,以免被迫批判西方经济学浓烈的意识形态。当时,我接触了一个称为资本结构无关论的理论。这个理论以两个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提出者莫迪格利安尼和米勒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称为MM理论,是财务管理和金融学必讲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大意是,企业的价值是由其经营收入决定的,而与其资本结构即负债率无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打过一个比喻:“按照莫迪利安尼-米勒的意思,我们可以把厂商比作一个馅饼,债券持有者和股票持有者得到不同大小的馅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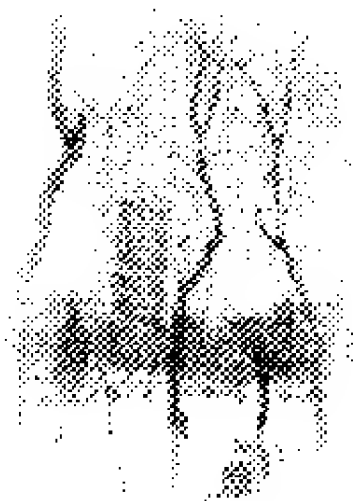


块;但是整个馅饼的大小,也就是厂商的实际价值,却完全不会受到馅饼分割方式的影响。公司的融资结构只影响由谁获得公司赚得的美元,即这个利润馅饼如何被分割以及谁承担厂商的风险,仅此而已。”

因为与当时认为资本结构与企业的市场价值之间存在一定内在关系的传统观念大相径庭,这个理论一提出来,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在近三十年的争论后,这一理论开始盛行于西方财务学界,并逐渐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主流地位,被视为现代理财理论的奠基之作。然而如果我们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与人们的实践不符合,不能为人们的实践所证实或部分证实的理论就是不正确的。尽管 MM 理论早已为西方学术界所公认,并在课堂上广为传授,但当初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即该理论与人们的现实感受相距甚远的事实,却并没有被消除。

我一接触这个理论就觉得有些别扭。在我看来,尽管馅饼块看上去都一样,但利润看上去却不那么一样:同样是厂商赚得的美元,有的美元上附带着风险,有的则没有或附带的风险少一些。因此,这些美元是不同的,所以馅饼的比喻其实并不合适。我后来想到可以用部分拌有辣椒油的饭团来比喻。其中,辣椒油代表风险,怕吃辣的人代表厌恶风险的债券持有者,喜吃辣的人代表愿意承担风险以期获得高收益的股票持有者。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合适,怕吃辣的人吃到未拌有辣椒油的部分,而喜吃辣的人吃到拌有辣椒油的部分,则皆大欢喜,所有的饭团将被消费掉。但是,如果饭团的分配方式不合适,怕吃辣的人所分配到的饭团中混有拌有辣椒油的部分饭团,那么,怕吃辣的人会剔除掉这些饭团,从而最终实际消费掉的饭团数量要比前一种情形来得少。因此,饭团的分配方式与实际的饭团消费量有直接的关系;同样,资本结构也与企业的实际价值存在着相应的关系,资本结构不是无关的。

但是,MM 理论是经过数学论证的,它的问题在哪里呢?经过一番思考,我终于发现它的缺陷之处,在于该理论要证明的结论就像是“一个人可以把自己举起来”,而它论证的逻辑是,假定有两个你,其中的一个



个你当然可以把另一个你举起来——但问题是只有一个你。

这时,有一位清华大学的教授到我们那里做讲座,他讲的正是基于资本结构无关论的一个成果。我跟他说,MM理论是错的,他却说,MM理论错不错没关系,因为还有其他人做了补充证明。我当时就有些生气了,做学问可以这样不严谨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国外的“学术传统”。一个海外华人学者跟我说,他曾问过一位国外某一流经济学期刊的编辑,说某某的论文中的论证是错的,你为什么还发表?那个编辑说,他的结论是对的,推论错了不要紧,会有人给出正确的推论的。但问题是,如果一篇论文的推论是错的,凭什么认为它的结论是对的呢?

与那个编辑不同,我听了清华大学教授的那番话之后,就决定去把资本结构无关论的其他理论找出来,一一加以批驳。尽管当时我还没有见过这些证明,但是既然第一个证明就不成立,那么,后面的证明同样存在不成立的可能性。这时,我想到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而无关论则强调事物之间是相互孤立的。因此,仅凭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我当时就认定,所有的无关论都是错误的。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自然证明了我的论断,而这些批驳的内容也就成了我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回北大后,我将博士论文扩展成了一本书,考虑出版社销售上的方便,给它起了一个具有冲击性的书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我把这本书送给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些同事后,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也遭到一些人的否定。欢迎的,主要是些年轻教员;否定的,主要是些中老年教员,尤其是中年的“海归派”。但据我所知否定的理由,仅在于书名而已,没有人能够证明我对资本结构无关论的批评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在逻辑上捍卫资本结构无关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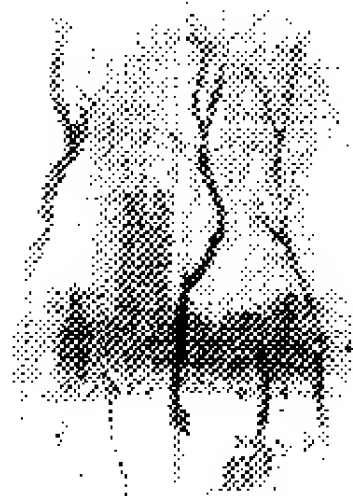
其实,从博士论文到第一本书,我都遇到了一种批评的障碍,明明



是真理,却得不到赞同;明明是谬误,却得到追捧,即便是在北大,也是如此。这时我看了一本书,才明白其中的缘由。这本书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书中指出,“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该书还指出,“如果你的研究表明你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你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而这些经济学家则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既然我的研究结果不可避免地要表明我的某些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我就像哈姆雷特那样不得不面临一个问题。对他来说,是选择生存还是选择死亡;对我来说,则是选择经济科学还是选择经济神学。也就是说,我要么放弃自己的研究结果,为五斗米——也是五斗金米——而折腰,要么就知趣地选择离开。我选择了后者,也就是选择了经济科学。

马克思早就说过,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他选择了牺牲自我去追求自由的科学研究,那么,我觉得我今天没有理由在这一点上落后于前辈们。

其实,人这一生是很短暂的。吃喝嫖赌是过一生,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做些有意义的工作,即使辛苦一点,也是过一生。你可以为了锦衣美食,为了房子车子,为了资本家的课题费,像妓女出卖肉体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辛辛苦苦地搞一堆自欺欺人的垃圾成果。但如果这样做,你这辈子就白活了,这世上多你一个,还不如多一个野生动物对环境更有益处。当然,你有做这种选择的自由,但我不会那样做。我在《微观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是做一个开辟经得起时间和逻辑考验的经济科学道路的时势英雄,还是做一个现代庸俗经济神学的虚伪的信徒



以便向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献媚,是值得每一个处于这一学术领域中的有志中国青年慎重抉择的”。

我之所以把现代西方经济学称为现代庸俗经济神学,是因为在其学术体系中,一切都拘泥于神圣的基本教义,而不论这种教义是多么的违背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多么的不合逻辑。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也像西方传统神学那样,借用数学工具给自己裹上了一层神秘的、思辨的伪装;不过,现代庸俗经济神学对数学工具的运用却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传统神学:第一个区别是,传统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地心说理论由于与现实不符而最终破产并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用数学包装的理论即使明显地违背现实却仍然没有被抛弃,反而要指责与其神学理论不一致的现实;第二个区别是,传统神学对数学的运用在数理逻辑上是相当严密的,仅仅是因为与现实不符才不得被抛弃;而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中的数学运用得不仅与现实不符,它本身就不符合数理逻辑。正是这两个区别,使得现代庸俗经济神学不同于传统神学而更具有邪教的性质。

说西方经济学与现实不符,可能一些人还能够理解,但说它不符合逻辑,可能有很多人就不理解了。有人说,西方经济学不是用了大量的数学推导么?难道还会有什么问题?其实问题恰恰就在于此,西方经济学不是在运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这一点在我的两本书中都有大量的例证。

由于邀请人要求不要讲数学,所以我今天就不讲这方面的例证了。在这里,我要讲的是如何识别或者说如何划分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因为只有知道如何对这两者进行划分,我们才能在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与以往基于意识形态的划分不同,我这里是用逻辑标准来划分的。

以往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往往是从意识形态,从假设前提入手的,但这种批判是不够深入的,西方经济神学才得以僵而不死,甚至甚



器尘上；只有从逻辑上来批判，才能彻底驳倒它。不符合逻辑的东西，根本没有资格进入大学的讲堂，充其量只配进入教堂。

划分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的逻辑标准有三，分别是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按照这一划分标准，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因此资本不能为所欲为；其次，经济神学中背离经济科学逻辑基础的所谓理论比比皆是，其中许多理论，包括某些主流理论，都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

首先，我们来谈谈历史逻辑。

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也具有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一定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相应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要符合历史逻辑。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做“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也就是说，经济科学存在着内在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在经济科学中的经典体现，是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时代的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在历史上是如何演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而在此之前，等价交换规律与一般利润率规律之间的矛盾，始终是劳动价值理论的硬伤。现在有很多人看《资本论》只看第一卷，其实《资本论》三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把它们全部看完，就很难把握马



克思完整的思想精髓。

与经济学相反,经济神学则刻意地用违背历史逻辑的办法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本来,马克思早已指出,资本家之所以“是一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但是,受资本支配的经济学却无法接受这一点,于是,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样一个完全等同于为什么是奴隶主奴役奴隶而不是奴隶奴役奴隶主的简单问题,竟成了一个长期困扰经济神学家的重要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现在终于有人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指导下找出了一个能够为经济神学所接受的答案。因为这个答案“证明”,“资本雇佣劳动是一种能够保证只有合格的人才会被选做企业家或经营者的机制;相反,如果劳动雇佣资本,则企业家或经营者市场上将会被东郭先生所充斥,也就是说,太多的无能之辈将从事经营活动。”自然地,这个答案获得了西方著名大学的最佳论文奖,成为那里未来的研究生的一个范本。

然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这是一个严重违背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的答案!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违背历史逻辑的。这个答案首先假设人和人之间在生产活动能力上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经营决策能力上有所差别,这种差别为人们创造了一个合作的机遇,这种合作导致企业的出现。而且这个答案还假定不存在任何阻碍一个人成为企业家的制度性限制,换句话说,一个人总是可以自由地设立一家企业——这就是说,人人都至少可以做一个个体户。于是工人们之所以不去做个体户,是因为与资本家合作能够得到更多的福利。

可是,首先能力和机遇上的差别,自远古以来就有,但那时却没有出现企业。即使硬要把所有具有劳动分工特点的合作组织都称为企业,这些企业也不全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所以不能以此作为资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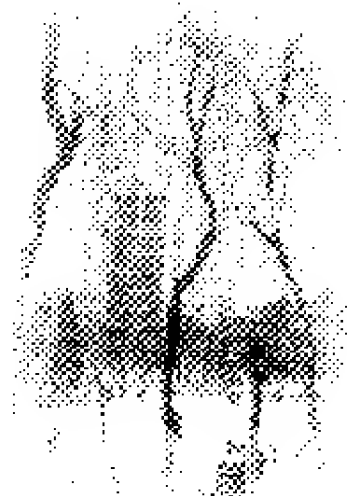


义企业的起源。其次,如果真的假定人人都可做资本家或者个体户,那么情形又会怎样呢?美国和澳洲作为欧洲殖民地的历史,还真的给了经济神学家从实践中体会这一假定的后果的机会,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描绘了这段历史:有位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他非常有远见,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都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这是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殖民地,还是一个“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在那里,“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也就是说,劳动者之间即使在经营能力上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也不是想象的那样大,而且“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显然,“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于是,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所谓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即“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的鬼话,在殖民地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而现代的经济神学家,只不过是將一百多年前的“资本所有者”换成了“经营成员”,“劳动所有者”换成了“生产成员”而已。他不过是用信息经济学的手段重新包装了早已破产的经济学理论而已,他的这一包装自然同样经不起历史逻辑的推敲。

事实上,早在这种殖民地历史之前,历史逻辑就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



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以往的“经营成员”和“生产成员”的所谓的“自愿”组合的过程就清楚了:“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大批地变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这种惩罚是非常残酷和血腥的,例如,被发现流浪三次就要被处死。《资本论》中对此有大段的描述,我就不多重复了。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看看,经济神学家眼中的所谓“自愿”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让我想到一个中国古代故事,说某人在夏夜为蚊虫所困,偶遇一个道士当街卖符咒,声称他的符咒可以驱蚊虫。此人买符咒回家后,当晚仍受蚊虫困扰,第二天他找到道士评理,道士却说,我的符咒要挂在蚊帐内方才有效。同样道理,经济神学要想证明所谓的“从社会观点来看,资本雇佣劳动是合意的”,那么也只有把它的证明置于早已是资本雇佣劳动的现行资本主义体制的蚊帐之内才成。

其次,我们来谈谈现实逻辑。现实逻辑包括公平、合理和唯物辩证法。

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公平与合理,经济神学也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公平与合理。但是,在义无反顾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经济神学中,所谓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因为经济神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蚊帐为前提的。在这个蚊帐内,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于是在经济神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



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但是显然,现实中的“公平与合理”,是不能以资本主义的现有蚊帐为前提的。

至于唯物辩证法,它的含义非常丰富。我在这里主要强调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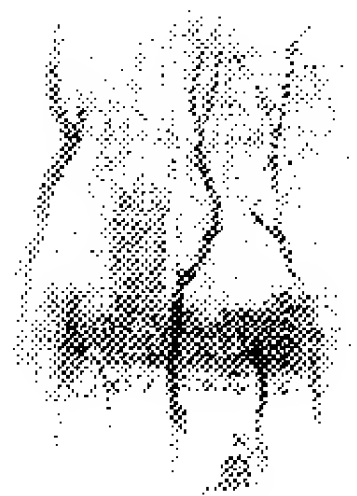
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因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前面提到的MM理论。MM理论的提出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我从逻辑上进行了否定。这一成果发表在北大学报上,大家可以参阅。

第二,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经济神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但革命先烈的自私与你张五常的自私,岂可同日而语?现在还有人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此“公”非彼“公”。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

第三,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其实已经隐含在了论证前提之中。自我循环论证是经济神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有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请同学们注意辨别。

第四,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这是经济科学与数学的不同之处。在数学中,等号是没有方向性的,而经济科学中的“=”往往具有方向性。在涉及时间的一些等式中,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两边的内容甚至是不可以相互交换的。显然,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会吃到最后一口饭,但经济神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我的书中就批判过这样的例子,在那个例子中,经济神学的逻辑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尽管得到的结论是要吃,但如果得到的结论是不吃,那又如何解释呢?

我们现在就来接着讨论前面提到的资本雇佣劳动的现实逻辑问



题。为了让资本家与享有剩余收入的企业家天然地结合起来,并排除穷人通过借贷成为企业家的可能,经济神学家假定观察一个人的经营能力较之于观察他的个人财富要困难得多、成本也要高得多,以便得出“就显示经营能力而言,富人做企业家的选择比穷人做企业家选择具有更大信息量”的结论。为此,他用数学推导了一个模型。按照这个模型的结论,假如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一种生产技术,该技术要求一笔数额为50的总资本,如果成功,就可以获得数额为60的收益,如果失败,则收益为零。假设市场利率为10%,市场工资标准化为零,那么一个人要想通过借钱成为企业家,就必须拥有不低于数额20.5的财富;也就是说,个人财富低于20.5的穷人不可能通过借贷成为资本家。但是,我们只要改动一下企业成功时的收益,就可以发现,经济神学家的结论意味着,越是收益好的项目,越借不到款;而收益率仅相当于市场利率的项目,却是人人争相放款的香饽饽。这一结论与现实如此相悖,我们不得不宣布它在现实逻辑上的破产。

实际上,马克思早就合乎逻辑地指出,“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也就是说,资本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与其自身的经营能力并没有什么关系。“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对化学惊人地无知”。同样地,对经营知识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同样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不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也能够指挥企业获得利润,这是因为企业的利润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而所谓资本家的经营才能,无外乎是能否更多地榨取本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或者能否将其他企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他们的资本家手中瓜分过来而已。

再次,我们谈一谈数理逻辑。数理逻辑是指经济科学中运用的各



种数学方法,马克思也曾指出,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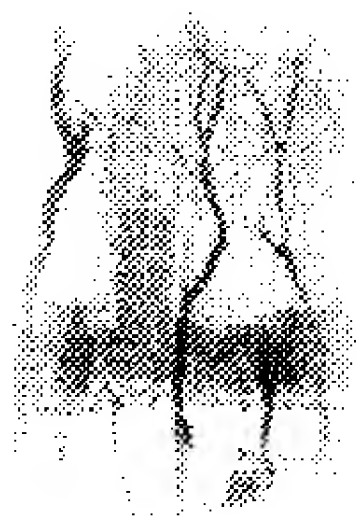
在经济科学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也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被归入“经济神学”。而且许多历史过程也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无法使用数学公式,或者说数理逻辑来表达。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可以表达所有经济规律的万能方式。

但是,如果不能较好地掌握数学工具,我们也很难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成为教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大多数马克思后继者的数学水平还不如马克思,从而无法自觉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分析问题,而只能用形式逻辑的方式把马克思的若干结论作为教条。所以,我希望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同学一定要学好高等数学。当然,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数学学得好未必就能把经济科学研究好,就像有不少数学家成为了经济神学家,却没有成为经济科学家。

最后,在提出划分经济科学与经济神学的三个逻辑标准之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关于经济研究的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经济研究不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但是,自然科学并不是科学的同义语,而只是科学的一个真子集。

第二个误区是,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要从一些假设前提出发,而这些假设前提又与现实中的情形存在着相当的距离,因此,其“结论就不可能作为正确的而被接受”。而且由于假定前提不同,经济学上往往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可以并存的特有现象,从而“经济学家不是在从事科学活动,而仅仅是用提出的幻觉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有知识的”。产生这一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神学为了达到鱼目混珠的目的,刻意地“过份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



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但是经济研究本身,却犯不着替经济神学背黑锅。

事实上,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形成时曾正确地指出,“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

实际上,公认最为科学的物理研究也往往假定物体处于并不现实的真空状态之中;但只要这种假定只是便于排除不相干的从属情况的干扰而不妨碍对真正过程的研究和对真实规律的把握,这种假定就只是“一种科学的手续”,而不是对科学的否定。为了从概念上加以区分,我们把作为科学的手续的假定,称为“假设”;而把经济神学常用的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所谓假定,称为“伪设”或“虚构”。同学们应该注意加以区别。

总之,我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前面提出的三个逻辑标准,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而经济科学和经济神学的区别,正在于此。

最后,我希望同学们在经济科学还是经济神学的问题上,克服物质利益的诱惑,不要将你们宝贵的精力用于经济神学的修炼,而将它们用于对经济科学的追求中,因为这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和民族强盛充分而必要的条件。

谢谢大家!

(2004年10月13日)



从刘晓庆案看法治观念的转变

■钱列阳

从刘晓庆案看法治观念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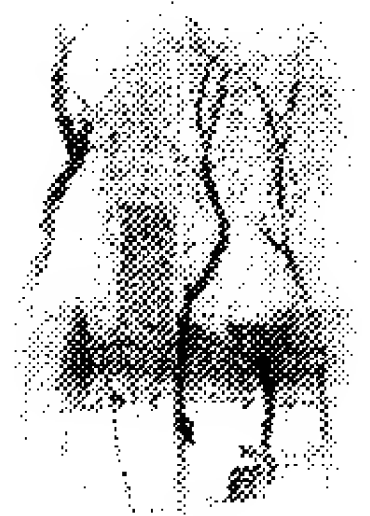
钱列阳,男,1964年5月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硕士。北京市中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合伙人、律师。现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律师协会律师权益保障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第四届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美国国家刑事辩护委员会(NACDL)名誉会员。

承办的有较大社会影响的刑事案件有:

江西南昌“德国牙医”章俊理非法行医、故意伤害案,台湾间谍寇建明间谍案,台湾姚嘉珍、杨铭中间谍案(受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推荐),辩护律师方傅根包庇案,秦德海故意伤害致死案(终审宣判无罪),北京市大兴县房管局局长傅冠宇贪污、玩忽职守案,厦门远华公司走私案,河北沧州卫生局副局长张彦龙玩忽职守案,张月新利用“非典”寻衅滋事案,刘晓庆涉税案,原中央电视台导演赵安受贿案,江苏常州“铁本”公司戴国芳案,北京密云踩踏事件孙勇玩忽职守案等。

陈瑞华(主持人):

大家好,我记得1999年钱律师读法律硕士的时候,他接手了一个



全国闻名的大案,就是江西南昌的“德国”牙医案。那个案件一审是由钱律师和另外一个律师两个人一起做辩护人的。应该说在当时的江西省乃至全国的新闻界,总之社会各界吧,引起了强烈反响。那个案件到现在余波未了,因为二审的时候被告人被指控的两个罪中的一个罪被判不成立,现在被告人(也就是罪犯)还在申诉之中。钱律师后来接手的几个大案中最著名的就是刘晓庆案件,是刘晓庆的首席辩护人。在刘晓庆案件的办理中,钱律师充分体现了他的高超的办案技巧,展现了大律师的风采。最近的著名案件是前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赵安的案子,钱律师也是作为首席辩护人出庭。在这个案件中,钱律师不仅是从事实上做出了辩护,更是从法律程序上做出了精彩的辩护。尽管赵安最终被判有罪,但是法院还是部分采纳了钱律师的辩护意见。

各位,要想了解实践有多种方式,可以到法院去,可以跟律师座谈。现在著名的律师坐在我们身边,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钱律师给大家做精彩的演讲。(掌声)

钱列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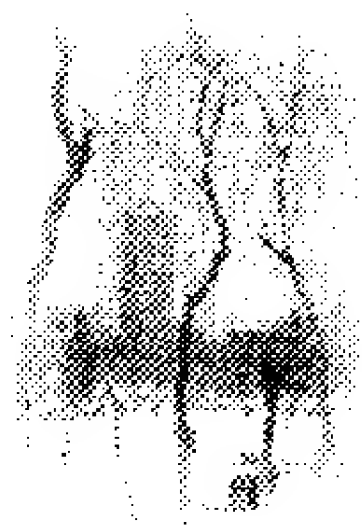
非常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这样的礼遇我真是受宠若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场合,我都有点诚惶诚恐了,因为太正式了。这里是母校,我觉得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且同样是在这一个房间里,我聆听了包括陈瑞华教授在内的很多著名学者的讲座。所以这里是给我知识积累和思想启迪的发祥地。今天能够回到这个地方来真的感到非常亲切,我觉得这与其说是一个讲座不如说是一次谈话,同学们可以打断我的讲话提问。最后我也会留出一点时间供大家交流。我只是想把我办案的一些感想或是感觉到的一些问题给大家说出来,既算是谈一点心得也算是诉苦,跟各位同学作一次沟通和交流。这次活动的主办者问我这个讲座的名字时我说随便吧,他们就说刘晓庆案是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是不是就叫刘晓庆案件的感想,反正即使你不讲刘晓庆案,别人也会问及刘晓庆案。再加上最近收到了很多邮件要求我讲一



讲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技巧、方法以及我作为一个刑事辩护律师的感想,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演讲可以从两部分内容入手,一部分是通过我办的一些案件来谈一点我个人的感想,也许很不全面,就供大家评断,另外一方面就讲一讲当前刑事辩护的一些情况。

那么就先从刘晓庆案件开始讲起。其实刘晓庆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几年报纸上就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刘晓庆的情况,其间有好几次高潮。下面我就先简要介绍一下刘晓庆案件的一些情况。

刘晓庆是在2002年6月2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的,随后就转入侦查阶段。大家也知道,侦查阶段拖的时间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杭州和深圳各有一名律师由家属委托作为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律师到北京市看守所去见了一下这个著名的当事人。等到2003年1月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受理了刘晓庆的案件,算是侦查阶段的结束,转入审查起诉的阶段。家属就开始请律师,我们北京的四个律师分别是许兰亭、李肖霖、张青松和我介入了这个案件。之所以要四个律师,是因为被逮捕的是刘晓庆、她的妹妹、妹夫,因为是单位犯罪,所以还有一个主体就是晓庆文化公司。当时在北京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就找了这四个律师各代理一个主体。我正好接手刘晓庆本人。所以我们从1月10日正式签合同接手这个案件。接手之后我们就联系人民检察院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当事人关在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我们从正式接手这个案件开始,总共会见了刘晓庆三次。为什么到8月的时候才放出来呢?大家学过刑事诉讼法也知道,审查起诉阶段是一个半月,然后退回补充侦查,然后又是一个半月,再退回补充侦查,然后再来一次。这三个一个半月加上中间的两个半月补侦期,就拖到8月了。而且每一次都要到即将退回补充侦查,我们才能见当事人。所以我是在2月、4月、7月会见过刘晓庆。这半年里我得到一个很深的体会,那就是媒体记者非常厉害。电话都被打爆了,而且每次你的话中稍微含糊了一些问题他们就会断章取义,捕风捉影地报道。所以熟悉我的朋友一看报纸就知道,我决不会这样讲话。这



都是记者的话,前面加上一个“钱律师说”,就报导出来了。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眼球经济,报纸上出现一个刘晓庆的新闻,观众的眼球一下子就被吸引过去,旁边那个公司倒闭了根本没人理会。办一个名人案件会有这样的体验,在此之前我们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到8月16日刘晓庆放出来的时候,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60辆新闻采访车子包围起来,都是全国各地赶到北京的媒体。在《潇湘晨报》14日登出了这条消息之后,15日新闻采访车就把看守所“包围”了,据说早上4点记者就蹲在看守所门口守候。还听说他们中间有一条悬赏:刘晓庆放出来之后谁拍了第一张相片就奖金1万块钱。但是15日整整一天人都没出来。最后到了16日才放出来。到底她是从哪个门怎么出去的我都不知道,只是16日下午有人打电话告诉我她已经离开看守所了,我才长长出了一口气。因为一直没有拍到刘晓庆的照片,悬赏金从1万一直涨到6万,最后涨到10万元。终于有一天,我的手机响了,有记者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们已经拍到刘晓庆的照片,我们可以不发表,但是要对刘晓庆作一次独家专访”。我也不知道刘晓庆在哪里,只好给她当时的男朋友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记者已经拍到照片了,他们要求一次独家专访,否则就发表照片。他坚决不同意采访。所以照片随后就被网络刊登出来,这也就是大家看到的第一张照片。

这个案件在她取保候审放出来以后,一直到9月份,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只把晓庆文化公司和主要责任人靖军(刘晓庆的妹夫)起诉到朝阳法院,我们四个律师的职责分工也作了调整,我和张青松律师共同接手晓庆文化公司总经理靖军的辩护。

这次案件审理中检察院可以说是严阵以待的。在我们刚刚接手的时候,共有103本案卷。起诉到法院的时候被删节掉不少,只剩63本案卷,一共52项指控。法院判决书最后把这52项指控认定了42项,否决了3项,改判了7项。等到判决的时候已经是2004年4月。在这段过程中,刘晓庆因为从2003年8月份放出来之后片约不断,经济上一下子就缓过来了。所以到12月份开庭的时候,公司诉讼代表人就已



经理直气壮地说：公司欠税的本金已经还完了，现在就差罚款了。等到4月份一审判决的时候，税务部门的罚款也已经付完了。最后法院认定晓庆文化公司偷税710万，判罚金710万，并且对主要责任人靖军从轻处罚只追究了3年有期徒刑的责任。判完之后靖军当庭提出上诉不服，认为自己无罪。我和另外一个律师就去劝他不要上诉，因为这件事情已经闹得太长了，我们不想节外生枝，该到尘埃落定的时候了。所以最后他就撤回了上诉。一审判决就此生效。

2004年5月，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就向刘晓庆本人正式发出了不起诉的决定书。这个案子从2002年6月22日到2004年5月10日刘晓庆拿到不起诉决定书，取保期限就此终结，总共用了约两年时间。大家都知道取保候审的期限是12个月，如不提前解除，到了2004年8月15日就自然期限届满。由于公司到判决时止交足了全部的欠税款和罚款，这也是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刘晓庆最后作出从轻判处的原因。

当5月10日刘晓庆拿到决定书之后，我们都按兵不动，不透露消息，直到5月底媒体终于知道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轰炸。我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从刘晓庆案看法治观念的转变”。我很想提一提的就是媒体的第四次轰炸，也就是5月底的那一次。可以看出，自始至终的几次媒体轰炸体现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刘晓庆刚刚被抓的时候人人喊打。等到我们接手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惊讶，说刘晓庆居然有一个律师团辩护。到去年8月刘晓庆放出来的时候大家又开始同情她。到今年5月份传出刘晓庆不被起诉了，社会上又开始出现了反弹。大家纷纷怀疑刘晓庆为什么没有被判罪？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刘晓庆真的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况且相关司法机关始终没有直接面对记者就此做出任何公开、正面的解释。因此，这第四次媒体轰炸中社会大众表现出的质疑心态其实也应该是正常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想讲一下从刘晓庆案看社会法制观念的变革。相信大家都清楚现代法律人一定要有现代法律技能，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现代法律人也要具备现代法治观念。我要谈的一个是刘晓庆案，一个是刘涌案件。这两个案件让我有



一次警醒。我们都认为作为法律人自然就具有法律意识,但我们真的具有现代法治观念吗?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是两码事。法律人有法律意识就像足球运动员有射门意识一样。遇到一件事知道要用法律来解决就叫做法律意识,但这距离具备现代法治观念还有很大距离。

我们就先从刘晓庆案件开始。第一,从电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很多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没有法律专业教育的人都分不清犯罪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区别。这在我们这些学法律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值一提。但是大家应该考虑一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名人、高官被抓多有媒体报道,没有一个不是最终被判刑的。社会大众对于犯罪嫌疑人必然最终等于犯罪人已经有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也就是刘晓庆被放出来才给大众上了法治观念第一课,原来抓进去不一定都要被判刑,犯罪嫌疑人不必然等同于犯罪人!这种可以通过名案提升社会大众法治观念的作用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这就是观念变革问题。第二,刘晓庆的晓庆文化公司偷税的犯罪,是单位犯罪,刘晓庆是董事长。那么刘晓庆应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社会大众普遍认为她当然犯了罪,她是老大,当然要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又对又不对。她确实要承担责任,但是是什么责任?是经济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刑法》第211条对单位犯罪讲得很清楚,单位犯罪追究的是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非上述人员不在追究刑事责任之列,那么,刘晓庆在其公司偷税的过程中有没有命令、指挥、唆使、暗示、默许等行为呢?如果没有,她要承担的责任就不能是刑事法律责任而只能是行政责任、经济责任,承担民事责任。这也就是为什么她放出来之后要拼命挣钱补税交罚款,这是她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第二个问题警示我们的是:一般责任和严格责任是有区别的。一般责任指的就是行政责任、经济责任、民事责任,而严格责任指的就是刑事法律责任。要承担责任并不一定特指承担刑事法律责任,这个观念必须树立起来。刘晓庆的妹夫总经理靖军非常能干,公司的经营运转情况良好,所以刘晓庆曾告诉我这些年她连财务部的门



都没进过,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刘晓庆的专业是演员,她并不具有其他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几次退回补侦确实分清了哪些属于故意,应该承担刑事责任;哪些是因疏于管理应该承担行政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看出上述观念的区分非常重要。在刘晓庆事发之后,很多开办公司的名人都不敢当董事长了。就是观念问题而怕走刘晓庆的路,犯罪嫌疑人不必然等于犯罪人,承担责任不必然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观念非常重要,很多人包括个别司法人员分不清。因此,将这些观念上的界限在我们处理完案件后提炼出来我个人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这个案件的结局对法治观念的转变也就显示出特别的重要意义。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过错和有罪区分开来,把应承担的责任大小和职位高低区分开来,要将故意犯罪和失职行为区分开来,没有抽象的、想当然的犯罪。这些法治观念如果能在大众中逐步确立起来,这个案件也就达到了推动社会大众法治观念进步的意义。

回过头来,我们谈谈辽宁沈阳黑社会老大刘涌的案子。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一审死刑,二审死缓,最高法院提审又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我们不是以看热闹的心态看这个案件。不知大家想过没有,这个案子中体现出了什么东西?基本的问题大家很清楚:就是“刑讯逼供”。到底警察有没有“刑讯逼供”?这一点我在北大法律文化节上也曾经谈到过,这里就再说两句,也就是定性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刑讯逼供罪。所谓“刑讯逼供”就是使用暴力强迫的方法获取口供。这是一种行为犯。举例说:盗窃罪必须达到法定的数额才能构成犯罪,而抢劫即使一块钱都没抢到也构成了抢劫罪。盗窃犯罪就是一种结果犯,而抢劫罪就是一种行为犯。从法律规定看“刑讯逼供”是一种行为犯,即只要警察刑讯逼供,其口供就应该排除,警察要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法律常识。但是,我国刑讯逼供为什么屡禁不止?关键的原因就是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被扭曲成了结果犯。所谓结果就是必须出现犯罪嫌疑人被打死、致残或最终导致冤假错案,就像云南杜培武案件一样,口供全是逼供得出的,但是法院根本不采纳杜培武的申诉,直到



真凶归案才真相大白。于是乎才追究预审警察刑讯逼供罪的刑事责任,而且追究得非常轻。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在实践中“刑讯逼供”变成了结果犯?原因在于我们的司法机关为了保护干警工作的积极性,提高破案效率,并不愿意从根本上去诊治刑讯逼供这一顽疾。只要嫌疑人说了真话,没有被打伤,打死,口供就会被采纳。田文昌律师收集了大量证据证明警察曾经刑讯逼供,二审法院就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原因语焉不详。由于激起了民愤,最高法院就提审这个案件。这些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了,但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到底警察有没有“刑讯逼供”?

1. 如果有“刑讯逼供”,那口供能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最高法院提审中对此没有解释。

2. 如果有“刑讯逼供”,对“刑讯逼供”的干警应该追究什么责任?法律规定得很清楚,但最高法院没有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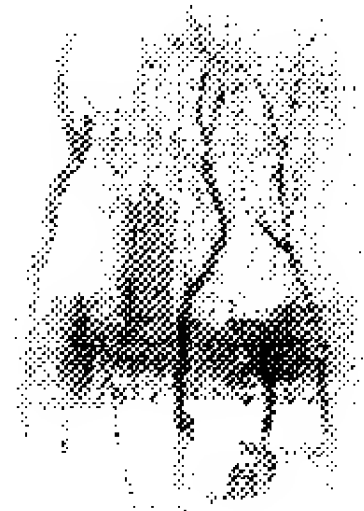
3. 假如公安局没有“刑讯逼供”,而律师捏造了“刑讯逼供”的证据,干扰了诉讼工作的正常进行,那么律师该当何罪?

所以刘涌被执行之后,留下的问题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让我们把我们办过的每一个案子的结果是好是坏放在一边,好好想一想这个案子对我们的法治建设是不是有利,是法治文明的进步还是倒退?我们的这张刚刚编织起来的法治的网绳子很细,窟窿倒很粗,所以很不健全。怎么办?这张网我们应该丢掉吗?丢掉了的话我们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们应该保留它,然后通过每一个个案来补充它,让它变得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健全。但我们来看看,我们的法治中的很多案件都是为了抓住一条鱼而撕破了一张网,为了达到打击犯罪的目的破坏程序。法律的精神在于分辨是非,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用黑白两色来象征法律。法律的概念是清晰的,是非必须明辨,不是搞平衡。这个搞平衡经常被有关部门称为“协调”。什么是协调?协调是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大家行动上的同步,而不是不分是非地把一件事情糊弄过去。今天司法机关不是当年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更有意义的是,这个案件可以和



相近时期国外的一个案件作比对,那就是美国的辛普森案件。辛普森当然杀了人,但是为什么法律能容许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因为比起让一个杀人犯逍遥法外更不能容忍的是警察通过制造假证打击犯罪。辛普森的律师在辩护中没有证明辛普森没有杀人,他只证明了在侦查过程中警察确实制造了假证。这就在陪审团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印象:辛普森有没有杀人是一个问号,而警察造假证是一个句号。这就是辩护律师的高明之处。他引导陪审团首先审查警察是否有非法的侦查行为。陪审团都知道,如果允许警察造假证打击一个真罪犯,明天警察就可能用同样的手法打击罪犯旁边的那个人,就会伤及无辜。这就是撕破了一张法网的结果。从这个角度讲,法律的一大功能是代表国家限制政府强大的公权力对脆弱的公民私权力可能形成的伤害,这就是法治。我们今天能不能把这些案件都上升到法治的高度去理解,研究(这一案件)是有利于中国法治还是拖法治发展的后腿?大家都知道木桶理论,中国法治的短板是什么?人权法。最近几年来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年3月份人大修宪“人权”入宪,保护私有财产也同时入宪,这才开始使用“human right”。人权保障是我们的法治体系中最短的一块木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设立的这个奖学金主要针对人权法这个角度。比下岗职工权力这块木板更短的一块就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被告人的权利。这块最短的木板变长了,整个国家的法治状况就改善了。我们不要和美国比谁的部长权力更大,而要比哪国的犯罪嫌疑人得到法律救济的途径更广;哪边的无业人员得到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更多。所以,当务之急恰恰就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我很高兴今天有两个同学获得了这个奖学金,我希望这些有志于人权保障的同学要持续关注我国人权法律发展这块短板。这块木板直接关系到我国法治建设的成败。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我国法治这桶水最终就会漏得精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通过这两个案件,我想谈谈中国今天的刑事诉讼法。陈瑞华教授是我的老师,他一直在探讨的就是刑事辩护的程序问题。在这里我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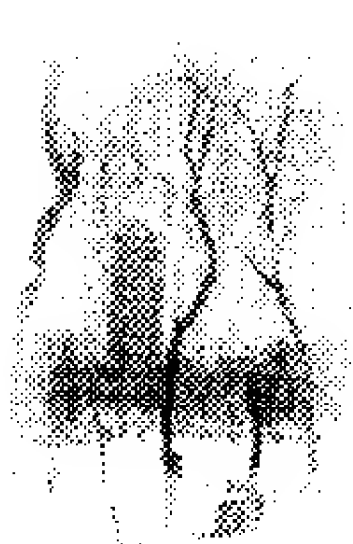
想班门弄斧再提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在座各位都读过很多法律书,我们把很多法律的观念和案件结合起来。这个结合应该如何考虑?大家都看过很多介绍欧洲中世纪的书。欧洲现在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法治社会,最黑暗的时候就是中世纪。这个时期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它叫做“铁少女”。这是一个金属制成的少女像,非常漂亮。但是打开一看,里面都是钢针。这些钢针正好对准人的要害部位。当宗教法庭判处人死刑的时候,被执行的人就站在铁少女的里边。当铁少女盖子合上的时候,里面的钢针正好刺入被执行人的要害。这是一种非常残忍、非常野蛮的刑罚。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铁少女是一个标准模型,它的形状不会变。但被执行的犯人高矮胖瘦完全不同。所以如果一个罪犯有幸长了一个标准体形,他可能一下子就被刺死。但如果他不是标准体形,那么就不会立刻死亡,这种痛苦无法想象。有些罪犯几天几夜都没死,直到血液流尽,十分残忍。

这给我们一个启示:罪刑不相适应的后果就是铁少女里面非标准体形人的后果。罪有应得并不可怕,冤假错案的发生才是最可怕的。有谁听到被关进铁少女里面的那类人的哀号?也就是当一个人蒙冤的时候,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的时候,刑罚对人的身心的伤害有多大?这个声音主流媒体里面是很少听到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外国学者,什么是弱者?他说弱者就是发不出声音的那些人,他们的声音没有人听得见。有谁能够听到铁少女里面的人发出的冤屈的声音?而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为什么说欧洲中世纪是黑暗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基本的人权。罪刑不相适应给人带来的伤害实在是我们常人难以体会的。有时候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在特定的背景下能够听到这些最痛苦的声音,他们是发不出声音的人群。我把这些情况介绍出来,还是围绕着前面的那个法治观念建设的话题。

另外,这几天收到的邮件中有同学提出了一些关于司法鉴定方面的问题,这里我想讲一下一个我办理的走私象牙的案件。这个案件我认为是对我们法治发展可能有点意义的案例。象牙是国际间禁止非法



流通的物品,我国也于1981年参加了国际《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国际间的象牙买卖是不允许的。我办的这个案件是这样的:有一个在非洲索马里工作的中国人花了相当于3000元人民币在那里买了六根象牙,但是他并不知道象牙是不允许在国际间流通的,因而就直接从机场海关带回来了,被海关警察查到了,最后公诉到法院。当时被告人的亲属就找到我来给他做辩护律师,林业部有一个鉴定说象牙的价格是每根人民币25万元,六根就是150万元。为什么呢?因为象的牙被拔掉以后,大象就死了,所以25万是一只野象的价格,这样的规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一算起来就是150万了,有点冤。我于是就找到了陈瑞华教授等几位著名学者请教,决定在鉴定结论上寻求突破。当时鉴定的相关规则正在修改中。我看到那个鉴定结论是海关走私侦察局从林业部保护野生动物部门那里拿回来的,只是盖了个章,章上刻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北京办事处”字样,没有鉴定人签字。而依据法律规定鉴定结论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鉴定人的签字,并说明鉴定的理由等等,而且鉴定结论属于言词证据,因此鉴定人还有义务出庭作证,接受质询,作虚假鉴定也要承担伪证罪的责任。鉴定结论存在程序上的问题,所以当时我在法庭上拿到了那个鉴定结论,就说,首先我没有理由怀疑图章的真实性,但是没有鉴定人签字,我不知道是谁鉴定的,也更没有办法请出那个人作证。第二,鉴定图章只能证明鉴定单位和鉴定人身份的真实性,不能证明鉴定结论的正确性。这个结论我要求寻找鉴定人并出庭作证。这个案件发生在2001年8月,11月份开的庭。法官认为以前没有人这么提过,法官于是就问公诉人如何解释,公诉人也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这类案子从来都是这么办的,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我也狐假虎威地把陈教授的意见提出来了,说明鉴定结论在本案中不符合刑事诉讼的规定。于是法院决定休庭。后来检察院把案件退回到海关的走私侦察局,他们说这类案件从来就是这么办的,甚至那个图章也真的就在他们自己手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过了几天我接



到电话说被告人已经被取保候审放出来了。所以报纸上在人抓进去的时候说要轰轰烈烈地追踪报道,后来这样的结果就不了了之了。这个案件就这样结案了。这个案件恰恰说明了鉴定结论在我国当今的刑事诉讼中的完善是一个当务之急,各个部门都没有足够地重视。大家见过有谁被追究虚假鉴定结论的伪证罪吗?还真没有。鉴定结论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当然的正确,当出现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就在比较谁的鉴定机关级别高,好像打扑克牌一样,而不是从技术层面加以区分比较,这就是我们刑事诉讼中鉴定结论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几天不少同学问我关于刑事辩护的辩护技巧问题,在这里我就简单聊一聊我的一些看法。作为刑事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最主要的是两部分,一个是询问证人,另一个是法庭辩论。询问证人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证人的出庭率太低,这是经常出现的,这让辩护律师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当然也有出庭的,我在办理江西南昌“德国牙医”案件的时候还真有警察出庭的,当时被告人告诉我他被刑讯逼供了,我就问他有什么证据,他就说他被逼供了七天七夜,回到看守所的时候浑身是伤,看守所为了避免责任,专门为被告做了一个有关伤情的笔录,把身上的伤都记录在案了。这个看守所的警察也是知道姓名的。于是我就申请法庭请这个警察证人作证,我没想到他还真的出庭作证了。1999年12月的事情,我首先问他那天是否找被告人做了笔录,他承认了,然后我问笔录呢?他说扔掉了,我问为什么扔,他不回答。我再问为什么要做笔录,是不是所有被提审的人回来都要做笔录,他说不是。我于是问那天对被告人为什么那么特殊,要给他做笔录,这个出庭作证的警察就不说话了。我接着就进行了一个诱导性发问“是不是你看到他身上有伤,为了防止以后被追究责任,就做了笔录,请你回答是还是不是”,他就不说话了,到这个份上,我也不说了,我们就对视着,全场上下一点声音都没有,最后那个警察实在说不出话了。最后法官出来圆场,说“证人你是不是想不起来了,想不起来就不要再想了”。作为一个辩护律师问题问到这个份上就已经够了,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已经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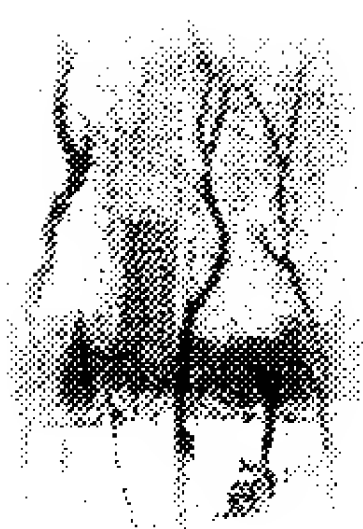


白是不是存在“刑讯逼供”了。实际上律师在询问对方证人或者中立证人最主要的询问方式就是诱导性发问,因为你自己的证人是不能够诱导性发问的,只能主询问,只有在反询问的时候才能够采用诱导性发问。当你只需要对方回答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的时候,你不需要别的话来填充,你要的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真空。无论法官和公诉人怎么不开心,旁听的人已经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了,这时目的就达到了。

另外,在询问证人的时候不要同时问三个问题,因为他只会挑最好回答的问题回答,其余难回答的被略掉了。最好是一次只问一个问题,而且要求对方回答得越简单越好,该打断就打断。而且在问问题的时候,如果公诉人已经问过了对你不利的问题,就不要再次提问,这会加深法官的印象,你只需要问能够得到简单回答的问题。然后把关键要问的问题放在无所谓的问题的中间。比如说你问十个问题,其实你只想问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一个放在第四,一个放在第九,你就一口气问,问完第九个问题的时候,你把它一引申,说明它与第四个问题是矛盾的。你到底想说什么接着就是第十个问题,你到底想说什么就在第十个问题中,以此来说明公诉方的证人的证言是不能采用的。这对我们来讲很容易,但是对于证人而言,他很紧张,你一引申他就乱套了。

然后在辩论阶段有不同的情况,首先的理念是:法庭辩论不是拳击赛,而是田径赛。谁先把你想说的向法官说清楚了就够了,而不是把公诉人驳倒。对于公诉人的一些口误,没有必要抓住不放,包括证据里面的失误,比如说某案件的证据里面有“4月36日”,像这种低层次的错误不要去抓,而要抓大的。首先要把整个案件的焦点总结个一二三点,这样你就抓住了整个法庭的走向。比如,第一是作案时间问题;第二是作案动机问题;第三是作案过程中工具的问题,这样抓住了三点,而对你不利的不必去说,由于你的归纳总结,一下子把旁听人、法官以及公诉人的注意力都抓到了你的手里。这是占领制高点。

还有,如果案件是不公开审理,在法庭上律师语言要简单,只讲法



理,重重的几句向法官说清楚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庭下有旁听的人,情况就不一样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旁听的可能是受害人或其亲属,可能是被告人的家属,或者是中立的人。这时候有一点要注意,眼神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嘴巴。因为就像今天的讲座,在座各位是看着我的眼睛在听,而我也是看着你们的眼睛在讲,这种眼神的交流很重要,你要说服一个人一定要看着他的眼睛,别人只有看着你的眼睛才有可能被说服。如果我在这里低头念讲稿,你们还有兴趣听讲吗?如果听讲者东张西望,那根本就没有抓住他的注意力。当庭下坐着大量的旁听人员,这时你不要去看公诉人和法官,你只要看着观众,你需要得到观众眼神的反馈。而当公诉人发言的时候,你就紧盯着公诉人的眼睛,这种眼神是对他的尊重,当然也是精神压力。

还有,有些律师和公诉人非常擅长用电脑,电脑就摆在旁边,可能提前就准备好了,时不时地敲键盘,表面看来很现代化,实际是错了。法庭辩论是要看着大家的,在法庭调查的时候如果想到了灵光一闪的时候,就是一张纸和铅笔,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了。辩论是直接而迅速的,如果这个时候还去摆弄电脑,整个气氛就被破坏掉了。而且庭辩之前可能准备了五点要说的,但在法庭的多变情况下,可能第一、第三点已经不必再说了,这个时候无论你在这一点上准备得多充分,该舍的一定要舍,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很可能在法庭上着重要讲的问题是之前没有想到而临时决定的,一定要懂得舍,有舍才会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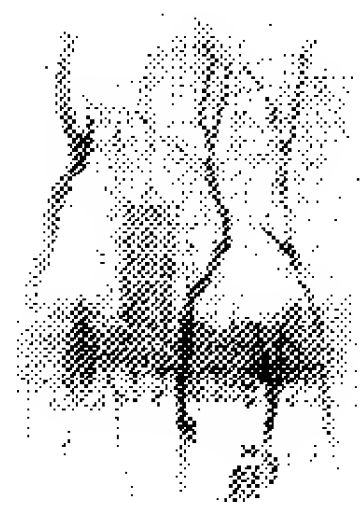
对于某些公诉案件,民愤较大的案件,庭下坐的是被害人的亲属,在开始陈述之前应该适当地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这很重要,毕竟他们是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否则你一说话他们就会听不进去而起哄。以自己个人的名义表示对受害人的同情有时还是很有作用的。要知道,我们不是给犯罪行为辩护,而是给犯罪人的合法权利辩护,这点一定要清楚。你辩护的是被告人应该得到的合法权利,即使犯罪人第二天要枪毙了,今天也要给他吃饱饭。这就是基本的人权。我个人对辩护律师是这样定位的,在有公愤的公诉的案件中,律师首先表达这样的同情



并没有超出基本的做人和做律师的界限,但有利于缓解法庭紧张、激愤的气氛,使庭审回到平和理性上来。在具体地讲述的时候,法理要占三分之二,公理和人情占三分之一,后者是要使被害人家属的情绪安定下来。

当庭下坐的是大量被告人的亲属,这是个值得同情的案件,我觉得要把法理讲清楚,宣传一下法制。就是情有可原,但是法无可恕。为什么?因为很多案子确实情有可原,可又的确触犯了法律,这个时候要反过来说服一下被告人的家属,他们经常觉得自己冤得不得了。就像今年的密云灯会踩死人的案件,司法机关追究了两个警察的玩忽职守罪。虽然实际有责任的还有其他人,但是人是没有抓错的,不能够因此而觉得冤。就像你不能因为共犯在逃就不追究被抓住的人的刑事责任,这显然与法制相悖。家属经常是中国典型的“不畏贫,畏不均”的心态,这个时候我们要讲明除了人情以外,还有法理在。这时我们要宣传法制,这也是律师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之外的另一社会责任。很多案件从法律上讲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其理由当事人不了解,心里就有一个疙瘩解不开,于是就觉得不公平,忙着上访告状。因此,强调判决书要讲理,否则当事人不明白会产生误解,这时律师就有一个很大的社会责任——解释法律。

最后,我愿意作为律师把我们今天的法治社会打一个比方。如果说法律界是一个大海,法律条文就是海面上的浪,法学理论就是海面下的各种海流,浪是由海流决定的。而法学思想是海底的泥土,法学思想承载着法学理论成熟后浮到最高层就是法律条文。我们律师呢,就是海浪中的冲浪者,我们没有铁的外壳,司法机关、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就是海面上的舰艇,我们没有办法跟海面舰艇碰撞。至于法学教授就是海流里面的潜水艇,必要的时候就浮出水面,其他的时候都是在法学理论中遨游为理论成熟上升为法律条文做努力。我为什么打这样的比方?只因为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将来无论是要做冲浪者,还是潜水艇,还是海面舰艇,非常需要掌握的还是法学理论的海流。有朝一日,我们魂



归西土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将毕生经历凝成的感悟沉淀为海底的一点点泥沙,能够为国家法治文明的进步做出一点点的贡献,那就是我毕生的追求。谢谢大家!

(2004 年 11 月 23 日)



在组织化与个体化之间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抉择

■ 谢立中

在组织化与个体化之间

谢立中,男,祖籍湖南省隆回县,1992年7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92年8月—1994年7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1999年9月—2000年7月到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高级访问学者。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社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社会理论学报》(新加坡)主编等职。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社会发展与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著作有:《社会发展二重奏》(1988年)、《社会指标与社会发展评价》(合著,1995年)、《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战略》(主编,1997年)、《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主编,1998年)、《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导论》(2000年)、《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副主编,2001年)、《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主编之一,2002年)、《后现代社会理论》(译著,2003年)、《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主编,2004年)、《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卷)》(主编之一,2005年)及学术论文数十篇。



一、解释概念

各位好！很高兴来这里给大家做这个讲演。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组织化与个体化之间——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艰难抉择”。今天的讲演主要分成三部分。首先我会给大家解释一下我所使用的几个基本概念的含义；然后我要讲一讲我用这几个基本概念来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所做的一种描述；最后，则要参照我对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所做的描述，来讲一讲我们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艰难抉择。

第一个基本概念是“个体化社会”。所谓个体化社会，是指在一个社会里面，社会成员基本上是以一种自由的个体形式存在，法律上赋予每个个体以充分的自由，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满足的一切资源，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在这个社会里面，人与人之间可能也有很多交往，但是他们在交往的时候，主要是以个体对个体的形式。这样一种社会我们叫它“个体化社会”。

第二个基本概念是“组织化社会”。所谓组织化社会，是指一个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每个人都不是以单个的个体方式自由地存在，而是作为不同组织中的一员而存在。他们的自由受到很多限制，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不只是靠个人的努力获得，而主要是靠他所在的组织协助他去实现。这样一种社会我们称之为组织化社会。同样属于“组织化社会”的社会其组织化程度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或时候组织化程度高，有的地方或时候组织化程度比较低。

第三个基本概念是“去组织化社会”。所谓去组织化，是指一个已经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开始经历一种组织化程度不断降低和衰退的过程。过去社会成员是作为组织中的一员存在的，生存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所在的组织去满足和实现，但现在他们所处的组织的各种功能开始转移出去了，社会把个体生存的责任重新交给个体，个体重新



获得了自由,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所需的资源,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处于这样一种过程当中的社会形式我们就叫它“去组织化社会”。

以上几个概念都应该看作是韦伯“理想型”意义上的概念,现实社会在实际上不会完全与上面几个概念所说的特征相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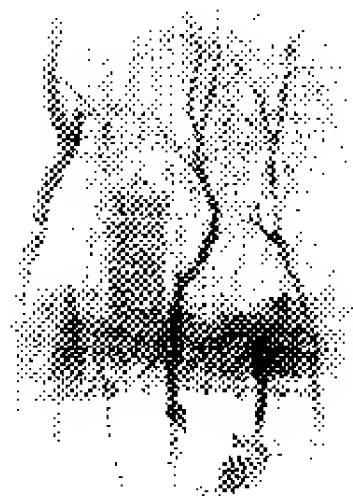
二、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个阶段

我们上面所使用的“个体化社会”、“组织化社会”、“去组织化社会”三个基本概念事实上反映了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三种基本形态或三个基本阶段。

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第一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个体化社会”阶段。

在17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在社会形态方面主要采取了我們上面所说的“个体化社会”这种组织形式。17世纪末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以后,首先在英国确立起了现代的政治经济体制,学术界一般把这一事件作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标志。从那个时候开始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里的西方社会,我们称之为个体化社会。主要特征是:小政府,大自由。“小政府”的含义是指政府对社会上的事要尽量少管,它的主要职责是对外捍卫领土的完整,抵御外来侵略,对内制定法律条令,协助维护社会秩序,裁决纠纷。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承担些经济建设方面的职能,搞一些基础性建设投资,但要尽量少,其他很多事情应交给社会成员自己去执行。“大自由”是指社会成员当中每一个公民在法律或制度上说都平等地拥有比较多的个体自由,而不是只赋予一小部分人以自由。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大自由”这个概念。有人说,在西方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因为西方在中世纪的时候自由就已经存在了,但专制政府到了近代才开始出现。但古老的中世纪的自由实际上主要是贵族的自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而不是每一个人平等享有的自由。



在现代社会里,一方面法律在形式上赋予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同等地享有各种自由,而不是只让一部分人享有自由;另一方面法律或制度在形式上赋予每个公民的自由相对而言是比较充分的,如就业自由,私有财产处置的自由,人身不受侵犯的自由,迁移自由,言论和出版方面的自由,等等。这种每一个公民在法律或制度上都平等享有的自由只有到现代社会才可能存在,在中世纪是不可能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社会里法律或制度在形式上赋予其成员的自由叫做“大自由”。

可见,在西方现代化的初期,人们所期待的社会形式包括两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是小政府,政府尽量不干预经济运作;另一方面,相应的是每个人在法律上或形式上都享有较多的个体自由。人们认为只要政府不去干预经济和社会运作,让个体享有充分自由,使个体能够利用这个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整个社会也就能够繁荣。这是英国革命完成后到20世纪初,整个西方国家的社会运作原则。用我所使用的术语讲,就是一个高度个体化的社会。在那里,处于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各种中间社会组织如工会、企业家协会等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当作是封建的东西而遭到禁止。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家庭、有村落,但家庭和村落组织既不是现代社会组织,而且也已经处于衰退当中。企业和政府组织虽然是现代组织,但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组织,它只是组织经济活动、政府活动的一些组织。所以这种社会,我们说基本上是一个个体化社会。

个体化社会有它的积极一面。和前现代社会相比,它在法律形式上赋予了每个公民比较充分的平等和自由。个体有了较多的自由,自主行动的空间发展了,个体的理性能力也能充分发挥了,不再受到包括宗教在内的多种外在权威的限制了,个人活动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的提高,这样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这种活力最终引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空前高涨,达到前人所不能想象的一个地步。

但个体化社会也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和消极后果。最主要的消极后果就是随着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物质生产财富的分配却越来越不



平等,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越来越尖锐,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进一步的负面后果,主要有:

第一,引发一种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这是社会不平等造成的重要负面后果之一。导致现代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由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所导致的社会购买力相对偏低。社会不平等扩大到一定程度时,必然促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危机。一方面社会的经济活力始终存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陷入相对贫困的境地,他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这就意味着在社会所创造出来的全部产品里面,最终的商品购买力即由多数社会成员的支付能力所形成的消费品购买力所占的比重会越来越小,供求矛盾会日益扩大,最终造成供求严重失调,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

第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有很多表现,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冲突越来越频繁。19世纪的西方国家充满了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它们有时候甚至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流血的冲突和斗争,如工人起义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第三,导致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普遍的精神危机。尤其是在弱势人群中造成严重的心理或精神危机。越来越多的人在心理上、精神上越来越焦虑,看不到前途,感到生活没有意义,精神不健康的人越来越多,自杀率越来越高。在十八九世纪,西方社会普遍经历了自杀率上升的阶段。

总而言之,社会不平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于是,19世纪的许多思想家们都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试图对这些危机作出诊断、开出解决危机的有效处方,结果导致各



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等。自由主义者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人们享有的自由还不够。虽然 19 世纪已经是自由化社会了,但是自由还受到很多限制。如选举议员时有财产限制,达到多少年收入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这样的后果是议会里的议员主要是由富人构成的,穷人没有代表。在整个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当中,不可避免地倾向于富人。所以,任由社会两极分化,结果就导致了多方面的危机。自由主义者开出的药方就是主张进一步扩大个人自由,降低选举与被选举人的资格限制,提出在议会里面,代表穷人与富人的议员比例应该是 1:1,这样就能够使穷人和富人有大体同等的议事和立法权,制定出来的政策就能兼顾劳资双方,缩小两者的差距,经济、社会和精神危机就会逐步缓和下来。

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保守主义者则认为各种危机的根源在于个体享有的自由太多。在前现代社会里,人们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好的社会秩序。家庭制度、庄园制度、宗教制度、王权制度、等级制度等,这些都是很好的制度。现代社会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人们通过革命把这些曾经行之有效的社会秩序全部给破坏掉了,使每一个人,不管是有教养的还是无教养的,有财产的还是无财产的,都可以享有充分的个体自由。这样的社会当然就会导致无序和混乱。他们认为消除现代社会各种危机的唯一的办法就是退回去,恢复以前行之有效的各种制度,如等级、王权、教会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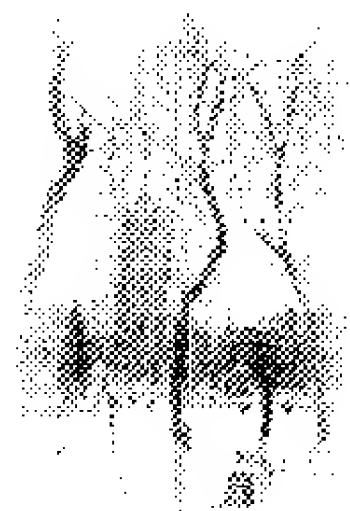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涂尔干的观点和上面几种观点都有所不同。他们认为 19 世纪西方社会面临的各种危机是社会转型尚未完成的结果。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把传统社会行之有效的那些制度破坏掉了,人们拥有了比较充分的个人自由,但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一整套法律、道德、规范以及社会组织形式又都还没有形成,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社会“失范”状态的出现。就此而言,西方社会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危机的确与个人自由程度的提高有关。在这一点



上他们的看法与保守主义者的看法大体是一致的。但是在孔德、涂尔干看来,想通过重建传统的社会秩序来解决危机是做不到的。人们不可能再从工业社会退回到传统农业社会上去,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我们能做的是根据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来重新建立一套社会秩序,即一套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道德规范、法律制度与社会组织形式。所以,在孔德和涂尔干看来,要解决早期自由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危机,需要的是在现有条件下重建一个社会秩序。重建社会秩序的措施、方案很多,其中一个就是重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把19世纪那种由孤立的、自由的、原子化的个体所组成的社会形式转变为一个大家都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处于某种组织当中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具体设想就是要把企业家和劳动者都组织起来,而且是要在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内组织起来。不仅仅是在每个企业中组织起来,而且要在地区一级、行业一级甚至全国一级组织起来,让地区、行业或全国一级的劳资双方通过有组织的协商谈判来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确立一些新的社会规则,如工资及其增长率方面的标准、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方面的标准、劳保福利方面的标准等。但是,孔德、涂尔干提出的思路,在19世纪时并没有很多人响应,基本上只是在学术界作为一种观点而流行。

由于一直没有对个体化社会进行大的调整,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经济、社会和精神方面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导致了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这种形势下,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企业家们才认识到必须要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以美国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政治家对西方发达国家普遍进行了体制改革。改革的具体内容虽然很多,但主要方向就是使社会重新组织化。其中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志性的内容,它们成为后来西方新型社会组织形式即“组织化社会”的三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政府开始转变自己的角色,从一种小政府开始向大政府转变。国家现在直接要介入到经济与



社会的运作过程中去。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直接投资办国营企业。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国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国民经济中占一个很大的比重。比如美国的国有企业投资从战后到 80 年代前一直占建设投资的将近 30%。政府还可以通过向私人企业订货、通过各种财政和税收政策来干预经济运作过程。政府现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对经济和社会的运作过程进行组织和协调,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与社会运作过程进行组织和协调。

第二根支柱就是福利国家。所谓福利国家,就是由国家出面来向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福利国家”的概念不等于“福利社会”的概念。福利国家意味着社会成员享有的福利,包括看病、养老、住房、教育等福利是由政府或国家来提供,所以称为福利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国家采用一种杀富济贫的办法,把国民收入中的一部分拿来作为国家福利,提供给社会成员。国家提供福利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救济型的,只给那些在市场竞争中完全失利的人。这些人在短期里没有竞争能力了,由国家提供一批救济金,维持最低生活保障。另一种形式就是保险型的,由国家强制实行并给予一定的资助,个人得到的保险利益与自己的收入和所缴纳的保费成正比,收入和缴纳的保费越高,得到的保险利益就越多,反之则越少。第三种福利形式就是平均主义的福利给付,国家在对社会成员提供福利时,没有任何资格限制,不分性别、种族、地区、信仰、职业、收入高低,平均提供一份福利。像瑞典等北欧国家,主要采取这种形式。

第三根支柱就是所谓的社会伙伴关系。社会伙伴关系主要指的是劳动者和企业家即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关系由过去那种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的关系转变成一种伙伴关系、合作关系。就是要像当年孔德和涂尔干所主张的那样,在国家的指导监督下,通过一系列制度性的措施,在地区、行业 and 全国范围里面将劳方和资方重新组织起来,让民间的工会团体和商会团体每年一次定期的就



劳资双方利益分配有关的问题进行协商谈判,通过相互之间的谈判来确立规矩,解决劳资双方利益分配问题。谈判的最终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在谈判组织管辖下的各个企业中,劳资双方都必须遵守。“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劳资双方谈判时有个大家都认同的重要规矩,就是工人的平均工资与该地区、行业或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应该以大体相同的幅度增长。

以上三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形态,使发达国家的社会从现代化社会的第一阶段进入到现代化社会的第二阶段,即从以往的那种个体化社会转变成为一种组织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由自由、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自己分别去进行,而是由国家、企业、多种多样的民间团体有组织地进行。劳动者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各种需要的满足也不完全只靠个人的努力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政府、工会的协助和支持来获得。这样一种组织化的社会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并日益尖锐的两极分化趋势,从而逐步缓和了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这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这是西方社会由个体化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的积极意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也大部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最终完成的。

但另一方面,由个体化社会向组织化社会的转变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弊端就是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活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能力降低。众所周知,相对而言,国有化企业的微观运作效率总是比较低下。福利国家也是一样,它杀富济贫,把富人用来投资的钱拿走一块搞福利,平等地分给社会成员,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而且由于在劳动者之间形成不管干好干坏都能得到一份福利的局面,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社会伙伴关系的负面效果更严重。通过劳资双方有组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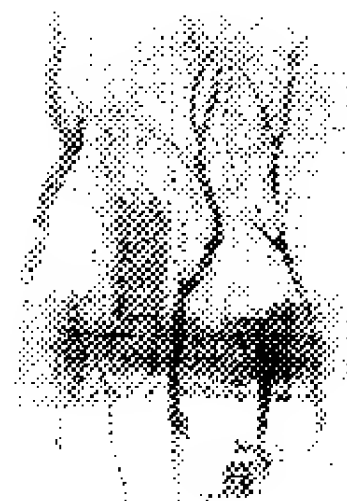
谈判来确定工资增长率,具有法律效力,企业必须遵守,这是对企业自主权的一个很大限制,使企业家不可能根据企业的生产、销售状况随行就市地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从整个社会上讲,市场经济运作的条件被破坏掉了。在发达国家里不仅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工资增长率和价格变化率的拉平化趋势,而且还造成了“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的工资结构和价格结构,使产品成本日益上升,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逐步下降。

当然,如果发达国家相互之间都是封闭的,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没有相互竞争,或者虽然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但各个国家在政府干预、福利提供和社会伙伴关系水平方面都是协调一致的,那么,上述所谓“弊端”并不会成为真正的“弊端”或问题。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参与相互竞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低效率,不会有太强大的挑战者出现。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可以出去,你也可以进来。因此,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个体化社会向组织化社会转变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从个体化社会向组织化社会的转变,但国家介入的程度不同,福利化程度不同,社会伙伴关系的完善程度及对企业家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也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可能是在全国一级进行谈判,对企业家的限制比较多,有的国家主要是在地区或行业一级进行谈判,也有一些国家只在企业里谈判。这就导致在发达国家里面市场运作机制受到限制的程度不一样,对企业家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不一样,因而企业活力降低的程度不一样。其中,组织化程度相对较低因而企业活力相对较强的发达国家是日本。在日本,国家对经济社会运作直接进行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也非常少,福利主要是由企业提供,企业效益好多提供,效益不好就少提供,比较灵活;而且由于日本没有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没有全国的工会与企业家对抗,只有企业工会组织,使日本企业家能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劳动者实行更有效的



控制和管理,结果是日本工人的劳动效率和强度都高于欧美。与欧美国家的工人相比,日本工人平均工资要低,劳动时间更多,劳动强度也更大,这也使得在与欧美具有相同技术条件的情况下,日本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其劳动力成本相对就会更低。于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如汽车和电器纷纷涌入欧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美制造业的不景气状况。日本的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强,以至于有人说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则可能是日本的世纪。在这种情况下,欧美社会又面临着新的危机,它的国有企业、福利国家体制、社会伙伴关系很难再坚持下去了,受到了挑战。大家开始意识到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状况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条件,限制了企业家的个人自由,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活力,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国家制造业部门的企业家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一部分企业就从工资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跑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先是跑到本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去,然后跑到国外发展中国家里面去,从而给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带来一个工业化的机会,并逐步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这也是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冒出来的原因之一。另一条出路就是改行,把工厂关闭,转到别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里去。欧美国家传统制造业部门的企业要么纷纷迁厂,要么转行,其直接结果是在欧美国家普遍引发了一轮“去工业化”的浪潮。同时导致了其他一些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一是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收到了严重影响,不仅影响了政府的政策运作,而且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也难以为继,使福利国家体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危机;二是工人大量失业,工人原有的社群自然解体,社会伙伴关系也陷入困境,社会秩序也不能不受到新的威胁。

于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下,发达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面转变。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运作过程的干预程度,包括通过将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量出卖给私人等措施来降低国有



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及降低税率等;二是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降低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以平均主义形式给付的福利种类等;三是减少对工会组织的支持,增加资方的权力和鼓励资方“灵活使用劳工”;等等。从社会结构上看,这样一个转变的结果是使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了,使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我们所讲的“去组织化”阶段。整个社会重新向个体化形式转变,社会在形式上重新赋予个人以更多的自由。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企业家比干预主义时期更自由了,能力更强了,灵活性更大了,全球化的经济系统也使他们可以去世界任何地方。但就工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跟以前就不一样了。和以前相比,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和以往相比要在更高的程度上依靠自己,而不能依靠政府以及工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了。政府提供的福利少多了,工会组织也很难帮他了。在很多“去工业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传统的产业工会组织甚至都瓦解了。所以克林顿后来呼吁美国人民要加强邻里互助,搞社区建设。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社会组织形式方面引发的重新向个体化社会转变的趋势,或“去组织化”的趋势。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它不可能完全转变到 19 世纪那样完全个体化的状态上去。政府不可能重新变成 19 世纪那样的小政府,福利国家体系也不可能彻底瓦解。所以人们把这场改革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改革。

三、中国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

以上讲的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讲西方的现代化过程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现代化过程,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过程。现在我们就来讲一讲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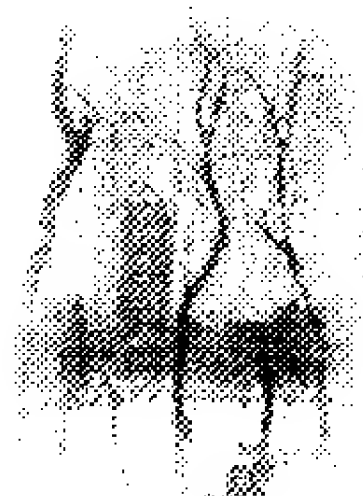
中国的现代化严格地说应该是从 20 世纪初随着清王朝被推翻才



正式开始的。清朝时虽然也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但基本上属于小打小闹,没有对国家和社会的体制、结构产生有实质性意义的影响。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是辛亥革命,迄今为止只有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大体上我们也可以把这不到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是从辛亥革命到 1949 年之前,大约经历了 30 多年的时间。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体制既和 19 世纪的西方社会有区别,又和同时代的西方社会有所区别。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虽然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但即使在工业化的城市地区也并没有完全转变成一个 19 世纪西方社会的那样的一种个体化社会。首先,是存在着较大比例的国营经济比重。其次,是存在着一些基层性社团组织,如工会、农会、商会等等。但我们也不能称它是一种组织化的社会。因为从整个社会的结构来讲,和后来西方国家形成的组织化社会相比,1949 年之前的中国社会其组织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即使在城市社会中也是如此。首先是国家介入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从整体上看还是很低,无法和后来的西方国家相比;其次是根本不存在着什么福利国家系统;再次,也不存在着任何真正意义上阶级合作机制或社会伙伴关系,存在的只是阶级之间的对抗和冲突,整个社会总体上处于一种无组织或低组织状态。这样一种体制,再加上外部的入侵,中国的现代化确实是步履艰难。民族经济发展不起来,政府能力有限,无法有效解决内部的各种社会问题,结果导致社会内部危机四起。

1949 年以后中国进入共和国阶段。从 1957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有二十几年采取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对应的是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一种最高程度的组织化。整个社会完全被组织在国家这个单一的组织系统之内,国家和社会几乎完全合为一体。各种经济、社会组织如工会、共青团、协会、企业、事业单位,都是变相的国家机构,都是国家这个庞大的科层体制中的一个部门和环节。每个领导都是国家行政机构里的一个行政官员。工会组织有行



政级别,企业领导也有行政级别,如司局级,团级,科级等。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几乎都是由这些作为国家体系当中一个环节的“单位”来组织进行,个体基本上没有什么自主行动的空间。但同时你个人对自己也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责任,你以及你的家庭成员的生存与发展几乎都由国家包揽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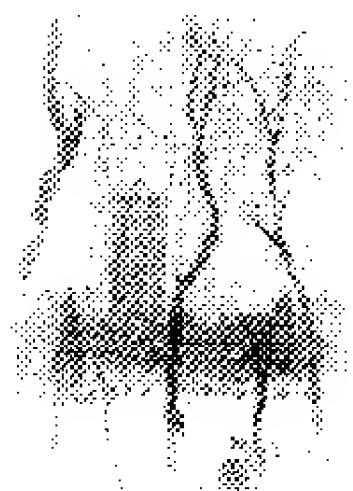
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一方面,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来讲,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是个落后的国家,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现代化过程起步晚。我们开始大规模进行工业化时,西方的现代化已到了很高很成熟的地步。那个时候,西方企业的实力已很雄厚。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开始起步时,民间企业的规模很小、资金有限、技术水平低下。单靠民间企业自身的力量去与国际上的大企业竞争,肯定竞争不过。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些私人经济以外的经济力量(譬如银行或者政府)参与到现代化竞争中去,通过这些力量来募集资金、进行投资,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也不得不有一部分国营经济的主要原因。而到20世纪中期的时候,西方发达社会也已经进入了组织化社会阶段。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一个企业家可以支配比以前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因而实力就更雄厚了。你若不相应提高经济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就更竞争不过他们。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由一种最强大的公共力量即国家出面来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由国家这种强大的公共力量出面来组织经济和社会运作,有它特殊的优势。因为国家掌握暴力,拥有强大的资源筹集能力,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剩余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它可以有办法让老百姓都勒紧裤腰带将碗里的饭掏出来去支援经济建设,这样就可以集中资源进行一些基本建设和重要投资,如修公路、铁路,建水库,建大型骨干企业等。应该说改革开放前二十几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还是很大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如前面说过的那样,这种社会体制的内在缺陷也是很明显的。与组织化的西方社会一样,高度组织起来的中国社会



也缺乏微观的活力。什么都是国家包揽了,什么都要由国家说了才算,没有市场运作,没有个体自由,一切都要按计划进行。只有国家一个方面的积极性和活力,大多数人都没有积极性和活力,这样的社会其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必然很低。但也和我们前面讨论西方发达国家时说过的一样,如果这个社会是封闭的,没有外来的挑战者,那倒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不会有严重的生存危机。因为在本国内部,大家的竞争能力都很低,甚至没有竞争,所以也就无所谓。但这个局面很难长期延续下去。因为你能闭关锁国于一时,却无法封闭于永久。

所以,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前苏联的社会体制开始重新转型时,中国领导人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也不能再按老样子走下去了,我们也要改。所以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也走上了体制改革之路。我们的改革尽管在本质上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体制改革有根本差别,但在改革的政策取向方面与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大同小异,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改革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将原来那种带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福利体制转变为一种以救助和保险为主的福利体制,重建劳动关系等等。随着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国家逐渐从直接的经济与社会的组织管理过程中退出来,放权让利,给企业和单位自主权,也给个人以相当的自主权。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空间增加了,但个人对自己的责任也增加了。和西方社会一样,社会也进入了一个以“去组织化”为特征的新时期。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日益地降低,个体化程度在增长。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活力,激发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使经济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处于高速增长过程中。这个成就大家有目共睹,也都享受到了。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负面后果就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提高,社会两极分化程度日益加剧。从今年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统计数据看,一方面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上了一个新台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罗斯托等人所讲的“起飞”阶段。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但同时,我们的社会



不平等与分化状况也在日益加剧。我们国家的基尼系数已达 0.4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指数,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是巴西,达到 0.6 左右。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基尼系数超过 0.4 就表明社会不平等程度已经很高。可见,我们国家的社会分化程度已在世界上居于前列。城乡之间人均收入已扩大到了 3.2:1,实际福利之间的差别就更大,是 6:1;我国包括股票、债券、存款等在内的全部金融资产的 60%—80% 仅仅为 20% 的人所占有,剩下的 80% 人口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20%。整个社会的结构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中、上层人口占 20%,其中中等阶层占 7%—15%。东、西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比值也达到了 2.5:1。

社会的两极分化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经济与社会后果: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引发了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大多数人的购买力不能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最终必然导致供求总量失衡,引发生产过剩。90 年代后期以来,我国的物价有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大量的产品销路不好。过去我们曾经把资本家往河里倾倒滞销的牛奶当成资本主义制度腐朽的例证之一写进小学课本,但近年来在国内的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商人在商业不景气的环境下也在干同样的事情。

第二,造成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尤其是穷人和富人之间、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干群之间的激烈对抗情绪,毒化甚至恶化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很多人长期生活在一种朝不保夕的状态之中,没有正常、稳定的谋生渠道,久而久之,必然产生心理危机,对相对富裕阶层,甚至对整个社会充满仇恨。媒体上关于恶性案件的报道几乎天天都有,读者对这种报道差不多也已经麻木了。这些案件有些是针对富豪阶层,但也有很多是针对普通平民的。现在的许多案犯几乎不分男女老幼贫富官民,几乎见人就抢,甚至为几百块钱就害人性命。深层的原因就在这里。

第三,使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结构日益变得高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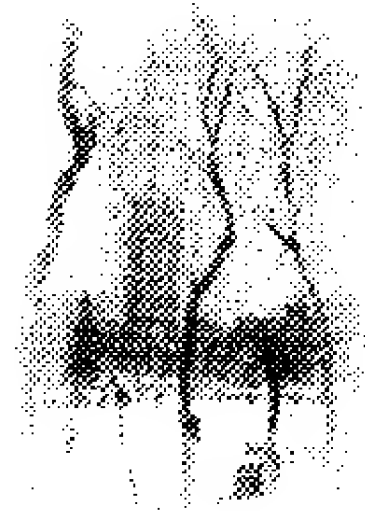


向型。由于社会分化严重,社会整体消费购买力上不来,很多企业觉得自己的产品在本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就想方设法到海外去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到海外扩展市场。去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近30%是靠对外出口,这是好事。说明中国人有本事,能赚别人的钱。但同时也要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的隐患。一旦别人要制裁我们,或战争爆发,你卖不出去了,你这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三分之一不就没有了吗?这是一个隐患,如果不及时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对国外市场的依存度会越来越高,潜在的威胁就会越来越大。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面对上述消极后果,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设想出很多不同选择。

一种选择是我们就继续按现在的样子走下去。两极分化就两极分化,随它去。我们要尽快实现现代化,就要加速推动经济增长;要加速推动经济增长,就必须使社会有活力,使企业有国际竞争力。为了使社会有活力,就要牺牲一部分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为了使企业有国际竞争力,就更需要通过两极分化来确保企业始终能够得到大量价格低廉的劳动力。因此,单纯从经济增长角度讲,从提高我们国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角度讲,社会的两极分化还是有一定好处的。如果中国企业家很争气,也很努力,能够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善管理,再加上由两极分化所造成的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其国际竞争力就可能越来越强。这意味着即使在国内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照样有可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持续发展和繁荣起来。从理论上说,仅仅通过不断开拓海外市场,国民经济就完全可能以7%—8%的年均速度持续发展,不会遭遇太严重的经济危机。也就是说完全可以出现这种局面:一方面国内社会两极分化程度越来越高,但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照样能够持续增长和繁荣。这就是很多人所讲的社会“断裂”现象。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断裂”成两部分,其中的一部分人和海外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靠海外市场就够了,而另一部分人则被从经济和社会过程中甩出去了,甚至被遗忘掉了。经济的增



长和繁荣既不依靠他们,也和他们无关。因此,一方面是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另一方面则是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尖锐,社会秩序可能越来越差,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很强的一个反差。这就是第一个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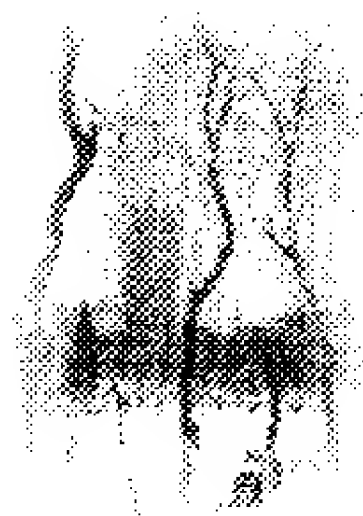
第二条思路,就是从现在开始立即采取各种相应的措施,去缓和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譬如,我们国家公民享受的福利水平能不能提高一点。我们现在的福利化程度很低,比欧美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低。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的人口比例太小,基本上未把农村人口包括在内;我国的福利形式基本上是救济型和保险型,平均分配的很少。我们可以考虑把一些最基本的保障项目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扩展到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全体公民;我们也可以考虑大幅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例如将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从“保障生存”提高到“保障有一种体面的生活”);我们还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具有平均给付性质的福利项目,例如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降低公立大学收费水平等等。此外,还可以考虑在劳资双方之间重新建立社会伙伴关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在国家监督下把劳资双方重新组织起来,使劳资双方之间不仅是一种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而且还是一种共存共荣的社会伙伴关系,让劳资双方通过定期的、有组织的协商谈判来解决与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相关的一些问题,譬如工资标准及其年度增长率、劳保福利、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等等,使广大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和实际福利能够与企业利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而同步增长。总而言之,就是要参照“二战”前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对社会进行再组织化。如果采用了这样一些措施,应该能够对我国社会的两极分化趋势起到较大的缓和作用。

然而,正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所显示的那样,通过上述各种措施虽然可能对社会的两极分化起到较好的缓和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但它们同时又会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譬如,老百姓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平均劳动力成本就会上升。当你的劳动力成本高于有可能和我们一起参与国际竞争的其他落后国家(譬如越南、老挝、柬



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以及拉美,甚至非洲的一些国家)时,同这些国家的企业相比,你的国际竞争能力就会相对降低,不仅你原来已经获得的国外市场可能慢慢失去,而且在国内市场也对外开放的情况下,你的国内的市场也会逐渐被那些更具相对竞争优势的国家的企业所占领。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就可能像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出现一种去工业化的浪潮。不仅外国资本而且中国本国的资本都有可能跑到那些劳动力成本相对更低的国家中去,中国的制造业将因此而逐步衰退。在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不能尽快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就将同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国家一样面临一系列新的困难和危机。

实际上,回想一下我们前面对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描述,我们就会意识到,上面讲的第一种思路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采取的思路,而第二条思路则是发达国家在“二战”前后所采取的思路。区别只在于:第一,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想按第一条思路一直走下去最终却没能走通,而我们现在如果想按这条思路去走的话却有可能走通。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对于因社会两极分化导致国内市场狭小而遭遇经济增长瓶颈的国家来说,依照第一条思路所确定的经济增长策略其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既相当广泛又相对成熟的国外市场的存在。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前提条件是自然存在的,而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西方发达国家来讲,这一前提条件却基本上是不具备的。所以它们最终不得不进行体制改革,走上了上面所说的第二条道路。另外,第二,当20世纪中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因采取第二条发展思路而面临上述困境时,它们最终通过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的办法来摆脱了困境。由于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使得“去工业化”过程所造成的那些不良后果(经济停滞、财政危机、福利化程度降低、失业率上升等)逐渐得到了遏止。而我们在面临同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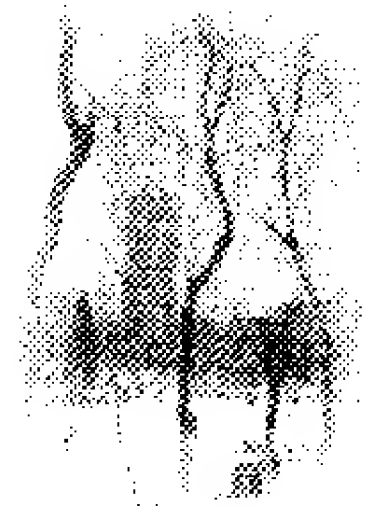
困境时,却未必能够通过同样的办法来得到同样的结局。这还是由这些国家和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相当不同这一点所决定的。当这些国家的传统制造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成本相对提高而逐渐失去国际竞争优势时,它们所发明的任何一种新技术、新产业却都仍然是国际领先因而具有强大国际竞争优势的。因此,它们在传统制造业部门所失去的竞争优势完全可以逐渐由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所带来的竞争优势所替补。然而,对于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旦我们的传统制造业部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失去了国际竞争优势时,我们却很难再找到一个能够使我们重新获得某些新的国际竞争优势的替代部门。除了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落后地区或落后国家转移之外,我们的一些企业可能也会选择向高新技术部门转移。可是,由于这些部门主要是技术密集型部门,我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相对西方发达国家所具有的优势基本上没有意义,而在技术方面(尤其是核心技术方面)我们又很难占有优势,因此,这种转移很难产生西方发达国家在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变时曾经产生过的那些同样的经济、社会后果,例如推动经济重新复苏、就业重新增长、社会重新稳定等等。

所以,在我们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面临的是一种非常艰难的抉择。我们应该怎么办?从理论上和原则上讲,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在上面两种设想之外的第三种解决办法或思路,这就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的办法。我们的企业家、政治家、学者应该努力找到一套办法,通过这套办法既可以改善我国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缓和我国日益尖锐的两极分化趋势,提高社会平等程度,但同时又能够不降低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是否顺利,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一点。如果能找到这么一个平衡办法,那么我们国家就能走出困境,前途将无限光明。如果找不到,那我们今后就会面临一系列困难。所以,我们应该鼓励每一个有志于中国发展的人去进行这样一种探寻,而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都有责任去进行这么一种探寻。或许,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尽管这条办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



难,但我们还是要尽力去做。因为,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我们已经别无选择。

(此为 2004 年 11 月 13 日晚应北京大学学生会邀请在第三教学楼 105 教室给北大同学所做学术讲演的记录稿)



从感应认知到理性的理论

■ 陈嘉映

陈嘉映,1977 到北大西语系读德语,不久后到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读西方哲学,1981 年毕业后留校,1984 年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读博士学位。1993 回国,翌年回北京大学执教,2002 年转到上海华东师大,继续教书。

译著有: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与人合译);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语言哲学》、《旅行人信札》;编著:《“存在与时间”读本》,文集:《思远道》(后改名为《从感觉开始》)、《冷风集》、《无法还原的象》。

我讲的题目是科学、哲学与常识,或者是科学世界与常识世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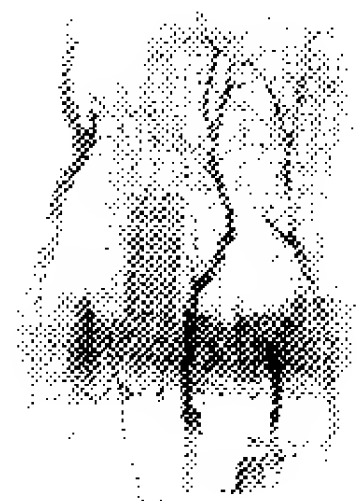
科学世界和日常世界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 20 世纪哲学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我们一般生活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原因大概是这样,科学已经提供了一个从大爆炸开始,一直到人类诞生,一直到

^① 这是我 2004 年 10 月在北大所做的系列讲座的总题目。这个系列讲座共六次,这是第一讲的内容。这里发表的内容由北大团委录音、转换成文字,我自己做了整理和修订,补充了少许课堂上因时间限制未及讲述的内容。



我们今天周围世界的一个整体的画面,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知道,是我们的日常思考完全无法提供的;而且科学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这一点我稍加解释,因为现在有一种观点,在科学哲学里叫做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科学也不过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就好像科学不过是另外一个圣经故事,或者是另外一个阴阳五行理论。我觉得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科学不是这样的东西,它通过对事件的预言,也通过技术性的生产,生产我们现在使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也生产原子弹、氢弹这些东西,它通过这种种途径证明了自己的真理性。这里提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能力,一个是预言能力。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像人文学者反复强调和指出的,这种科学认知的方式似乎已经排斥了甚至摧毁了我们日常的道德诉求、艺术理想等等,因为在科学图景中没有道德的地位,也没有艺术的地位,从物理学到心理学都不研究这些,或者说他们的研究成果将粉碎我们对道德和艺术的偏爱或兴趣。因此,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强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的有效性和真理性,另一方面它对我们的道德和艺术提出了挑战。正因为如此,科学世界和日常世界之间的张力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

我们有几种方式看待这样一个局面。第一种方式是所谓科学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真实的世界就像是科学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至于自由意志、道德要求、爱情和友谊,所有这些,平常看到的或平常用来思考的东西都是一些幻象。第二种方式就是我们所说的建构主义,认为科学只不过是另外一套意识形态。当然我这样陈述这两种观点太简单了,它们都有很多精致的表述。第三种方式,有很多思想家,包括人文学者,也包括科学家,希望能够发展出一套方案来证明科学真理和常识世界是兼容的。这些方案非常之多,比如海德格尔的方案,他从人的此在开始,认为人的此在是最原始的,科学是人的生存活动的一个分支,因此,需要从人的原始生存来解释科学,而不是相反,不是从科学来解释人的生存。这个方案会碰到它自己特有的一些问题。另外一个方案,比如美国哲学家蒯因的方案,他提出了本体论相对性这样一个概



念,认为物理学或者荷马神话或者什么,是一些不同的体系,各个体系自己的概念框架保证了它的真理性,如果你在物理学的体系中,你就会像亚里士多德或牛顿那样思考,但如果你碰巧是一个基督教徒或者是古希腊人,你相信上帝造世或荷马神话,你就有另外一个世界体系。这些体系都摆在那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选择哪一个体系。这个观点也会碰到它的困难。

在 20 世纪通过哲学上的和一般人文学科上的所谓语言转向之后,这些问题又和我们对语言本质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有些科学术语是从日常语汇中借用来的,比如力、光、能量、运动,但是它们却被赋予不同的意义。这些意义是怎么来的?有些术语是科学自己创造出来的,比如质点、虚数等等,这些概念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没有的,那么它们是怎么被赋予意义的?比如说光这个概念,在物理学中有不可见光这样一个概念,和我们平常所讲的光差不多是相反的,平常光就是本身可见的或者使东西可见的。比如我们平常说的静止,现在被说成是匀速直线运动,本来静止就是静止,运动就是运动。我们可能都已经习惯了现代科学的说法,不觉得运动状态这样的说法别扭了,本来,运动和状态是不相容的,比如语法里面区分过程词和状态词,现在大家都习惯了运动状态这样的说法。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哲学问题,但对当代语言哲学多一点儿了解,对思考这些问题是有好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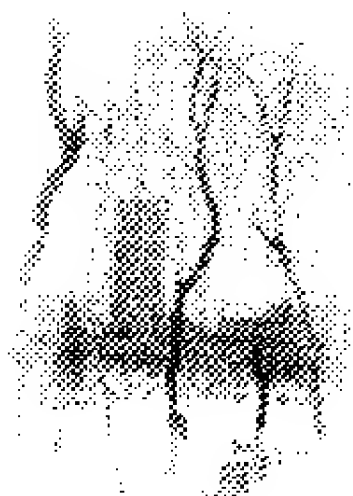
科学世界与常识世界是什么关系?科学概念和日常概念或曰自然概念是什么关系?面对这个大问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在这个讲座里,我们会谈到古代科学到近代科学的转变,比如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牛顿的物理学,它们是同一种物理学还是两种物理学?我们要谈到现代科学的特点,我们都知道现代科学具有数学性、实验性、假说性质和集体研究的性质,我们想看一看这些特点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此外,我们想问一问科学概念和我们日常使用的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总之,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科学世界离日常的理解越来越远?我相信越来越远是个事实,现在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甚至教授,对绝大多数科学



都不懂,而想懂任何一个科学的分支都需要很多年的学习和训练,它所使用的概念和方法已经离我们自然理解和日常理解越来越远,它所描述的世界和我们的日常世界越来越远,这是怎么发生的?我们还想回答这样一类问题,科学知识是否削弱我们的道德意识和艺术感?抑或这真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科学管科学的,艺术管艺术的,道德管道德的,就像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在我们的讨论过程中,我们希望能够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十六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上,但在这之前,我想先谈一点儿感应思维和理性的兴起以及在希腊出现的哲学,我们可以把哲学视作理性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一两个钟头里谈论这么多内容,显然只能是极其粗略的,但我希望能为我们后面谈论希腊的自然哲学和近代科学提供一个粗略的背景。

初民的思考方式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参照点。远古的人类把世界上的事物理解成互相感应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人类学家给予不同名称,有的就叫它原始思维,有的把它叫做巫术同一律,有的把它叫做互渗律,有的就叫感应思维,下面为了简明起见一概叫它感应思维。感应思维可以这么举例,死人和活人是可以互相感应的;星辰和生死、兴亡和荣辱互相感应,什么星星预示着吉兆,什么星星预示着或者象征着死亡;女人怀孕是在梦里受孕的,梦见了神人,或者跑到山里踩了一个脚印,就怀孕了。远古的人相信这种东西,不是说踩那个脚印或者梦里的形象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怀孕的原因,这里面没有因果,不是一个原因导致的一个结果,它是一种感应,甚至是一种感动。我们都知道魔魔法,扎一个小人,往上扎针,然后让你伤了或者死了,甚至我慢慢地说你的名字,这样就能伤害你。我们经常讨论巫术,巫术很明显是一个控制感应的技术,我们现在控制导弹是通过因果关系、通过物理机制来控制的,远古的人编个稻草人是通过感应来控制这种巫术的。或者跳大神,那是一种感应式的治疗方式。初民之间的战争包括了大量仪式性的东西,去掉对方的阳气,增加自己的阳气,都是通过这种方式操



作的。有些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远古时候,这种感应思维是无所不在的。我们把它叫做远古人的思考方式,或者野蛮人的思考方式,但在我们心里还留存着这类思考方式的很多遗迹。我们现在叫做迷信的东西大概百分之九十都是感应,包括意念致动,比如瓶子没打开,药就到手了。(有人相信意念致动,但认为那不是感应,可能是个隐秘的物理过程,药片变成粉末,到手上又结合成药片。也有人这么相信,但这种人很少。)梦里或者其他的白日梦一类想像里,有很多感应思维的因素。这些我们更加熟悉。我们清醒的时候也有很多例子,比如到庙里烧香求签,占星术、降灵术,招魂,这些东西在我们现代社会中仍然相当流行。也许我不去烧香,不去拜佛,也不去祈雨,但是有些想法我们每个人都很难逃脱,比如,有个恶人朝你的父母照片上吐唾沫或者扎一个钉子,你肯定怒不可遏。其实你知道这在物理上对你所爱的人不会造成一点伤害,但你仍然怒不可遏。在孩子身上可以观察到更多的感应思维,幼儿心理学家都能举出大量的例子。所以感应思维不仅远古人有,而且在现代也常见。

相信感应跟相信因果是不一样的。在物理因果关系中,受动的那个物体是完全消极的、被动的,比如施力给桌子,桌子是完全消极的,力来了它就动,力撤了它就不动。感应不是这样的,双方是互感的,就像是对呼唤的响应一样。你去感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被动的,它有所感、有所应和,它在受感而动之际是积极响应、积极回应的。正因为有这个重要区别,我们就要避免把我们自己的因果观加到初民头上。他扎一个小人,然后拿针扎它使敌人受伤,你要问他是什么机制造成了这个结果,这个问题他是没办法回答的,因为对他来说不存在这样一个物理因果的关系。

因果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佛教里的因果报应,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原因和结果。这是非常好玩的一件事,佛教里的因果报应恰恰是感应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你做了件坏事,然后你得到报应,这里面不是物理的原因导致物理的结果。而现在所讲的因果,物理因果,



虽然是从感应因果来的,但这两者非常不同。我们若有时间细致考察一下“因果”这个概念的转变,那就可以看到,感应在原始思维中所处的地位与因果在现代物理中占有的地位一样,都是核心地位。

我们会想,相信感应是迷信,没有道理。初民愚昧,他们相信那样一些愚蠢的念头。就像义和团相信自己受了什么功,刀枪不入,真刀枪不入当然好,但是他不是,上去一枪还是把他打死了。你扎一个稻草人让他受伤让他元气受损,但客观上并没有得到这样的物理效应,可见这些初民挺愚昧的,但做出这个判断至少会碰到一个问题。达尔文时代以后的人,在思考这种问题的时候,难免会碰到一个问题,一个重大的问题。从进化或演化的观点来看,今天的人进化了,今天的人聪明,以前的人笨,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反过来想,假设人是猴子或者黑猩猩变来的,那么,初民虽然不如我们聪明,他们应当比黑猩猩聪明。黑猩猩是现实主义者,它们很实在,当黑猩猩变成初民之后,怎么会从一些现实主义者变成一些迷信的人呢?当时的人也得对应他的那个环境,他不可以那么傻,那么愚昧。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也许你没有想这个问题,但我要这么来问你的话,你恐怕得承认这是个问题,不能马上给我一个好的回答。按照进化学说,什么时候迷信都不应该产生。我们当然会犯错误,任何一个族类、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犯错误,但是长时间的,我说的长时间是几十万年,在迷信方面越陷越深,这个不能设想。因为初民也生活在现实之中,它的本能和精力得用来应付现实,而迷信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它并没有物理效应——当然它不能有,否则它不叫迷信。

这个问题在人类学家中也有讨论。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是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马林诺夫斯基大家比较熟悉,是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夫斯基不同意他的前辈的人类学家,前人讲巫术或者感应思维对于初民是无所不在的,马林诺夫斯基说不可能这样,因为原始人像我们一样,他们要生火,盖房子,烧瓦罐,要捕鱼,要抓野兽,要种地,要治病疗伤,如果他成天在那儿算卦跳大神,这个物种早就灭绝了。据马林诺夫



斯基考察,实际上初民只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才大量使用巫术。在什么事情上呢?那些反正你拿它没办法的事情,比如说祈雨,祈雨并不能使它下雨,但是不祈雨它也不下雨,不像捕鱼,编好渔网辛勤下海就能捕到鱼。还有海上的航行,我们知道水手的迷信特别多,水手的仪式特别多,因为人对海洋的力量几乎是不能控制的。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讲,从积极方面讲,仪式、巫术等等则有着进行社会组织、社会动员等作用,这些我们就不讨论了。

马林诺夫斯基解释了问题的一部分,但不够让人满意。马林诺夫斯基的解释允许迷信的存在,只要它不是那么无所不在就行,迷信也许只占据原始人生活的五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是,按照演化的原则,似乎根本上就不会有任何迷信产生。我觉得,感应思维的产生,不能完全从功能主义得到解释。要说清楚这一点,就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考虑演化理论,我们在这里无法尝试这项任务。我只想说,我们人类跟黑猩猩有一点不同,人类,包括初民在内,不仅是在应付这个世界,而且他想理解这个世界,提出黑猩猩不会提出的一些问题。他会追问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种族的起源这样的问题。他也许不会像我们一样清晰地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想理解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只把巫术视作一种意在实用的技术,毋宁说,它首先是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发现初民把巫术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很多事例,但是我们不应轻易把我们的技术发明投射到巫术研究中去,仿佛初民为了对付一种情境发明出某种巫术,为了对付另一种情境发明出另一种巫术,毋宁说,巫术首先是对世界的一种整体理解,从这种整体理解出发,碰到具体的事情用某种巫术来对应就可以是相当自然的。差别恰恰在于,根据科学的因果观念,每件事情是由特定的原因导致的,因此对待一件特定的事情,我们可以谋划一种特定的技术,因此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技术观念,技术创新观念等等,这些东西是不能投射到初民头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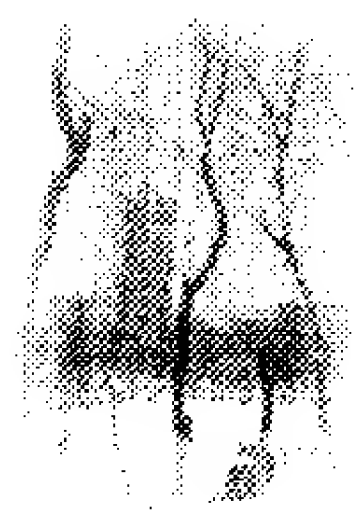
然而绕了一圈,我们不是又回到原点了吗?我们不是仍然要解释,初民怎么会 对世界有一种整体上错误的理解呢?一种技术是否有效,



祈雨是不是能够带来雨水,这件事情比较容易确定。但是我们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是否正确,这件事不是那么容易确定。我们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物理学是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确的世界图景?这是唯一正确的世界图景抑或是很多正确图景中的一种?这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这是个通常所说的哲学问题,或者说是个概念问题。就是说,说到整体认识,怎么算是正确不正确?我们会一步步说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说到近代科学,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正确”的含义本身也在变化。我们现在不急于断定感应思维正确或不正确,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感应来理解世界是有些道理的,比如日出与生命的出生、兴旺,日落与衰亡,这种联系是那么自然,从这样的联系来理解世界,在所有文化中看到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简直无法不从这样的联系开始来理解世界。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就说,人天生求理解。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解有特定的含义,我们怎么叫做理解了一件事情,理解了一个人或者理解了世界,亚里士多德有一套他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可以宽泛地说,理解世界的冲动定义了人之为人,从初民一直到我们都希求理解,哪怕我理解的是错的,我也要理解。哪怕是一种粗浅的、错误的或者我们叫它迷信的东西,总比没有理解要好。哪怕这种理解没有实用价值。我喜欢举一个例子,破案的电影结局的时候,一个已经垂死的人,还要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了也没有用了,但是他还是想知道,知道了就安心了,明白了,死也无憾了。

在感应思维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能看到一种情况,一个民族发展出一个神话系统,这些神话包括了世界的起源、人类的起源、自己种族的起源、人类的生活规范、本民族的生活规范——当然所谓本民族的生活规范就是人之为人的生活规范。这种神话系统对世界做出统一的解释,在这样一个神话系统中,有一个 micro world,一个以人为代表的微观世界和整个宇宙互相对应,骨骼和石头对应、毛发和草木对应、呼吸



和风对应。这样的神话系统出现在文字时代到来之前。

按照对文字的最宽泛的定义,大概在五千年前就出现了文字。不过,文字最早就像一些神秘符号,由僧侣和史官等极少数人掌握。大概直到公元前八百年的时候,在埃及、希腊和中国,文字才开始有了广泛的使用。公元前八百年左右是一条大致的分界线,这是历史学家都承认的。一个新时期出现了,不同的研究者通过强调某些特点给新时期以不同的命名。一是城市的出现, *civilization* 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有人把它叫做阶级社会的出现,是从社会结构的方面来说。一个是信史的出现,可信的记载下来的历史,信史出现之前的历史,口述的历史和神话纠缠在一起,叫做史前史。在所有这些特征中,文字的普及在我看是最关键的。例如,信史既然是用文字记载的,当然依赖于文字,信史是和文字的普及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从中国历史看到,以前的文字都在史官手里,到了春秋时期,逐渐兴起了士的阶层,他们掌握文字,会书写;但他们不属于特定的官府,文字不再是由官府垄断的东西,此所谓王官之学失其守而降于民间。在我看,对我们所要讨论的新时代,文字的普及明显是最重要的。

但在讨论文字普及之前,我先谈谈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雅斯贝斯所说的 Axial Period 大致涵盖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这个提法跟文明等命名法不一样,它不是用当时所出现的一种突出的东西命名的,比如城市啊、信史啊、阶级啊。轴心时代的意思像是说,从这个时候展开了一个新的时代,就像从画轴上展开一幅画卷那样。要是这么理解,我倒觉得此后两三千年都归属于轴心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画面不同了,但还是在同一轴画上,当我们往前看时,我们眼光的尽头是春秋战国,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眼却看不到春秋之前。春秋是我们的 horizon,是我们视野的尽头。你能理解孔子、子产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开始了我们的历史画卷,从他们开始以后的人类活动,是由历史学家研究的,他们之前的人类活动则要由人类学家作为科学对象去研究,通过实证方法去研究。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仍然是轴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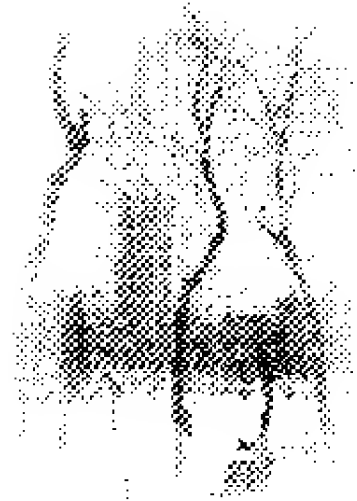


时代的展开,当然也许已经展到头了。

《诗经》被称作经,孔子被立作我们民族的圣人,因为这些人物的作品是一整个画卷的文化原型。比如你是个哲学家,我是个哲学家,我们俩哲学谁好,可以一争,你是个诗人,我是个诗人,谁的诗好也可以一争,但是你不会去跟《诗经》争,不会去跟孔子争。主要倒不是说孔子的思想深刻得超不过了,正确得超不过了,而是说,孔子提供了一种原型,你是在那个原型里做事,在这个意义上,无所谓你超过超不过,和孔子一较短长没有意义。

孔子、子产、管仲提供了何种原型呢? 我们有这个印象,商朝重鬼神,周朝重天道,到了春秋时代,孔子、子产、管仲把天道和人道合在一起来看待,这些人完整地代表了这种重人道远鬼神的态度。我觉得,不妨把这样一种态度叫做理性态度。理性是一个太大的词,有太多的词义,我们无法不用到它,但是要比较小心。

我们眼下称作理性的东西,和文字有一种因缘。文字带来了一种横向的交流,带来了一种共时性,不同的文化、世界观、观点,并列存在。即使是从前写下来的东西,仍然原样放在那里,也和现在写下来的东西具有某种共时性。不同的观念并列杂陈,没有一种天然的统一性,我们需要一种超越于特殊传统之上的东西,来建立不同观念、不同文化的统一,宽容、客观性等等因此而起。以前的史前史,民族的神话,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等等,都是通过口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属于一个单一的民族。当然我不是说横向的交流一点都没有,物品和观念都有些横向交流,但是观念体系是竖着传下来的,有点像犹太教那样单传给自己的子民。在旁观的研究者看来,口头传统其实也一直在变,但是生活在这个传统里的人,由于接受的是口传的传统,没有古时候的文本作参照,只有一个现存的版本,所以觉得他只有一个统一而稳定的传统。但是文字文本不同,它可以在不同的民族、种族之间传播,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同一个民族中,传统在不同时期留下了不同的版本。从这个角度看,“史前史”这个名称就不显得那么自相矛盾了:在我们看来,



史前民族也是有历史的,但对于生活在那时的人,他们以当下的方式而不是以历史的方式生活在自己的传统里。

不同观念的共时性带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要求我们对其他种族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有所认识,要求我们对不同的观念予以协调。用比较晚近的例子来说,以前我们觉得中国文化是标准,其他的都不是文化,虽然我们自己也人压迫人,也互相残杀,但“我们自己”似乎仍是一个整体,于是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好像只要是中国人就都同心同德似的。现在 we 不愿意这样说了,这么说显得挺没见识的。有人甚至倒过来觉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比我们的好。但是对于单一传统的初民来说,善和美都是以自己为标准的,甚至人这个词也只用在我这个种族身上。

到了文字普及的时代,不同的观念同时摆到了眼前。理性的第一个特征是反省,我们在他者的背景下看待自己。别的种族像我们自己一样,他们也有一种生活方式,有它自己的合理性,比如读希罗多德的《历史》,我们不可能不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他对其他种族的生存价值、生存合理性的承认。希罗多德是个旅行家,在世界上走了很多地方,见到了很多奇特的风俗,他尽可能地理解这些奇异的风俗,哪怕那是我们坐在家里不出门的人不可思议的风俗。他说到印度有个地方,那里的人要把亲人的尸体吃掉,在希腊人眼里,那就是禽兽不如了,可希罗多德却从习俗的相对性来看待这样的事情,说是“习俗高于一切”,说任何人如果能够选择,就会选择在他自己的那个民族的习俗中生活。这是理性态度的一个突出标志。当然,希罗多德仍然为自己是希腊人而骄傲,走了那么多地方,还是希腊最好。但这个最好,可以说是理性反省的结论,是与他人比较而言的,这个话在前理性时代没有人会说它,自己这个种族才是好的,原是自明之事,我简直要说那是个分析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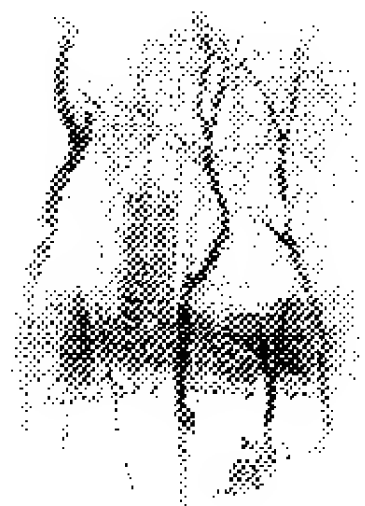
在中国,孔子、子产这些人体现了这种新兴的理性态度。我上面已经做了提示,这里要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说到理性,往往先想到科



学,好像科学是最理性的。我不是这个意思,实际上,我整个的讲座是想扭转这个观念。当然我要一点儿一点儿讲,但概略地讲,科学是理性的一个分支,是一种用理性来从事理论的事业,就说它是理论理性吧。我要说的一个重点是,在通常意义上,理智和理性是非理论的,甚至是反理论的。什么人是有理性的?是讲求现实,讲求经验,不成天张望六合之外的人。爱好理论的是那些神神叨叨的人,神话学家,阴阳五行家。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关于这一点有太多的误解,人们说到理性,首先想到理论。然而,在孔子他们的理性态度那里,我们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理性态度是一种非理论甚至反理论的态度,是一种经验的态度,讲实际、讲经验、讲现实世界,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而理论总是在琢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我们这里无法深究理论的性质。但不难发现,我们叫做“理论”的东西,首先是一般的、普遍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是和具体情况相对的。反过来说,凡是概括的东西都有一点儿理论的意味,比如像人之初性本善、物极必反、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是进步的。乃至“理论概括”成了个短语。还有个常用的句式:“从理论上来说当然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是实际上……”普遍性对于理论家是重要的,对于务实家却没什么用。比如说物极必反,这不错,但也没什么用,麻烦在于总是弄不清楚什么时候是极点。再说一百遍物极必反,你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买进股票,什么时候该抛出。

当然,一般说到理论,不是指物极必反这样一个简单的概括,而是有个结构的,差不多是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我们可以把它和“侦探的理论”类比。我们读侦探小说,案件进行到一半时,侦探会说他的理论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理论设想了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但其中有些环节是设想,还没有被证实,如果全是实事,那就不是理论了,就是故事本身了。由此来想,理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具有完整性,另一个特点是它包含推论。如果没有推论,它就不是一个理论,它就是一个描述、一个故事。



现在我们反过来看概括命题,就可以看到,概括之所以被视作具有理论性质,是因为其中包含着推论的因素。逻辑上注重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的区分,反倒无关紧要。因为全称命题其实有两种。袋子里有一百个球,这一百个球我都看过了,都是红的;还有一种是袋子里有一百个球,我检查了九十个,都是红的,然后我给出全称命题,这一百个都是红的。这两者都是全称命题,但有重大区别,区别在于前者没有推论,一百个球我都看过都是红的,它和一个特称命题没有区别,在认识的意义上没有区别,它就是一种描述,它跟你看了一个球,说个球是红的,这两者在认识上没有区别。你看了九十个然后推论说这一百个球都是红的,这才是抽象概括。平常说话中的所谓全称命题都是这一种,都是包含推测、推论的。比如说山东人豪爽,我可以保证你没有把山东人看遍,你也许见过十个,也许见过一百个一千个,然后你做了这个概括。

我们只是从一两个方面涉及到理论的性质。但让我们暂时总结一下,说理论具有整体性,又包含推测或推论。我们说到,一个民族对世界有一个总体的解释,不难设想,这种总体解释里有很多推测的、推论的内容。所以不妨把对这种总体解释的追求视作雏形的理论态度。在史前社会,这种总体解释一般是由一个民族的神话系统来承担的,理性兴起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另外一种形态的总体解释。在中国思想史上,热衷于这种整体解释的不是孔子、管仲、庄子,而是邹衍、董仲舒这些人,是他们的阴阳五行理论继承了感应式的神话解释。阴阳五行作为一种理论,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和事物归拢到五行中,无论天文、地理、政治、人生,都纳入到同一个理论之中,形成一个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继承了神话传说。阴阳五行理论的感应特点很明显,春配东,因为在中国春天刮东风,秋配西,然后配金,配刑,在秋天处刑。这些感应的因素虽然没有严格的科学根据,但是它有很强的感性方面的支持。

总的说来,阴阳五行这些东西是不入正统儒学法眼的,虽然从汉朝



起,也有不少儒学议论里杂入了阴阳五行的因素。儒学是很理性的,对这种半神话式的理论原则上采取排斥态度。从我的理解来说,跟其他文明比起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一种特别富有理性态度的传统。在近代与西方遭遇之后,西方是一个强势的力量,不仅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上是强势的,而且也是一个强势的文明,结果把我们这个中央帝国挤到了世界体系的边缘上,于是我们反省说我们的文明肯定有什么根本的缺陷,甚至把我们的传统说得一无是处。然而,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特定的环境而言的,不能从本质主义的意义上谈论缺陷。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中国的民族性有诸多需要改造的地方,但我们应当就事论事,不宜动不动就追溯到汉唐春秋那里。

我说中国人特别富有注重经验的理性态度,主要是描述性的,不是评价性的。思想考察的一个要求是不急于评价,把评价推迟。总是处在评价态度之中是无法深入研究问题的。如果不那么感情用事,我觉得并不难看到中国传统的理性态度特别显著。例如,中国两千年前就建立起了相当健全的官僚制度,一千多年前就建立起相当完备的科举选拔制度。不是说两千年前的时候中国多美好,但是用那个时期的中国和绝大多数别的民族比,中国的文官、文人乃至平民百姓明显地更理性、更实事求是。

中国人注重经验和现实,还可以从反面看到。例如,中国没有史诗,中国远古的神话保留得很少。鲁迅、茅盾都强调过这样一个事实。我认为我们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尽管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但笼统说来都极理性,中国在轴心时期的转变特别彻底,理性态度占了绝对优势,几乎完全中断了史前史的神话传统。我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创世神话留下来。中国留下了那么多东西,但这里面没有创世神话。在孔、孟、老、庄、杨、墨的学说中,我们也看不到继承神话的关于世界的整体解释。先秦诸子不面对神话传统,没有提供一种理性的整体解释以取而代之的冲动。《庄子》里面有不少神话,但其中多半不是继承下来的,而是编出来的,不如视作寓言。这种高度注重现实的理性态



度的另一面就是缺少理论兴趣。先秦的各个学派都不怎么重视对宇宙的整体解释,后来成为中国主导传统的儒学尤其突出,更没什么理论兴趣,对宇宙论这类事情往往全不在意。乃至中国理论兴趣偏向于阴阳五行,相对来说不登大雅之堂的那种,没有成为文化主流。汉朝以后,儒学中掺进不少阴阳五行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始终为正统儒学所警惕、所反对。宋朝的儒学,受佛学的影响,也有些宇宙论的东西。我们以后讲要讲希腊的宇宙论,你们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与西方的宇宙论和自然哲学相比,理学中的宇宙论因素可说完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宇宙论。中国士大夫传统中始终缺乏真正的理论兴趣。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一百年多年来,我们开始学习西方的东西以来,在各行各业都有能人,在技术性的领域里学习成绩尤其好,但理论创新方面很弱,在物理学、数学、生物学领域是这样,你要再想想社会理论、人类学理论、政治理论,那就根本没有中国人的份儿。直到今天,中国人讲到理论,还是阴阳五行那种类型的理论,大而化之的一类。

我们现在习惯于从西方的历史来看待世界,说到理性就想到理论。我则想表明,一般说来,理性态度是非理论甚至反理论的,理论和理性在希腊的结合是一件特殊的事情。这个问题我经常是这么来讲的,所谓倒转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这个问题得倒过来,问西方人为什么发展了近代科学,这才是提问题的办法。我们只能对非常态的东西问为什么,对常态问不出为什么。我只能问你弟弟最近怎么生病了,不会问你弟弟最近怎么一直好好的。不是这么问不礼貌,而是你听不懂我在问什么。像李约瑟那样提出问题,就好像我们本来都应该发展出科学,事实上全世界的民族没有一个发展出近代科学,只有西方发展出这东西来,所以该问的是为什么西方发展出近代科学。我们要讨论的是科学、哲学和常识,常识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的,但是科学和哲学只有西方才有,至少就比较完备的形态来说是这样。

黑格尔说,回到希腊,我们就回到了家园;海德格尔说,哲学说希腊



话；加达默尔说，哲学—科学完全是属于希腊的。希腊哲学史的专家伯纳说，除了希腊和在希腊影响下的民族之外，根本谈不上哲学—科学。可咱们中国是泱泱大国，人家有的我们都有，哪能说哲学是希腊的或者西方的，那不成了西方中心主义？我们平常不爱分析，一到 *philosophia* 就喜欢分析了，*philo* 是爱，*sophia* 是智慧。智慧这东西当然中国也有，印度也有，马来西亚也有，东方人比西方人更智慧，比你更爱智慧，哲学比你更多。这样一来，*philosophia* 就成了一种普遍存在的东西。然而，把中国的传统智慧叫作哲学，我们不仅可能错失了希腊人所说的 *philosophia* 的特点，而且说不定反倒落入了西方中心主义而不自知。

为什么希腊会产生哲学？为什么希腊会把理性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这是个历史问题，我没研究，只能随便说说。希腊有一些特殊的社会条件，有两点比较突出，一个是民主，一个是法庭。希腊盛期的哲学是两个支流汇集而成的，一个支流是泰勒斯那样沉思的自然学家，另一个支流是智术师，*sophist*。智术师是什么人呢？智术师一开始是给人写诉状的，是教你怎么打官司的，后来法庭允许代理人上法庭，智术师就像现在英美法系里的律师那样到法庭上来帮人打官司。智术师的这些作用只有在一种特定的法律形态中才会形成。这里我们见到的不是一个只面对长官的公堂，而是一个公开辩论的、面对公众意见的法庭。

智术师是教师，智术师不仅教人怎么打官司，他也教人怎样演说、竞选。只有民主制度才需要这种教师。民主制度不是靠血统，也不是靠财产，当然它跟财产有关，它是靠嘴的，民主制度最大的特点是要靠“说”的，靠说服你让你投他一票。在希腊，*logos* 这个“说”，成为一个比其他地方重要得多的本领。

如果说，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有沉思者，都有对真理的追求，那么，希腊的特点就是法庭制度下的和民主制度下的公开辩论。当然，公开辩论必须和对真理的追求结合在一起。苏格拉底总是和人辩论，在这一点上跟智术师一样，但苏格拉底不是智术师。柏拉图反对 *sophists*，智术师收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不收费。我想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区别：智



术师是要在对话中让自己的 doxa 取胜,比如要打赢这场官司;苏格拉底是要让真理在对话中浮现,他自己事先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理。智术师在讨论开始时就知道结论是什么,苏格拉底不知道。我们都知道柏拉图的辩证法。Dialectics 这个词无非就是对话的技巧,柏拉图将它从一种说服术转化为一种怎么通过对话以便使真理出现的方式。

我们经常拿诸子百家和希腊相比。的确,要说学术的繁荣、思想的生动、智慧的深刻,两者共同之处甚多。但我现在想说一点不同,那就是希腊人建构理论的热情。说到古希腊的理论兴趣,我觉得不妨从希腊神话说起。和先秦已经失去神话传统正成鲜明的对照,希腊流传下了最完整的神话体系。希腊轴心时期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诗哲之争。诗哲之争说的不是我是一个哲学教师,你是一个诗人,你我争论该推崇哲学还是推崇诗歌。柏拉图所说的诗哲之争,是一种新兴的理论态度和神话态度这两者的争论。也就是后来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话家和自然学家的争论。亚里士多德把泰勒斯叫做第一个自然学家,这个自然学家是与神话家相对而言的。神话为我们提供了对世界的一种类型的总体解释,与之相对,新兴的理性要提供另一种类型的总体解释。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的理性思想一开始就具有理论倾向,我们把这种用理性态度来建构的理论称之为哲学。如果是这样,可以说哲学是有神话渊源的,神话渊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哲学和神话都尝试提供整体的解释。两者最根本的区别就是,神话是通过传说、想像、编故事来编织一个完整的解释,而哲学力图通过经验、事实及其推论来补足的,有些事实我们直接能看到,有些东西看不到,哲学就通过逻辑从经验、从看得到的事情来推论,来形成整体的解释。哲学,就它原本的形态来说,就它希腊的形态来说,一方面运用理性,像孔子、老子一样,注重经验,注重经验所提供的道理;另一方面,像神话学家一样,建构整体解释,建构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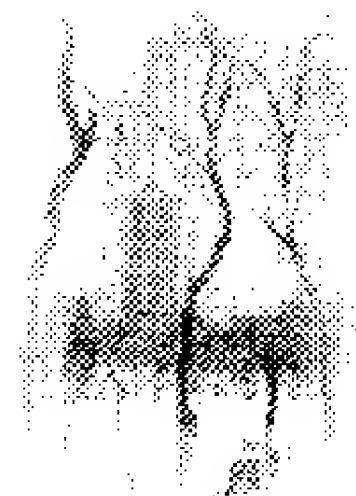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什么叫做理性的理论。地球,无论你把它想象成一个球还是一个平面,几乎没有哪个喜欢思考的人不纳闷,它为什



么不掉下去。为什么？也许因为大地是在鲸鱼背上，也许大地底下有几根巨大的柱子。希腊人阿那克希曼德提出，为什么地球不掉下去，因为地球均匀对称地处于宇宙的中心，因此没有向任何一个方向运动的偏向。因此它没地儿掉。我们在这里也见到一种想像力，这是理性的或科学的想像力，和神话想像的区别一望而知。在希腊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用理性的态度来做理论。对照来看，在中国那些最理性的人不做理论，那些做理论的人不是最理性的，我们始终没有发展出一种理性的理论态度。

这里只是一个提示，下一次我们来比较切近地看一看希腊人的宇宙论，关于宇宙的理论。

(2004 年 10 月)



时代、个性与学术

■ 王红生

王红生,1951年出生于福建南平,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世界史;1982—1985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南亚系读研究生;1989—199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是印度历史与社会。发表过一些有关印度历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文,现正承担的全国社科项目的题目是《独立以来印度的政治与社会》。

同学们,大家好:

首先感谢学生会给我这次机会,感谢在座的各位同学,谢谢各位的捧场。

我想在座各位不管是不是北大同学,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工科的,都是因为对学术感兴趣才来听这个讲座的。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有的人成功,有的人却很失败。那么我们就讨论这么一个问题:如何做个成功的学者?

我想从大家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谈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黑暗年代,内忧外患,经济落后,民生凋敝。但就在那个黑暗年代,却出现一批人才,无论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还是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的优秀作品和学术大师,造就了学术史上的



辉煌。直到今天,当我们在回顾北大的光荣历史和 20 世纪中国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大师时,仍不得不提到他们。相比之下,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学术研究却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如果说 80 年代以前,由于政治运动或其他原因,学术活动受到极大的干扰而无法正常进行的话,那么 80 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繁荣和政治安定时代,中国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学者们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图书资料的获得和信息流通随电脑的普及而极大的方便,出国留学、进修、讲学交流已是平常之事,只要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政府尽力扶持,起码不会横加干预。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平同世界同行有很大的差距,同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在我们的先人面前,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如何才能迎头赶上?首先必须检讨我们与学术老前辈的差距究竟在什么地方?

这里,我想通过“陈翰笙是如何做学问的”个案分析来切入这个问题。之所以选择这个切入口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这一点不仅是我们这样讲,许多外国人也这样认为。如曾任印度社会学学会主席的 Andre Beteille 教授在其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如下的话:“中国学者从事农村问题研究是在刚接受西方社会科学后不久,此时,印度已经受英美社会科学影响很久了。然而,中国学者很快就抓住了农村问题的核心——土地所有制,而印度学者关注该问题整整晚了二十年。尤其值得我们反省和惭愧的是,中国的同行们是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以如此大的热忱和耐心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在这些中国学人中最著名的是费孝通先生、梁漱溟先生和陈翰笙先生。二是我同梁漱溟先生未曾谋面,只是在课堂上和一些会议上听过费先生的讲演,而陈翰笙却是我的恩师,在 1982—1985 年期间在他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从此,有幸受其教诲二十余载。

陈翰笙 1897 年出生在江苏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深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东林精神的影响。



后留学美欧十余载,1924年回国任北大历史系教授,是当时的北大最年轻的教授。当时北大教授年薪300—400块大洋,然而优厚的待遇没有让年轻的陈翰笙忘记国事和天下事,他追随李大钊,结识前苏联学者,研读《资本论》,参加“三·一八”游行示威,投身中国大革命。大革命失败使他痛感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而开始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30年代出版的一份杂志上,他写下了如下一段话:“假使梦想就是希望,我总是希望着我的个人的工作能助长人类的进化,而我个人的生活不违反这样工作的志趣。”直到晚年,他还经常告诫年轻人:“究竟什么是科研?虽然各有各的说法,但我可以简单地说,就是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服务社会。”为推动社会进步而研究学问,是陈翰笙“一以贯之”的原则。

陈翰笙在研究中主张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运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来研究问题。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各门学科形成自身独特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相互之间往往存在分歧与争论。比如,尽管历史学与社会学是两门相近的学科,历史学家往往以搞清历史事实为己任,他们对社会学家们所热衷的概念阐释与理论模式的构建很不以为然。社会学家们显然更加关注理论问题,认为理论本身不会作为资料积累的产物出现,因为资料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源于理论的指导,是先有理论后有资料而不是先有资料后有理论,任何有效的科学研究必须以适当的理论概念为前提。因而,在他们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应遵循一定的程序,先确定研究主题,接着进行概念阐释和提出理论假设,再根据材料对理论假设进行小心论证,最后得出结论,以提高对该问题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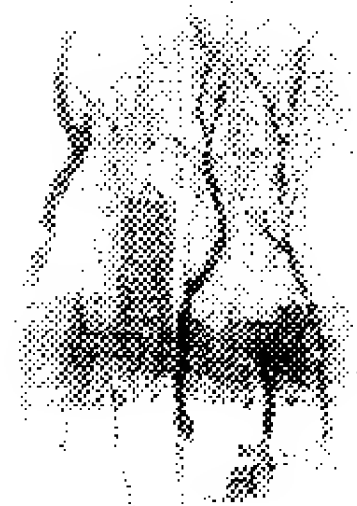
陈翰笙很好地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程序与历史学知识结合起来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前,他写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一文。该文章中,他使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等三个概念,并以五项标准(生产资料所有权、农具耕畜、超经济强制权、地租形式、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在实践和空间上的分开与合一)对三个概念进行阐释。接着,他运用这三个概念对历史上欧洲封建社会土地制度进行比



较分析,指出赋役制 3—5 世纪盛行于西欧,9—14 世纪盛行于日本,13 世纪盛行于俄国;强役制 8—12 世纪盛行于西欧;工偿制则为俄国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制度,形式非常复杂。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中国现在,赋役制、强役制、工偿制或雇工制,虽然不能完全没有,可是决不占农村生产关系的主要地位。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除赋役制、强役制和工偿制以外,其他制度的分析还待继续进行。”这是一份很好的开题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陈翰笙将农村生产关系的理论与世界历史进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为研究当时的中国农村问题设定了一个有效的视角。有了这份报告,研究者在从事实地调查前,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所要搜集的材料、所要论证的主题做到了心中有数,明了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未知的,什么是有待证明或修正的。这样做如同“在进行化学实验,探索新元素之前,必须脑中先有‘元素周期表’,否则很可能重复别人的劳动”。

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是陈翰笙科研工作的另一大特点。他坚持认为:要搞好研究工作,就需要充足的资料,有了资料才能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为了获取资料,他想尽办法,利用一切关系。在自己的家乡,他利用当地的地保和小学教师做通当地农民的工作,打消他们的顾虑,接受访谈;在广东,他先后利用同宋庆龄、孙科、唐绍仪的关系,获得当地政府的配合;在西双版纳少数民族地区,他争取到当地洋教士的信任,获得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在异国他乡的印度,他不畏酷暑,在狭小的帐篷里认真研读英国殖民政府的档案材料,以致浑身长满痱子;就是在“文化革命”那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他也走了外交部的“后门”,整理了故宫档案里的有关华工出国的史料。正是他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使他成功地在中国广大农村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调查,他的调查材料本身现在已经成为了解 30 年代中国农村的珍贵史料。

陈翰笙是个大学问家,但从来不装腔作势,不玩弄理论概念。他主张为文心中要有读者,文章要吸引读者,要让读者看得懂,乐意去读。因此,他的文章没有繁琐论证,没有史料堆砌,而是直入主题,提出自己



的见解。例如《三十年来的中国农村(1911—1941)》一文,全文只有5000余字,就将当时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以及出路何在交待清楚了。这篇论文的写就凝聚着他十余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在中国农村调查的心血,他本可以加上大量的实地调查的材料,以加强自己论点的可信度,也完全有能力用一大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加以演绎论证来提高论文的学术品位。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历来主张写短文,短并不意味着内容贫乏。

从以上对陈翰笙学术生涯和学术思想的简单回顾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同一般的人:一个大学教授却甘冒杀头的危险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三次被反动政权追杀不得不流亡海外;一个历史学家却自讨苦吃到贫困落后的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大学问家却心里装着一般老百姓,把能否为社会造福摆在自己的名利之上。这些铸造了陈翰笙的个性,他自己十分看重学者的个性,曾多次对人说过:“个性与个人主义不是一回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能有个人主义,但作为一个人、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具有自己的个性。”只有坚持个性,才能保持追求真理的精神,才能有胆有识;只有有胆有识才能在学术上不断创新,取得成就。这也是他经常说的,做学问做得怎么样,取决于做人做得怎么样。

陈翰笙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正是由于有一大批像陈翰笙那样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社会的良心和中华民族的脊梁,中国没有沉沦,并最终获得崛起。他们可能在政治观点上不尽相同,但在倡导学术个性上则是一致的。如胡适先生曾说过:“大凡文学有两个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人发生交涉。”我们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在给即将赴欧美留学的同学讲话时叮嘱:“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由此可见,那一代中国学者是十分重视“我性”即“个性”的。今天中国学人无论从个体数量上,还是发表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上都是十倍百倍于前人,一些人年纪轻轻就已经著作



等身,但这并不能催生出学术大师来,更不能真正繁荣中国的学术。因为过多的所谓学术著作缺乏“我性”,缺乏著作者个人的性情与见解,这种没有“我性”的作品当然也就不可能与一般人发生交涉,更不可能引起专家同行的兴趣,就是作者自己也只是用来当作晋升的资本。因此,要振兴中国的学术研究,必须大力张扬中国学人的“我性”即“个性”,去除将学术当作“升官发财”工具的“私性”。

陈翰笙平静地度过他的108岁(虚岁)生日后,于2004年离开了我们,一般人很难活到那样的岁数,更难具有如此波澜壮阔的一生和杰出的成就。他像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照出我们现时代学人的种种缺陷。今天,当我们寻找与先辈们的差距时,我们是否应在“做人”上多加反省?拷问一下我们是否具有他们的健全的“个性”?

我就讲到这儿,下面欢迎同学提问。

学生:老师,我问一下,如果想研究中东,就一定要学会阿拉伯语吗?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吗?

老师:我问你,你是不是想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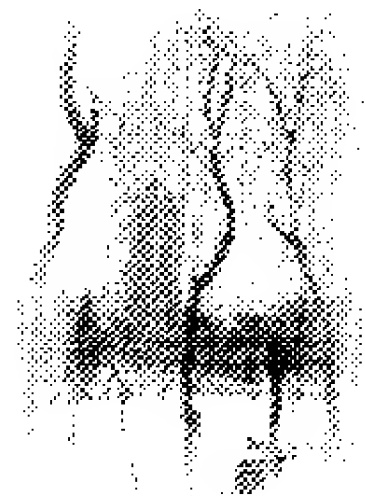
学生:大当然是想做的。(笑声)

老师:如果你只想浅尝辄止,可能不一定需要通晓阿拉伯语;你如果想要出真正的学术成果,就必须懂阿拉伯语。我这话绝不是开玩笑。

学生:我想问一下,史学研究有多大作用啊?

老师:这问题太大。我很同意那种认为人类知识可分为三种的说法:一种来自经验,一种来自理论(形而上学),还有一种属于历史知识。三种知识不能相互替代,但又都有某种局限性,因此我赞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我们今天讲座的主题之一。

学生:我想向你请教两个问题:前一个问题是一个学术需要研究什么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比如现在,在中国,经济学和法学是比较出色的学科,那能不能说它们俩就是可以称之为主流学术?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从历史来看,凡是学术界上的名流或学术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那变革和学术是否有这样一个必然



联系,30年代社会动荡,而80年代以来,我们经济空前繁荣,那是否意味着学术就很难会有发展呢?

老师:(笑声)首先我承认时代和学术成就是有联系的,某个学科兴起同当时的需要有关,经济学、法学,很热,是吧,那就说明它们有市场,有很多人去研究它们,取得比较快的进展。至于学术能否取得更大的成就,那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更好地看出来。也许有这可能,也许不。当时农村领域在中国是很受关注的,有一大批学者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经济学、法学这么热,是否必然导致中国在经济学界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或者这个将对中国的经济学有什么影响?这个,都得往后才能看出。第二个问题,我不认为今天我们的社会科学状况不太令人满意是因为今天社会变化不如30年代大。实际上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是很大的。

学生:问一下,目前国内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无论在语言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不如国外的学者,那我们何不多引进他们的研究成果?还有,你如何看待人们重视研究美国史而不是阿拉伯史?

老师:你这两个问题问得有点意思。我们国家的美国史研究水平,也许比不了美国同行。但美国学者研究美国,欧洲学者研究美国,和我们研究美国同样都有其价值,他们有他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感受。有些东西,他们未必想到,我们会可能提出新的研究角度或新的看法。比方说吧,那山外看山,角度不一样,看到的東西也就不一样。外国学者对我们的研究也一样,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角度,我们都很重视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现在确实比较重视研究大国、强国,尤其美国。那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事实,这一事实有多种原因,我们个人是很难改变这一现象的。人们常说,“历史是贵族的墓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进入历史的,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谁叫美国这么强大?谁叫美国有那么大影响力呢?但是,这不等于说,大家都应该去研究美国史,如果你要去研究阿拉伯,尽可以去研究,但是你要要有心理准备,你会



遇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障碍。

学生:简单地说,我想问一下,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捷径,怎样才能避免少走弯路,更好地成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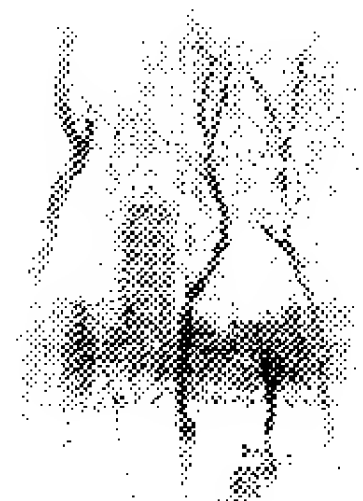
老师:这问题可不简单。想要成才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我无法回答你,我不是一个成功者,直到今天我也没有成才,尽管我也很想成才。我只能告诉你,成才并没有捷径,任何经验总是仅供参考的。

学生:我想问,怎样调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老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话题,所以我只能简单的对你说。比较好的应该是既脚踏实地又有理想的人。

学生:我想请教一下,做学术应有怎样一个过程?怎样才能把某个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

老师:这问题提得好,但不易回答。我想在现时代要从事学术活动需要具备一些必要的条件。首先要有经费,“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是应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科学研究存在经验的积累问题,就是你说的过程,比如说陈翰笙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第三世界农村问题研究的先驱之一,是因为他不仅较早研究中国农村问题并取得研究成果,还因为他还研究印度农村和西方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他在研究印度的过程中,先后研究印度的自然地理区域、印度的历史、印度的农村阶级和土地关系等。如果说研究第三世界的农村和农民是他研究的总体战略目标,而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农业、中国和印度农村的研究则是一个个的战役。没有一次次成功战役的实施,就不可能有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而没有整体战略目标,分散的战役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你的第二个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提出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研究从提问开始,一个好的问题可能是成功的一半。可是要提出一个好问题是不容易的,要回答好问题更不容易,这需要平时积累,需要一种境界。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一句诗很好地表达了这一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就是要像年轻人追求爱情一样去追求学问,即使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理想的结



局,但追求过程的本身也是十分有价值的。

学生:你好,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提高阅读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摄取最多的知识?

老师:首先,你应向你的老师请教,让他给你开列参考书书单。然后,根据需要选择泛读和精读的书。我认为只有多读书,才能提高阅读速度。

今天就到这儿。

(掌声)

(2004年12月4日)



新世纪的中国外交

——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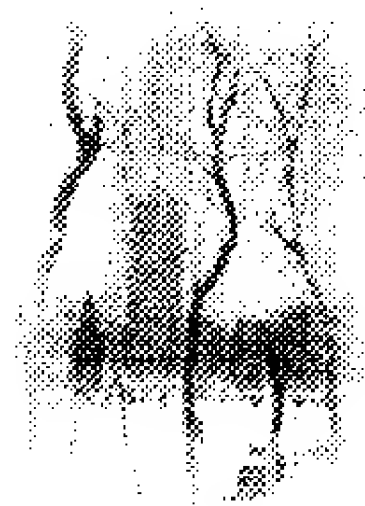
■ 牛 军

新世纪的中国外交

牛军,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教授。学术专长:中国外交史、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史。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停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论文:《新中国外交的形成与特点》,《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美国这场选举对媒体来说,是一场战争。同时,也把我们吵得心浮气躁,不太干得了事情。今年台湾选举就很典型。3月19日我正在俄罗斯大使馆,一个在台湾的学生打电话告诉我,陈水扁遭枪击受伤。当时感觉很恐惧。事实上,当时很多人都估计国民党会赢,但每个人的话(包括我)都有个“但是”,不排除意外事件导致翻盘。当时俄罗斯大使递给我一份经翻译的法新社新闻,陈水扁受枪击。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给大家分以下层次。本次讲座题目“大选后的中美关系”包括两个问题:(1)选举过程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对其现状和我们的认识的影响。(2)选举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研究选举要向前追溯到去年秋天,向后关注到明年初。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选举的



基本情况,主要是客观情况,希望大家听后作出自己的判断。

首先,我介绍一下选举过程。这里有两个问题:(1)如何控制美国选举过程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在这一点上,国内学者大多认为温家宝访美是成功的,因为我们看到那次访问使中美关系持续稳定至今,当然它不是唯一原因,但至少是起了重要作用。(2)如何应对美国选举结果对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其影响是正是负,学术界尚在讨论中。

去年夏天,选举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越来越被关注。中美关系中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贸易。中美贸易额近年来急速增长。今年预测高达 11500 亿,这么大规模的贸易额。美国国内利益集团可能利用选举期间行政当局和参选政客拉选票的需求,对政策施压,要求未来执政者做出承诺,满足自身的利益。中国高层都强调从战略的高度来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但布什就很具体,比如中国会买多少美国大豆。因为他背后受农场主的影响,大豆卖得多,就可能获得更多选票。

就我个人体会而言,美国之所以特别强调价值与理想,是因为这个社会是典型的成熟的商业社会,社会精英层不得不告诉人们,我们还有理想。如果社会充满理想,领导者就会告诉大家,我们需要财富,就像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作的一样,反复强调发展是硬道理。

另外一个问题,与大选无直接关系,但可能在大选这一政治狂热期成为焦点——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有它的特殊性。去年 10 月,陈水扁过境美国,大力宣扬对美外交的重大突破。突破在以下几点:(1)突破警察阻挠,与华侨中亲民进党人士握手;(2)在美国召开新闻招待会;(3)停留期间,在纽约游览。总的来说,陈的活动服从两个需求:(1)外交突破;(2)使台湾民众看到其在美国的活动,增加选票。也正是因为布什政府给予如此高的待遇,民进党的支持率大幅上升。我在当时的一些研讨会上发言,认为美国应对此负责。陈水扁访美后,民进党出台了包括修宪、公投在内的竞选纲领。他们敢这么干,就是美国纵容的结果。一旦两岸关系紧张,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大选议题。当然,我们难以判断是否是布什本意,还是包括美在台协会主席夏馨等人的推动。



夏馨行事非常张扬,陈水扁过境美国她全程陪同,因而陈非常感谢她。夏曾说,台湾的保护天使是布什。台湾大选结束,国民党不服,要求验票。两方都期待美国的态度。夏擅自传达了信息,违规操作,因而被迫下台。

大选中任何一件事都可能被炒作,包括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民币汇率,等等。温家宝访美就是为了控制美国国内的事态发展。若中美关系再次成为焦点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政府比较早地做了准备,与美方达成协议,派出贸易采购团,解决一些利益集团的矛盾,减轻候选人的压力。温家宝访问美国期间,布什作出表态,反对台湾单方面行动。温表达了类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宣扬。

我们可能很难理解美国民众的想法。举个例子。今年5月,我参加与哈佛大学的交流对话,紧接着作为顾问参与中美青年安全对话。在美国停留期间,看了当地报纸,与人聊天,身处其境,才了解中国政府那么做的必要性。哈佛大学有自由主义的传统,没有闭门会议。交流会上,我听了,90%的人最关注的议题是贸易。美国中部俄亥俄州是比较保守的地区,是有不少钢铁大工业,现在大量出口钢铁到中国。当地人就特别关心钢铁贸易。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多次提醒我们要关注贸易问题。

回国后,我到广州市作报告,与会中不少是区县干部,他们对中美关系对贸易的影响就有切身体会。主要是当时美国对中国具征有高关税。

另外还有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考虑。这些概念出来是有它的道理,有它的根据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很多问题都会处理不好。这次的广州之行再次使我体会到考虑问题不能那么简单。甚至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能谈到政治局的高度,考虑到全局,全国规划。但其他地方有很实际的问题和困难。说到美国反倾销问题,当时美国政府必须要满足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你给我工作,我就投你票。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



台湾问题也经过这样的交锋。有感兴趣的同学看到台湾选举中的公投,最后变成了一个买武器公投。如果没有公投做砝码,选举很可能就赢不了。但是美国人说不能把涉及独立的问题作为公投题目,于是搞了一个“买武器公投”。为什么要搞“买武器公投”呢?就是台湾官员向美国承诺,过去三年一直没买过武器,再执政一定买,只是投其所好而已。美国则说公投是民主形式,我们不能反对,而你公投买武器,这些军火商又会投我一票。我们只能说你不能就什么问题公投。但是它(美国)毕竟是控制了台海地区的局势,没有使局势发展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所以由此来看,就我们所能操控的范围而言,未来的中美关系,仍然是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贸易,一是台湾。就是说这个选举完了,过程我们控制住了,之后问题还会怎么发展。它的由来都是在选举中。美国的政治发展有它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只能控制这个过程。我们现在要研究的就是怎样应对它所产生的结果。

现在看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影响,大致有一个基本看法:在冷战结束后的四次选举中,第一次出现这样的现象:中美关系没有成为选举的一个议题。克林顿和老布什争当总统的时候,因为受到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加上前苏联解体,整个国际大格局处在比较混乱的状态。当时美国人中有一个突出的想法,就是过去我们是因为和前苏联斗争,才用得着你们(中国),现在你们又不实现民主化,我现在也用不着你们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克林顿在对外政策上主要抨击老布什的就是对华政策。说“老布什向北京的老年暴君磕头”。他们选一些“民运人士”,站在台上表示抗议对华政策。克林顿的对外政策就是“我执政后要惩罚北京的暴君”。然后就是克林顿的第二任竞选。美国国内的保守派就攻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说他没有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当时因为出现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他在1996年五月选举之前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对华政策的讲话,主要内容就是要和中国接触。而且他是敢于承认错误的。他承认过去的对华政策看来是行不通的。只有通过接触,使中国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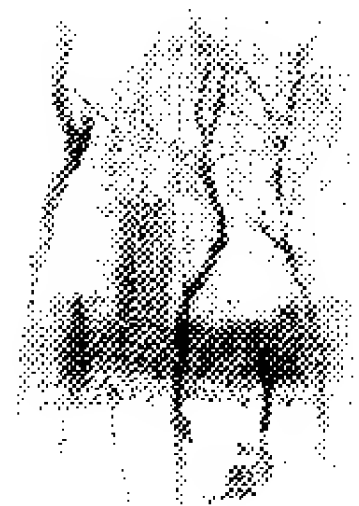
国际社会,但同时美国也会保持强大的威慑,来应付可能出现的问题。他的主要目的在于在选举前丢掉这个包袱。先把自己的政策亮出来。但美国的保守派在对华政策上仍然是比较强硬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他执政后期,中美之间不断出现一些摩擦的原因。

小布什竞选的时候又开始批评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他认为克林顿把中美关系说成是战略伙伴关系,就是完全的判断错误。他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就差说出敌人二字了,从他执政以后可以看出。有一件事大家都知道,他说他的核武器瞄准七个国家。克林顿和江泽民是达成过协议的,双方核武器互不瞄准。当然,在现在这个条件下,再瞄准起来是很容易的。当时大致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意愿:双方互不把对方视为敌人。但是到了小布什时就转过来了。

这次两党竞选纲中在对华政策上几乎是一致的,甚至竞相表示要推进对华关系,来寻求美国利益。应该说在今年美国选举过程中,中国政府所做的努力,使这个选举在结果出来之前,控制一直使很有成效的。当然,就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

刚才是就选举过程的影响做了一个基本的介绍。这次选举是越战后第一次把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作为选举的首要议题。有人说安全和贸易是主要议题,但我认为安全大大超过贸易,贸易问题远远没有国家安全重要。这是越南战争结束以后第一次,是对领导反恐战争的领导人的一次信任投票。从现在的结果看,小布什得到的票数——第一,小布什赢超出了不少人的判断;第二,他赢得的票数之多也超出了不少人的预料。

我觉得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往往都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感受来理解这个反恐战争。我印象很深的是1992年到美国,一个朋友带我去华盛顿。他带我去一个美国银行家的家里做客。下午吃完饭聊天。因为他们正在选举,然后他就问,你是从中国来的教授,你觉得选举结果怎么样。我就说老布什肯定赢。他就问为什么。我说,如果在我们中国,一个领导人打赢了这么一场战争——那时候是第一次海湾



战争,就是解放了科威特,然后把伊拉克几十万军队基本上全歼了。我说像这样的民族英雄,他选举是一定会赢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因为我们从我们中国的角度来讲,加上我就是研究美国外交的,我们关心的,我们的关注点就是当时的美伊战争。老布什,我在那个时候看那个录像带,看了那时的录像,他有个胜利演讲,就是一百天打赢一场战争以后,在国会受到欢呼。我想强调的,就是那种气氛,就是他给美国人留下这么个印象,使美国人在心理上摆脱了越南战争失败二十年的阴影,靠的就是老布什的这场战争。过去一要作战,就想会不会陷入越南的泥潭,现在伊拉克的局面,又让人想起越南战争。他好不容易把阴影抹掉,他儿子又把它弄回来了。这就是特别奇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研究第一次海湾战争,看美国当时的媒体,打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最怕的就是出现越南战争的问题。但是,老布什还是下了决心要打。为什么现在的鲍威尔总批评拉姆斯菲尔德这些人不行,因为整个战争的谋划都是他主持的。所以他在这次发动战争之前,就说他们的办法不行。他就认为现在指挥战争的人都没有打过仗,那个银行家跟我讲,克林顿赢。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美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国内经济问题。他说布什最大的失误就在于他以为一场战争的胜利就能够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他说这很可能是布什最大的错误。看这个事情,完全不同的视角会导致人们对事件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最后,事实证明还是克林顿赢了。他的口号就是“哥们,是经济”,这就是竞选口号。他说你们讲什么海湾战争,什么战后国际新秩序啊,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啊,还有什么冷战的胜利,苏联的崩溃啊,布什的爸爸讲了一大堆这些问题,讲的非常的充分,谁看了都热血沸腾。但是克林顿不管,美国民众最重视的是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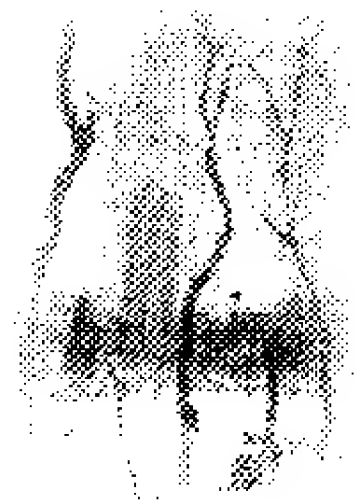
不久前在美国开过一个会,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召开的。请了中国学者,还有一个俄罗斯学者,还有美国的很多学者,包括著名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研究冷战的。还有现在的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档案编辑人员,情报整理人员,还有就是过去负责中国情报的前



中央情报局官员,包括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东南亚站的站长。请他们来就是借着10月18日公布的这批档案开个座谈会,大家谈谈这个档案的情况,当时的话题是请他们介绍一下当时这些情报是怎么收集的,再讲一讲他们是怎么把这些情报整理出来的。然后也请学者来评估一下他们当年做的这些评估——它不是原始情报,因为原始情报涉及到很多技术的,包括很多卫星的照片,航拍的照片,还有从媒体上搜集的。这些东西是最原始的。——这些情报的评估是在这个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军事等等各方面做分门别类的评价。

开这个会,它给我直接的印象,给我的信息是,美国在“9.11”以后它的情报机构进行了大改组,在这个改组的过程中,必须对中国的情报给予足够的重视。《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全部进行了报导,就是要引起各个方面对中国的重视。它为什么重视这个事件,这就不用我说了。

他们当时邀请基辛格中午来做午餐讲话。基辛格,前国务卿,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基辛格那么大年纪,声音还那么洪亮,他讲到台湾问题,因为台湾问题是必谈的。基辛格用一种很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就说中国不会无故地首先使用武力,或者说用武力来实现统一。他讲了一个笑话,他说当他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说过,世界的事大,台湾的事小。就是说跟苏联的扩张比起来,台湾是小事情,我们可以放一放。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等一百年。”基辛格说他后来有一次见到江泽民问:“毛泽东主席说的‘等一百年的话’还算不算数?”江泽民跟他说:“不行,不算数了。”江泽民主席说:“这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我们还能再等七十年,不能再等一百年了。”你琢磨琢磨他给我们讲这么个笑话,任何谈中美关系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他要做出一个基本判断,他的判断其实从这样一个幽默里面,从他讲的这个笑话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主要的问题是在台湾,不是在大陆。他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基辛格在这个会上,被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介绍,说是伟大的爱国者。“9·11”以后,对人的



赞扬一定要有伟大的爱国者。为什么要这样赞扬一个政治家,因为现在爱国主义是一种特别强烈的公众情绪化。基辛格讲美国要关心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的范围太大,一定要重视对中国的关系,要把它当作一个世纪的课题来对待。

他说:“有三点要在座各位认真思考,第一,我们没有能力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权。”就是没有能力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超级大国,反正就是这种意思。他说美国没有这种能力。“第二,不论基于什么样的理由,中美之间发生一场冲突,将是世界性的灾难。”当然,还有一个前提,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第三,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或者找到一条道路,我们即使不能与中国合作也能在这个地球上共处。”

你们看基辛格的回忆录,他对中国当时的那一套政治哲学,他是怎么看中国的。他认为这两个国家既然不能发生冲突,那就只好找到一个办法即使不能合作也可以共存下去。这是他讲的三个问题。我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别以为我说了美国这次大选没有炒中美关系,大家便认为美国不重视中国了。从外交上来说大概今年中美之间的互动,或者说美国方面的举动也是意味深长的。在我印象中,也没有过这样的先例,那就是在选举年除了总统之外的决策官员都到中国访问过了。副总统切尼,研究美国的同学可能都知道,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操盘手,真正的操盘手。副总统切尼,今年来的;切尼来了以后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赖斯,现在的国务卿;然后最后一拨就是选举快揭晓之前来的鲍威尔。你看看这种高层交往,然后这期间大家印象中的胡锦涛与布什之间通电话,通了好多次,这是少有的。相互通信,彼此不能相忘。双方把各自的立场都说一下,重申让全世界都知道两国在什么问题上有共同语言,然后相互之间心里有个数。像这样的外交活动,表明美国重视到什么程度,我很难做一个确切的评估,肯定同过去不一样。我在这引用两段话,一个是《外交季刊》七八月号的一篇论文《正在进行的全球性权势转移》,它说亚洲正在迅速崛起,连同它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



转化为政治和军事势力,两方必须适应,否则就会掉在后面。亚洲经济增长的首要理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另一篇评论文章“美国权势衰减的新的亚洲”里面有段话,过去四年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不断衰减,一种深刻的改组正在进行。还有一段是:“当以后评价布什政府的外交时,伊拉克战争和美國人对恐怖活动的恐惧将占主要笔墨,另一点就是降低了美国对亚洲的影响。”当我们终于度过了美国大选这样一个周期之后,我们在大选的过程中看到了对华政策并没有成为相互攻击的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关系还是不断地巩固。大的方面讲,美国并没有忽视中国的重要性,它的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关注是与日俱增的,这个情况是真实的。

我刚才讲的是选举过程对中国的影响,下面我讲第二个,选举结果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这里面问题比较简单,谁当选?谁当选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较有利?——这是一个比较经典和完整的表述。当选后实际上会发生什么情况?问题很简单,但回答起来却很难。

在我个人看来,在总统选举后期——我一直提出这样的观点——我说应该有三个关注点。第一个,哪个人或那组人当选。第二个,当选人和美国国会的关系,因为美国国会对政策的制约力非常大,冷战结束后变得越来越大。所以总统和国会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关心政府的政策,关心它的执政能力,必须要看这一点。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由于共和党在国会占多数,预算通不过,官员的工资都发不下来。第三个要关注新政府的人士安排。我认为我们国家对美国政策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很深的层次,但我们还要看,除了看每个部门的第一把手外,还要看助手,因为这个国家对我们未来二十年的影响太大了。还有一个原因是,台湾问题变得越来越紧。

十月份我去华盛顿开个会,印象最深的是,共和党,民主党,包括民主党外交资深的成员都是这么一个观点:小布什连任对中美关系的积极影响超过克里。他们都是这种看法。他们的理由是:布什能控制国会。国会如果是共和党多数,就不给共和党领导人捣乱。一个民主党



的领导人,国会就给他找无数的麻烦。我听一位民主党的竞选助手讲,有一帮国会共和党人在对华政策上给政府捣乱有非常多的办法。很多事情,我们在评估美国大选的中美关系的发展时,它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在2002年有一个和哈佛大学关于中美关系的综合性的项目,整个讨论中,在华盛顿区给我们安排了各种各样的座谈,包括去政府部门、媒体等。我觉得对研究都非常有帮助——我们现在不能停留在对总统的研究上。我们过去就是只听总统,因为我们的经验决定我们关心总统说的什么,要读出字里行间的含义。这是我们的政治文化决定的。后来经过台海危机,我们知道要重视国会。经过台海危机才知道,国会还能迫使政府作出一些改变。

机构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结构,一个是结构里面的人。我那次去了国务院、国防部、白宫。国务院中,东亚事务的国务卿助理是和平研究所研究东亚的专家,对中国问题很有研究。中国处处长是加州的一个政治系教授,80年代就在中国考察访问。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我和他聊天的时候,我感到还是有些客套话,但客套话里还是有东西的。克林顿政府很了解中国外交的复杂和敏感,政府的渠道非常畅通,非常丰富。

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基本的判断——对布什政府的多数的判断,我是同意的。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应该有着很强的延续性,在某些领域可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这不等于没有问题,如果在座的愿意进行中美关系方面的研究的话,我觉得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对我们国家来说必须设立这样一个目标:使中美关系在安全领域成为一种可以管理的关系。因为我们必须管理,就算是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规模——对双方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某些知名人士认为,中美关系恶化的后果是世界性的灾难。我们也不能保证某些不受控制的事件的发生不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我举一个例子:台湾。未来四年将是一个高度紧张的时期。

我想,在讲美国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美国人怎么想。我们看伊拉



克战争已经搞成这样一种样子,认为美国人真的就会有所收敛了?不搞单边主义了?不搞先发制人了?美国还有人在想:打伊朗!除了那种霸权主义的傲慢和对自我军事力量的评估,换个角度讲,它也有它的问题。比方说,伊朗有核武器,以色列能接受吗?你们看到80年代的战争,以色列怎么把伊拉克的核设施给炸掉的,那是一个经典的战役。就是伊拉克搞核反应堆,以色列发现,说他们是生产铀,提炼到武器级了,就派飞机把它炸了。三架飞机,翅膀相叠,在雷达上看就像一架客机,于是,三颗导弹把生产核反应堆的核心炸掉了。这就是伊拉克没有能生产核武器的最初原因。现在埃及和沙特那些国家群众反美情绪严重。如果以色列突然动手打一个阿拉伯国家,那怎么办?美国用什么理由来劝阻它不打?第一次海湾战争,伊拉克人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美国对以色列说,你千万别还手,让我来搞定。因为一还手,整个阿拉伯阵线就崩溃了。这次又是紧紧控制着以色列,决不许参与。美国有它的问题,大中东地区是它的战略中心,这个重心里还有一个大国,第一怀疑它与恐怖组织有关,我们都不信,可美国人信。第二伊拉克的什叶派很多是受到伊朗支持的。因为伊朗是个以什叶派为主的国家。

军事手段作为一种选择,伊拉克已经被美国封锁了近十年,但是这么多国家与伊朗有贸易关系,想想我们国家与伊朗之间的贸易,还有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再举个例子,朝鲜半岛核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处理不好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冲击。

所以,从战略上讲,美国政策具有其连续性,领导人熟了,双方有很多战略上的合作,这些都可以说。但是我为什么说中美关系的研究必须进入到管理层次上,我们要找到办法,首先要找到管理的路径。要找到办法,使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四年中,成为一种可以被管理的关系,否则的话,这个局面是完全有可能被破坏的,它不会就这么自然地稳定下去。我觉得,对中国来说,存在着很多非常复杂的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素,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一套机制,使得中美关系不要再出现危机,从而形成一种我们可以控制的局面,使得我们可以控制它的消极影响。



中美关系讲来讲去,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的二十年的发展战略,能不能成功,是在于有没有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从政策的角度,花费这么大的力气来讲稳定中美关系。在座的各位同学这么关心,也有它必然的地方。今天就讲到这里,同学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留点时间给大家提问题。如果一时还没想到问题,可以在想到的时候把条塞到我国关学院的信箱里,然后写上你的 e-mail 地址,我会尽我所能给你们回答的。好的,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4 年 11 月 26 日)



美国大选与对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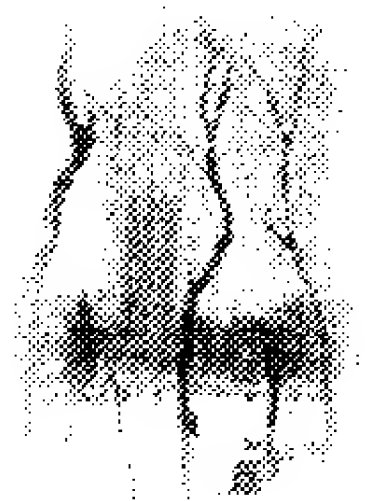
■ 贾庆国

美国大选与对华政策

贾庆国,1979年5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198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政治学硕士学位,1988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监察部特邀检察员。主要专业研究方向包括国际政治、中美关系、中国外交和台海两岸关系。已出版专著一部,与人主编书一部,合著一部,并在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和学术论文集里发表中英文论文六十余篇。

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讨论当前的热点问题。自从国关学院盖起新楼后,终于等到有了自己的办公室,却发现自己越来越忙了。

最近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关系又成了社会上关注的焦点。人们如何评价中美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关系的状态不错,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中美关系现在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国内的一些官员学者也同意这个看法。但也有一些人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美关系不仅不处于最好的时期,而且处于最坏的时期。我想看看同学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请举手表示一下: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最好时期的同学请举手?觉得中美关系现在处于最坏时



期的同学请举手？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最好的时期的人比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最坏的时期的人要多一点。但举手的人总共没有多少，可见大家都觉得中美关系可能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坏。那么，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比较好的时期的人举手？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比较差的时期的人举手？看来大家还是认为中美关系处于比较好的时期。这也是我自己的看法。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关系现在是总体良好，局部问题比较严重。说它总体良好，主要是跟“9·11”以前的中美关系相比，“9·11”前几个月中美关系当然非常紧张，南海撞机事件使国人情绪高涨，美国太霸道了，居然到我沿海地区侦查和骚扰，还把我飞机撞毁，道歉也是牙缝里面挤出几个字，而且还是没有针对这个事件，只是针对我们的飞行员丧生，飞机失事表示遗憾。而且最后只同意赔偿3万多美元，跟我们要的100多万美元相差甚远。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憋了一肚子气。美国人也没觉得这是件好事，许多美国人从这件事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人反美，中国强大了，开始跟美国叫板了，因此他们对中国充满了担心和忧虑。当时双方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紧张，跟那时比，现在的中美关系要好多了，而且即使跟90年代那十年相比，现在的中美关系也比以前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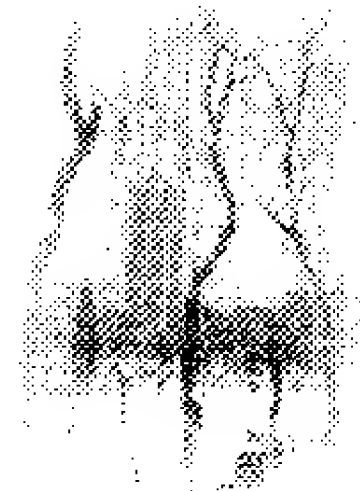
中美关系的状况良好首先表现在中美两国政府间接触和对话频繁上，在最高层，胡锦涛主席，以前是江泽民主席，都跟布什总统见过面并进行过电话交谈，李肇星外长与鲍威尔国务卿的交往更加频繁，李外长自己说他跟鲍威尔关系非常好，想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就什么时候打电话，周末甚至睡觉的时候都可以打，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高层的沟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两国政府间其他各层次官员之间打交道也非常的频繁，两国很多问题都在这种交往中得到了解决，至少得到了控制。此外，军事方面的交流也已恢复，但由于美国国防部对中国还抱有很深的戒心，美国在两军交流方面还显得非常谨慎。

说到美国国防部对两军交流的态度，2001年我带国内一个教授团



去美国访问,其中一站是夏威夷。我们在夏威夷的接待单位给我们安排参观的一个地方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实际上是美军做公关的地方,它的任务主要就是宣传美军的“优良传统”,美军如何“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等。我们到夏威夷之前,他们曾表示愿意接待我们。但是,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又说他们不能接待我们这个团了,据说是国防部不批准。我们当时觉得美国国防部很没意思。连美军公关部门接待我们这些大学老师都不批准!这无非是想表明它不想让美军跟中国发生任何关系。据说后来中美军事交流恢复还是在白宫的反复压力下才实现的。直到现在为止,美国国防部对两军交流还是很消极。说白了,国防部的一些高级官员仍然是把中国看做潜在的竞争对手。尽管如此,跟以往相比,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还是有了很大的改善。

此外,在其他很多方面,两国还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合作,比如说在反恐方面,我们应美国的要求,冻结了与恐怖主义有牵连的组织和个人在中国银行的账户,据说我们还向美国提供了一些我们掌握的有关恐怖主义组织和个人的情况。还有,我们还同意在我们的港口对发往美国的集装箱进行检查。原来这些集装箱都是到了美国的港口再进行检查的,后来美国觉得这样做不安全,担心恐怖主义组织用集装箱将原子弹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到美国,这些武器到了美国的港口再检查就迟了,那时候恐怖主义组织就会以此要挟美国或直接攻击美国的港口或城市。所以美国人认为最好在集装箱运出他国港口之前就进行检查。2001年我在华盛顿的时候,美国国防部的一个杂志的编辑曾打电话给我,问我如果美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个要求,中国政府会不会同意?我说那要花很多的钱,中美贸易量很大,那么多集装箱一个一个去检查,费用一定很高,谁来买单?他说当然我们来买单。我说要是你们买单这个事就可以商量。据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也有了进展。此外,美国联邦调查局还要求在北京设立一个办公室,这在“9·11”前是根本不可能的,有报道说我们也同意了。美国方面对中国给它的



帮助最终也开始领情,不再说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并把新疆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放到它的恐怖主义组织的黑名单里。在国际反恐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双方都尽可能满足对方提出的有关反恐的要求。

在处理朝核危机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坚持原则,同时采取了灵活和积极的做法。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两条:第一是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我们认为中国周边不能再有核武器了,朝鲜一旦拥有核武器,其他的国家像韩国、日本也要有,这样中国周边核武器国家的数量就会增加,对中国的安全极为不利;第二是反对美国对朝使用武力,我们不希望美国在我们的边境上打一场战争,也不希望美国占领和控制朝鲜,这都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我们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做法,先是促成中美朝三方会谈,后来举办了中美日俄朝韩六方会谈,而且积极推动六方会谈取得进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作用得到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赞赏。美国政府反复称赞中国在朝核问题上的做法,主要是因为它在伊拉克问题上焦头烂额,无暇关注和处理朝核问题,我们的努力实际上帮了它的忙。当然,美国政府公开赞赏中国政府在朝核问题上的做法也有其他的意图,那就是希望借此离间中朝关系,为它以后按照自己的意图解决朝核问题创造条件。

现在美国比较热心于继续六方会谈,鲍威尔最近来中国访问,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早日举行下一轮六方会谈。当然美国对六方会谈会取得什么成果并不抱很大希望,因为它骨子里觉得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是一个邪恶的国家,不相信朝鲜会放弃核武器计划。美国推动六方会谈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六方会谈来把朝鲜拴在谈判桌上,这样朝鲜就不会做太离谱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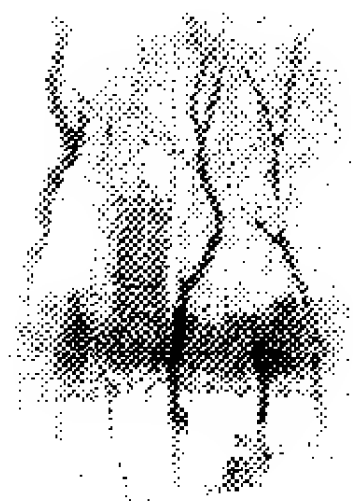
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如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中美双方也在进行合作,这些年,中国对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越来越重视,认为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并把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和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视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



前一时期中国政府已经制定了法律,禁止任何公司或个人对外出口国际上明确禁止的武器、材料和设备,如果哪个公司,哪个人在中国敢于做这种事,它/他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前些年美国的媒体经常报道说中国向这个国家出口武器,向那个国家出口违禁的材料,这几年这方面的报道不多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做法也是认可的。

中美双方甚至在台湾问题上也有了一些合作。去年温家宝总理在访问美国的时候,布什总统当着温总理的面公开和明确地表示反对台湾当局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陈水扁宣称要在2006年修宪,2008年制宪,让美国人感到很担心。当然布什这句话也是说给中方听的,那就是美国也反对中国政府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布什说这句话后,我们这里有些人感到很欣慰,甚至很高兴,认为美国站在我们这边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陈水扁搞台独,美国担心两岸出现军事冲突,把它牵连进去,损害它的国家利益,所以它要反对。反过来,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统一国家,它也会认为损害它的利益,也会反对。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太乐观了。但是话说回来,双方目前至少在反对台独问题上在合作。

中美经贸和文化方面的交流非常频繁,特别是经贸关系,发展的势头非常好,贸易量非常大,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去年增加30%左右,今年可能又是30%。双方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程度在加深,文化交流也很热络。但是这两年美国反恐,限制外国人赴美,间接打击了我们学生去美留学的积极性,据说去年申请赴美留学签证的人数下降了50%。鲍威尔这一次访华,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专门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认为美国应该简化对于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的申请手续,我们教室里可能也有人对此而感觉到欣慰。现在美国入境申请手续太繁琐,要申请十几天,我下个月要去美国,上次办签证,让我按手印,说是几分钟,但是等了2个小时,当时虽然很气愤,但觉得这次按完手印,以后就不用再受这个罪了。但这次办签证才发现每次办签证都要按手印!简直是太过分了!美国政府的这种近乎愚蠢的做法妨碍了中美交



流,从长远的角度看也会伤害美国的利益。

两国国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政治气氛也有所缓解,“9·11”前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批评铺天盖地,使用的语言尖酸刻薄,让国人难以接受。2001年我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在那看到一篇文章,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写的,文章说中国是法西斯国家,为什么中国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文章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但中国实行的又是社会主义或国家主义,所以中国是法西斯主义的。这个逻辑太荒谬了!这位先生对中国敌意太深,乃至胡言乱语。但当时这种文章在美国都有市场。现在这种话没有多少人说了,说了也没有人看。因为美国的注意力在反恐问题上,在国内经济的问题上,中美又在反恐问题上合作,反华文章在美国失去了不少市场。

中国国内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气氛也有所缓和。前几年国人对美国很反感,对美国反华做法也很愤怒。90年代中期时,美国对中国心理上和政治上连续不断地进行围剿,让中国人受不了。于是有人写了《中国人可以说不》。1997、1998年中美首脑互访后,两国关系刚好一点又出现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事件,于是中国人上街游行,抗议美国的做法,有些人还往使馆里面扔了石头。记得当时我在一份国外的杂志里看到一张照片,照片里美国驻华大使在大使官邸的门后站着,门上有一个大窟窿,玻璃被砸碎了。看到他满脸沮丧的样子,我心里真有点难受。这位大使在中国的三年期间,对中国很友好,为推动中美关系的确做了很多的事情,结果三年的努力完全泡汤了。据说后来他也得到了一些补偿,在他离任的时候,江主席和朱总理单独接见他,也是对他三年的努力的认可。现在中国人对于美国的看法也未必就好,在网上还有很多的批评,但现在的批评跟过去比要缓和的多。虽然认为美国比较霸道,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做法不以为然,但是中国人现在的反美情绪远不像过去那么强烈,也没有人提抵制麦当劳了。

说中美关系现状不错不等于说中美之间没有问题。事实上,中美之间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说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等等,但是



“9·11”以后,两国政府都在想办法务实地处理这些问题。“9·11”以前双方更多的是在媒体上处理这些问题,公开地指责对方,结果双方越吵情绪越大,关系出现恶性循环的局面。

为什么中美关系现在不错呢?这要从“9·11”前的中美关系的特点谈起。“9·11”前中美关系的总的特点是分歧在减少,冲突在增加。为什么说分歧在减少呢?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出现了持续和快速的发展,中国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使得中美之间的差异在缩小。改革开放以前我们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地方,国家也相对封闭,受国外影响很小。那个时候到商店里面空空荡荡,只有不多的商品供你去购买,你还要有购货本和购货券才有资格买,常常由于商品缺货,即使有券也卖不到。那个时候既没有可口可乐,也没有耐克鞋,更没有好莱坞大片。这些东西现在都有了,现在我们的商店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不比美国的商店差。现在到处都是跟合资企业有关系的广告,高露洁,微软视窗软件,还有好莱坞电影的介绍,受国外的影响很大。现在美国人到中国,看到这些就像回到了美国。而且我们有的大城市比美国的一些大城市还要先进,充分体现后发优势。美国人比较注重个人权益,政府要把路修宽点他要是不想搬家,这路也就没办法加宽了,政府限制广告的权利也没有那么大,不能像北京那样说这条路不能上广告,你得把你的广告拆了,结果像纽约这样的城市,路就没有那么开阔,有的地方还比较乱。相比之下,北京和上海倒显得整齐些,该修路就修路,看上去反而更现代化一些。当然,中美双方生活水平还差很多,但双方的差距的确在缩小。

中美差异不光反映在物质层面上,而且还表现在价值理念上。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拒绝市场经济,现在我们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当然有中国特色;二十多年以前我们在讨论要不要法治,法大还是权大,记得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炒得还挺凶,现在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国家要实行法治,党的意志通过法律来实现,在这个问题上的关系理顺了;二十多年前我们拒绝谈人权,认为人权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



现在我们主动谈人权问题；二十多年前我们不提民主，现在我们说要加强我们社会主义的民主，民主本来就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我们也可以用，所以，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加强民主。所以，双方在价值理念方面的差距在迅速地缩小。应当说现在两国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比以前要小得多。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将来我们跟美国会完全一样。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几十年以后，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的制度也不可能会跟美国完全一样，我们国家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需求，国情不同，我们不可能跟美国完全一样。

按理说中美两国物质层面和理念层面差距缩小后两国间沟通应该顺畅一点，关系应该好一些，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整个 90 年代到“9·11”前，两国关系总的发展趋势是冲突在增加。90 年代初美国对于中国出现“六四”感到痛心疾首。当初美国许多人对于中国抱有很大的希望，80 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东欧和前苏联都没有实行改革，结果是中国一枝独秀，实行改革开放。美国总统里根是非常保守的人，1985 年他到中国访问时，感觉好极了，认为中国正在变成美国。那个时候，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期望值特别高。1989 年春夏之交，天安门广场出现游行示威，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对他的学生说，这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加速，中国在进步，不会出什么问题。后来他到了北京傻了眼，事态的发展跟他原来的想象非常不一样，于是，他很失望，可以说当时整个美国对中国发生的事都非常失望，失望之余就要求美国政府对华实行制裁，包括禁止跟中国进行高层来往。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老布什悄悄派他的顾问到中国来，跟中国领导人商量挽救中美关系。这件事后来被曝光，布什在政治上非常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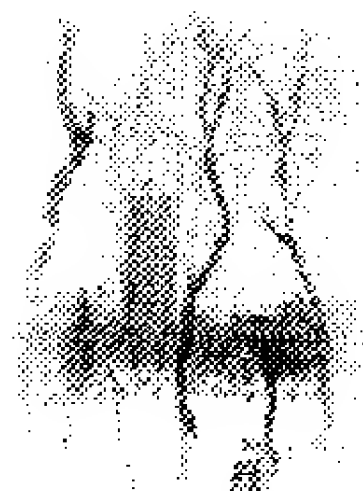
“六四”后，美国国会每年在 6 月 3 日审议是否要给中国最惠国待遇之前，美国国内都要就中国问题进行一番大的辩论，各种各样的团体粉墨登场要求美国政府取消给中国的所谓最惠国待遇，每年如此。为了证明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些团体和个人提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对



中国和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攻击。中国人刚开始觉得出了“六四”这样的事情也很遗憾,美国人骂就骂吧,但后来美国人骂个没完没了,而且还无中生有,添油加醋,中国人于是就受不了了,说你这不是瞎来嘛,没有的事你也编,还造谣夸大。正是在个背景下,国内有人写了一本书批评美国国内的这种做法,书名叫《妖魔化中国》。

当时还闹出个上海孤儿院事件,今天在座的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美国有一个民权组织发布了一份报告,宣称根据他们调查,上海孤儿院对有残疾的孤儿实行虐待,而且还谋杀这些婴儿,说这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怂恿。美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那时在美国做访问教授,听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编得也太邪乎了,按照美国的标准,即使中国政府坏也不至于谋杀有残疾的孤儿!这件事也给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上了一堂课。在此之前,很多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对于美国对中国政府的批评过去是相信的,也有半信半疑的,看到美国媒体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以后就不再信美国媒体的报道了。

虽然这种做法很无聊,但当时在美国很有市场。对于美国人来讲,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军火贩子(其实美国出口的武器比谁都多);中国是一个奴役服刑人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血汗工厂;中国是一个盗窃美国核技术的国家,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就是从美国那里偷来的;中国还是一个企图用金钱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家,如非法向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的竞选总部捐款(后来美国也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最后发觉只有一个跟中国有背景的人捐过一笔钱,是10万美元,我想要10万美元就能把戈尔买下来,那他也太不值钱了!),这些说法基本上没有什么根据,但是美国就有人信,而且吵得沸沸扬扬。美国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每个利益团体都有其各自的利益和想法,但是总的来说反映了美国人希望改造中国,希望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心理。9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人看到后来中国经济发展起来,看到中国强大起来的时候尤其如此。为什么想改造中国?因为美国人中有很多是自由主



义者,他们相信所谓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在他们看来,如果中国变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中国就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他们要把改造中国。还有一部分人是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崛起的国家必然要和既得利益国家发生冲突,因为当崛起的国家的实力增强时,它就会在国际上要求更多的特权和利益,要求更多的影响,可是既得利益国家不舍得把利益分享,结果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最终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对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写了一本书,书名是《大国政治的悲剧》。他认为中美关系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这个悲剧就是古希腊悲剧,剧中的主人翁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会很悲惨,所以千方百计地去避免它,但是最后悲剧还是出现了。这位教授认为,虽然中美双方都不希望对抗,并会努力避免它出现,但是大国政治的内在逻辑决定了中美必然要走向对抗,这是无法逃避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位教授提出,美国现在就需要给中国施加压力,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位教授的观点反映了这部分人的想法。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者要求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给中国施压的目的不是把中国改造成民主的国家,而是阻止或延缓中国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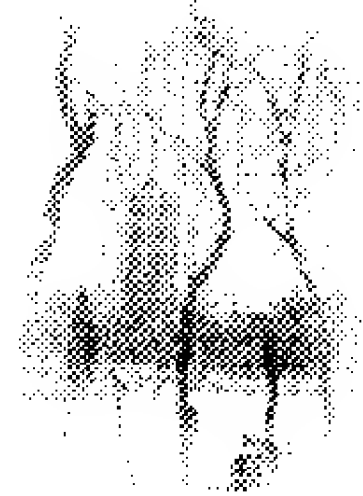
整个 90 年代,美国政府都在向中国施加压力,特别是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给中国政府出了难题。此时的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中国政府面临严峻的挑战。我个人认为中国经历的是三大转型:首先是现代化转型。现代化转型也是一个非常深刻和非常不稳定的过程。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常常伴随着社会的不满和动荡。美国有一个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是《为什么人们造反》,他说人们造反并不是因为他们很贫穷,也不是因为他们绝望,而是因为他们有了希望却无法实现。经济的起飞使他们对发展带来的好处的期待值上升,期待值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实际上能得到的好处,心中就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变得越来越强烈,于是他们对现状不满,就起来造反。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的阶段,虽然经济发展给很多人带来了



实惠,但是人们对生活改善的期待值增长的更快,结果他们对现状就变得越来越不满足。现代化还是一个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有些人抓住了机会,获得的财富较多,有些人没有,得到的就少,甚至什么也没有得到还失去了许多。倒霉的人就不说了,没抓住发财机遇的人也会产生不平衡的感觉。现代化之前,社会结构、分配方式、道德理念相对静止。但是,经济起飞时这些方面都出现变化,面对这些变化,人们很不适应,随着变化的加剧,人们就会感到非常焦躁不安。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动乱与革命。我们国家现在就面临这个问题,经济发展很快,但好多人不满意,不稳定因素很多。

第二个转型是经济体制转型,也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个转型也是非常深刻的,对社会和政治的冲击也不小。计划经济体制有自己的一套价值理念和分配方式,市场经济体制也有一套自己的价值理念和分配方式。当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这两套不同的价值理念和分配方式共存,结果是生活在两种经济体制下的人谁都不满意,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说他们特权太多,凭什么享受铁饭碗、廉价住房、公费医疗等等待遇,甚至生老病死都要国家管,我们在这辛辛苦苦却什么都得靠自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看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发财也非常眼红,说你们这帮人什么都不是,凭什么乘豪华车,住那么大的房子,有那么多钞票。总之,谁都不满意。价值理念也混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感叹世风日下,雷锋叔叔没有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说,别假正经,雷锋之所以成为雷锋是因为有人给他提供免费的伙食和住房,现在首先要养活自己,然后才能无私奉献,你要想做贡献还得自己富一点。总之,转型的时期不满情绪特别多,再加上转型过程中大量工人下岗,社会极其不稳定,不稳定因素就更多。

第三个转型是领导类型的转换,也就是从打江山的领导人转向技术官僚型领导人。这两种类型的领导人跟体制的关系非常不一样。对于打江山的领导人来说,江山是他打的,体制是他们建的,什么外交部、农业部都是他们设的,他们和体制的关系是人强体制弱。1970年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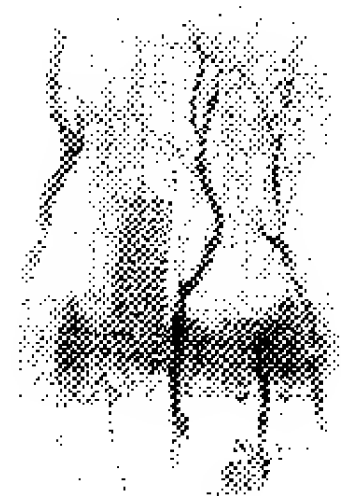
会议上,毛主席说不设国家主席,于是就不设国家主席了;邓小平退出领导岗位后,虽然什么职位都没有,但是他照样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技术官僚型领导人是什么特点?就是体制强人弱。当然这里说人弱并不是指那个具体的个人,而是说跟打江山的领导人相比,技术官僚型领导人的权力相对于体制要弱。这是因为他们是在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权力是体制给的,体制把他给放在什么位置上他们就有多少权力,一旦失去了这些位置他们就没有这些权力。这两种领导体制搞好了都可以稳定。但是在体制转型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打江山的领导人过世以后,他们身后留下来的是一个比较弱的体制,他们的接班人又是比较弱的接班人,弱的体制和弱的人加在一起就不稳定,因为弱的体制无法给他们足够的支持,所以此时领导人的权威特别容易受到其他人的挑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很幸运。为什么?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在世的时间比较长,只要他们在世,政治上就比较稳定,而且,由于他们年事已高,精力有限,所以逐渐将越来越多的权力转移给技术官僚型领导人,于是后者就有机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熟悉和运用权力,等打江山的领导人过世的时候,技术官僚型领导人已经积累了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有了运用权力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权力交接比较顺利的重要原因。如果打江山的领导人60岁左右就过世了,情况可能就很不一样了。虽然中国领导类型的转换比较平稳,但这种转换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搞不好很容易出大乱子。

中国面临的这三大转型,每一个转型都有可能引发强烈的政治动荡,如果你不相信可以看看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出多少问题,还可以看看前苏联经济体制转型出现了多大的混乱。1995年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报告,说俄罗斯人的平均寿命是56岁。这比前苏联垮台之前至少降了10岁!如果把失去的这些寿命换算成人的生命的话,那么至少上千万人俄罗斯人的生命就这么消失了,且不说活着的人也非常痛苦,这些年我见到一些俄罗斯的学者,他们对俄罗斯发生的事都非常沮丧。当年前苏联人在世界上多有地位啊,记得在康奈尔



大学读书时,我的一个同学见到前苏联一个学者,她说问他办赴美签证时申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了吗?他说当然了。我的同学问他难道不担心美国拒绝给他签证吗,他说他不担心,因为前苏联政府跟美国有协定。当时的中国政府就没有能跟美国人签这样一个协定,结果我们好些共产党员去美国都没有能公开申明他们的党员身份。今非昔比,现在的俄罗斯人不仅失去了过去的地位,而且常常要面对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冷落的尴尬处境。前几年我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开一个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东亚和中美日三国关系。会上有两位俄罗斯学者参加,听着大家说中国怎样,美国如何,日本又如何,唯独不谈俄罗斯,他们就坐不住了。记得其中一位发言说,你们谈东亚问题不提俄罗斯是错误的,俄罗斯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当我听他要求大家重视俄罗斯时,我觉得很感慨,昔日的超级大国竟然沦落到被人遗忘的地步!

言归正传,中国这三个大的转变,任何一个转变都意味着对中国政府的严峻挑战,搞不好都会出大问题,而中国同时要面对这三个转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政府才始终强调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邓小平讲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一切,后来的领导人也反复强调这个观点。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只能向美国的压力说不。且不说美国人无法真正了解中国需要什么,即使它提出一些对中国有利的要求,中国政府也只能反对,这是因为美国压中国政府做事本身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是,中国政府抵制美国的压力的做法,在美国政府看来是因为它施加的压力不够,所以需要加大给中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也只好奉陪,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抵制。结果是双方关系出现了恶性循环的趋势。在不同的时候,中美两国领导人从国家利益出发,也曾采取过一些办法扭转两国关系下滑的趋势,比如说1997、1998年,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访,提出建立一个建设性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有一定程度的转机,但是每次中美关系缓和或改善情况出现都是好景不长。使馆被炸,中国政府抗议,克林顿政府也曾想办法缓和两国关系,但美国国内对他提出的接触政策的批评是一



浪高过一浪。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是越来越不好,在中国人的眼里,美国人也越来越坏,“9·11”以前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小布什上台前在竞选时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是战略竞争对手。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改变了美国对外战略的优先秩序,从而“9·11”改变了中美关系恶化的逻辑。“9·11”后,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恐怖主义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这是因为恐怖主义不仅使得美国经济受到重创,不仅使世贸大楼内的几千人失去生命,而且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为什么这么讲?“9·11”后,美国为了反恐,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剥夺了美国人引以自豪的许多自由。而且在美国受到炭疽病毒威胁的那段时间里,美国国会的议员不敢打开选民的来信,美国的民主也受到了挑战。所以,对于美国人来说,恐怖主义才是真正的敌人。于是他们开始集中精力反恐,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且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美国要反恐就需要中国支持,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既然需要中国的支持,也不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像过去那样说三道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现来自美国的压力突然减轻了,也开始有了对美国示好的空间。“9·11”事件刚刚出来,中国领导人就发了电报,表示沉痛哀悼,同时表示支持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坚决站在美国这一边。那时我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中国购买了30架美国波音飞机!当时没人敢坐飞机,波音公司的股票直线下跌,但是中国却买了它的飞机,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出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角度考虑的结果。之后在上海举办的亚太经贸组织首脑会议上,又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平台让美国用来呼吁反恐。中国政府还在其他方面跟美国进行了合作。中国政府的上述做法,最终使美国相当一批官员感觉到中国不是敌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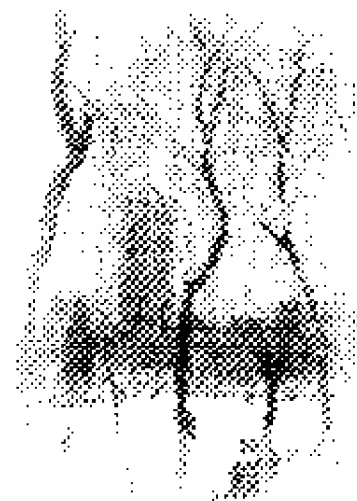
“9·11”后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支持美国?除了道义上的因素以外,主要还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中国政府一直是希望跟美国搞好关



系的,从中国的角度讲,唯一能阻碍中国现代化,阻碍中国发展,并有可能给中国造成很大伤害的国家就是美国,如果中国能跟美国搞好关系,中国就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就有可能集中精力从事国内经济建设和必要的改革。所以中国始终希望和美国搞好关系,只不过“9·11”以前美国没有给中国多少机会。

回顾过去,中美关系可以说是经历了风风雨雨,现在的情况应当说是不错的。近期内估计不会出现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威胁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消失,美国政府还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反恐问题上。同时,中国也愿意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合作,恐怖主义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威胁,最近在巴基斯坦发生的绑架中国人的事件,也使中国人对恐怖主义的威胁有了更加直接的感受。恐怖主义是中美,还有世界各国共同的敌人。

当然,中美两国间还存在一些较大的问题,特别是台湾问题。布什政府的官员最近说的一些话比较中听,但这也只是跟以前相比,跟布什政府过去说的一些话和做的一些事情相比相对好了一点而已。布什政府上台后在台湾问题上都做了什么?一个是加强美台关系,公开表示将要竭尽全力协防台湾,安排台湾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访美,准备卖给台湾 6000 亿新台币的武器和装备,以前还向台湾卖潜艇,潜艇是进攻性的武器,等等,严重违反中美《八一七公报》,这让我们很难接受。最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美军加强与台军的关系。现在美国国防部往台湾派人,据说这些人昨天还是军人,今天脱了军装就以民间的身份到台湾工作,加强美军与台军在信息、通信、指挥等方面的沟通与配合,这使美国军队和台湾军队越来越一体化。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变相恢复美台军事关系。1979 年我们跟美国签订建交公报时,我们提出了三个条件,一是撤军、二是断交、三是废约,当时美国是接受的。所谓废约就是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台军事关系的恢复意味着美国正在背弃废约的承诺,而且,在美台军事关系的加强也增加了美军介入台海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布什政府的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



益,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有的人说中美关系现在不是处于新中国成立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是处于最坏的时期。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个人认为,总的来说,中美关系现在还是不错的,不能说中美关系是处于历史上最坏的时期。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美之间经济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密切,中美之间的合作也从来没有这么深入,中美之间的交往也从来没有这么频繁,这些对于中美关系今后的发展是有利的。

现在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是美国的下一届总统是谁,在座的认为克里会当总统的有多少? 布什? 看来还是看好布什的人多一点。几个月以前,我在北大和一个美国年轻的教授谈到美国大选,他说克里会取得压倒性优势的胜利,我说大家都看好布什,你凭什么得出这种看法? 他说美国有一部电影,叫“华氏 9·11”,是批评布什政府的,这个电影创造美国纪录片有史以来的票房记录,这么多人喜欢看“华氏 9·11”,就说明布什不得人心,所以说克里一定高票当选。这个时候,另外一个美国教授过来,他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说还有一部电影也很受欢迎,那就是“耶稣受难记”,这是一部宗教色彩很浓的影片,看这部电影的人大都是笃信宗教,也就是比较保守的人,这些人大都是布什的支持者,这说明布什还有许多支持者,现在说克里会赢为时过早。

说到宗教在美国的影响,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根据美国具有权威性的宗教机构去年调查的结果显示,美国每 10 个人中就有 9 个人自称相信上帝,有 8 个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有 7 个人是属于某个宗教团体或者是组织,大约 6 个人每天祈祷,有差不多 50% 的人认为上帝是美国民主道德的引导力量,有 4 个人每星期日去教堂参加礼拜,全美有 30 多万座教堂,遍及美国城乡,虽然美国很讲求实力,讲求金钱,喜欢新奇、刺激和追求物质享受,每年观看橄榄球、棒球、篮球、网球、赛车各项体育比赛各达 4 亿多次,但是参加宗教活动却达 52 亿人次,虽然美国每年花在橄榄球、棒球、篮球上的费用达 50 亿美元,可是美国人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每年奉献给教会的捐款超过 500 亿



美元。这个现象就像美国著名的神学家尼泊尔说的那样,美国是世界上最信神的国家,也是宗教性最强的国家。这篇文章认为一个深受美国历史影响,又非常尊重这一独特历史的美国人,一个对美国的现状深深忧虑,对美国将来负有深刻责任感的美国人,很可能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并不十分杰出的布什总统,因为相信布什总统要比克里对美国目前在道德、文化、价值等方面出现的社会危机和国家安全更严肃,更认真,也更有责任感,比起克里来美国更需要布什。

当然,现在到底克里和布什谁会当选谁也说不清楚,到现在为止所作的民意测验显示,两人差距基本上都是在3%以内,3%以内的差距在合理误差范围内,所以这个差距一般没有多大意义。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次选举的结果双方得票会比较接近。前两天凤凰卫视播出了一幅漫画,漫画里有一长溜人排队,有两人在旁边议论,其中一人说,这么多人来投票,可能要创美国历史上总统大选投票人数的记录了,另外一个人说,你注意到没有,这些人都是律师啊!意思是共和民主两党都担心这次出现上次选不出总统的情况,所以双方都在准备打官司。上次事先没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这一次可不能在贻误战机了。听说这一次双方为了打官司找的律师达到万人。

目前我们搞不清楚谁会当选,也没必要花更多的时间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现在需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布什当选和克里当选对中美关系分别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当怎么办?这样我们才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从国际社会的角度来讲,克里当选比布什当选要好些,布什上台后,对外关系没有处理好,外交上单边色彩比较浓,结果世界上70%—80%的人都不太喜欢他。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国家的人喜欢他,其中一个就是以色列。如果布什连任,他很可能还会延续现在的政策,这对国际社会来讲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对国际社会不是好事,对中国不一定是坏事。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个人认为,不管布什还是克里谁当选,都是好坏参半。如果布什当选,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会继续关注安全问题,在



台湾问题上就会跟我们有较多的矛盾和冲突。好在现在布什正在致力于在反恐,在这方面的压力有限。此外,布什政府中有些人还是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敌人,在这些人看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迟早要导致中国向美国的地位挑战,因此,他们认为需要限制中国的发展,这就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有所作为,绝对不允许台湾落入中国的“虎口”。美国现在的对台政策就是一方面控制台湾,不允许台湾给美国添乱。另一方面阻止大陆收复台湾,将来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利用台湾来遏制中国。但是布什上台也有好的地方,贸易上给我们的压力会少一些,毕竟共和党主张自由贸易。由于中美贸易中美国的贸易赤字很大,不管是根据美方的统计还是中方的统计,美国的贸易赤字都很大,美国经济现在的情况又不太好,所以这方面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即使如此,也会比克里上台的情况要好些。在人权问题上的压力也不会太大,布什还会派官员到日内瓦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不过不会像克里那样热心。人民币汇率问题,我觉得布什政府也没有想好到底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对谁有利,所以它的态度非常矛盾。如果人民币贬值,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出口成本就高了,对美国不利。前一段日本政府也曾积极主张人民币升值,现在不怎么嚷嚷了,也是同样的道理。总之,在这些问题上,对于中国来讲,布什政府可能采取的做法要比克里政府可能采取的做法要好些。

如果克里上台,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可能会少一些,因为大多数支持民主党的人相信民主和平论,认为只要中国民主了就不会对美国造成威胁,所以他们希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对于他们来讲,推动中国民主化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台湾现身说法,表明中国文化和民主不是相互排斥的。只要台湾不独立,他们就利用台湾向中国推销民主。前几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就有这样的说法,那就是美国为了向中国推行民主也不应支持台湾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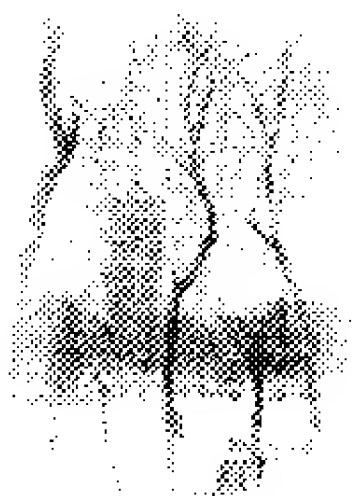
前一段克里说他支持一国两制,但后来又说那是口误,没有这个意思。我总觉得口误常常反映真实思想。我觉得他心里还是认为一国两



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一国两制多好啊!两岸相安无事,美国不必面对台海军事冲突,还可以让台湾发挥所谓民主榜样的作用。美国许多人现在担心的是台湾到底能撑多久。几年前,美国一个资深学者说美国很快就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真的要实现和平统一美国该怎么办,我说你认为呢?他说他觉得美国有一部分人会反对,但有什么理由才能反对呢?后来美国大学一个教授为此发表过一篇文章,文章说台海双方都同意和平统一的话,美国不会也不能阻止。当然美国有一些人是不会接受的。不管怎么说,克里在台湾问题上既然这么想,他可能在售武、美台军事交流和美台军事一体化这些问题上就会谨慎一些。他那里谨慎一点,我们就踏实一点,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矛盾就会少一点,合作就会多一点。

但是,克里上台双方在所谓低级政治(非安全)问题上,如贸易、人权、环境等等这些问题上的矛盾很可能会比布什连任要多一些。毕竟美国的工会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者,美国工会的人认为中国工人抢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所以他们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在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数字非常大的情况下,克里政府很可能会接受他们的要求。当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很大的时候,克林顿政府就曾给日本施加非常大的压力,逼迫日本政府开放市场,甚至不惜损害与日本的关系。日本是美国的盟国啊!共和党当时对此气得不得了,认为民主党的做法危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小布什上台第一件事就是修补和日本的关系。民主党对日本尚且如此,美国跟我们又没有什么盟友关系,所以民主党在贸易问题上对我们只会更不留情面。民主党上台在人权问题上也会加大对我们的压力。中国越强大,民主党越着急,越觉得中国民主化的步子太慢,越担心强大但非“民主”的中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所以,如果克里上台,中美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也会增加。最近看美国的报道,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在增加。

当然,不管共和党 and 民主党谁上台,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总的来说不会有大的变化,中国政府不能指望美国放弃台湾,美国在可以预见的



将来不会支持中国的统一,不管统一是以何种方式实现的。

这两年我在美国到处讲,说支持中国和平统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并不违背美国的价值观念,从长远的角度看,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如果美国拒绝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美之间在战略上就无法建立真正的信任感,美国就很难指望中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跟美国全面合作。而且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美国有求于中国的事情只会增加不会减少,美国会为此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所以,拒绝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到时吃亏的是美国。当然,现在对美国人说这个可能还为时过早。

现在中美之间要出现军事对抗可能性不是很大,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台湾问题上,陈水扁说 2006 年要修宪,2008 年制定新宪法。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美国是不会让他这样做的,中国也会坚决反对。但如果陈水扁他真的利用修宪和制宪推行法理台独,中国政府就只能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制止他,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动用了武力,中美对抗就难以避免。

总之,美国共和和民主两党不管哪个党上台对中国来说都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美国对华的基本政策不会变,但会各有特点。我们对这些特点需要好好地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变不惊,沉着应对。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4 年 10 月 29 日)



美国大选与竞选辩论

■ 张睿壮

张睿壮,南开大学政治学教授、博导;南开大学国际问题
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主任

美国大选与竞选辩论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和北大的同学谈谈大家关心的美国大选。我打算采用漫谈的形式讲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事情,而不去做正式的选情分析,因为关于美国大选的正式报道在很多报刊上都看得到,上面有关于最新竞选形势的报道,也有很多评论文章对影响选举的重要因素特别是一些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都有深入分析。因此这些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当然,还是免不了先对当前选情作一个简单概括。如果把美国 50 个州分成铁定支持和倾向支持布什的,铁定支持和倾向支持克里的,以及不确定的,那么迄今为止还有九个州没有确定。这九个州又叫战场州(battleground state),竞选战的主战场就是在这九个州。美国的选举很有意思,那些铁定支持某个候选人的州在整个大选期间都很少有人搭理,譬如那些铁定支持布什的或铁定支持克里的州,这两个总统候选人都不会去。不管支持他或不支持他的,已经铁定了他还去干什么?美国人的竞选高度技术化,他们的时间、金钱都要用在刀口上。对于那些有倾向的州,也要看有没有希望,有希望就去,没有希望就不去。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集中在 battleground state 上。根据民意调查,现在这



两个候选人得票非常接近,而且呈现交替领先的情况。一会这个多三四个百分点,一会那个多两三个百分点。考虑到抽样误差和统计误差,这种差别在统计上被视为 insignificant,即不显著,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此说这两个人现在是势均力敌,选举结果难以预测。

今年九月下旬我到美国去观察总统选举,这次活动由美中教育基金主办,邀请了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一共四个人,先到华盛顿,见了总统辩论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前主席弗兰克·法兰考普夫,听他讲两党是如何策划竞选的,总统辩论又是如何组织的。又到布什竞选总部去看他们是怎么实际运作的;还到国会会见民主党外交事务主要发言人、参议员拜登的首席国际事务顾问,听他谈如果民主党胜出,克里政府的外交政策将会是什么样的。如果克里当选,拜登将是国务卿的热门候选人。我们此行的高潮是在迈阿密大学现场听了第一场总统选举辩论。今年大选一共举行了三场总统辩论,一场副总统辩论。

今年的美国大选有两个特点,一是外交问题成为选举的头号问题。这在美国是很少有的。战后美国历届选举,正常情况下经济问题总是头号问题。经济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钱包,自然最受关注,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一样的,美国人尤其如此,他们更重视物质主义,更关心自己的钱包。中国人有个特点,就是对国际事务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中国电视台里国际新闻播出的时间长度和显著地位要远远超出美国。美国三大电视网加上 CNN、FOX,国际新闻是很少的。除非国际上有大事发生,它们一般不播国际新闻。一些地方电视台以只播地方新闻为口号,这对本地公众是一种吸引、一种招徕。美国的选举中外交政策作为头号问题很少见。上一次是在越南战争的时候。这次为什么? 因为有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现在正在进行中,每天都有美国士兵在战场上死亡,引起美国人的关注,所以外交政策成为今年选举的一大焦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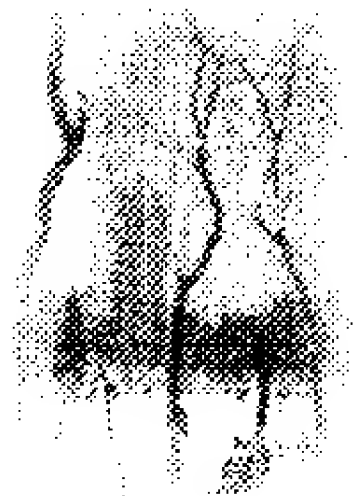
今年的选举的第二个特点是民意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选民在一些主要问题如伊拉克战争上,赞成和反对的比例接近一半对一半。伊



战刚爆发时,美国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达到 70% 以上,那时美国社会达成一种共识,但现在这种共识不复存在,究其原因,美国原先发动战争的借口一个接一个地破灭了:伊拉克既没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萨达姆·侯赛因跟本·拉登也没有联系,现在剩下唯一的借口就是所谓的“政权更替”,说萨达姆是独裁政权,必须取而代之。但世界上独裁者还有很多,美国是不是都要去打呢? 又是谁给美国这种权力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布什唯一能为自己辩护的就剩下这一条理由,但它却没有说服力,已经不能让多数美国民众相信这是一个合法而正当的战争。当然,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仍然相信布什这种煽动性的话:“一个没有萨达姆的世界比有萨达姆的世界更安全。”然而按照这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一个没有布什的世界比有布什的世界要安全”,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也应该来一个“政权更替”呢? 我这么说是根据的:美国权威的民调机构在全世界进行美国总统的模拟选举,结果克里大比分胜过布什,这倒并不说明克里受欢迎,因为谁都不大清楚克里到底主张什么;外国人之所以选克里,实际上是对布什投否决票。

像现在这样,在一个主要的竞选问题上出现正反两边势均力敌的局面,我们就说民意呈两极分化。美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形成了强大的主流共识,在一些主要、重大问题上持歧见的往往只是很小的少数。尤其在战争时期,美国一贯的传统都是全国一致,团结对外。战争期间为数众多的公众公开表达反战意见是十分罕见的(上次例外还是越战,不过那次反战的强度要远胜此次)。在这一问题上,两党候选人的立场也开始拉开。伊拉克成为克里向布什发难的一个焦点问题。克里称伊拉克战争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布什则反问一句:我们的军队还在战场上,你说这种话对我们军队的影响有多坏? 伊拉克战争成为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然而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如果往深里看,美国选举,甚至美国民主的特点是什么呢? 其实美国的两党没有给美国的民众提供一种真正



意义上的选择。两人对伊拉克的分歧看上去很大,但实际上分歧只是浅表层面的。克里说:我们不应该打伊拉克,因为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我们应该集中力量追捕本·拉登,朝鲜、伊朗要比伊拉克更危险。这只是策略上的分歧。克里从来没说美国没有权利打伊拉克。对美国的霸权,对美国在世界上不顾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准则去进攻另外一个国家的权利,克里从来没有质疑过。克里攻击布什的伊拉克政策的另一论点是他未能组成国际联合战线(international coalition),所以在伊拉克战场上投入的战斗兵员及其伤亡中美国都占了90%以上。克里称如果他当选,他就要组织一个真正的国际联合战线,多让外国人去打仗,那样一来美国士兵就可以不死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且不说克里的如意算盘能否实现,从他的“替代方案”可以看出克里对布什在伊拉克政策上的挑战都是策略上的、表层的,没有原则性的、深层的。譬如说美国到底有没有权利发动战争?或者说你作为美国总统,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美国这样在世界上横行霸道有没有好处?换句话说,今天你打伊拉克后,美国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像这些都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克里恰恰没有在这些问题上挑战布什。这只是一个例子,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列举。

这个例子突显出一个问题:在根本价值观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很多问题上高度一致的。它们一致到什么程度呢?举一个例子:在一次竞选演讲中,布什攻击克里主张大政府,说我用一个字来概括克里的主张:自由主义。在今天的美国政治中,自由主义是一个脏字儿。说谁是自由主义,谁就名声扫地。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重归保守的表现。其实在那之前,例如在20世纪60—70年代,自由主义曾是一个代表开明、开放、改革、进步的褒义词,那时的民主党就是以自由主义为标榜的。曾几何时,尤其到冷战结束后,在多数美国人的眼中,自由主义成了诸多社会罪恶的根源,把你的对手形容为自由主义,无异于置对手于死地。要是在过去,克里作为民主党人肯定会为自由主义辩护并反过来攻击布什的保守主义。但是现在民主党已经不再有



自己的意识形态了。克里的反击很说明问题：他说布什当政后建立了美国历来最大的政府，所以请大家来评评理，到底谁是保守主义谁是自由主义？克里是民主党候选人，他不为自由主义辩护，却和布什比谁更保守，这个例子告诉大家其实他们在根本的价值观和政策主张上是一致的。选民真正有所选择的前提是，可供选择的政党、政策之间要有实质性差别。美国两党的政治主张趋向一致，这就不能给美国公众提供真正的政策选择。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存在既有社会的原因又有政治上的原因。社会的原因是指美国的阶层分布，政治的原因是指它的选举制度。首先要从美国社会构成的角度去看。如果跟欧洲国家相比，他的社会构成相当单一，阶级上的两极分化不明显。两头有没有最穷的和最富的？有，但最大的是什么呢，是中产阶级，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美国的阶级分布可以看成这个样子：一个接近于正态分布的单峰曲线，富有的权势阶层是少数，底层阶级也是少数，分布在曲线的两边；最大部分就是中产阶级，也就是曲线中部的这个峰。美国社会历来比较稳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这根曲线从社会经济地位上看。如果从政治观念上看，底层阶级比较偏左，富有阶级是偏右的。横坐标表示社会经济地位或政治观念，纵坐标就是分布频率。这就是美国的社会政治曲线。如果美国的曲线是这样的话，大家看，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政党，要赢得多数，你的策略是什么？你会把政治主张放在中线上。民主党的基本选民在左边，它会尽量把这根线向右推移，争取中间偏右的选民，共和党则正好相反，会尽量把把这根线向左边推移，争取中间偏左的选民。正因为有这种单峰分布(monomodal distribution)，所以两党的政策都倾向于往中间靠拢，而且倾向于往对方的阵营偏，要争取对方阵营中的选民，当然立场中间化甚至与对方界线不分也会失掉自己阵营中一部分最左或最右的选民，但是从图中的曲线可见，在中间争取到的选民远多于在边缘失去的。

不是所有国家的社会构成都是这样的。作为对比，欧洲国家的阶



级分化相当厉害,即使不是个个如此,也可以说是多数如此,这些国家的社会构成往往是一条双峰曲线,像这样。西欧很多国家有非常强大的工人阶级,左翼政党的重点对象就是保住这个基本群众,右翼政党这边是资产阶级,权势阶层,我就保住这批人。那我要不要往中间靠一点争取对方的选民?可是往中间移一点,就会在自己的侧翼失去一块,因为双峰曲线在中间是低谷,政治立场往中间偏移丢掉的要比得到的多,他就不移了。这就注定了欧洲政治的两极分化。工党就是为工人阶级说话,另一边就是为中上阶层说话,两边都是旗帜鲜明。这就是社会分布的原因。

还有一条是政治选举制度的原因。美国的选举制度有一个特点,叫“胜者全得”(winner-take-all),就是说在绝大多数州(只有两个例外)的竞选当中,该州所有的选举人票全归在选举中得到选民票最多的候选人,而得票较少的那位什么也得不到,等于零。这种制度塑造的典型政党行为就是不顾一切去赢得多数,因为只有赢才谈得上其他,赢不了就一切玩完。这与欧洲的比例代表制是非常不同的。在欧洲,一个小党即使人数很少,仍然可以立场鲜明,它有自己的社会基础和基本群众,假如这部分人占选民的10%,那么它就能得10%的选票,在议会里就有10%的席位,你拿10%就是10%,不会变成零;而在美国,哪怕你拿48%、49%的选民票也等于零,所以在美国,赢得多数就是一切,其他所有的包括原则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在这种制度下,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胜出不惜在立场上让步、在原则上妥协,就是为了争取中间选民,民主党的主张要争取共和党比较靠中间的那部分人投他的票,反过来共和党的主张也要让那些不那么极端的民主党能接受。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选举会出现这样两党立场趋同、选民没有真正的选择的另一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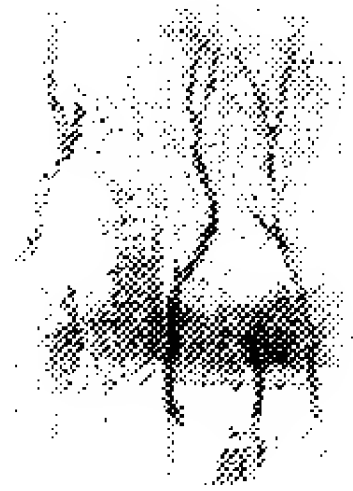
这一“胜者全得”的选举制度还引起了另外两种后果,一是这么多年以来维持了美国的两党制,因为第三党作为新兴政党极少有机会能超越两个地位早已确立的老牌政党获得多数,这样它们所有的努力都



将归于徒劳。二是有可能出现一个只获得少数选民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给“多数统治”的民主原则蒙上一层阴影。

当选者得到的选民票低于落选者,这是怎么回事?这还得从美国选举制度中的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说起。美国人选总统在形式上不是直选,而是选举代表他所在的州投票的选举人(每个选举人事先明确他将投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票)。每个州的选举人的数目等于它的众议员和参议员人数之和,因此全美共有 435(众议员总数)+100(参议员总数)+3(哥伦比亚特区)=538 张选举人票。在实行“胜者全得”的 48 个州里,规则规定该州所有选举人票全归得到最多选民票的总统候选人。这样,一位总统候选人如果以微弱多数在一些大州获胜而以较大劣势输掉一些小州,就有可能出现得到多数选举人票和少数选民票的情况。例如,上次大选在佛罗里达,布什仅赢克里 530 多张选民票,但佛罗里达 27 张选举人票却全归布什。假如在一个小州,一共只有 3 张选举人票,但是戈尔得到的选民票可能是压倒性多数,比如说比布什多十万张,但他也只得 3 张选举人票。如果单算这两个州,布什多得 24 张选举人票,戈尔却多得近十万张选民票,这就是为什么在 2000 年的选举中布什在选举人票上以 271 对 266 胜了戈尔,却在选民票上以 47.87% 对 48.38% 输给了戈尔。这就是说,在全体选民中获得少数票的人最后当选总统。除 2000 年大选外,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还出现过三次。

这样的现象引起人们对美国民主的怀疑。因为民主的原则就是多数统治,得票少的人当选总统跟民主的原则冲突。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太低的投票率。美国现在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大概是 50% 甚至更低(今年是例外,达到 60%,是 1968 年以来最高),这是四年一次的大选,当中还有一次中期选举,不是选举总统而是改选众议员和部分参议员,众议员任期两年,参议员六年,所以两年改选 1/3,这种中期选举的投票率大概只有 30%,非常低,这在政治学上也是一个研究的课题,叫做民主参与的问题。如果民主参与率这么低的话,这个民主还有多少



意义？你说多数统治，但如果参加投票的仅占选民的 30%，算上他们之中的多数（譬如 70%），也就是整个选民的 20%，20% 的人赞同的东西，整个社会都要接受，这样的民主还能不能叫多数统治？

其实美国民主的问题很多。前面说过，美国是两党制，但这两个党的政策立场非常接近。在选举当中，在政策立场上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那就是选举的策略。所以在美国，双方都把选举作为一场游戏来博弈，不是如何挑战对方的原则立场、政策主张，而是谋划以什么样的策略去抓住选民，猎获选票，最终目的就是要为了赢，赢就是一切。我们在华盛顿的时候听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谈竞选的策划。他做过两任共和党主席，曾经帮助两位总统当选（里根的第二任期和老布什），是他们竞选班子中的核心人物，所以他对这套东西非常熟悉，讲解起来就像指挥官讨论作战方案或是篮球教练制定攻防战术一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一个多小时中他用了很多数字、图表给我们讲解竞选策略，却从未提到过两党在原则立场或政策主张上的分歧，让人感到美国的选举似乎是一场纯技术的斗智竞技。

例如，他以自己亲手策划两次大选的经历告诉我们，美国大选一般都是竞选刚开始时，就已经有 40% 选民决定选共和党，还有 40% 决定选民主党，在剩下的 20% “动摇选民” 中又有譬如说 7% 是分布在那些某个党占据绝对优势的州里，对选举结果已不会产生影响了，那么这 87% 的选民从一开始就被从双方的作战计划中抹去了。两党竞选班子感兴趣只是剩下 13% 分布在“战场州”的“动摇选民”，这些才是争夺的对象。如果进一步的民意调查和分析表明，在这 13% 的选民当中，有 8% 是倾向于保守主义，5% 是倾向于自由主义，那么作为共和党的竞选策略，他就要抓住这 8%，把他们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只要这 8% 保住了，共和党就能赢。具体的策略就是投其所好。比如竞选顾问会让总统候选人在每次竞选演说中都把“我们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对“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这样的“关键词”重复多次，以此作为一个卖



点去吸引那 8% 的选民,争取他们的选票。对于竞选战略家们,选民们不过是他们算式中的一连串数字,至于这些人想要什么样的政策,根本就没人不在乎。他们喜欢听什么就给他们唱什么调,竞选完全成了一场博弈游戏,这就失掉了民主原来的意义。而且政治家从民众的领袖变成了民意的追随者。按理说领袖应该比民众高明一点,能够高瞻远瞩,看到一般民众看不到前途所在,然后通过说服去引导民众,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现在是政治家们都有一个竞选班子在那里密切关注民意,然后想方设法地让政治家顺从民意公开表态(或表演)去取悦选民、争取他们的选票。

除此之外,还有技术上的问题和利用技术问题制造政治障碍。2000 年佛罗里达州出现的计票错误,有的是计票人员工作失误,有的是投票机器的故障,有的则是人为制造的,利用一些规则上的技术细节故意剥夺某些选民的投票资格,或把他们的选票作为废票处理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多起诉讼,也未能解决问题。今年的选举也一样,已经出现了一些类似的诉讼。象俄亥俄州的一些选民就已经把该州的州务卿告上了法庭,因为他规定,凡是选民通过邮寄进行选民登记的,一定要用 80 磅以上的纸张,纸张不合格的就算登记无效。换句话说人家的投票资格就被取消了。这 80 磅纸的厚度相当于普通书籍的封面纸,一般人家里是没有的,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既不会有这样的纸,而且消息也不灵通,对州务卿的这一规定多数不知情,因此寄进去的登记因为纸张不合格就作废了,很多人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取消了选举资格。现在已经有人聘请律师准备打官司,说这个州务卿是共和党的,故意用这种办法来减少民主党的选民(因为低收入阶层以民主党支持者居多)。类似的案例在美国不胜枚举,都快把美国大选变成一场诉讼的人民战争了。我们在迈阿密大学法学院访问时,那些法学教授一个个摩拳擦掌说我们就等着 11 月 2 日这一天,票一开出来如果双方得票还是像上次接近,那么肯定有无数的官司等着我们去打。这成了美国民主的又一道风景线。



美国民主有这么多毛病,可是还有那么多美国人妄自尊大,也有那么多外国人盲目崇美,都以为美国的制度是天下最好的制度。冷战以后,美国人在全世界推行“民主共同体扩大化”,其实是推广美式民主。如果你实行的民主不是美国式的,美国人就不承认,说你不是民主。但美式民主有这么多问题,怎么还能成为世界楷模?你美国人怎么还能那么自信在全世界推行你的制度,甚至不惜用暴力强加给别的国家,就如在巴拿马、海地、科索沃、伊拉克所做的那样?可是也有头脑清醒而且不带偏见的美国人也意识到他们自己的问题,像我在迈阿密大学遇到的一位美国教授就说,他前些年在东欧访问时,对那些刚摆脱一党专政、准备确立政治制度的国家的政要和学者说,你们学谁都行,就是千万不要采用美国式民主。

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再讲讲关于美国总统大选中电视辩论的趣事。美国总统的电视辩论从1960年开始,肯尼迪对尼克松的辩论,通过电视向全美转播。1960那次以后就停了,因为后来的在位总统不愿意参加。1964年的大选,林登·约翰逊在肯尼迪被暗杀后作为副总统顶替上去成为总统,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要同他辩论,他没有同意,因为:(1)约翰逊的口才不行,他自知不是辩论的料子。(2)在位的总统多不愿参加电视辩论,因为他本来就已经有足够的机会在电视上面向全国观众;反而是挑战的人最希望有电视辩论,因为这是他在全国观众面前亮相的难得机会。其后因为越战就停下来。再后来卡特也拒绝辩论,因为有第三党的候选人参加,而他认为第三党作为一个小党不够格同他辩论。总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停了,一直到1976年才恢复,1988年其组织工作被无党派的民间组织总统辩论委员会接管过来,辩论的形式和规则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原来规则很少,比较随便,但后来规则越定越多、约定越细,到现在已经有了一本厚厚的规则手册,连两个讲台的高度和相互之间的距离都有明文规定。上次2000年的总统辩论中,戈尔忽然离开自己的讲台向布什走去,害得布什手下的人出了一身冷汗。因此在今年的规则中,应布什方面的要求又增加了一条: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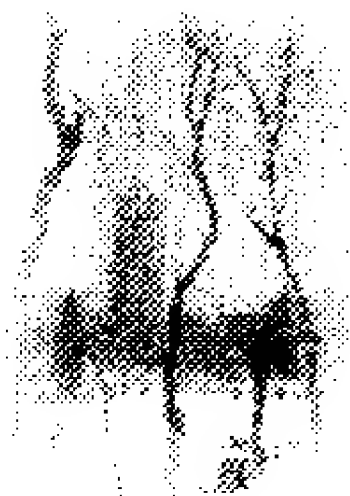


方候选人在辩论中间不能离开自己的讲台走动。

在美国总统竞选辩论的历史上有几场关键辩论值得一提,说它们关键,是因为它们对最后的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如1960年肯尼迪对尼克松的首场电视辩论,年轻英俊但知名度远不及对手的肯尼迪战胜了时任副总统的政坛老手尼克松,改变了传统的竞选观念和策略。1960年电视还没有完全普及,少数家庭还没有电视机,是听电台转播的,其他人看电视。结果听电台转播的人多数认为尼克松赢,看电视的人多数认为肯尼迪赢,这说明在电视上辩论不仅要口才好,形象也很重要。单听声音尼克松获胜,说明尼克松的口才或者主张还是挺强的,为什么在电视上却输了?后来尼克松在自传中说那天他累得不得了,一脸倦色,还因时间太紧没刮胡子,脸上胡子的阴影很厉害,加上强烈的聚光灯往他脸上打,使他汗流如注,电视上看起来就像他被肯尼迪问得狼狈不堪的样子,所以说形象非常重要。美国人其实挺浅薄的,不少选民对候选人就看外表,尤其是女性选民,往往搞不清这两个党的主张是什么,就看谁长得帅,谁更性感,所以候选人的形象和风度被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1976年卡特对福特的辩论中,福特因为说错一句话丢掉整个选举。有记者问他对苏联主宰东欧的看法,他随口应道:我不认为苏联在东欧有主宰地位。此言一出,全国哗然。福特从此一蹶不振。大家知道,当时东欧国家多为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是苏联帝国的势力范围,这在美国是主流共识啊,怎么能说不呢?所以两党之间政策不管怎么分歧,不能超出美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必须在这个范围之内才有民主自由可言。

1984年里根和蒙代尔的辩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插曲。里根很有辩才,当过好莱坞演员工会的主席,其任务就是谈判和演说,后来他又当过加州州长,所以他的口才非常好,往往会用轻松幽默的方法来调侃严肃的话题。蒙代尔给人的形象却是僵硬刻板。里根竞选总统时已经70岁了,辩论中蒙代尔攻击他太老。里根没有直接反驳他说“我不



老”，却说：在这场竞选当中，我将不会把年龄作为一个问题，我不会利用我的对手的年轻和没有经验。本来人家攻击他太老了，他反过来说我原谅你的年轻和没有经验，这句话说完以后，全场大笑鼓掌，甚至连蒙代尔在台上也笑起来了。据说蒙代尔一听到里根的反讽当时就意识到自己完了。

还有一次是在1988年，老布什对杜卡基斯，这次辩论对杜卡基斯最后输给老布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因为有一个问题答坏了。杜卡基斯是民主党候选人，他反对死刑，当时有记者提问：如果你的妻子被歹徒强奸杀害，你会不会还主张不判这个人死刑？据媒体事后报道，杜卡基斯回应时就像是在回答一个与他本人毫无关系的国际海洋法的问题，一张毫无表情的面孔。第二天发表的民意调查表明，杜卡基斯的支持率大幅下降，而且还受到舆论的抨击。因为按照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当人家问你这样的问题时，你应该非常愤怒并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但他没有。这当然跟他的立场有关系，因为他是主张废除死刑的。但他在避免陷入记者的这个圈套时，至少应该做出发火的样子，应该拍桌子对记者吼：永远不许对我提这样的问题！我绝不允许侮辱我的家人！这就是美国价值观。在美国人看来，如果你连你的妻子家人都不能保护的话，我们怎么能指望你来保护我们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和我们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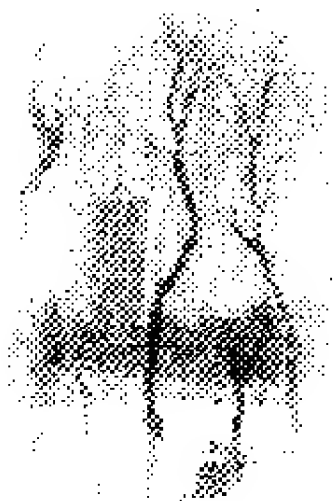
最后，让我用今年总统选举辩论的一点花絮来结束我的讲话。前面说过，我们一行四人应邀赴美实地考察首场大选辩论。谁知当我们到了华盛顿，见到总统辩论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总统选举委员会”两主席之一佛兰克时，才知道原来外面已经炒得沸沸扬扬、全球万众瞩目的美国总统辩论究竟能否举行直到此刻还在未定之天！就在会见我们的前一刻，他刚刚结束与布什竞选班子的谈判，对布什阵营提出的参加辩论的条件进行了最后的讨价还价，现在正等待对方回去汇报后给他最后回话。这时离预定的辩论只有三天时间，已经有上千家来自世界各国的媒体在辩论现场迈阿密大学安营扎寨等候好戏开场，更不用说该



大学已经围绕这次重大事件举行了由数十场活动组成的“总统辩论月”活动。如果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说辩论不举行了,真不知如何向所有这些已经投入无数人力、财力的活动举办方交代,如何向翘首以待的公众交代!直到那天晚上,我们在晚宴上再次见到弗兰克时,才知道仅仅十分钟前他刚接到布什竞选班子的通知,确认布什将如期参加竞选辩论。直到这时,大家悬着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晚餐时我问弗兰克,你们在布什承诺参加辩论之前就投入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大张旗鼓地筹备、宣传,闹得满世界都知道将有一场总统竞选辩论,万一到最后关头布什说“不”怎么办?你们岂不会非常被动吗?弗兰克答道:是的,不错,我们投入得越多,我们的风险就越大,但布什面临的(期待他参加的)公众压力也越大,他拒绝的可能就越小。我说,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他得意地咧开嘴笑了:我们只是民间组织,我们没有权力强迫任何人参加辩论,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法。大家看到了吧?民主政治中还有不少游戏的窍门呢!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004年10月23日)



阿拉法特身后之谜

——阿拉法特逝世及其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 穆斯塔法·萨法里尼

穆斯塔法·萨法里尼,博士,巴勒斯坦前驻华大使,中东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毕业生,阿拉法特“义子”。

主持人:

今天晚上的主讲人是萨法里尼先生,一提到萨法里尼先生有两个非常亲切的词,我在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一个是校友,他是我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毕业生,他是在7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另外一个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词汇——“铁人”,在巴勒斯坦你提到前任驻华大使萨法里尼,可能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如果你一提到铁人,那么大家都知道是萨法里尼先生。今天晚上,萨法里尼先生的演讲主题是阿拉法特之后的中东局势,众所周知,萨法里尼先生和阿拉法特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先生任驻华大使期间,凡是给阿拉法特的公文,最后落款都是你的儿子萨法里尼。所以我们的条幅上也特别注明了这点。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先生发表专场演讲。

萨法里尼博士:

同学们、朋友们,我今天抱着两种不同的心情。第一,我特别高兴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回到我的母校,看到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同学,

我们爱戴、尊敬的领导人,关心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另外一种呢,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民众,对阿拉法特主席的去世感到实在的悲痛、伤心。

你们肯定会注意到,两个星期以来,国际社会很关注阿拉法特的病情,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哀悼。联合国降半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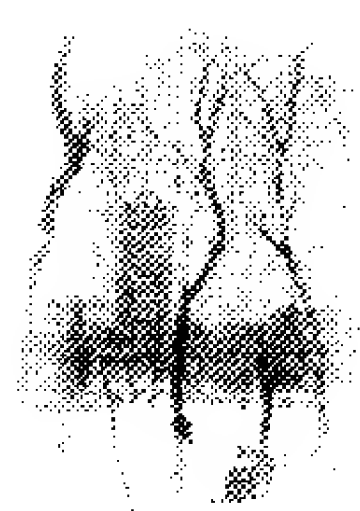
致哀,欧洲领导人也对阿拉法特的去世表示哀悼。阿拉伯国家在埃及开罗为他举行了葬礼,所以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政要都参加了,通过媒体,你们也看到了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是如何告别他们伟大的领袖。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位老人会这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呢?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觉得有必要回头看看历史。

我今天演讲首先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巴勒斯坦民众,第二也是作为一个北大毕业的博士生,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同学们坦率地讲阿拉法特对中东问题,对巴勒斯坦的民族正义事业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我是老外,哪里说不清楚,同学们可以随时提出来。

我要说,我们应该从历史角度来看今天中东的局势,我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看到中国对历史是很重视的,“以历史为鉴,面向未来”,虽然中东地区的历史和很多地区不同,但是我要强调巴勒斯坦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有一些西方研究历史的学者歪曲历史说,该地区只有两千年历史,这是两个概念。说两千年的历史的是有些国家,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因为两千年以前,以色列曾经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一部分建立了以色列,我们说五千年的历史,因为五千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的是巴勒斯坦人——迦南人!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两千年以前,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受到周边的国家,具体地说是以



前的埃及的压迫,它受到宗教的压力,埃及人逼着他们移民到巴勒斯坦,我们巴勒斯坦当地人欢迎他们,照顾他们,这是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一部分移民在这个地区建立了以色列国,以色列在当地只有80年的历史,后来巴勒斯坦又连续受到外来侵略,从那时候起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强调的是,他们来巴勒斯坦前后,巴勒斯坦人一直居住在那里。

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巴勒斯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为自己的利益,为了争取英国犹太人的支持和更容易控制和分裂阿拉伯国家,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贝尔福”是当时英国外交大臣的名字,它的内容就是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他们的犹太国,到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国通过了一个决议,分治巴勒斯坦的土地,就是181决议,这个181决议在1947年11月29日通过,把巴勒斯坦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建立巴勒斯坦国,另一部分成为犹太国,当时这个决议分治两国的土地面积几乎一样,181决议还把耶路撒冷(Jerusalem)交与国际管理。

1948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发动第一次侵略战争,不仅侵占了联合国181决议给他们的48%的土地,此外还占领了巴勒斯坦整个领土的70%土地,包括181决议提出来作为国际管理的西耶路撒冷也被他们占领了。从那时起,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就变成了难民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更不是侵略和被侵略的问题。综上所述,以色列这个国家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产物。联合国把巴勒斯坦问题压放在抽屉里,不再讨论了。因为,以色列侵占了70%,巴勒斯坦只剩下两个不连续的地区了,就是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加沙地带给埃及管理,约旦河西岸给约旦管理,从那时起就这样了。当然了,当时我们是反对的,这是不公正的,你们都了解,因为当时联合国是美国等大国的工具,所以就这么通过了。因此巴勒斯坦问题自1948年后就没有被讨论过。这个背景是个事实,你们翻一翻历史就会知道,巴勒斯坦所受的不公正的对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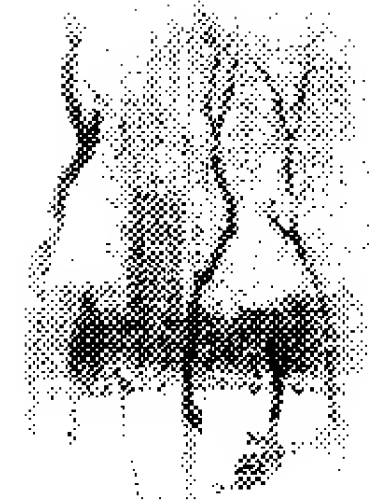
阿拉法特主席和其他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发现,只依靠别人的力量是难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的,我们相信要靠自己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所以1965年1月1日我们爆发了人民武装斗争,阿拉法特率领50年代秘密建立和领导的“法塔赫”运动。开始和以色列打游击前,我们与阿拉伯国家的兄弟交换了意见。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明确的表态,因为阿拉伯国家不是一个国家,虽然阿拉伯国家只有一个历史、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但目前有22个国家。你们可能会问:一个民族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国家?你们也知道,因为法国、英国为了控制阿拉伯地区,1917年签署了《塞克斯—皮科尔协议》,把它分成了这么多国家(塞克斯是英国的外交大臣,皮科尔是法国的外交大臣)。为了瓜分阿拉伯国家,法国和英国把阿拉伯地区分成许多国家。

1964年,在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首都举行了不结盟国家领导人会议,伟大的令人爱戴的周恩来总理参加了这次会议。阿尔及利亚当时支持阿拉法特发动人民武装斗争。在大会期间,阿尔及利亚领导人对周恩来总理说,我要给你介绍一个朋友。阿拉法特主席一见到周总理就说:谁不知道周恩来总理啊,马上上前和他握手,阿尔及利亚总理就说:好像用不着我介绍啊,你们好像是老朋友一样。

阿拉法特给周恩来总理介绍当时的情况和巴勒斯坦问题,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他还邀请阿拉法特到北京来访问。

于是1964年下半年,阿拉法特来到北京访问,是秘密访问,不是公开的。在与周总理会晤的时候,他讲当时的情况。周总理很诧异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很难闹事的,大国肯定不允许。另外周总理也提到,中东不是一般地区,涉及到大国利益,第一是原油很多,第二位置也很敏感,很重要。你们闹革命很困难,但是你们能爆发革命,把革命继续下去,你们的力量会慢慢发展起来,这是了不起的事。当然,在那段时间,当时的局势和现在不同,当年我们受到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

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是唯一的合法的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现在我们谈到阿拉法特通过爆发革命给巴勒斯坦人民也好,给阿拉伯人民也好,带来了希望。因为1948年,以色列通过侵略战争,打败了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军队。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第三次就是1967年,以色列在美国支持和维护下,侵占了整个巴勒斯坦领土,也侵占了戈兰高地、西奈半岛,所以你们看看,阿拉法特能够通过人民武装斗争,把巴勒斯坦问题从联合国很久没有讨论的抽屉里拿出来,摆在国际社会面前谈。从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中东核心问题,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解决不了中东和平问题。这就是阿拉法特所作的巨大贡献。

另外,在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我们游击队员在那段时期,就是1967年下半年,在黎巴嫩南方,为什么在黎巴嫩南方?因为在那里也就是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边境,我们建立了一些不大的游击队基地,在戈兰高地和约旦也有。

我先不谈我第一次见阿拉法特时的情景,继续谈他对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贡献。在1968年,巴方收到一个军事情报,说以色列准备消灭所有在巴勒斯坦——约旦边境的游击队员,当然我们游击队员在那里还不到两百人,没什么武器,而以色列装备很先进,不用一个小时就能消灭掉我们。当时阿拉法特收到情报,在一棵大树下,我记得他带着帽子。他提到毛泽东主席说按理以色列入侵,我们应该撤。我们也不懂应该撤到哪儿,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因为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在第一、二次中东战争中都失败了,我们必须给阿拉伯国家群众和巴勒斯坦人民带来希望,打以色列一巴掌也可以,献出那么多烈士也可以,所以他决定了要跟以色列打。23号早晨,以色列坦克飞机进入了这个小村——卡拉马(Kerama),真不巧,卡拉马的意思就是“尊严”,所以当时,阿拉法特说通过我们的卡拉马战争,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尊严,决心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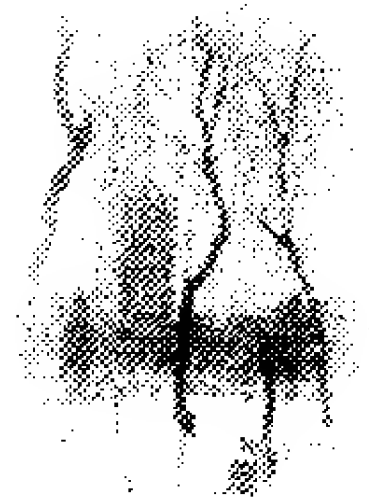
按照他的命令,一百多个人,按每5个人一组,分成小组。背上反坦克火箭 RBG 和机枪,等以色列军队进入卡拉马村以后,发现村子里



没有动静,没有游击队员,是空的。但到了傍晚,天还没黑,那些游击队小组冲击他们的目标,以色列不知道这些游击队员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游击队员和以色列军队面对面地作战,以色列空军也丧失了它的作用,以色列军队一下子就乱了,只能和游击队队员一一作战。战斗中巴勒斯坦游击队员里出现了许多中国的董存瑞。以色列军队撤军时也很乱,按照毛主席说的呢,可能更应该追着它打!以色列在任何战争中都绝对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当时,他们有三四个坦克已经被击毁,这是很大的成果,以前阿拉伯国家和他们战斗中都没有过的。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我要说,在这三四个坦克里面,发现没有别人,只有驾驶坦克的人,已经被烧死了,我们看到驾驶员的右手被锁住跑不了,以色列被称作是一支打不败的军队,确实是,它是拥有美国先进武器装备的世界上第五大军队,我们拉着这些坦克给群众看,你们可以想象群众对阿拉法特有多大期望,多么爱戴了。

我们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1974年联合国邀请阿拉法特代表巴勒斯坦讲话,因为它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承认巴勒斯坦的民族权力,我们的民族权力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让1948年被以色列赶走的巴勒斯坦人返回家园;第二,我们有自决权,决定自己的命运;第三,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这是联合国的决议,国际社会的立场。阿拉法特在讲话的最后说:我今天来到这里,左手拿着橄榄枝,代表和平,代表我们的希望,用和平来解决中东问题和巴以冲突,我的右手拿着自由战士的枪。这反映了阿拉法特希望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和巴以冲突。他代表着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巴勒斯坦人民。

阿拉法特曾经提出,建立一个多民族的民主国家,因为整个巴勒斯坦领土还不到2.7万平方公里,让我们和犹太人建立一个统一、民主的国家。但是以色列还是要保持自己的一个种族国家——犹太国,不愿意和其他民族与宗教生活在一起,不履行联合国所通过的决议,不听国际社会的呼声,继续占领巴勒斯坦领土,打击巴勒斯坦人民,使我们对



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失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继续人民武装斗争。

1988年也是转折点,从1967年到1988年,巴方没有承认安理会1967年通过的242号决议,因为242号决议仍然是不公正的,比181号决议更加不公正,因为242号决议是把以色列1948年侵占181号决议指定面积以外的所占领土合法化。181决议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几乎相等的面积建立各自的国家,把耶路撒冷交与国际管理,但以色列侵占了整个巴勒斯坦面积的70%,包括耶路撒冷西部。所以我们说242号决议更不公正,分给以色列更多的土地。但是,国际社会包括阿拉伯国家承认了242号决议,巴勒斯坦为了和平不得不做出让步。

1988年11月15日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巴勒斯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181和242号决议巴方宣布巴勒斯坦建立了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

242号决议说得很清楚,以色列应该立即无条件从1967年占领的土地上撤军,包括东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宣布了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我们做了很多让步。当时国际社会承认了我们宣布的巴勒斯坦国,并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一个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当时是钱其琛外长到我们使馆参加了换旗仪式,1967年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京办事处在1988年正式改为巴勒斯坦国驻华使馆,现在有一百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阿拉法特主席为了实现中东和平和稳定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前苏联提出和平倡议在西班牙首都召开马德里国际和平会,阿拉法特主席为能够推动和平进程,做了不懈的努力,他考虑了国际和地区局势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和60年代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决定参加和平进程。当时,阿拉法特面临的问题是怎么说服他自己所领导的人民和不同的派别,去参加和平进程。你们知道巴解组织像一个联合政府,下面有不同的组织,这些组织从哪里来?1948年以色列侵略巴勒斯坦大部分领土时,很多巴勒斯坦人被迫移民到周边



阿拉伯国家,每个阿拉伯国家的巴勒斯坦难民,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建立自己的巴勒斯坦组织和运动。1969年,在阿拉法特领导下,所有的不同派别的巴勒斯坦组织被拉到解放组织领导下。当然这些组织受到当地政府的政治影响,很难把它们完全统一起来。所以阿拉法特要说服它们放下武器,进入和谈是不简单的事。更不用说连阿拉法特自己建立和领导的“法塔赫”运动也很难说服,也需要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够说服它们。因为在美国的支持下以色列历来采取侵略和扩张政策。不相信以色列有信誉来和谈解决中东问题,就这样在阿拉伯法特领导下巴勒斯坦进入和平进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正式承认了以色列,以色列也正式承认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里我有责任说,没有阿拉法特就没有奥斯陆协议,也没有今天的和平进程。

在拉宾时期,和平进程发展比较顺利,取得了武装斗争不能取得的成就,这证明了中东问题和巴以冲突都可以通过对话和和平协商解决。很遗憾的是拉宾被以色列极端分子暗杀了,后来和平进程碰到很多曲折,很多困难,更不用说沙龙上台后,所有我们在拉宾时期取得的和平成果都被破坏,以色列还重新侵占了巴方控制的地方,用强硬的政策,用各种各样在21世纪不该采取的手段。包括政治、军事封锁,随意抓捕领导和群众,摧毁民房等等,连巴勒斯坦人民选举的总统也被软禁三年,你们想想一个国家的总统被外来侵略在本国软禁三年,到底有没有民族感情!

阿拉法特去世了,我们穆斯林相信,人的生命还是在真主的意志那里,不过可惜的是目前死因还不清楚,有很多说法,我不能乱说,等着弄清他的死因。给我们安慰的是,国际社会的立场表明,阿拉法特是谁人都不能代替的,怎么办呢,我要解释一下,现在在巴勒斯坦领导人里谁都不能发挥阿拉法特的作用。那天凤凰卫视报道了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几百个人游行,高兴得不得了,我可怜他们,我要告诉他们,阿拉法特的去世对以色列肯定是不利的,因为他为了他们的安定和发展做了不少贡献,也让步了不少,并且一直把和平处理问题作为战略选择,



他即使是在软禁中也坚持了下去。

在我们内部,特别是法塔赫,有许多杰出的领导人,可以继承他的崇高使命。可惜他在世时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他有两个愿望,第一就是要亲自看到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国,第二就是他能够在耶路撒冷安葬。很可惜两个愿望都没有实现。这是以色列历来无视联合国的决议,无视国际法,无视人道主义所造成的。

我说任何人都不能代替阿拉法特所包含的两个原因:

第一,从他的地位和所承担的职务来看。你们可能不清楚,媒体报道也是不准确的。阿拉法特的职务第一个呢,他是法塔赫领导人,也是巴解组织领导人,加上巴勒斯坦国主席和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共四个职务。关系是什么呢?解放组织是一个联合政府,里面有不同的派别——里面最大的力量是法塔赫运动(法塔赫领导解放组织),如果打一比喻的话,法塔赫是我们的党,巴解组织是政府,有很多派别。临时权力机构是临时政府,过渡政权。按照我们和以色列 1993 年签订的奥斯陆协议,规定将于 5 年之内也就是 1998 年宣布为独立国。但是由于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立场,到现在也没能成立。



法路可·卡度米

法塔赫的第二个人物,第二把手也就是法塔赫的秘书长法路可·卡度米(Farouq Kadumi),阿拉法特去世以后,就被选举为法塔赫的主席。他从和平进程的一开始就没有回到巴勒斯坦,一直在突尼斯总部,为什么呢?是不是跟阿拉法特有分歧呢?不是,是不是对和平进程有异议呢?也不是。就是因为奥斯陆协议规定在过渡阶段所有的外交事务和国防事务还是由以色列来管,所以卡度米留在国外,领导我们巴勒斯坦国的对外事务。说实在的,这个人不太受美国欢

迎,也不太受到以色列的认同。卡度米是法塔赫的创建者之一,在巴勒斯坦人民和各派组织中有很大影响。

解放组织,是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承认的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巴解第二个人物,第二把手,就是巴解秘书长马哈穆德·阿巴斯(Mahmud Abas)。阿拉法特去世后,他被推举为巴解组织主席。他一直参与巴以和平谈判。法塔赫和解放组织是两码事,我们应该分清楚。

1988年11月15日宣布了巴勒斯坦独立国,阿拉法特被举为巴勒斯坦国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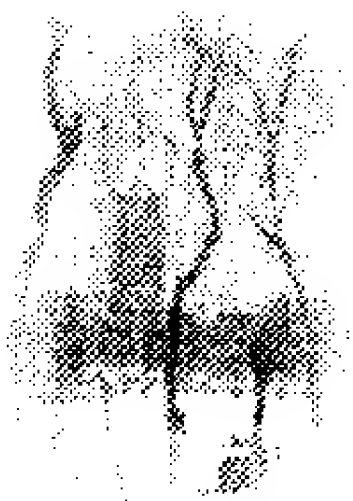
马哈穆德·阿巴斯

统。现在这个位务,自阿拉法特去世后,一直没有被选人代替。

巴勒斯坦民族主席就是过渡政府,1993年奥斯陆协议产生的结果。1996年举行的大选,阿拉法特被选举为民族权力机构主席。按照民族机构的想法,如果主席辞职或去世,应该在60天内进行大选,选举新的主席。在这个60天之内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立法院院长,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临时主席。根据宪法,现在由 Raohi Fatoh 为临时主席。我们巴勒斯坦已经宣布2005年1月9日为大选之日。目前,有十几个候选人。法塔赫已经推荐了阿巴斯作为唯一的法塔赫代表参加明年一月的大选。关键的问题在于以色列能不能为公正、透明的大选创造条件。第一应该从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撤军,第二允许不允许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参加大选(1969年大选,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都参加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从组织上啊,我觉得一个人来代替阿拉法特做这么多的职务是不可能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阿拉法特是那样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目前,特别是沙龙上台以来呢,采取了强硬政策,软禁阿拉法特,重新侵



占轰炸巴勒斯坦土地,有很多派别相信应该用武力对付以色列的行为,比如哈马斯、民阵等等,这些组织认为面对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必须采取强硬的政策,他们除了阿拉法特外,很难有人能说服他们,约束他们。阿拉法特是国家之父,他们绝对不会向阿拉法特摇头,可能在背后会,但是在他面前肯定会点头,因为他们好像是儿子和父亲一样的,所以有任何新决议出台,我认为只有阿拉法特存在才会通过。从这两方面,他是代替不了的人物。

巴勒斯坦问题其实很简单,比任何其他地区问题都好处理,就是占领与被占领的问题。以色列撤走问题就不存在了,要说问题很复杂,因为不公正的国际秩序还存在,无论在中东还是其他地区,联合国发挥不了作用,美国这样的庞然大物,奉行单边主义。我不是广泛地说,美国在哪里,就是问题在哪里!特别“9·11”后,美国的所作所为让我们更加悲观!

让我们感到乐观的就是你们,为了一个小小的国家领导人的去世,北京大学的同学们这么关注。能够给我许多安慰的是中国近20年取得的发展,在国际社会和地区热点问题中,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巴以冲突不需要更多的决议和倡议,只需要我们对现在已经有的决议进行落实。我们现在和以色列签署的协议,双方如果能履行它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我们觉得不公正的242决议,我觉得问题就不存在了,和平进程的基础就是242号决议,是联合国所通过的决议,那为什么不能举行?我认为原因在于美国一方。美国在别的地方,一直觉得它的利益有问题,不管联合国承不承认就出兵,逼着联合国和国际社会跟它走!

以前,美国对中国的立场不也是不管吗?但你们看看近几年,就大不相同了。所以,给我们安慰的、让我们保持乐观的是看到这个发展中国家——最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国际社会保护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我相信在中国采取这样又独立又和平的外交政策,继续推动国际社会向多边主义发展,让联合国发挥大的作用。我觉得我们不但会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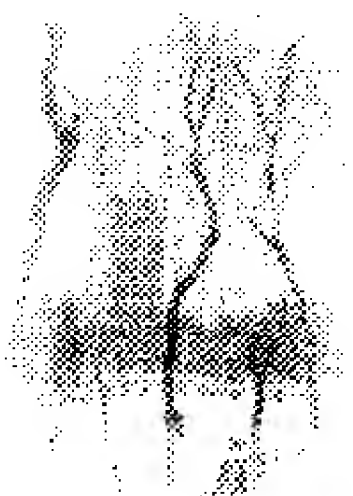


中东问题,其他问题也会解决。所以你们看看,中国从一开始,四代领导人,在毛泽东——毛主席,我很尊敬他的——毛主席的时代,中国是第一个国家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的唯一合法代表。在伟大的邓小平时期,也是第一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国并把我们的办事处换为使馆,我成了巴勒斯坦驻华大使。70年代初,我本来是驻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副代表。90年代成为巴勒斯坦国驻华大使,在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我说伟大,因为给我们一定的希望,就是这个乱七八糟的国际形势不会继续下去——中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美国要想半天才能够下手,过了五年、十年,你们等待着看。所以,我感谢我的同学们,给我那么好的机会,保持我的微笑。阿拉法特的微笑,我告诉你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阿拉法特没有一次是没有微笑的,他总保持着乐观和希望,我相信巴以冲突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特别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公正立场下,是很有希望解决的。我告诉你们,很多人说中国亲巴勒斯坦,我说不是,我告诉你真的不是,你看看媒体,你看看外交部发言人,巴勒斯坦做的任何不对的行动,中国不支持,是谴责。以色列任何行为不符合和平进程,中国也谴责也反对。中国是有责任的国家,有公正的立场,我们需要这样伟大的国家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这里,我带来了中国对目前巴以冲突和中东问题的五点倡议。路线图是由美国提出来的,后来俄罗斯、联合国、欧盟加入,仔细看,联合国四个常任理事国都在里面,美国、俄罗斯、欧盟也有英国和法国,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及常任理事国成员,中国为了推动和平进程,早日实现中东和平和稳定,欢迎和支持这个路线图:

一、中方对“四方”正式公布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表示欢迎和支持,认为“路线图”内容积极,为以巴恢复和谈提供了良好基础。希望以巴双方抓住时机,采取切实措施配合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争取早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二、以巴双方应尽快正式宣布接受并执行“路线图”计划。当务之急是双方立即停止以暴易暴和冤冤相报,为恢复和谈及达成协议创造



条件。以应撤军至 2000 年 9 月 28 日前的位置,停止对巴采取的军事打击、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的措施及“定点清除”政策,冻结定居点建设,缓解巴人道主义危机,恢复阿拉法特主席人身自由。同时,以的安全应该得到充分保障,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暴力活动。中方支持早日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欢迎巴举行民主选举及在政治、财经、司法、行政等方面进行改革。巴人民有自主选择政治体制的权利及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合法领导人应得到尊重。对于在实施“路线图”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双方应本着开诚布公、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先易后难的原则,通过谈判加以解决。

三、为确保“路线图”计划得到落实,应当及早建立公正、权威、有效的国际监督机制。

四、以联合国有关决议、马德里和会确立的“土地换和平”原则及各方已达成的协议与共识为基础,尽快恢复以色列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谈判,以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最终实现中东地区全面、持久和平。

五、推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国际社会应增加对中东问题的关注和投入,联合国应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倡议尽快召开由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及有关各方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并愿积极参与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国际努力。

我认为这样的倡议真的很公正,里面提到必须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中国也提出来了。我觉得这样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提出来的这样的倡议会得到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欢迎和支持,所以我们感谢中国提出来的这个公正的倡议,并且希望越快越好,实现中东的和平。可能我说得乱七八糟的没有头绪,可能没有你们感兴趣的,但是你们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我很乐意,很坦率地回答。

大使:清楚么? 清楚?

学生:清楚。

主持人:好,下面欢迎大家提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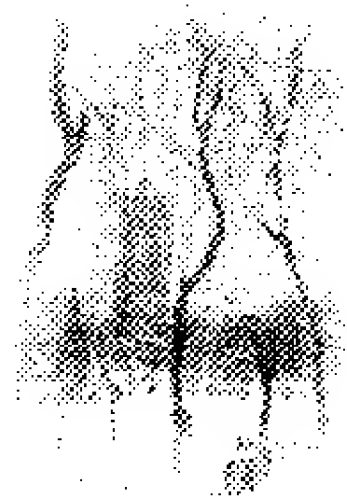


学生:大使先生,目前巴以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就是未来的中东局势将有哪些变化?

大使:我刚才可能有的地方说的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第一要国际社会要更多地参与中东问题,因为中东的稳定涉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和稳定,但是很可惜的是,大国尤其是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你知道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很大——不但要控制中东,它要控制中东是为了限制别的国家的发展,它对中东的政策在他的国际战略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阿拉伯的原油占国际原油的 2/3 以上,控制了这个资源,恐怕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中国的原油进口 40%—50% 都是从中东来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能公正地参与中东事务,也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以色列撤军,让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我觉得很难。以色列的利益,我可以说不,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会给以色列带来安全。安全是双方奉献的,它们不得到安全,我们也没有安全。所以我们双方都应来奉献安全。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以色列肯定也受到威胁,所以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安全,同样也是我们的安全,今后,如果公正地按照联合国决议处理巴以冲突,我觉得我们就会和平共处,我们会为了未来人民的利益,为了中东和平、稳定和发展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以色列采取以暴制暴、武力、单边主义,我觉得都不符合 21 世纪。我觉得它的意思是要从加沙地带撤军,谁不同意? 我们也支持,但是他从加沙地带撤军的目的是为了永远保持对约旦河西岸的占领和控制,现在是 21 世纪,它却在我们的领土上建立隔离墙,为了它所谓的安全。我觉得,事实证明,不会给它带来安全。

我还记得,朱镕基总理对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总理说过的话,我不知道哪一年,内塔尼亚胡来中国参观访问的时候,1996 年还是 1997 年,内塔尼亚胡先生去万里长城参观游览,回来和朱镕基进行会谈,正要会谈之前,内塔尼亚胡自豪的说:“哎呦! 你们伟大的万里长城! 我们以色列需要这样的万里长城,为了避免阿拉伯国家的威胁。”朱镕基总理的



回答,我觉得符合 21 世纪领导人的风范,他说:“现在这个万里长城是一个游览的地方,而核武器、导弹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安全,除了和平共处、谈判,不会给任何国家带来安全。”所以我觉得,我们希望以色列认识到在这个 2.7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按照联合国决议建立两个独立的国家,和平共处,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人民创造更好的安宁、稳定、发展的条件,那个时候我们的和平是可以实现的。我不知道我答的是否符合你要问的问题。

学生:萨法里尼先生,对于阿拉法特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那么我们在阿拉法特先生生前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是穿着富有阿拉伯民族色彩的服饰,戴着头巾。他经常说他是一个自由的战士,对不对?那么今天您出席我们的见面会,您并没有穿上阿拉伯民族服饰,那是不是意味着曾经是铁人的您将放下手中的钢枪继续在阿拉法特先生生前制定的“以土地换和平”的政策下同以色列和联合国合作?谢谢。

大使:好,感谢。我要说的,我确实没有戴阿拉法特的头巾,但是阿拉法特的思想,他的崇高的使命在我心中,特别是,今天我看见那么友好的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我觉得你们,五年、十年不但会在中国也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给我带来希望。虽然我没有一次是悲观的,我一直保持乐观,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没有任何人能剥夺我们的权利,以色列三次侵略战争,美国的支持,每天的轰炸,每天的暗杀和屠杀,也没有处理问题,也不会处理问题。伤心的是,欧洲的媒体,美国的媒体,比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媒体的宣传还强,中国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或者发展中国家要了解中国的发展情况,报道和消息大部分来自西欧媒体。我们所看到的是,天天有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很惨地暗杀。但是很少有媒体报道,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在任何地方碰到任何问题,就会被媒体广泛地报道,影响国际社会的评论。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值得注意!

你认为我们愿意对以色列进行自杀式爆炸?我们反对任何针对平



民的暴力行动。这不符合 21 世纪。但是,我敢说,任何人都接受不了以色列这种不可忽视的镇压,简单的刚才我说了,一个总统在他的土地被外来侵略软禁三年,你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哪个能欺负呢?我还记得,董存瑞抗击外来侵略。现在,时代不同了。阿拉法特发挥的作用就是给这些暴力行为很多的压力和约束,但有很多个别的暴力行为控制不了,比如拿我本人来说,天天从家门口出去,碰到以色列军队和坦克,对我们耀武扬威,甚至进入我家欺负我家里的人,乱抓乱骂,我觉得是任何人接受不了的,就算是丢了性命也要咬他们一口,所以有些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平民的行为,被别人看作是恐怖行为,但是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却是国家恐怖。

但是我们还相信,希望很大,刚才我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际社会,你看看,阿拉法特去世,世界都在哀悼,也希望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希望就是给巴勒斯坦一定的鼓励,能够避免暴力行为、以暴制暴,不可接受的方案。我相信通过和平谈判、国际社会的参与,我们会处理中东问题,特别在你们的参与和你们所发挥的作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研究生,你们写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每天我去查,中国研究生对中东问题怎么认识的,怎么了解的,自然比其他国家的研究生影响大,所以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聚会,来了三百多个人,我认为本来要来十来个人。

两个星期以来,80%中国的媒体都提到阿拉法特和哀悼阿拉法特。到任何地方,因为我是老外,说中文说不清楚,我现在不当大使,当大使时有几辆私人的公车,我可以到处跑。现在有时候我打的,打的的时候我告诉司机,我还是聊政治,我们涉及到巴勒斯坦,“嗯,巴勒斯坦好的邻居。”是不是他认为我是巴基斯坦人,我说我是巴勒斯坦人,我还拿笔写来着,最后他说,你干脆说阿拉法特嘛。(笑,鼓掌)

阿拉法特主席 1992 年到 2001 年,我很荣幸地给他组织五次到中国参观访问,他说,1993 年签了奥斯陆协议,1998 年应该是我们宣布巴勒斯坦成立独立国,1999 年宣布了巴勒斯坦独立国。哎,不成,很多国



家发表它们不同的意见。2000 年到中国来,我记得他一个月可能去了 30 多个国家,他来中国的时候跟江泽民主席谈,准备根据奥斯陆协议和 242 号决议宣布巴勒斯坦独立,中国的立场很明确的,非常支持,你们有自决权,你觉得宣布巴勒斯坦独立对你的事业,对你的人民,对和平进程有好处,中国支持,并且为什么你来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早在 1988 年就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他指着我说,这个就是你们的驻华大使。我从人民大会堂到钓鱼台,很近的路,我坐在阿拉法特的车上,他想想也不说话,我跟他说话也不听我的,不知道怎么了,有什么意见,我有点担心,我说:“阿拉法特主席,你想什么呢?”他说:“江泽民主席说的对,他说我们应该多想,从各方面来想这个问题,最好通过谈判,双方同意再宣布。”他当时决定推迟宣布巴勒斯坦独立国了,你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多大。阿拉法特主席很重视中巴关系,我们很自豪有这样的朋友。

学生:萨法里尼先生,您好!我知道您曾经是阿拉法特先生亲密的战友,在座的同学也希望了解,在阿拉法特早年的时候他和以军战斗的情况,比如在 1967 年的时候,阿拉法特是唯一一个打败以色列军队的阿拉伯将领。您能不能介绍一下他过去指挥战斗的情况?

大使:刚才我说的是阿拉法特所领导和涉及的卡拉马战斗,谈到我个人,阿拉法特是整个巴勒斯坦人民之父,我在 1967 年可以算是游击队员里面最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在 1967 年他到黎巴嫩南方,我们当时在黎巴嫩南方不是公开活动的。当时,他不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领导,我很尊敬的领导。他谈了很多事情,那边是很危险的地方,当时我们打游击,可能因为我表现的好,有一点勇敢,他对我鼓励,他给我提了个外号“铁人”,我很自豪得到这样的外号,肯定有比我还勇敢的战友,当时有些战友为了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并且把我作为他的干儿子。从那时起,在任何报告和关系中,我们就是儿子和父亲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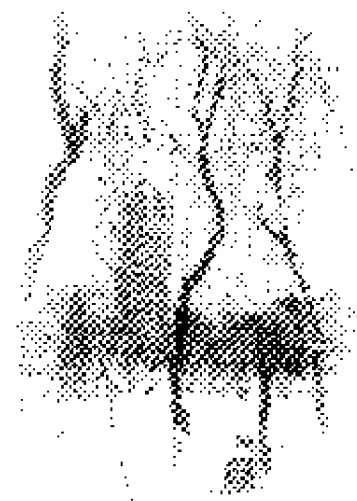
1968 年卡拉马战斗以后,他推荐我到中国,和我同来的有二十来个人,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阿拉法特对我一直像对待儿子一样。1972



年的时候,我在北大半工半读,我也参加了上山下乡,开门办学。大字报我也参加了,在北大啊。我还要告诉你们我最好的朋友是陈云桂,就是在大寨那边。我在北大找到了一位很漂亮的同学,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文革”期间,有些严格的要求,但是我的对象是老挝人,也是我们北大的,当时我征求她的意见,她没有回答,老挝政府也不同意,夫人的爸爸和周恩来总理关系特别好,她的爸爸是老挝的经贸部部长,之前我是不知道的,我们结婚了。后来我回黎巴嫩去,我还记得可能我是晚上11点到阿拉法特的办公室去,人来来回回,没有机会谈论任何事情,我害怕受他的批评,我也参加了他和别人的会谈和会晤,最后他两点半就是深更半夜还要会见记者,记者从外面来采访他了,他说:“铁人你坐着。”然后他说:“你爱人呢?”我说:“在啊!”然后叫别人派车去接她,送她结婚的礼物,我忘不了的。并且说,父亲不接受他的儿子结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感情特别特别好,别人做不到的,我觉得可能我跟阿拉法特有点调皮的,我觉得他就是真正的父亲。

去年,我去巴勒斯坦,他的官邸,很可怜的,第一,要回国,以色列同意,发了个通行证给我,好像我去以色列一样,我去我的国家跟去别的国家一样。告诉你们,我们受苦受难很多。

江泽民主席他去巴勒斯坦,我办了很多手续才能够去巴勒斯坦迎接江泽民主席。那次很成功的参观访问,我无比的高兴和振奋能够看见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巴勒斯坦进行参观访问,我荣幸地陪同江主席参观访问东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参观结束后,我有机会到现在的以色列,我的老家 haifa,特拉维夫附近的一个地方,看望了我的家族。我的姐姐、我的妹妹和我爸爸以前的亲戚,我看到他们非常高兴。去年我去了阿拉法特的官邸,他身体真的不好,一般晚上十点钟他和他的客人一起吃晚饭,几个人来了,让我们进来,坐在他的桌子旁,一起吃饭。我那天十点钟去了,在他的办公室有一个长桌子,他的警卫把它整理了一下,吃的很简单,就是黄瓜、鸡蛋、橄榄油,我发现他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他拿了几块切成块的黄瓜,我坐在离他第三个人的位置,他



递给我,我拿了吃,过了一会儿,他给我两块鸡蛋,我吃了,他说:“怎么了?我不是给你吃,给你旁边的人一起分。”他喜欢亲自给他的客人吃的,但是我呢,我觉得,他给什么,我吃什么。(笑)正好他说了这一句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对面坐着一个人是我很好的战友,是整个约旦河西岸的警察官,他要说话,说:“阿拉法特主席,你还记得铁人 1967 年穿着黎巴嫩南方当地人很奇怪的衣服。”他什么都没有回答,过了五分钟,他点头了,告诉那个人,就是那个警察官,“我还记得铁人不但穿那个服装,还要带基督教的十字架”。你们看看,阿拉法特去年还记得 1967 年一个小小的事情,他的精力很强,是很不俗的人,是很伟大的人。我还记得他每次来,一进他的卧室,我很希望帮助他脱衣服,但他不让,他自己服务自己。给任何人感觉到,以色列说要温和派领导,比阿拉法特更温和的在哪里,最温和的就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说什么,做什么,都履行他的承诺。

学生:这位杰出的校友,听了您精彩幽默的演讲以后,我们对您和阿拉法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现在我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是,您在巴勒斯坦号称“铁人”,为什么会有这个称号?这是第一个问题,这个“铁人”有什么特征?第二个问题是,您认为阿拉法特先生是位什么样的人,您从他身上学到了哪些有益的方面?

大使:我很喜欢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铁人”是过去的事情,但是说实在的,现在你去任何地方,你说萨法里尼,不认得,认识我的朋友,在巴勒斯坦还是用“铁人”这个称号,并且任何人给我写信,大部分还是给“铁人”巴勒斯坦驻华大使写信。不像,但是这个铁人我希望不是表达强硬,或武力。这个是过去的事情,最好的是阿拉法特说的话,以前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老发誓:为群众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为了和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本来为了战斗,为了和平,为了和谈,用谈判实现和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个阿拉法特最伟大的话,给我们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过去,60 年代、70 年代的国际形势和现在不一样了,现在 21 世纪是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以现在武力、战争、单边、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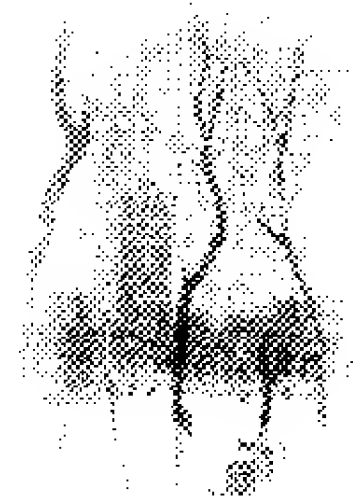


权,使事情复杂化,要和谈,要协商,政治解决争端。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我可以发誓,为了和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勇敢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学生:您好!萨法里尼先生,我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每天从各种各样新闻中看到,现在全世界对巴勒斯坦有很大的关注,但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内部,可能也声援巴勒斯坦各种各样的活动,但是阿拉伯世界的团结程度究竟是如何的?作为同一文化、同一宗教下的这么多国家今后它有多大的可能性成为团结的、真正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一个国家的组织,就像今天的欧盟一样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使:你说的对,中国领导人总是强调阿拉伯团结,阿拉伯团结,阿拉伯团结,团结就是力量。你说的对,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族,刚才我说的,一个历史、一个民族、一个文化,按理最容易团结。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六七十年代为争取它们的利益,为了好控制这个地区,不是一般的地区,你也知道,原油和它的位置,你看看,巴勒斯坦的位置,2.7万平方公里小小的地带,可以联系红海和地中海,你看看苏伊士运河,谁控制那个地区就可以控制整个地区。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1917年,英国和法国签订了一个协议叫做“塞克斯-皮科尔”,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英国外长,一个是法国外长,这个协议把整个的地区分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从那时起,本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分成越来越多的现在的22个国家。我的意思就是,因为两个因素,一个就是外来因素,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阿拉伯国家有的亲美,有的亲苏,所以我们好欺负,这是我们的缺点,我们的弱点。虽然阿拉伯群众是团结一致的,但是国家政府那么多的,20多个国家,在美国的势力和威胁下,需要时间团结,如果团结,美国和其他大国都知道在那边没有饭吃。所以我可以承认我们的缺点,阿拉伯民族的缺点。按理一个民族应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反对外来侵略,达到了那一点,那时候美国和其他大国在阿拉伯国家没有好过的,现在我们好欺负,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可以肆无忌惮。



学生：萨法里尼先生，感谢您的演讲。首先我想对阿拉法特主席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阿拉法特主席为了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值得我们这些热爱和平的人永远尊敬和怀念。我想请教您的是，您是否认为哈马斯组织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东和平进程？您觉得巴勒斯坦未来的领导人应该怎么协调和哈马斯之间的关系？再一个就是自杀性爆炸事件给巴勒斯坦人民和以色列人民都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和隔阂，这些隔阂将如何弥补呢？谢谢！

大使：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也告诉你，我不是官方的看法，是我自己的看法，哈马斯是一个爱国的民族的组织，但是我不太支持他们目前采取的办法来处理巴勒斯坦问题，刚才我说，针对老百姓和无辜的人们，任何武力我都反对，并且我可以说它是恐怖的。如果真正了解目前巴勒斯坦人民在被占领的地区是怎么生活的，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任何人从北京大学受过教育，肯定是爱好和平的，我肯定我是爱好和平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我回去，我可能压不住自己。我不能看见我的家里乱七八糟的，或是我的孩子出门上学没有回来，所以希望全世界和国际社会像对待人那样来对待我们。为什么？为什么那么多年美国不允许按照中国所提出来的派一个观察部队？但是我说哈马斯可以停止所有暴力的活动，如果以色列表示撤军，接受联合国的决议，或者表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合法权力。没有任何人爱死或者喜欢死，所以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恐怖，什么是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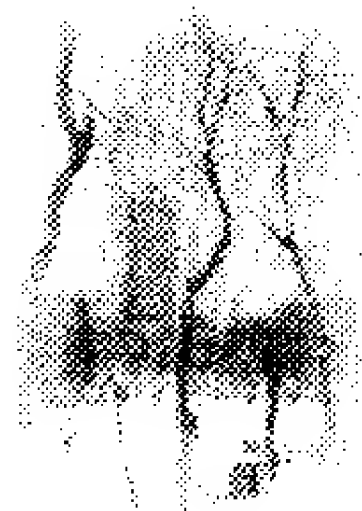
第一，我反对任何恐怖活动，我在使馆，就是以色列实行软禁的时候，我曾经说得很清楚，如果以色列继续采取这样野蛮的行为，我们都是哈马斯，哈马斯是什么意思？就是反对侵略者；如果以色列公正地接受这个和平，接受我们建立两个独立国家，和平共处，哈马斯还威胁以色列的安全，我也反对的。这个很明确，主要问题在哪里？我去巴勒斯坦，从拉姆安拉不能到别的城市去，从一个地区没有自由去另一个地区，我们过的生活真的没有任何人能接受。哈马斯的行为，有的针对普通人，我们反对的，坚决反对的，阿拉法特每次都亲自或通过他的发言



人表示反对和谴责,但是国际社会在哪里谴责以色列天天的屠杀,有的地方就是屠杀、包围、封锁,进去抓个人就走了,打个人就走了,在这样美国所采取的双重标准下会处理问题么?什么时候你触犯到它的利益,你是恐怖,无论如何,你是恐怖,打!所以恐怖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是根据它们的利益决定是不是恐怖,所以这个双重标准没有任何人接受的。

谢谢大家!

(2004 年 11 月 18 日)



印度宗教与现代化

■ 陈峰君

陈峰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国际政治教学与研究,重点研究印度和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专著有:《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当代亚太政治经济析论》、《共产国际与印度》、《印度社会述论》(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主编)、《亚太大国与朝鲜半岛》(合著)等十部作品,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百余篇论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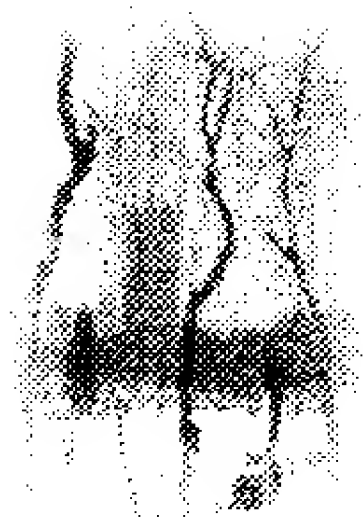
各位同学:

晚上好! 首先我要谈一下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很大,难度也很大,但是非常重要。重要性就在于,首先,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四大文明是按宗教分的。季羨林先生把世界文化分成四种类型: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佛教文化,再就是印度教文化。印度教文化的特点和其他文化不一样,其他文化几乎都是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一种文化,而印度教文化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当然,如果再加上尼泊尔就是两个,但主要是一个国家,而这一个国家信仰宗教的人数可以讲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信仰宗教的国家像印度这样信徒人口众多,而且这样虔诚,这样狂热的。当然要论狂热的程度,其他一些国家



比如伊斯兰教国家也是相当狂热的,但是印度教的信仰者的狂热程度,应该说不亚于伊斯兰教。我在印度呆了一段时间,发现他们从上到下,从老到幼各种层次,从总理一直到平民百姓,到大学生——因为在大学讲课,和大学生接触得比较多,他们的大学生,从博士生、硕士生到本科生,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虔诚的印度教徒,他们都搞宗教活动,非常狂热,这个跟中国人大不一样,我们中国人有几个信仰佛教的?在座可能没有,可能也没有信印度教的。有的可能稍微信一点——需要的时候信一下,特别是你老爸,你老妈,还有你老爷爷,需要的时候烧香,磕头,不需要的时候就很少这样。就是说真正的信仰,南方有一些省市的人信仰得比较虔诚,真正的印度教徒加上佛教,这个数量加在一起,中国加上东南亚、日本、韩国加在一起有说两亿的,有说三亿的,有说五亿的,因为这个数字没有办法统计,半信半疑不能算。但是印度这个数非常好算,印度是10.5亿人口,很快就要11亿了。10.5亿人口70%、80%是信仰印度教的,当然还有其他教,包括伊斯兰教,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教。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只要生下来懂事以后就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所以印度是第一宗教大国。我说世界四大宗教,实际上到底谁是第一大呢?印度教的影响力没有后来那几个大;但是从信仰的人口和信仰的程度讲,印度教应该可以说是世界第一大宗教。

从其影响来说,印度教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宗教本身。它不仅是宗教本身信仰的问题,它整个影响了印度的各个方面,印度的方方面面几乎都打上了印度宗教的烙印,主要是印度教的烙印。离开了印度教,印度的社会各个方面都说不清楚;但只要从宗教的层面解释,很多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包括国际关系。我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你要不从宗教这个层面了解,你就不知道印巴之间的矛盾为什么一直难以解决,就是因为宗教在这里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他的方面,印度的社会、印度的文化、印度的经济发展,诸多方面,都受到印度宗教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了解印度宗教,特别是印度教,乃是我们了解印度社会的一把钥匙。这个是从重要性来讲的,印度教本身在印度社会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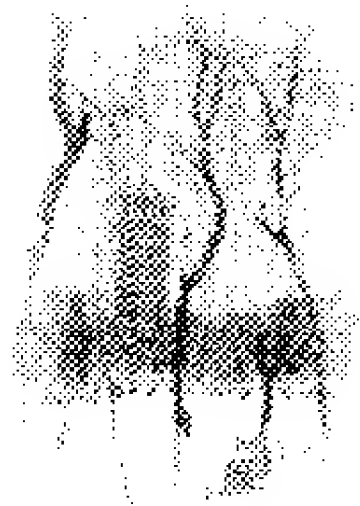


和起的作用是我们不可思议的。这个是其一。

其二就是从学术上讲。目前人们都在探讨亚洲的崛起,探讨中国的崛起,和平的崛起,印度这是一家,另外一家也在崛起。印度到底能不能崛起,人们在探讨。而且最近比较多的,越来越多的开始探讨:印度这个国家在崛起之后,能不能赶上中国,甚至超越中国?这个是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从我们学术界来讲,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印度到底能不能赶上中国?绝大部分人认为印度赶不上中国,因为我们身在中国,认为我们中国各个方面强于印度。但是我们再把眼光放宽一点,放宽到印度去,放宽到其他的国家,看看其他的学者是怎么看的,那看法就和中国的学者不完全一样了,当然有的认为中国已经远远超过印度;但是有的人认为,印度迟早有一天会赶上甚至超过中国。美国的学者在美国的《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的题目就是“印度能赶上中国吗?”然后他们的结论是认为能赶上中国。理由就是说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优于中国。他们不是按照社会体制、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角度看的,而是单纯从引进外资这个角度看的。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很大的程度上是开放市场了,和世界接轨了,主要是依靠引用外援,依靠外资,大量地引进外资,加上国内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这种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会受到限制。印度虽然也依靠外资,但是更主要的是靠国内的私营发展,特别是印度国内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印度独立之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的私人资本非常强大,英国的私人资本撤出去之后,相当一部分转嫁给了印度,然后仍然有英国的资本。印度的私人资本企业发展非常迅速,独立之前它还有其他大的财团。从独立之前一直延续到今天,世界一些大的财团,印度是有名次的,中国在 50 名之内很少,印度要远远超过中国,它的私营企业非常发达。所以美国学者从私营经济这个角度,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依靠私营经济的发展,大企业的发展,是能超过中国的。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印度的软件。印度的软件企业就是靠私营垄断企业来发展,紧追美国,而我们中国在这方面远远落后于



印度。这个是美国学者的一个例子,其他我们看到的很少。再一个就是印度官方和一些学者,我们看到一些材料,他们认为印度在很多的方面有优势,印度一定能够赶上并超过中国。大家可以查查印度驻华大使馆的网页,专门介绍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网页。我把他们的一些说法,即印度大使馆认为印度在竞争优势方面有优势的是 16 个方面。这 16 个方面有些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是夸大的说法,但是有些方面恐怕是事实,这个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第一,它说按购买力类比,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系之一。按印度的购买力,它认为印度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集团,这个中产阶级已经到了两亿到三亿人口,中国没有这么高的中产阶级的比例。第二,就是英语是他们的商业语言,这个印度软件发展,还有其他一些方面远远超越我们的原因。印度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总体的英语水平是高于我们的,在印度,他自己的印度语甚至不是它的主要语言,英语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语言。因为(英语的使用)面积比较大,水平也比较高。第三,就是巨大的快速增加的消费市场,3 亿人口构成了商品品牌消费市场——它说三亿人口,基本上指的就是中产阶级。第四,就是说大规模多元化的基础设施遍布全国,这个是他吹牛了。我在印度发现它的基础设施远远不如中国,它的机场也非常落后,基础设施很差,高速公路都很少,几乎是没有,我去的时候没有。后来有了,也很少。它靠原来殖民统治时代的一些基础设施,后来虽然有发展,但是比较落后。你到新德里,到一些大城市,你上厕所都很困难。第五,就是所谓强大的成熟的私有经济占它 GDP 的 75%,这个是事实,就像刚才我说的,美国人认为他这一点是最有优势的条件。第六,是巨大的制造业能力,可适用制造业的所有领域。它的制造业英国统治时期是比较发达的,后来因为印度大兴国有企业,特别是军工企业,所以制造业是相当发达的,有的方面甚至优于我们的。第七,完善的研究开发基础设施和技术市场基础。第八,丰富的自然资源、丰富的矿藏和自给自足的农业,这个也是它的优势。它的自然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它的面积虽然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但



是它的耕地面积却几乎是我们的两倍,你到印度去到处是土地,它的土地过去直到现在都是印度封建土地所有制,都是地主有土地。和中国相比来讲,它一个小地主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个大地主,占的土地很多。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比我们还要多得多。第九,发达的银行系统,超过 6.3 万家支行的商业银行网络。它们是由一些国家级和邦级金融机构控制的。这一点也是它的强项,金融企业、银行系统。资本主义统治以后,银行企业基本上都是私营企业,非常发达,而且比较成熟,这一点我们远远不如印度。第十点,就是充满活力的国外投资者与资本市场流入印度,2001 年超出了 2000 年。但这一点还远远不如我们。第十一,占有价格优势训练有素的人力和专业管理人才,包括工程师、管理人员、会计师、律师,这个是它的优势。培养技术人才这方面它是很有一套办法的,而且它号称科技大国,就是说在世界上来讲,科技人才占世界的第三位,它的数量,它的水平都是很高的。我们在某些方面虽然有一些高精尖的专业人才,但是总体上不如印度。印度在教育上特别是高等教育、中等教育上,它有一套训练办法,这一点是优于我们的。第十二,就是良好的外资投资环境,包括了投资、选址、进出口自由方面,这方面特别是经过了它 90 年代以后的改革政策以后,这方面也是相当不错的,和我们相似。第十三,就是流动资金的可兑换性,外国投资者的资本可兑换,这一点也是不错的。第十四,就是充分平衡的岁入激励机制,这方面它的机制一直是比较成熟发达的。再就是第十五条,就是稳定的民主环境,所谓稳定的民主环境,就是说它是一个最大的民主国家,最大的议会民主国家。所谓最大的民主国家就是它的选民是世界最多的,10.5 亿人口大概有 8 亿多人口是选民。他的议会机制非常完善。巴基斯坦动不动就是军事独裁,但是印度发生再重大的事件,比如总理遭暗杀,从来都是议会民主制照样运作。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至少在议会民主制方面是比较成熟的。这个给它的经济发展造就一个有利的环境。最后一条就是司法制度也是比较完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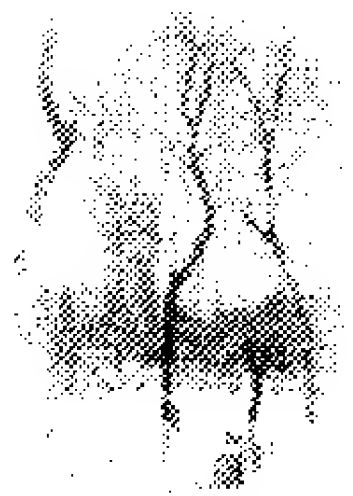
所以基于以上这样一些因素,除了少数我们认为不是事实的,或者和中国相比比较弱以外,应该说它每部分说的都有一定道理,所以印度人现在信心十足要赶上中国,而且一定能够赶上。他们有一些具体的数字不说了,在多少年,什么时候成为发达国家等等。那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开头点题。点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问题非常突出地摆在了我们中国面前。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这么一个强大的邻国,正在发展中的一个邻国?我们一方面要学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从各方面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印度)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邻国,对我们是一种压力——我们现在走在前面了,但是万一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如人家了,那是非常可悲的。所以这个非常有现实意义。因此我们今天从宗教这个层面上,探讨一下到底印度能不能赶上中国,或者刚才提了这么多东西,印度方面提出的东西,我们再从印度宗教层面进一步探讨。这种学习就是为了更明了一些,从深层次探讨印度未来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讲这样一个题目,我先讲的这些就是开头点题。

下面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做一些介绍:然后再做一些分析。

1. 首先介绍一下印度宗教,先说一下印度宗教的产生过程和宗教的类别。

印度是一个古老文明大国,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它的宗教产生非常早,有一些研究宗教的人认为,印度是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的国家之一。印度早期宗教中最早的叫做吠陀教,它在公元前 20 世纪就诞生了,实际上它就是现在印度教最古老的前身,公元前 10 世纪以后发展成婆罗门教,婆罗门教是印度教的前身。佛教衰败了以后,兴起的印度教基本上是沿袭了古老的婆罗门教。

说到佛教,大家知道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佛教产生于公元前 6 世纪左右。这个时间概念都是非常非常虚的东西,因为印度人不重视历史,它的神话、宗教、历史混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只能大体上推算。释迦摩尼创造印度佛教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 6 世纪。另外一个和佛教相类似的宗教叫耆那教。之所以诞生佛教,就是因为婆罗门教的



种姓制度是非常严格的,比现在的种姓制度还要严格。所以(婆罗门教)在兴盛了十多个世纪后就败了,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婆罗门教最上层的人士腐败堕落,在内部不断地争斗,最后佛教诞生并兴起了。具体情况,我们学学佛教史就知道了,不必详细说了。印度是诞生佛教的国家,所以它对东方贡献非常之大。佛教在公元前6世纪产生,在印度兴盛了十多个世纪,后来它内部有很多的派别,最大的派别一个是大乘佛教,一个是小乘佛教。大乘教后来传到东北亚,包括中国、韩国、日本这些国家。小乘佛教,就是向南传了,传到了东南亚各国和斯里兰卡。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有一定的区别,小乘佛教的一些戒律更加严格,二者是有不少区别的。但是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还有一个派别是喇嘛教,也是从印度传播到西藏、青海、蒙古,这个喇嘛教和大乘佛教、小乘佛教的区别比较大一些。喇嘛教迷信的程度更重一些,活佛转世等等是原来的佛教里面没有的。喇嘛教是印度佛教和西藏古老的地方宗教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佛教诞生后到公元6世纪左右也开始衰败了,由于内部纷争,这个和婆罗门教一样,任何一个宗教都有它的兴盛、衰败这样一个历程。这个衰败的时间,恰恰是中国佛教最兴旺的时期,也就是在唐朝时期。大家知道唐玄奘西天取经,其实并没有神话里面的八戒什么的,就要玄奘他一个人骑一个小毛驴,一路上受到很多的劫难,跋山涉水,在印度呆了17年。唐玄奘非常聪明,在印度学了梵文,把佛经全面地传到了中国,其中包括了最精华的部分。非常遗憾的是,在传到中国的时候,印度的佛教已经开始衰败了,然后印度教开始兴起。衰败的原因也是因为佛教派别林立,它的威望就越来越下降。然后,印度教一个叫商羯罗的教徒在公元7世纪时候,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也吸收了佛教一部分精华形成了现在的印度教,也就是从公元7世纪一直到现在,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后来外国不断入侵,伊斯兰从中东、从阿富汗、从土耳其、从伊朗那边不断地侵入印度,建立了一系列的伊斯兰教国家,所以伊斯兰就在印度推广伊斯兰教,从公元12世纪到18世纪把伊斯兰教作为印度统治阶级的统治宗教;但是主流宗教还是



印度教,一般的平民百姓依然信印度教。而上层的、统治阶级的伊斯兰人信仰的宗教是伊斯兰教。还有一些原来的印度教徒后来改信伊斯兰教。到了15世纪的时候印度又产生了一个锡克教。它是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综合在一起,把它各自的优点吸收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宗教。现在印度的西北部地区一些人还信锡克教。这样,15世纪的时候又一个宗教诞生了。15、16世纪以后,西方人,包括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不断的入侵,把基督教、拜火教等等传播到印度。

以上我把印度宗教产生的过程给大家一个脉络,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宗教的类别。印度不光有印度教和佛教,它有七大宗教,所以印度是一个宗教的博物馆。刚才谈的是历史演变的过程,现在看宗教的组成。我们总的来看一下,第一大宗教就是印度教。其次就是伊斯兰教,现在有11%,是第二大宗教。第三大宗教就是基督教,基督徒现在还有2800多万。这个是90年代的数字。第四大宗教就是锡克教,占1.9%。然后就是佛教,佛教还有1%。印度把一个自己产生的好端端的佛教给输出去了,自己不信仰了,信仰了印度教,所以后来印度人自己说我们自己没有传统佛教。其实印度佛教还有几百万人信。这个是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现象。然后是耆那教。七大宗教里面,我们计算一下,自产的宗教占了四个,印度教是土产的,锡克教、佛教还有耆那教是土产的。“进口”的呢,就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以主要还是自己产的。这些宗教里面佛教我们了解,伊斯兰教、基督教我们都了解,锡克教不太了解,我一会儿会提到。这里面最重要的,也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印度主流宗教,百分之七八十的人口信仰的是印度教。

2. 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谈一谈印度宗教的特点。

印度宗教特点很多了,我们只介绍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第一个特点是泛神论,所谓一切都是神。在印度教徒的心目当中,一切都是神,就是多神论。数量有的说是几千万,有的说是几百万,总之凡是世界上存在的事物都是神,所有的自然界,山、水、木头都是神的化身。所



有的动物,象、牛、鼠、蛇都是神。所以一切都是神化的。这一点是和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其他国家也有多神论,包括我们的佛教到底是多神论还是单神论还有争议,要按我的意思是以一神为主的多神论。这个和有些光信仰真主的、光信仰上帝的不一样。在中国,除了释迦牟尼以外,还有很多小的神。台湾还信妈祖,还有好多好多地方神。但是我们还是以一神为主。这个和印度不一样,印度什么都是神,所以它的神就千奇百怪了。最主要的神是“三神”,就是梵天、毗湿奴、湿婆三大神,这个是最主要的神了。其实老百姓不一定信这三大神,往往都是它的化身,是别的东西。但是我们基本上是从这三个神入手来了解。梵天就是所谓创造之神,创造世界万物的神,创世以后它就变成一个毗湿奴,一个湿婆。毗湿奴是守卫之神、湿婆是毁灭之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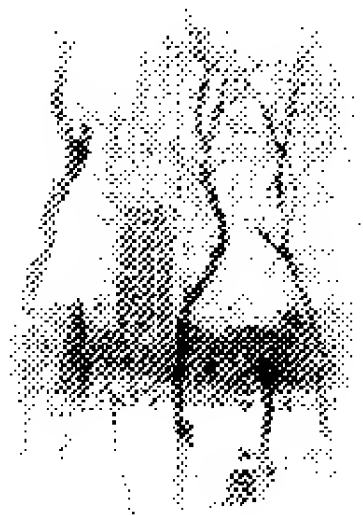
印度人都信仰神牛,特别爱喝它的奶,不管穷人富人都喝点奶。印度产奶也是世界最多的,我们产奶只有它的四分之一。母牛就是圣牛,有的虔诚的印度教徒甚至早上喝它一杯尿。还有信仰蛇的,大家知道,印度有舞蛇。舞蛇,蛇会随着笛子声舞来舞去。信仰老鼠,在我们中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在印度不能打。有的地方专门养老鼠,在庙里面,认为老鼠是可以辟邪、避灾的。但是,我在印度看到的老鼠不多,看到的更多的是用松鼠代替饲养。像我们这儿松鼠是很少见的,印度到处是松鼠。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神,多神论,这个是它的第一大特点。

那么印度教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信守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印度教的一大特点,甚至是它一个核心的内容,这种种姓制度在有些国家曾经兴盛,后来就衰败下去了。但是唯独在印度,这个种姓制度从古至今依然存在。虽然有所弱化,城市里面有所弱化,但是在农村几乎是依然如故。所谓种姓,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梵天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万物。梵天身体的不同部位产生了不同的人类集团,不同“品种”。头脑产生的,生下来就是“婆罗门”,就是主持宗教仪式、传授知识的人,像我这样当教授的当然是婆罗门了(笑);然后第二个层次是“刹帝利”,刹帝利是肩膀生的,有力量,负责保卫国家,士兵就是这个层次的;然后



是“吠舍”，双腿产生的，是经商的；脚生的“首陀罗”是干重活、干脏活的，工农等都是首陀罗。除了这四个以外，还有一个最底层的是所谓的“贱民”，就是“不可接触的人”。我们把他也算在这种姓里面。但是实际上，印度人最反感就是把不是种姓里边的人算在“种姓”里面，因此实际上“贱民”不在种姓之内。这个贱民有相当的数量，大概有 1.5 亿人口，按我们的话说就是最贫穷的，一无所有的，最受歧视的人，在印度教就叫贱民。就是这么五种类别了。

这五种类别的划分对印度社会有什么影响呢？大概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职业世袭”，这个对印度现代化发展是很有影响的。什么叫职业世袭？就是你老子做什么的，你就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你儿子就是做什么的，不能改变。生下来是贱民，你这一辈子就是贱民，你的儿子，子子孙孙也都是贱民。因此，人总是干着一种行当的，不能变通的。这个叫做职业世袭。第二个就是“内婚制”，所谓内婚制，顾名思义，就是种姓内部结婚，不同种姓之间不能随便通婚的。因此，就有了“顺婚”与“逆婚”之分。比如说，只能是婆罗门之男和婆罗门之女可以成亲，这个叫“顺婚”。这种顺婚被印度社会认可。但是还有在一部分人或者是一部分种姓之间，高种姓之男跟他相邻近的低种姓之女可以成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如果是另外一种，就是低种姓之男，要娶高种姓之女，这个叫“逆婚”，是绝对不可以的。在印度法典里面不允许，在社会舆论里面更不允许。在印度城市里面，虽然城市很大，但是大学里面的年轻人很少有谈恋爱的。当然也有谈恋爱的，都是私下的，是非法的，在宗教上不被许可的。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思想比较解放，像印度电影里面那样跑跑追追的。但是这个毕竟是电影，生活里面很少。我在印度呆了一段，我观察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一直想看，但老看着不着。（笑）连拉手你都很少看到，像我们这种场面，在印度看不到。（笑）很有意思的。我在前几年接见了一个印度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我跟他聊天，我问他印度种姓制度现在在农村、在学校、城市里面到底怎么样？他说应该说是受到一定冲击，但是在婚姻上讲，依然受到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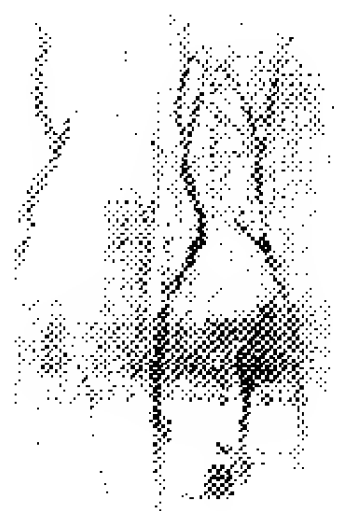


厉的限制。他以他自身为例,很有意思,他当年二十几岁不到三十,他说他之所以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就是因为婚姻问题。他的婚姻问题真像小说里面说的那样,说他是一个婆罗门出身,他在大学里面看上了一个低种姓的,还不是贱民,是首陀罗的一个女孩子,两个人谈情说爱,简直是爱得死去活来的,要结合了,结果家里面坚决反对,他就无奈,最后就翻身闹革命,参加共产党了。(全场大笑)再有呢,第三个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所谓的严格等级制度,由等级决定的差距,在各方面都非常严格。坐几等车,住什么样的房子,喝什么样的水都有严格的限制。宗教活动也是这样,就是说哪个种姓参加什么宗教活动都要严格限制,特别是对贱民有着严格的限制,认为贱民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在印度看种姓的区别,就是看你从事的职业是干净的工作还是污浊的工作,越是从事脏的活,层次越低。所以打扫厕所、抬死尸、扫街道,这些一般都是贱民。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往往受到宗教上法律上的保护。法律规定,贱民的影子不能碰到高种姓的人,所以贱民往往是白天不出来,越是早上不敢出来,早上他的影子好大,一扫一大片,所以不敢出来。我们地下旅馆里面,有好多贱民,他根本不跟你说话。以上这些是印度教的第二个特点。

印度教第三个特点就是业报说,又叫做因果说或者轮回说。这个跟佛教相近似,但是它更为严格,理论性更强。所谓业报,这个业就是因,报就是果,所以业报就是因果。你前世有什么因,你后世就有什么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们认为人生有三世,前世,现世,来世。这三世是轮回的,人的一生不是以你生下来为始,以死告终,而是轮回的。人生是三世轮回的,然后和世界万物是不断地轮回的。不论是因行善升天,或者是因为恶行而沦为牲畜类,都需要不断地轮回。因此虔诚的印度教徒追求的就是脱离生死轮回,进入个人永恒的“梵”,就是“梵我合一”。“梵”,指的是宇宙的本源;“我”,指的是一切生命现象。只有梵我合一了,那么你才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所以请注意,印度教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是追求的人的精神最高境



界,它注重灵魂的修炼、冥思苦想、善于思辨。印度的哲学非常发达,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搞哲学的,印度的哲学在世界上也是非常有名的。印度人重视知识、重视奉献、重视积德、重视所谓的慈悲、行善、宽容等等,而对物质欲望、权力欲、占有欲都是非常的鄙视、非常的轻视,他重视的是精神的文明,精神的文化。这个是印度教轮回说衍生出来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这是印度人的价值观。到了印度以后,发现从高层次到中产阶级,表面上他们有钱了,但是比较简朴,穿衣、吃饭都是非常简朴的,不奢侈、不浪费,对物质的欲望不是那么强烈,不像我们。西方人的欲望更加强烈,中国人也是有一种占有的愿望,虽然没有西方那么强烈,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个欲望变得强烈了。印度人这种欲望不是那么强烈,就是物质的享受不是特别突出。所以人死了火化,火化了以后,他什么都不留。人死了就是死了,所有的金银财宝都不带走,有一些也是给别人了。他追求的是精神上的寄托。印度贫苦人很多,印度10亿多人口,贫困线以下的比例说法不一样,有的说50%,有的说30%,30%左右是可信的。就是说印度人有3亿多人口温饱问题根本没有解决。特别是“饱”的问题,“温”的问题好解决,因为印度的气候太热,所以不用穿什么衣服,问题不大。但是饱的问题很大,三亿多人吃不饱饭。在印度,你看到乞丐很多,,那些小孩,无数只干瘪的又脏又黑的小手不断地向你伸来,你还真是应接不暇,没有办法。越是繁华、越是旅游景点,这些小乞丐越多,多得不得了。但是这些小乞丐,他们能生存,能活下来,有的甚至比一般人活的更好,就是因为印度宗教这个特点:行善、积德。好多人就给乞丐钱,包括我们到那儿去以后,也给他们钱,学人家行善、积德。有的老年乞丐上汽车,我们的乞丐敢上汽车吗?印度的乞丐上汽车,因为印度汽车里面或者是火车里面没有售票员的,都是随便上,大家就是让你乞丐先上,就是积善行德,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一种非常好传统。受印度教的影响,他们对物质的欲望很淡薄。他们那么多的贫困人口,特别是贱民,他们没有任何反抗的意识,没有任何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他们认为我生下来成为人,这已经



很幸运了,没有任何奢求。印度共产党老想发动这些人(指贫困人口特别是贱民)但发动不起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印度人学中国的中学生、大学生,也要闹革命,也要搞文化大革命,带一个红袖标,然后到农村去发动所谓的贫下中农闹革命。(笑)可怎么发动也发动不起来,没有人听你的,人家不听你的:“我就是贱民,我生下来就是如此,我老爸如此,我也是如此,我怎么会翻身呢?”你给大家开会,把大家召集起来,贱民离得远远的,他拿一个小板凳到边上坐着,他不敢到前面来。用中国话说就是“我天生如此,我命该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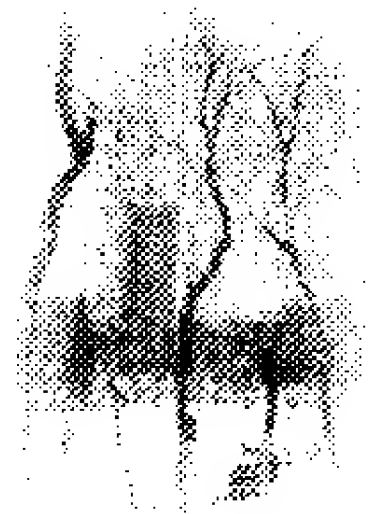
第四个特点就是非暴力说。这个也是印度教里面一个重要的学说。非暴力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甘地我想大家都知道,他是世界上有名的领导人,精神领袖,他没用一枪一炮就把英国人赶走了,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所谓的没用一枪一炮也不完全是这样,有一些民众还是用武装暴力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用非暴力的思想把英国人赶走了。非暴力是印度宗教里面的一种信仰、一种哲学,顾名思义就是用和平的方式,对人要爱,一切都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它认为人与人之间是和谐的,人与自然也是和谐的,即使有矛盾,也都是可以化解的,所以人与人之间不存在敌我之间的矛盾。虽然表面上看英国人是敌人,但是我可以化解,可以把他作为朋友,然后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梵我合一”,一切都是和谐的,人与自然是和谐的,所以印度人对自然界非常爱护。在印度不存在保护自然、保护生物的问题,印度就是一个大花园、大动物园,鸟语花香,所有的动物,没有人去动它、不许杀生的,所以印度人对自然界是非常友好的。当然他们也有其他一些宗教,比如说伊斯兰教专门吃牛,你不让我杀牛,这个还得了,我没法生活了,这个就产生了宗教矛盾。但是印度大部分是非暴力的,主张和谐。后来印度主张所谓的不结盟运动,也是由非暴力衍生而来的。但是他们也有些东西违反非暴力,比如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也产生了一些矛盾,往往用暴力解决,这个是另外一回事,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第五个特点,林加崇拜,也就是性力崇拜。这个林加就是男性生殖



器。这个是印度教里面的特产,当然有一些国家古老宗教也崇拜这个东西。但是印度从古至今依然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崇拜的偶像,这个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而且这种崇拜融入生活各个层面,特别是建筑艺术里面。在印度往往开始很不理解,印度这样一个封闭国家,连拉手和接吻都不可以,在电视里面过去不可以接吻——但是在宗教里面这个东西却是非常合法,在这方面比中国要开放得多,这个是两个极端。那么之所以如此,就是他把性力这个东西,作为一种生命,是宇宙产生的源泉。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对宇宙本源的穷追探索,导致了生殖崇拜这种古老方式在印度哲学、宗教和艺术中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因为没有什么比生殖现象更能简单地解释宇宙的起源了。”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些他的画面。(展示)这个是巴罗达市大学里面,我们开始去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很吓人的,这个是它的一个庙宇里面的一些雕塑里面的东西,好多都是男女做爱的一些场面。就是这样一些东西,都是艺术品,它从这个艺术品反映出来印度教的性力崇拜。然后有一些建筑,就是这种形象的,有好多庙宇就是和性力崇拜有关系。

以上我们把印度宗教的特点勾画了以下,现在我们总结一下。印度教总的特点,我们用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印度的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琢磨、禁欲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扎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前面三个分号,后面就是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印度很多的庙宇里面,有很多印度的和尚,实际上人家是印度教徒,主事的婆罗门什么的。但是还有一些舞女,有一些专门做舞女的,就是家里没钱的一些女孩子,被卖到庙宇里面,大多是非自愿的,还有一些寡妇,因为印度寡妇是一种灾难,寡妇没有生活着落,一些漂亮的寡妇,也到这里面跳舞。因为印度教崇拜林加,所以这个舞女其实比妓女还妓女,有一些庙宇就胡来了,就把性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宗教的仪式,很是荒唐。印度这个社会很有意思,很多你不可理解的东西,它既是非常非常封闭



的,但是在某些方面又是开放到了极端。所以,马克思说的“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很好地概括了印度教的特点。印度教最大的神,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毗湿奴,她就是最大的舞女,她有“舞论”,最早就倡导这个舞蹈,所以印度的舞蹈非常发达。凡是精神方面的东西,印度的文学、印度的哲学、印度的舞蹈,它在精神层面的东西在世界上是叫绝的,这一点我们中国是不如的。但是印度其他的方面,比如科技生产力方面,科技发明方面的东西,印度对不起了,没有了,这个是印度的特点。

3. 印度教的历史作用和对未来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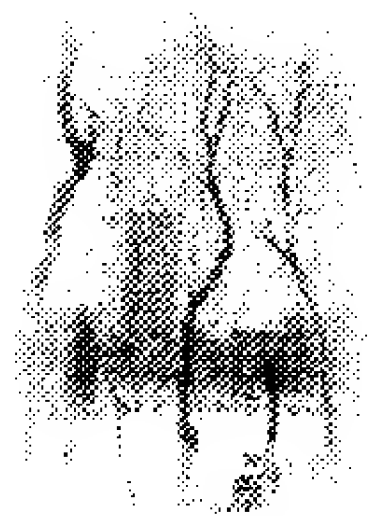
下面我们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印度宗教,或者印度教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对未来的影响。跟世界各国的宗教是一样的,印度宗教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是双重的。有一些国家的宗教在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以积极作用为主,在另外一个时期可能是以消极作用为主。但是印度的宗教到底怎么评价,特别是印度的印度教,到底怎么评价,目前正是学术界正在探讨的问题,而且是尚未得出结论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是我讲,但也是我和大家一起探讨;我把客观情况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一起看看能不能得出结论。得不出结论也没有关系,可以启发我们进一步地去探讨。

积极作用应该是说很明显的,它的积极作用可以概括成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积极作用是提高了东方的精神文明,同时又维系了印度古老文明的存在与发展。所谓提高东方的精神文明,这个主要是指佛教,不是指印度教。佛教创造了东方人的精神文明,说老实话,如果没有印度的佛教,还有中国的儒家,是不可能有的现在的东方的文化的。所以印度的宗教,特别是佛教,对世界、对东方的文化功不可没。印度在这方面确实立了一大功。后半句话,“它维系了印度古老文明的生存和发展”。这怎么讲呢?印度存在到今天,成为一个古老文明大国,泱泱大国。世界上泱泱大国没几个的。能够保持其古老文明美妙之青春一直到现在,没有几家,除了中国大概就是印度了。其他的国家比如伊拉



克,埃及,都是衰败下去了。但是印度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它有一些分裂,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分裂出去了,但是主体还是存在的。印度之所以没有四分五裂成为一系列小的国家,衰败下去,而且它自己一个古老文明的文化,从古至今依然能够存在下来,首先应当归功于印度的宗教,包括佛教,特别是印度教。从古老的吠陀,婆罗门教,到现在的印度教,印度教使得古老的印度文明能够传下来,使印度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因为文明不是空的东西,是信仰把大家凝在一起。印度的文学、建筑、哲学诸多方面都是靠印度教支撑的。印度教跟艺术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是形式又是内容,既是宗教经典,又是文学作品。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几十卷长的版本。那么它里面说的就是一些宗教的内容,只是宗教与文学合二为一了。所以印度人把这个东西作为他的信仰,这就是印度文化一直传到今天的原因。

其二,就是印度教为反殖民主义和印度民族复兴创造了有效的功绩。印度教的功绩就是反对殖民主义,复兴了印度并成为一个大国。就是因为甘地利用他特殊的魅力,用宗教里面非暴力的思想,把印度民众团结到一起。英国人要反对的东西,他就要发动群众保护这些东西,来提倡这些东西,把民众团结了起来。经过了几十年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经过一系列谈判,终于在1947年把英国人赶出了印度,一面闪闪的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南亚大陆的上空,一个新生的国家诞生了。现代印度国家的诞生靠的就是非暴力,靠的就是这种印度教的哲学,所以说印度教功不可没。这点我们要充分肯定。即使在今天,印度教依然把印度凝聚在一起,要赶上中国,要超越中国,造原子弹,中国人上天后他们马上说其实我早上天了,我只不过是和俄国人一起上天而已。在7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坐了俄国人的宇宙飞船上天了。现在2005年你看着吧,我们马上就上天了,我就要赶上你中国了。这种劲头靠的也是印度教,这个是我们中国人不可理解的。现在的执政党是人民党,原来是国大党,国大党是比较世俗的,是比较现代化的。现在上台的是印度人民党,这个党是纯粹的宗教政党,在我们看来一个宗教政党能够执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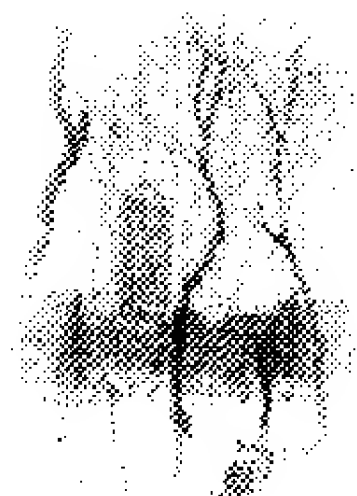


而且能够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很不可理解,但恰恰是人民党就抓住了印度人民的心理,要符合古老的印度的孔雀王朝的地位,要和中国比高低,要赶上西方大国。这些口号很有号召力。印度教的一些哲理、一些价值观,也成为他们一个有效的工具,这个方面应该说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就是印度教构造了印度议会民主制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这一点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我们搞这个研究的就知道,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西方人认为是专制、非民主的国家,美国老要改变中国这种社会制度。美国说印度多好,印度那么大的国家,那么穷,印度为什么就能实行议会民主制度?我们有一些同学,也说印度都能搞,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议会民主制度?当你了解印度的宗教了,这个问题虽然也不可能得到全面解决,但是至少可以得到部分解决了。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有多方面的基础,比方说它的历史基础。不断地被外敌入侵,使印度没有形成一个像中国这样强大的中央集权王朝,而是形成了一些小王朝,一些分散的小的国家,中央权力很小,大部分权力在基层了。所以印度的历史上没有中央集权的历史因素。再一个它又是多民族、多种姓、多宗教、多语种的一个国家,这样的多元化也是议会民主的一个基础,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基础。在思想和价值观等等一些方面,也为它的议会民主制度奠定了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你了解了这个以后,你就觉得印度尽管很穷,但是它实行议会民主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印度教里面倡导了几个东西,和西方议会民主倡导的东西有某种契合点,有某种亲和力,有一些相似,虽然不可能都一样。印度这个文化特点和西方的文化特点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这些东西确实有相似的地方,而这些相似的地方恰恰是印度议会民主制度的一个文化和社会基础。比如说印度教倡导的就是超自然主观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印度教信泛神论,神是高于一切的,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神是最高的,因此印度人对于权力、对物质、对财富都是非常淡化的,看不起权力、看不起物质,他最看得起的就是精神上的领袖,看得上的是精神上的智慧。他对婆



罗门是最崇拜的,所以一切都是听婆罗门的,都听教授的,他不听政府官员的,政府官员在他看来不过是一个行政官员而已,真正我崇拜的,我信仰的,我听信的精神领袖是宗教的婆罗门。所以这种超自然主义,使权力的地位在印度人的心目中直到现在也是非常低下的。在古印度社会里面,一个国王和一个宗教婆罗门两个人在一起走,老百姓会给婆罗门敬拜,而不给皇上敬拜。他对权力并不崇拜,对财富也不崇拜,崇拜的就是精神定律。那么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为它的议会民主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中国则崇拜权威,权威是高于一切的,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毛泽东是高于一切的。印度人也崇拜甘地,但甘地不像毛泽东,毛泽东可以有钱,但甘地不可以有钱。任何阶层,包括印度共产党对甘地也没有二话说的。过去斯大林说过甘地一些坏话,但一般人不谈甘地,甘地是没有任何缺点的,人们对他那简直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崇拜甘地并不是他有权——甘地没有任何的权力。他只有在没有权力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号召老百姓不用一枪一炮把英国人赶走了,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印度宗教的魅力;不是靠权威,靠的是他这种精神的魅力。你看到甘地的形象了吗?你看他赤身裸体,一个老头,光头,拄一个拐棍,这个是年老的时候,后来被杀死了。一生完全是奉献,没完没了的绝食,一绝食就是几十年,不吃任何东西,只喝点牛奶,坐过几千天的监狱,这样一个人被印度人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宗教这个东西就为他的议会民主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然后宗教又走向法制化,种姓法制化。印度人非常重视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有法可依、有法可寻的,这个跟中国重人治的情况大不一样。这个社会虽然古老、封闭,但是它的法治观念非常强,它的法治不只是现代西方的法治,而是和宗教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印度有摩罗法典,摩罗法典相当于大的宪法,很厚的。除了这个大法以外,还有很多的部门小的法典。人们的举止行为、食物、身份、层次、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按宗教都有明文的规定。所以不需要用现代的法律去规定他,约束他,人们自然而然就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当然也有落后的,有的废弃了,但是总的来说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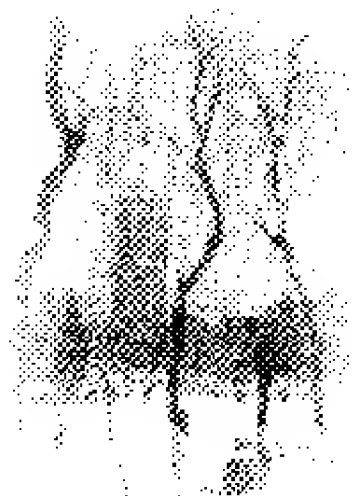


治观念,从古至今都非常强。印度形成议会民主制度以后,就把古老的法治和西方的法治结合起来,所以印度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全面,也是最厚的一部宪法,而且每年议会里面还要不断地修正。每年都要修正一两条。加在一起就很厚。印度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厚的宪法,因为它的法律详细得不得了。而且,印度的法治化和中国的人治化是不一样的。这个法治化和民主化是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化的另一个社会基础就是种姓的集团化,就是印度各个种姓都形成集团,高种姓、低种姓,包括贱民也有种姓集团,也有代表的,不需要人为组合,就按照种姓形成各个集团。各个集团都希望在议会里面能有自己的代表在那里发言,所以就形成了一种类似西方的选举制。这些东西,就是印度教里面倡导的东西,和议会民主制有些方面是相吻合,有一定的契合点。印度议会民主制度有其社会基础,有其文化基础,这个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由此可以举一反三,中国为什么没有形成议会民主制度?我们的传统,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跟印度相差很大。所以中国要形成议会民主制度,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但是在比较中我们可以发现,印度民主制度有一定可以供我们借鉴的地方。虽然它的议会民主制和西方相比也有些缺陷,但是不管如何,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为它现代化奠定了一个政治基础。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印度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民主的建立不是很困难,因为它基础非常好,加上英国人长期把它的议会民主制度移植过来了,恰恰又适合印度这块土壤,就开花结果了。政治民主的顺利建立为它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以上是几个好的方面。还有其他的,包括它对自然界的保护,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自己的和谐,都对现代化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社会的和谐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下面我们谈一下印度宗教的消极作用。前面我们从以上几方面谈了它的积极作用,这一点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印度教里面的消极作用也非常明显,这种消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应该远远高于西方的基督教。基督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大家知道马克思·



韦伯,他和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的社会学家。他写过这方面的论证,他的一个观点就认为西方的议会民主、西方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基督教的文化。西方宗教文化对现代化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提倡人性,提倡竞争,提倡个人主义,这个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且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东方的宗教信仰制度恰恰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阻力和障碍。他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就是因为宗教起了一个阻碍作用,儒教起了这个阻碍作用。印度教也同样如此,在印度社会进程发展当中,它虽然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消极作用,特别是在近现代,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具体表现,一个就是种姓制度和宿命论,窒息了人的创造性和反抗精神。我们刚才介绍了种姓制度,这种种姓制度,世袭的职业、内婚制、等级制度,这些都是不变的,生来如此,年年如此,月月如此,一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此。你说那么多的贱民,他们的孩子应该说智力能力也跟高种姓的是一样的,里面也很可能出现了几个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只能由泰戈尔这样一些人实现。就是说印度的种姓制度,把它固定化了,不可能有任何的变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就是印度的种姓制度是印度社会发展的基本障碍。虽然到了现代,印度种姓制度有一定的削弱,特别是在城市里面,大学里面,看不出谁是高种姓谁是低种姓;但是在印度农村的七八亿人口里面,种姓制度依然存在的情况之下,它对印度社会的发展无疑会起消极的作用。这个消极作用的表现最突出的是它窒息了人们的创造力。大家知道宗教是上层建筑,它是为社会基础服务的。印度社会原来是什么样一种社会呢?它是一种村社制度。印度从古老的时代一直到英国殖民主义入侵之前一直是这种村社制度,是以村社为基础的这样一种社会。村社比我们的“村”要大,相当于我们后来的公社了,这个是它的社会基础。这种村社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村社里面闭关自守,自给自足,遵守种姓制度。这个很独特的村社是古老的印度社会的一个特产。这个村社,从古老社会一直到英国人入侵之前一直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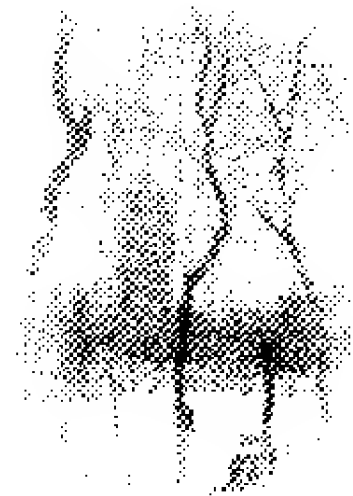
此,好象是田园的风味,表面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这个社会是极其保守的,极端落后的,有极大的惰性。商品经济不可能在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小社会里面发展。后来外国人不断地入侵,这个国家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村社还没有破坏。村社内部和外界基本上是隔绝的,与世隔绝,外面发生任何事情和我们没有关系,就是这样一个闭关自守的社会,一直是这样延续地发展。那么这种社会基层的组织 and 上层建筑,比如说印度教,印度种姓制度,二者紧密结合起来,落后的生产关系跟落后的上层建筑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使得本来非常落后的印度社会就更加落后,更加保守,更加有惰性。人的才智和创造性就受到影响,所以印度没有什么大的发明。在宗教面前,在种姓制度面前,你无可奈何,无能为力。这个村社制度窒息了人们的创造,还有反抗的精神。对外族入侵不能反抗,内部统治阶级愿意怎么变更与我无关,所以印度人的反抗精神和中国人不能比。说到创造性和反抗精神,你到印度去就会发现,人都是懒洋洋,包括我们自己一到印度就是懒洋洋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可思议,什么活也干不了了。(笑)现在这个天气还可以,这几个月没有问题(演讲时正值冬季)。一到三月份以后,一直到十月份,这个期间早晨九点钟以前还可以干点事,九点钟到下午四点这段时间什么也不能干,太热了就在屋里睡觉,电扇没完没了的开,24小时不关的,全身裸体,没有事做。大街上也没有人,谁也不上街上去,只有个别的贱民在劳动。这种炎热的气候和种姓制度的存在也是有一定关系,就是反抗精神很弱。中国的农民大起义简直多得不得了,历史上无数次。印度到底有多少大起义,几乎没有。我们说1857年的大起义,什么大起义,那个是小起义,很小很小的。所以印度主张非暴力,这个和印度的国情,和印度的宗教特点很有关系,和印度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印度人的性格非常温和,不像我们,在汽车上你碰一下我,不得了,两个人简直吵得翻了天。在印度,你踩他,你挤他,没事,非常的温和。印度公共汽车的人比中国公共汽车的人多得多,没有门,随便上,上车还不买票,可以把着窗户上去。印度人犯罪也很少,犯罪往往是在宗教



问题上比较多,但是在一般情况下比较少。

其二,就是造成外族不断入侵和国家的不断分裂。由于这种村社制度,闭关自守与外界很少接触,所以从古老社会一直到现在,印度是一个没有自己文明的一种历史。这个是马克思说的,不是我说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印度人往往非常反感,但是印度确实是一个没有自己文明的民族。你要了解印度历史,确实是不断被外族入侵的历史。最早的人侵者是雅利安人,实际上产生于现在的印度东北部,它侵略到这里,然后一直打到德国去。现在印度北部大部分都是雅利安人,长的非常高大,形象非常美好,男的、女的都非常漂亮。你看印度的小姐、印度的模特在世界上很有名的,就是雅利安人种。雅利安的人侵,把当地的土人,即达罗毗图人,又黑又小又瘦的那种人,撵到了南方。雅利安人以后,到了中世纪就是阿拉伯人不断入侵,阿富汗人的人侵建立了德里苏丹王朝。后来蒙古后裔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延续了几百年,是在明清时期。然后就是西方人不断入侵,荷兰人、法国人、英国人,英国人把法国人打败了以后,单独统治了印度 190 多年。造成外族不断入侵很大的原因就是印度宗教的原因,因为村社制度和种姓制度,造成他们各守一摊,谁都不管谁,与外界很少发生关系,外界发生任何大的变化都是与我无关的。所以,虽然印度总体来说是一个整体的社会,但是一直在不断地分裂。英国人入侵了以后,把大家团结起来,建立了一个空前的英印帝国,当时包括阿富汗的一部分、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但是英国人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把不同的民族放在一个邦里面,把一个民族分到好多邦里面。所以英国人走了以后,制造了印巴分裂,制造了克什米尔问题。后来巴基斯坦分离出去了,孟加拉最后也分离出去了。这个是印度宗教的第二大消极影响。

第三个消极影响,就是民族分裂运动严重影响了政局和经济发展,并且恶化了邻国关系。印度人非常温和,讲宽容,讲慈善,为人非常和善,它的价值观本来是非常好的。可是一旦遇到了宗教冲突的问题,这些就都抛在脑后了。在教派斗争问题上,从古至今一直是连绵不断,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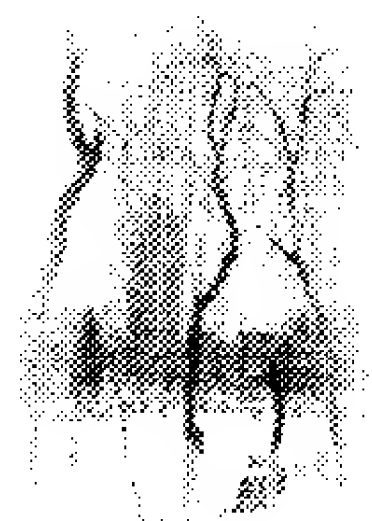


派与教派,宗教与宗教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仇恨往往是非常深刻的,用哲学和宗教的原理往往不能解释。在伊斯兰有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印度教派斗争特别引起了印巴分治。印巴分治本来是英国人制造的一个阴谋,但是同时也是印度教自身,特别是印回两教互相残杀的一个结果。因为印回两教,就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家本来就不断有矛盾,英国人没办法说你们两家分开吧,可是在分开的时候,本来好端端的一个印度,分出一个巴基斯坦而且两部分还不挨着;又分出一个克什米尔没有指定归属。大家看地图。这个是巴基斯坦,这个是孟加拉,这个是克什米尔,英国人统治的时期,当时的巴基斯坦、孟加拉都是印度的领土。它们 1947 年独立的时候,因为这两个地区主要是信伊斯兰教的地区,所以当时的宗教矛盾不断地激化。英国人退出以后,采取了印巴分治的措施,主要是分为信仰印度教和信仰伊斯兰教这两块地区,就是现在的印度共和国和东巴、西巴,这个东巴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克什米尔归属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个分治一方面有英国人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宗教自身的问题,是印巴宗教冲突的结果。这是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一个大的难题,印巴之间旧仇未消,又不断地增加新恨,特别是在 1947 年英国人撤出之后的民族大迁徙。因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主要是伊斯兰教的,印度主要是印度教的,但是两个宗教往往是混杂在一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英国撤出以后,为了使这个矛盾解决,所以就产生了民族大迁徙,就是在巴基斯坦的印度教徒往印度这边迁徙,在印度国内的穆斯林向巴基斯坦这边迁徙。大迁徙造成了灾难,死了 50 多万人,大概有一千多万人无家可归。本来印巴有好多工业、农业都是连在一起的,分裂以后,在经济上造成了人为的割裂,使得两国经济受到严重的影响。宗教的矛盾也一直没有解决。而且克什米尔一直是两家争议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现在印巴要缓和,但是这只是缓和而已,真正的解决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教派斗争除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斗争以外,就是印度教和锡克



教之争。锡克教产生于 15 世纪,是把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个宗教结合在一起组成的一个宗教。锡克教吸收两个宗教的特点,但是主要还是印度教的特点。那么锡克教的特点是什么呢?人们常叫“五 K”,凭着这五个的特点人们一看就知道是锡克人。第一是戴着“帽子”。这个不是帽子,这个是好长的一个头巾。然后胡须和头发从来不理,然后戴梳子,锡克人很有钱,在国外有很多它的移民,他们把在国外挣的钱拿回国内,搞绿色革命,买拖拉机,农业非常发达,资本主义非常发达。锡克教地区非常的富裕,相当于我们的江浙一带;虽然是内陆地区,但是它的富裕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他们很有钱,就想搞独立,所以从 80 年代就开始搞独立运动,成立锡克共和国,在国外印的钞票、印的国旗什么都有,在国内人民包括锡克的学生领袖在一起,就和政府直接对抗。当时执政的印度总理是英吉拉·甘地,当时和他们谈判,谈判没成。然后在 1984 年的时候,锡克人包括学生领袖,把几万人集中在锡克庙里面和政府进行对抗,他们也有钱,买了很多的武器。然后印度政府出动了几个师的兵力进行镇压,经过了几个星期的战斗以后,把锡克庙占领了,把锡克教领袖打死了,学生会主席打死了。这样一个举动引起了锡克人极大的愤慨,他们一定要报这个一箭之仇,不杀死甘地誓不罢休。所以在 1984 年 10 月,英吉拉·甘地最信赖的两个卫兵,恰恰是锡克教的杀手,当她在总理府散步的时候,当场把她开枪打死了。这个是印度历史上第二次暗杀事件,在印度引起极大的震动。就是宗教的冲突,因为甘地没有很好地处理宗教之间的关系,用武力去镇压。她死的前后印度教对锡克教的斗争死了很多人,是世界上一大事件。在这之前大概是 1947、1948 年,老甘地被暗杀,就是被一个极端的教徒暗杀。老甘地被暗杀是因为他提倡解放贱民,提倡印巴和解,提倡印度教宽容,所以极端的印度教徒拿起枪把老甘地暗杀了。这次暗杀也是由于宗教的矛盾。他们两代人都成为宗教教派斗争的牺牲品。所以这个教派斗争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从这里面我们看出印度的教派斗争,与邻国的这种斗争,恶化了国际关系,恶化了印度国内的政



治稳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最后一点消极影响就是滋生了陈规陋习,影响了印度的人口婚姻价值观。印度教本身的一些说教原则,在生活中也有一些体现;它的一些规则、法律都是要执行的。在执行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许多的在我们看来是非常丑陋的现象,与现代化生活格格不入的现象。最大的一个危害就是人口的增加。现在它是 10.5 亿,每年增长 1700 万,相当于每年增长一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 1600 万,它每年增加的人比澳大利亚还多 100 万。十年就生产一个日本。所以再过 20 年,中国的人口就不是世界第一位了,我们就非常高兴了。(笑)我们就是希望脱掉这个老大的帽子,这个帽子就让给印度了。(笑)为什么印度人口增长这么快呢,就是因为宗教里面一些哲理,一些说教,促进了印度人的生育。印度政府很早就提倡计划生育了。我们是 70 年代提倡的,印度很早就提倡了,独立以后就提倡计划生育了。但是计划生育在印度实行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印度人崇拜宗教,对政府的规定是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的。议会里面的 500 多个议员里面,有 400 多个议员都是有三个孩子以上的,很少有两个孩子以下的。所以超生游击队在印度并不是个别的现象,在印度到处都是,在桥底下到处都是五六个、六七十个的,一个比一个大,一排一排的不得了。反正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到哪儿也不需要房子,一住就可以了。也没有人管,因为印度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你住哪没有人管,不像中国还有人管你。印度教里面就是提倡多婚多子,特别是男孩子,在印度教里面就是认为女子不好,男子是好的,就是性力教。刚才我们说了印度教崇拜性力,性力是宇宙的源泉,你生得越多,说明你人丁兴旺,说明你在印度教里是一个最好的人。所以印度人信仰这个。而且加上印度的气候,使人们往往早婚,导致生育更加旺盛。印度人过去十几岁就结婚,甘地就是十几岁结婚的。现在提倡 18 岁以后,但实际上往往都是 18 岁以前。今天在座的大家都是大男大女,大部分没有结婚,但是如果在印度今天在座的可能就都是结婚的了。(笑)越是早婚生育越多,越晚婚生的越少,所以印度人口数量就越



来越多。然后在婚姻状态里面,有很多的怪现象,比如说童婚。这个童婚就是说到了一两岁小孩就可以结婚了,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风俗。提倡早婚,就引起了童婚,因为结婚要花很多钱,特别是女方要给男方很多钱的,这点和中国不一样。所以早婚大家就可以节省很多的钱,就采取集体结婚的方式,一到“黄道吉日”的时候,宗教节日的时候,你抱着小孩,我抱着小孩,两个人一说就行了。俩小孩正睡觉呢,就做了丈夫了,做了妻子了。(笑)就是这种童婚现象屡见不鲜,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童婚现象还是存在的。然后是嫁妆,现在印度兴起了一个叫做反嫁妆运动的。印度的嫁妆可是不得了。什么意思呢?在中国,虽说中国也有嫁妆,但是聘礼更昂贵。在农村,你要没有几万块钱,你能娶上媳妇吗?娶不上。而且现在要价在不断地提高。印度正好反过来,就是说你生一个女儿,你要很多的陪嫁,男方才肯要你,你嫁妆越多,你嫁的男人越好。嫁个好男人,你长得漂亮是一个方面,但是更主要是你要有钱,你要有嫁妆。印度的嫁妆也是在不断的提高,就像我们的过去的“四大件”和现在的“四大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一样,现在的印度没有几万块钱是根本不可能把女儿嫁出去了。所以印度的穷人要生一个女儿,就哭哭啼啼,要是生两个女儿就不得了了,要是生三个女儿按照中国话简直就是倒了八辈子霉了。所以印度政府兴起反嫁妆运动,就是要取缔。但是现在嫁妆习俗还是过去老一套,所以现在有好多地方的穷人为了嫁女儿,就采取极端措施,抢新郎,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假期,利用假期咱们就抢,就把这个小伙子硬抢回家,然后两个人就成亲。(笑)按照印度的风俗习惯,一旦成了亲,拜了天地,对不起了,你再想离婚就没门了。所以大家到印度去千万要注意,别被人抢了。(笑)还有印度的妓女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贱民,贱民也是一大问题,1.5亿没吃没穿过着那种非常贫困的生活,很难解决。印度政府想解放他们,但是印度风俗使这个很难办到。以上是我们介绍的印度宗教的弊端,因为时间关系,就介绍以上几点。

最后来讨论印度宗教对印度现代化的利弊问题,我提出我的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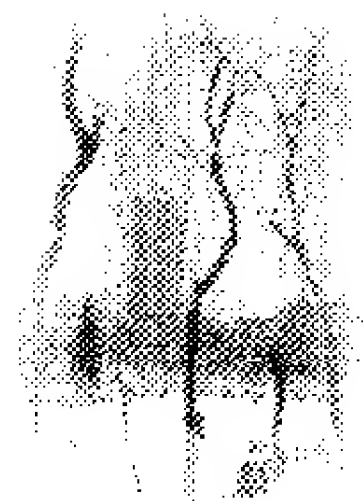
个人的意见,希望和大家一起探讨,试图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印度宗教对印度现代化是弊大于利。印度宗教对它的社会到底是利大还是弊大,这是一个饱受争议的问题。我们现在主流派的观点认为还是弊大于利。虽然印度宗教有有利的一方面,但总体上说还是弊大于利。目前我还是赞成这种学术观点的。但是这种观点能不能成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为什么说印度宗教对印度未来社会发展是弊大于利呢,因为和西方宗教相比,印度的宗教的弊端对现代化的阻挡比西方多得多。西方的基督教的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它提倡竞争、提倡个人主义,这在印度是绝对不允许的。印度教里的一些制度,我们谈到的它的特点,包括它的价值观,虽然有好的一面,但是对社会总体发展明显是弊大于利。印度和中国两国的现代化比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中印两个国家基本上是同时建国,同时独立的。他们 1947 年独立建国,我们 1949 年建国。两个国家在刚刚独立建国的时候,印度在很多的方面都是优于中国的,在农业、工业各个方面绝大部分都是优于中国的,只有个别方面中国是领先于印度。它的人均产值是 150 美元,我们只有 70 美元,它高出我们一倍。虽然印度也是殖民地,但是因为英国统治了 190 多年,所以它的基础比我们强,它的钢铁业、制造业比我们优越,总产量高于我们,它的现代化程度也比我们高。但是经过了 50 多年的发展,50 多年的较量,除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它快速赶上我们以外,整个的发展速度,我们是远远高于它的。虽然不能说被我们远远抛在了后边,但是已经落后了我们一截,在某些方面甚至是一大截。它只有在个别方面,个别的领域,是和我们相似的,甚至略高于我们。它的软件、高科技、高等教育可能比我们好一些。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数字。2001 年印度的经济总量是 4000 多亿美元,中国那个时候不到一万亿美元,现在已经 1.1 万亿了。印度是世界第 11 位,中国是第 7 位,现在已经第 6 位了。它的人均收入是 450 (美元),我们是 800 多,现在可能 1000 多了,我们是它的一倍以上。还有国际竞争力,它是第 41 位,我们是第 24 位。还有一些产量,除了牛



奶它是我们的十多倍以外,钢的产量,原煤、原油、水泥的产量,几乎所有的项目我们都远远超过了它。再一个就是外贸。它的科技强项跟我们相比根本不算是强项。这里面,信息产业比我们强,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跟我们差不多,有的方面比我们落后。科技实力的比较,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它是第29位,我们是第13位,它在这些方面总体还是比我们落后的。它的教育,识字率是52%,一半,现在好像又多了一点,大概是60%。即使是60%的话,还有40%的人不识字。中国当时大概是80%,现在可能还高于这个。总之,经过50多年的发展,原来我们是各方面都落后于他,现在我们是全方位地超过了它,所以从两国的现代化的对比中,我们看出,宗教因素应该是造成印度现代化落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想大家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角度进一步探讨。

第二个结论就是我们应该挖掘印度教中对现代化有价值的、有合理性的一些内核,特别是“梵我合一”的价值观。印度教里面有许许多多落后的东西,我们从学术上客观分析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人家的长处。一个是我们要从经济方面学习它的长处,另一个是宗教里面,虽然一般来说都是落后的东西,但是还是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是比较客观地介绍它的长处与糟粕。其实在这里面,它这个梵我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种非暴力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比如我们最近所说的“和平崛起”,和平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就是要和平,我们就是要提倡和平崛起。其实我们原来是“革命崛起”的,我们靠革命,靠枪杆子打出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你要还是靠这个东西就不行了,这个一定会把我们搞垮的。现在改革开放了,经济发展了,这样和平崛起了。印度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想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和中国、巴基斯坦都打过仗,尤其是印巴冲突不断。现在看来印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看现在印度的材料,它说“现在至少在15年内中国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了”。它的主要思想,它最主要的指导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中印关系在和解,印巴之间现在也正在和解。印度事实上也在转变。其实



从立国之初它本来是和平崛起的国家,不是暴力起来了,结果后来走向反面了,要发展军队,发展原子弹。其实它完全不应该发展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老百姓还没有饭吃,你为什么要发展原子弹?你不发展它不挺好吗?现在和原来的情况不一样了,又回到了和平的道路。也就是说,今天它也是要和平发展,中印这两个大国都要和平崛起,要在新的 21 世纪进行和平竞赛,这个是很可贵的。印度宗教里面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如果挖掘好,对印度现代化是很有价值的。我们也在学习印度宗教哲学的东西。当然,它的哲学里面好多东西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的东西,两家是不谋而合的。

第三个结论就是印度教中的一些糟粕,将会在迅猛发展的经济和科技现代化的进程中慢慢被突破。就是说你不要觉得印度好像总是那么落后,它也会发展。任何旧有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经济发展面前都会碰得头破血流。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慢慢会冲破一些宗教的桎梏,只是比较迟而已。所以印度的崛起是迟早的事情,虽然现在发展很慢,还很落后,甚至相当时间都很可能一直落后下去,但是我们相信印度的崛起是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的。亚洲这两个大国在新世纪的崛起,应该是不在话下。这个是我的一点看法。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印度种姓制度那么糟糕,民族还是那样落后。没有关系的,它会慢慢发展,随着它现代化的发展,它的许多糟糕的东西都会逐步淡化的,都会有所重大的变化。

最后一点是我的一点想法。如果印度真要想赶上中国的话,它就必须实行宗教改革。如果说不赶上中国,慢慢来发展是可以的,但是它要想赶上中国,就必须实行宗教改革,学习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一种新教改革运动,要出现一些出类拔萃的高人。像当年的尼赫鲁那样的人是可以的,但是在现在这种制度下没有这样的人。当然,印度的思维结构非常发达,印度尼赫鲁的哲学是有名的,我说的那种高人在印度是会出现的,我想会出现的。如果印度出现宗教改革运动,包括类似中国的五四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把它的一些旧的东西扬弃,就会出现一个新



的印度,一个新的印度宗教。那时,印度的现代化将会有大的提高。我寄希望于印度的未来。

因为时间有限,今天的讲座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热烈的鼓掌)

(2004年12月5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 □ 8 □ (□□□□□□□□)

□□ = B E X P

S S □ =

□□□□ =

□□□□ = [http://book7.5read.com/b300-2/di
sktbb/tbb06/04/!00001.pdg](http://book7.5read.com/b300-2/di
sktbb/tbb06/04/!00001.pdg)